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浙东抗日根据地

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
浙 江 省 档 案 馆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分 综 述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3)

第二部分 历史文献和报刊资料

-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从淞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致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电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 ……(25)
- 陈、曾对谭启龙提议的答复(一九四二年六月) ……(26)
- 关于派谭何主持浙江工作并责成谭传达华中局“七·一”决定的通知(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 ……(27)
- 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 ……谭启龙(28)
- 浙东区党委关于最近浙江形势发展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46)
- 浙东区党委报告华中局关于接受华中局十月二十三日及十一月九日指示的决定电(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9)
- 陈、饶、赖致浙东:敌后为我最好的发展地区,应首先巩固三北,保持四明、会稽游击坚持(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52)
- 浙东区党委关于开展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54)
- 浙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对三北部队及地方党的指示

| | |
|-------------------------------------------------|------------|
|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 (60) |
| 陈、张、饶致谭、何：在国共关系日渐好转情 况下对浙东今后任务与工作的指示 | |
|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二日)..... | (67) |
| 三北游击司令部通报(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 | (68) |
| 张、饶、赖致浙东：关于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 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命令 | |
|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82) |
| 华中局致浙东区党委：同意成立浙东行政 委员会及其纲领之指示 | |
|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83) |
|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 | |
|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 (85) |
| 浙东区党委关于出版《新浙东报》与加强报纸 工作的决定(一九四四年四月)..... | (88) |
| 浙东行委会财经处给各级财经工作同志的 指示信(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 | (91) |
| 浙东行委会财经处关于财政开源问题的指示 | |
| (一九四四年五月六日)..... | (97) |
|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三十三年公粮田赋 合并征收办法(一九四四年)..... | (106) |
| 第三届浙东文教会决定新的文教方针 | |
|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 (112) |
| 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节录) | |
|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 谭启龙(116) |
| 浙东游击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向党中央、 毛主席致敬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 (131) |
| 毛泽东对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给中央致敬电的 复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132) |

| | |
|-----------------------------------------------|--------------|
| 连柏生在浙东临代会上的一年施政报告(摘要) | |
|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 (133) |
| 浙东地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 (138) |
| 何克希作三年来艰苦斗争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摘要)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 (143) |
| 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致毛泽东暨中共中央电(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 | (149) |
| 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宣言(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150) |
| 浙东行政公署令(财字第十五号)(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 | (153) |
| 浙东行政公署令(财字第十六号)(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 | (155) |
| 浙东区党委关于发行抗币与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 | (159) |
| 浙东行政公署令(民字第六十二号) | |
|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 | (163) |
| 浙东区党委秘书处转发华中局来电(一九四五年八月)..... | (168) |
|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对敌伪军通牒 | |
|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 (170) |
| 关于日本投降形势下我军事行动的电文 | |
| (三则)(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十六日)..... | (172) |
| 浙东区党委关于敌寇投降后形势与今后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 | (174) |
| 谭启龙、何克希为浙东游击纵队北撤致知名人士告别书(一九四五年九月)..... | (179) |
| 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 (180) |
|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四年战绩(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 (184) |
| 杨思一日记(节录)(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 (186) |
| 我参加了新四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 | 岩冈文雄 (202) |

欢迎新同志岩冈文雄君(一九四五年六月

十三日).....栗花落岩(204)

第三部分 回忆录

浦东部队渡海到浙东敌后开展工作的一些

情况.....顾德欢 吕炳奎(209)

浙东四年.....谭启龙(217)

根据地建立前的浙东地下党及其抗日

斗争.....浙江省委党史办公室(241)

回忆浦东游击队.....连柏生(255)

“老三纵”的前前后后.....朱人俊(259)

初到浙东.....蔡群帆(266)

烟消云散太阳红.....钱忆群(269)

南进会稽山.....黄明(278)

杨葛殿痛击日寇.....张季伦(290)

梁弄战斗.....刘亨云(294)

浦东支队在反“清乡”斗争中发展壮大.....朱亚民(298)

从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到金萧支队独立

大队.....彭林 孙秉夫 张志莹(311)

血战大鱼山岛.....张大鹏 何亦达(318)

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情况.....何克希(327)

围攻许岙.....张文碧(330)

浙东游击纵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江岚(339)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陆慕云(343)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外事三则.....顾春林(353)

惜别四明.....谭启龙(366)

澈浦战斗.....何克希(371)

忆吴山民.....杜承钧(375)

国际主义战士坂本贤阶.....江征帆(384)

第四部分 日寇暴行一斑

“千人坑”——日本侵略军屠杀侨民

- 纪实……………余杭县委党史办公室(395)
- 青东大屠杀纪实……………青浦县委党史办公室(397)
- 难民生活的回忆……………郑雪芬(400)
- 顾祝同、黄绍竑关于日寇在浙江散布鼠疫菌罪行
呈报行政院电……………(401)
- 日寇曾在宁波金华散放疫苗杀害人民……………萧凡(402)
- 回忆义乌一带人民惨遭日寇鼠疫菌杀害……………楼秋星(403)
- 大蛟的浩劫……………田心(404)
- 三十九天血的经历……………倪哲生(406)
- 日寇火烧南黄暴行……………余姚县委党史办公室(407)

附：图表

-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战斗序列表(一——三)……………(409)
- 中共浙东区委员会组织系统表……………(413)
- 浙东行政公署组织系统表……………(415)
- 北撤前夕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示意图(插页)

第一部分

综 述

综 述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四个地区,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濒东海,南迄东阳至宁波的公路,西跨浙赣路金(华)萧(山)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地区,是个战略要地,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

一九三七年冬,上海、浦东各县和浙西杭、嘉、湖地区先后沦陷。日寇对沦陷区大肆烧杀淫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浩劫。国民党省政府南迁金华和永康方岩。在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抗战采取比较开明态度的有利条件下,浙江地方党抽调干部分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也在全省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全国形势开始逆转。浙江的反共顽固派也正在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一九三九年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浙江视察抗战。周恩来在浙期间,召集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就如何加强党的工作,加强沦陷区工作,坚持持久抗战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与黄绍竑等国民党军政人员晤谈,巩固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发动了宁绍战役,连陷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城。日寇仅用半个多月时间,即占领了杭甬线两侧、杭州湾以南整个地区。当时驻守在宁绍一线的国民党正规军和杂色部队不下十几万人,在日寇入侵面前一触即溃。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浙江地下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敌后抗日

游击战争。早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定海沦陷后，中共定海县工委负责人王起等即在东区农村组织了吴谢乡自卫队、东区警察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定海东区游击区。镇海沦陷后，县工委在江南组织了王博平、林勃领导的王贺乡抗日自卫队（后改称江南独立中队）。余姚沦陷后，中共余姚县特派员张光，指派原余姚中心县委书记王益生（赵树屏）到国民党三十四师残部孙彦龙连去工作，并把孙部与缉私营合编为“宁绍游击大队”。朱之光、赵继尧等也积极组织和发展武装，建立了“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了必要的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地区，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战区。并且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这是党中央一个新的战略决策。华中局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将开辟浙东、浙西两地工作的任务，暂归苏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同时，又派谭启龙在上海组织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打通同这四个省委的联系。浙江地方党在浙东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后，中共中央根据浙、闽沿海的新形势，又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的游击战争，准备成立一个战略单位。苏南区党委随即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浦东工作委员会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浦委认真研究了新形势，根据上级党指示的精神，作出了一方面坚持浦东，进行反“清乡”斗争；一方面把能够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有准备地渡海到三北敌后，协同当地党组织，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决定。

当时，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有两支武装：一支是坚持浦东抗日斗争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以下简称淞沪五

支队),一支是在伪军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根据党的决定,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浦东武装在蔡群帆、林有璋、朱人俊、方晓、姜文光等率领下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通过统战关系,先后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和“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浦东部队到三北地区共约九百余人。这支部队,成为后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建制的基础。

浦东武装南渡到浙东后,先后与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和宁(波)属特派员王文祥等建立了横的联系,并立即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六月十八日、二十五日,“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配合下,于相公殿伏击日寇,打死打伤日寇十六名,两战两捷。接着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又在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中连歼日寇。十月十日,三纵在登州街之西袭击了周巷出扰之日寇,激战一个多小时,迫使敌人逃回据点。十月二十二日,“宗德三大”在横河与日寇血战一个半小时,大队长姜文光和大队附姚镜人等二十九人光荣牺牲。十一月,我军在梅园丘与日寇遭遇,经激战后,敌逃回五夫据点,但大队长陆阳等十六人英勇牺牲。我军的英勇抗战,极大地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一九四一年十月,由吕炳奎、王仲良(即王耀中)、蔡群帆组成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为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在“暂三纵”和“五支三大”分别组织党的工作委员会。同时,与在三北的国民党薛天白、顾小汀等部队和地方开明士绅,建立了统战关系。随着敌后人民武装的建立和军事上的不断取得胜利,“五支四大”在地方党的支持下,设立了总办事处,并在慈北、镇北先后建立了古窑浦、海甸戎家、龙头场、蟹浦觉渡寺、沈师桥等办事处。“暂三纵”也在姚北先后设立了道路头、长河市、临山等办事处。办事处和武装部队一起,宣传抗日,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办事处开始部分地执行政权机关的任

务,成为后来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型。这时,我军已在三北地区初步站住了脚跟,开辟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由蔡群帆、黄明分别率领部队进入慈(溪)南山区和(余)姚南山区活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被捕,不久刘英在永康方岩牺牲。四月,华中局即派谭启龙到上海。五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创造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采用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五月三十一日,陈毅、曾山电令谭启龙“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

浙赣战役是日寇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发动的。当时敌人以十二万余兵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陷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直趋上饶,又一度占领永康、丽水、温州等地,先后侵占二十多个县城。驻守在浙赣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作了英勇抗击。后在国民政府为确保大后方安全,不惜放弃浙赣路沿线的指令下,三十多万军队纷纷撤出防地。不甘做亡国奴的浙江人民,在我党领导下纷纷在当地建立游击队实行武装自卫。诸暨沦陷后,在中共诸暨县特派员朱学勉领导下,六月中旬,由地下党员何文隆组织了泌湖乡抗日自卫队,九月扩大为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义乌沦陷后,在金华地区特派员陈雨笠和义乌县特派员江征帆等领导下,在金东义西组织了一些游击小组。七月,通过关系,取得了钱南军别动队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简称“八大队”,群众称为“吴山民部队”)。此时,陈流等在建德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名为“建德部队”或称“严州部队”。为了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日寇南进,并发展会稽地区武装斗争,我军二百余人组成“南进支队”,在蔡群帆等率领下,于六月六日从余姚游源出发,挺进会稽。中旬,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会合。下旬,在杨思一、蔡群帆主持下,在诸暨枫桥江下村召开了会议,决定以枫桥为中心

建立会稽山游击根据地。会后，南进支队即进驻枫桥，并在枫桥设立了会稽地区的第一个办事处。南进支队转战诸暨、义乌、东阳、浦江、嵊县等地，英勇抗击敌人。八月二十日，与出扰龙山、凤山之日寇激战，毙伤敌尉官柳泽春夫以下三十余名。浙东各县的抗日自卫武装也更加活跃。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淞沪三支”的支持下，镇北建立了以戚铭渠为队长、杜生甫为指导员的龙山自卫队。在鄞县县委领导下，组建了林一新抗日武装。七月，嵊东在张平山领导下成立了“侠义部队独立中队”，九月，正式成立了“嵊东抗日自卫独立大队”。

一九四二年六月，谭启龙和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等到浙东。谭启龙到三北后，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谭启龙为书记，统一领导浙东部队的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同时，在三北地区成立中共三北工委，王仲良任书记。七月十八日在慈北宓家埭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会上，谭启龙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传达了华中局对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的决定，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规定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接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一师师部所派的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张季伦、张浪、余旭、戈扬等一批干部到达浙东。早在七月八日，华中局已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任军事部长。七月二十八日，华中局决定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兼军事，杨思一任组织，顾德欢任宣传。十二月二日，经中央批准，区党委改组，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人为委员，谭启龙任书记。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华中局又同意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使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并取得抗

战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和浙东的实际情况,浙东区党委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并规定了实行总方针的各项基本政策。这就是:第一,要广泛地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要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武装力量,培养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广泛组织地方人民武装,这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前提。第三,要执行中央关于党在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决定: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交租交息。第四,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团结。此外,还规定了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政策。浙东区党委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的规定,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坚持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政委员会,由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组成,何克希任书记,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更名何静)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为政委,刘亨云(更名刘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三、四、五支队(简称“三五支队”)。此外,还有南进支队、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教导队和特务连。共计一千五百一十人(包括各办事处人员)。有轻重机枪三十六挺、长短枪八百七十八支。这支部队是巩固三北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的基本力量。另外,又派朱亚民等十二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党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为加强党的领导,区党委对宁绍地区党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四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包括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东部地区和定海县)工委和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工委。不久,各工(特)委改成地委。区党委还组织了敌军工作委员

会、海上工作委员会。区党委将以前各部队的办事处转为地方政权，正式成立“三北总办事处”。

当时敌伪在浙东的主要兵力有：宁波敌警备司令资源平三郎和宪兵司令对田部约千余人，奉化敌警备司令山根和宪兵队长岛营部约千余人，定海敌警备司令河之互之辅部约三百余人，慈溪有三百余敌寇；还有地方杂牌伪军姚华康、霍中柱、关天圩、周侯伯、潘文钧等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日寇增调谢文达的伪十师分驻慈、宁、奉一带；丁锡山的伪十三师也调来绍兴一带，向诸暨、嵊县推进，以加强浙东的守备力量，并在宁波、绍兴、三北地区恢复与增设据点。汪精卫还派要员沈尔乔到宁波建立伪浙东行政专员公署和各级伪政权。这时日寇对国民党加紧诱降，对三五支队发动“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加紧找我磨擦。九月五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浙东斗争方针问题作了指示，指出：日寇退守金华、兰溪后，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但不宜抱奢望，我军应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要利用各种矛盾，多交朋友，一切组织工作要注意保持地方性、群众性，埋头苦干，采用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的精神，作出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区党委还具体分析了三北和四明地区的情况，制订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华中局批准了这个方针，并强调“应迅速取得四明山、会稽山为主要阵地，这是长期坚持的基点。”随后，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司政机关、四支队及教导队，挺进四明，控制了姚南、慈南的一部分地区；由刘亨云率五支队坚持三北；由林有璋率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开辟慈东、慈西地区。

十月间，日寇动员上千兵力分三路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遍设据点，到处骚扰，反复搜索，企图消灭三北抗日武装。国民党顽军也配合日寇行动，趁机袭击三北根据地的我军政机关。我军经过蜀

山渡、杨葛殿、竹山岙三战三捷，毙伤敌伪百余名，重挫日寇气焰。十一月中旬，我五支队及新国民兵团、特务大队于慈北的宓家埭，伏击了由慈城出扰的伪十师一个营，将其全部歼灭，俘伪营长以下二百余人。日寇对三北根据地的“扫荡”被我军彻底粉碎。这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一千九百多人，并纠集金山、平湖两县的自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部等，共计三千左右兵力，由艾庆璋指挥，于十月下旬自金山及平湖、乍浦一带南渡杭州湾，分别在临山、段头湾等地登陆，向我慈(溪)北、镇(海)北进犯，妄图将我军消灭在三北沿海狭小地区，气焰十分嚣张。十一月中旬，我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和孙云达等部队保持中立。我党为了自卫，决定集中全部军事力量，争取给艾顽以歼灭性打击。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至十二月十五日止，我军在地方党和广大群众支持配合下，经周家路、登州街、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大小二十九次战斗，歼灭顽军大部，取得了完全胜利。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保卫了三北根据地，锻炼了部队，发展了武装，鼓舞了浙东广大军民，打开了三北局面，使我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南进四明山无后顾之忧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师部又派黄知真、陆慕云、陈洪、王胜、邱相田、钟发宗、魏善成、谢飞、徐放、江岚、丁公量、唐炎、黄源、于岩等一批干部，先后到达浙东，加强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

反“扫荡”战斗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军主力按原定工作方针，于一九四三年初再度挺进四明。为了配合三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打开四明局面，三支队和特务大队、教导大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夜，从晓岭出发，分三路奔袭梁弄。翌晨拂晓发起进攻。经十七小时激战，拔除了梁弄伪军据点。毙伤守敌伪十师三十七团一营官兵四十余人，俘伪上尉医官、中尉排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五十余支、驳壳枪九支，军用品三十余担。梁弄战斗的胜利，对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梁

弄是四明山的心脏，是向南发展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攻克了梁弄，就控制了整个四明山区。梁弄的攻克，迅速地推动了姚江两岸和四明山地区的政权建设，成立了四明山总办事处。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也先后进驻梁弄和横坎头。四明山根据地初步建立。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一九四三年春，日、伪调集两千余兵力，对三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我五支队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力开展了反“清乡”斗争，不断主动出击，先后在黄沙湖、郑巷、天元市、三灶等地连战皆捷，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在会稽地区，自南进支队和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奉调到三北参加反顽自卫战争后，马青率领十几个伤病员发动群众，重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诸北抗日武装又发展到六七十人。十二月，建立了诸北办事处，初步开辟了会稽山抗日根据地。后来又开辟了寿松涛、张子敬等领导的路西游击根据地。

在金属地区，原来在金（华）东、义（乌）西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八大队，在成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陈雨笠、江征帆、王平夷、李一群等领导下，发展到五百多人。一九四二年十月建立义西乡镇联防办事处，不久，改为金东义西联防办事处。一九四三年六月，成立了金义浦抗日自卫委员会办事处。开辟了以义乌西乡吴店为中心的金（华）义（乌）浦（江）游击根据地。后来，发展到兰溪北乡，金义浦办事处改称为金义浦兰总办事处，根据地也扩大为金义浦兰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三年九月，陈雨笠派陈福明率短枪组到义东北活动。九月，江征帆、楼觉率八大队进入诸义东边区，成立了坚勇大队，发展到二百余人，次年三月，成立了诸义东办事处，开辟了以义乌北乡为中心的诸（暨）义（乌）东（阳）游击根据地。

在浦东地区，浦东游击队在反“清乡”斗争中，采取隐蔽、坚持的方针，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机敏地打击日寇，保存和发展了自己。

自浙东区党委成立以来，广大军民经过艰苦奋斗，在和日伪顽

的三角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仅坚持了三北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阵地,还开辟了四明、会稽和金萧三块新根据地,初步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顽的极端仇恨与恐惧,于是他们就互相勾结,加紧对浙东根据地的进攻。

一九四三年十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两万余兵力,勾结日、伪,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形势十分紧张。

在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反共战争的紧张局势下,由我党掌握和领导的国民党鄞县郭清白部第六大队,于九月五日,在林一新、李明等率领下,粉碎了郭清白企图将“林大队”缴械的阴谋,把部队拉出来与我三支队会合。十月五日,定海“五大”和在东区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也粉碎了顽方企图消灭“五大”的阴谋,在钱铭岐、陈子方等率领下,渡海经三北抵达四明山,与主力会合。这时,区党委又决定成立三北、四明两个自卫总队。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接连发出三次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冀挽危局。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疯狂地向我进犯。我军被迫奋起自卫。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蜻蜓岗战斗开始,经历了大俞、东西岙、章家埠、前方、后杜桥等大小九十一战,持续了八个月之久。这个时期,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四明地委书记陈洪、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女)和樟蜜区的徐婴等英雄儿女,都牺牲在顽军的刀枪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夏,日寇也乘机向我浙东抗日根据地进攻。区党委领导军民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在敌人的正面,组织联防,趁敌人尚未站稳脚时,给以有力的打击。敌人深入根据地内设下据点时,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互相配合,困扰敌人乘机奇袭。还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在我埋伏人员的配合下进行活动。在四明方面:日寇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和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发动两次千人以上的冬季和春季

大“扫荡”，火烧了夏家岭头和南黄村，一度侵占梁弄、上虞县城等地。在我军民的英勇奋战下，日伪军被迫撤退。在三北方面：日伪增筑据点，采取“蚕食”政策。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我三支队一部及警卫大队，在镇北筋竹岙全歼伪中警团二营四连四个班。四月十四日，三支队又在慈北宓家埭重创伪中警团二营。六月七日，三支队一四中队，奇袭镇海虹桥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部”，全俘敌伪官兵二十八人，日寇少佐顾问吉永久寿秀和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上校总队长卫文达均俯首就擒。六月二十五日，三支队一四中队在慈东马家桥歼伪十师三营五十二名。六月，五支队一大一中和海防大队一个排，组织了“海北支队”，在张季伦等率领下，北渡杭州湾去海北，在海北工委配合下，积极打击日伪，牵制敌人增兵三北。不久，返回三北。八月二十五日，海防大队一中队，在岱山以西大鱼山岛，突遭日寇海军陆战队二百多人，伪军三百多人和两架飞机的海陆空联合进攻。经七小时血战，毙伤敌八、九十人，我四十二名勇士壮烈殉国。由于三北军民的英勇抗战，日寇“蚕食”阴谋并未得逞。在金萧方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义乌大畈成立了金萧地委，同月二十一日，金萧支队在诸暨王家店成立。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党控制的国民党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在彭林的率领下，全体指战员三百余人脱离了国民党，与金萧支队会合。五月二十七日，我金萧支队在诸暨墨城湖附近毙伤伪蔡廉部官兵一百多人。但大队长朱学勉英勇牺牲。在浦东方面：浦东支队攻克奉贤分水墩日伪据点，歼敌一个中队。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日寇集结数百人，向奉贤北宋偷袭。浦东支队转战于敌人的四个据点之间，又歼敌五十余名。八月二十二日，浦东支队在南汇朱家店伏击了出扰的四十七名日寇，当即击毙敌寇二十三名，余敌慌忙逃窜，在追击中，又击毙十一名。浦东支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十一月，浦东支队改名为淞沪支队，主力发展到三百余人。一九四五年一月，陈伟达、顾复生到浦东加强领导。部队活动的范围从川沙、南汇、奉贤一直向南到金山。后来，淞沪支队又

到浦西,以青浦观音堂为中心,积极向昆山、嘉定、苏州、松江等方向发展。

我浙东军民,在区党委领导下,粉碎了敌伪顽的进攻,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浙东阵地。

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开始后,为了公开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坚持敌后抗战,新四军军部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并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支队、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后改为淞沪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等。浙东游击纵队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是开辟、巩固和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强大支柱。区党委为了团结浙东敌后各阶层人士、各党派、各团体,抗击日伪,反对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逐步改造旧有的基层政权机构,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在四明山茭湖村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连柏生任主席。同时制订和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浙东敌后临时行委会的成立及其施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浙东敌后根据地开始了各方面的有计划的建设,标志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

日寇在军事上遭到打击之后,对浙东根据地进一步实行经济封锁,并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抢掠更为疯狂。为了粉碎敌伪的经济掠夺,区党委决定:以武装保卫秋收,反对敌伪抢粮;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二五”减租;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有计划地、积极地、主动地开展对敌斗争。军民们在“不让一粒粮食给敌人抢走”的口号下,紧密团结,在军事上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采取了快割、快收、快运、快藏,坚壁清野,使日伪抢不到粮食。反抢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迅速发展,德

国在欧洲的失败已成定局，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处于崩溃之中。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向全党和全军发出了关于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迅速地抓紧时机和积极地加紧反攻准备的指示。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决定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首先发展苏浙皖边和浙江沿海，尔后视敌人的进攻情况，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地位，占领南京、上海、杭州、芜湖各大城市。

区党委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以迎接反攻和大发展的形势，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慈北洪魏召开了浙东首届军政会议。大会总结了一九四三年二月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一年半的军政工作，特别是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及对敌斗争方针、任务进行了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会议后来移到四明山袁马继续举行，直到十一月五日结束。

为了把浙东首届军政会议上提出的新任务深入地贯彻到浙东人民群众中去，广泛动员全区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在梁弄召开了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分别作了政治、军事和行政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谭启龙代表区党委提出的施政纲领。大会正式选举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以连柏生、吴山民、何克希、张文碧、郭静唐、王仲良、罗白桦、朱人俊、黄源为委员；产生了浙东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郭静唐、何燮侯为副议长。大会最后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等八个通电。会后浙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以连柏生为主任，吴山民为副主任（九月增选王仲良为副主任），罗白桦为四明分区行政专员，王仲良为三北地区特派员，杨思一为会稽地区特派员，顾复生为淞沪地区专员。为了健全各级政权机构，浙东行政公署对各县区的行政组织和干部，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充实，还分别任命了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地区的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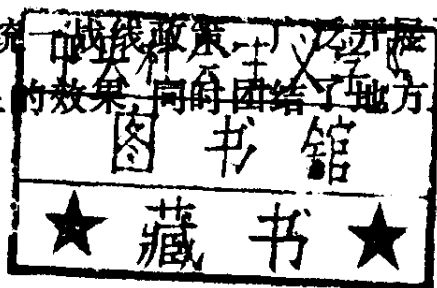
县县长。一九四四年九月，党中央给华中局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指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并指示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态势。同时，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师部，又增派涂峰、徐端、钱刚、周毅、邱子华、汪志华、周瑞球、朱光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工作。同年十一月，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应以南下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毛泽东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亲自电示浙东纵队，要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配合盟军驱逐日寇。十二月，在我党工作下，四明山“著匪”王鼎山、单孝升部三百余人，被争取过来，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嵊新奉抗日别动总队，后编入四支队。同月，中共嵊新奉县委掌握的原国民党新昌行动大队，在吴泽英率领下，脱离国民党，后到达四明山，被编为四明山自卫总队新昌大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根据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分批南下的部署，率一师三旅陶勇部南下，于次年一月六日与王必成部会合于长兴槐坎仰峰界地区，形成了与浙东根据地打通联系的战略态势。王必成部系新四军一师十六旅。一九四三年秋，该部在王必成、江渭清率领下，自苏南挺进浙西敌后，开辟了以长兴、广德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华中局奉中央军委电令，决定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二月五日，苏浙军区在长兴仰峰界召开了成立大会。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由粟裕兼政委），叶飞为副司令员，刘先胜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由十六旅改编，王必成为司令员，江渭清为政委；二纵队由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三纵队由第三旅改编，陶勇为司令员，阮英平为政委。四月上旬，叶飞率教导旅自苏中继续南下苏浙边，该部改编为四纵队，廖政国为司令员，韦一平为政委。苏浙军区的成立，加强了对苏南、浙西、浙东地区抗日战争的统一

领导。

为贯彻向东南发展的方针，邱清华、周丕振领导的浙南永嘉、乐清地区的“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准备北进，建立以括苍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基地。后因形势变化，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一九四五年初，区党委派余龙贵去加强领导，担任总队长。

三月下旬，苏浙军区曾多次派部队至富阳、新登地区侦察，预作南渡富春江的准备。五月十日，为配合浙西新四军主力南下，谭启龙等率三支队一部西进。五月二十日，在富阳中埠，与胜利渡过富春江的由苏浙军区四纵队十一支队会师。新派到浙东任纵队副司令员的张翼翔等也同时过江会合。不久苏浙军区对各纵队的任务作了新的部署。四纵队十一支队返回浙西。谭启龙、张翼翔即率所属部队日夜兼程赶回四明山。

浙东区党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在频繁的战斗中和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实行党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可能和必要的各项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区党委从一九四三年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领导浙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浙东地区斗争环境恶劣，战斗频繁，不可能采用集中整风的方法，因而采用分散学习为主，集中训练为辅的整风学习方法。先在军队营一级、地方县一级以上干部中进行，然后由上而下地全面开展，一九四五年还开办了党训班。通过整风，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使浙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更坚强了，为领导浙东敌后军民坚持抗战并夺取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个时期，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克服了经济上财政上的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密切了干部和群众及党政军民关系。除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外，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同时团结了地方上的开明士绅郭静唐、



吴山民、何燮侯等抗日爱国人士都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浙东的抗战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热情支持和拥护。当时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人才济济。

区党委按“三三制”原则，先后在根据地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浙东行政公署下，四个地区设立行政专员公署或特派员办事处。十个县设立民主县政府，并建立了六个县级办事处。县以下分设若干区署。区以下为基层的乡保行政机构。各地实行普选，成立区乡各界人民代表会，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各地普遍组织了工会、农会和妇女会，还成立了浙东总工会筹备会、浙东妇女联合会筹备会、浙东青年联合会筹备会。在经济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内，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一九四三年三北基本区就有一百零五个乡减了租，约占全部一百四十一个乡的百分之七十五。同时又规定交租交息，既承认地主的地权，又承认农民的佃权；并正确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政策，既保证工人和雇工的生活改善，又使资方有利可图，保护工商业。首先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推广合作事业。还实行了按财产和收入多少征税的合理税收制度，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规定抗日政府的收入为粮赋、货物税。坚持一物一税的统一税制。一九四五年四月，还创办了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各根据地还办了不少榴弹所、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后方医院。在军事方面，在“抗日保家乡”的口号下，组织了民众抗日自卫队、冬防队等民兵组织。许多县区普遍建立起游击小组，紧密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浙东地区建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形成了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在文化教育方面，切实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实行抗战与民主的普及教育，实施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的方针，着重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抗战胜利信心，培养和训练干部。在横坎头还开办了浙东区党委党校、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鲁迅学院浙东分院和各种训练班。并积

极开展冬学运动。提倡以普及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改造民间艺人,改革“的笃戏”,实行男女合演,演出革命现代戏;建立行署社教队、浙东鲁迅文艺工作团、战斗剧团、政治部政工队,演出革命歌舞戏剧。新闻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自一九四二年七月创办《时事简讯》后,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由《时事简讯》社试行铅印《浙东报》。同时还成立了新华通讯社浙东分社。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区党委的机关报《新浙东报》创刊。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创办了《战斗报》。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也办了一份日文版的《解放周报》。此外,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间,浙东文化界人士成立了“东南文化社”、韬奋书店(即浙东书店),筹备出版综合性的文化月刊《东南文化》,八月二十三日还出版了面向人民大众的通俗报纸《大众报》。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府,实行了党在抗日时期的纲领和政策,因而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群众,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中间,坚持抗战,使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屹立于东海之滨。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阴谋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密令顽军进一步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剿”,限制根据地之扩大。顾祝同阴谋对我根据地再次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此时,驻浙东的国民党田岫山部第三次公开投敌。田部原是国民党杂牌军暂编第三十师所属八十八团,曾先后两次投敌,两次“反正”。浙东游击纵队决定发起讨田战役。五月二十九日,拔除了田部第泗门据点,揭开了讨田战役的序幕。六月七日至二十二日,取得攻打田岫山老巢许岙的胜利,六月三十日,浙东纵队乘胜解放了上虞城(丰惠镇)。在我军攻打田岫山的同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和王云沛,调集约十个团的兵力向北推进,妄图与日伪遥相呼应,南北夹击,消灭抗日武装。浙东游击纵队奋起自卫还击,进占章家埠,西渡曹娥江。六月三十日,追击部队进入会稽地区,在西谢、下岙一带将顽军全部击溃,取得了第三次反顽自卫战

争的胜利。

讨田反顽战争的胜利和上虞城的解放,使四明、三北、会稽三块根据地基本联成一片。不久,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自横坎头进驻上虞城。上虞成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后期的指挥中心。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新四军不断取得巨大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挺进五纵队由张俊升率领于七月十一日投向我军。七月十三日,新四军军部命令张部改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任命张俊升为纵队副司令兼二旅旅长,王仲良为二旅政委,张景南为副旅长,徐学道为参谋长,朱人俊为政治部主任。原三、四、五支队编为第一旅,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兼第一旅旅长,纵队副参谋长谢忠良兼一旅参谋长。

苏浙军区在取得浙西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后,决定四纵队乘胜南进,再渡富春江与二纵队主力会合,准备扫除浙江中部浙赣线两侧敌伪势力,然后大举跃进,联结浙南,以实现打开东南局面的战略意图。八月二日,蔡群帆率领的浙东纵队三支队一大队和彭林率领的金萧支队一部等接应部队,在富阳大章村附近,与再渡富春江四纵队主力会师。不久,蔡群帆率三支一大和苏浙军区派来的汪大铭、谢忠良等干部返回四明山。四纵队主力在金萧支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作战,给敌伪以沉重打击。日寇投降后,四纵队主力奉命北返。

讨田战役和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国内外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大反攻的阶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浙东纵队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附近城镇日伪军及伪政权发出最后通牒。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新四军、苏浙军区连续发出了《对日本驻军通牒》和《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紧急通告》,命令沪、杭、甬等大城市及江浙地区的一切日伪军及政权机关立即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违者则以武力解决之。浙东区党委为了迅速缴

下敌人武器,于八月十五日成立了以谭启龙兼主任的“动员委员会”,动员浙东解放区一切军民力量,为坚决消灭顽抗的日伪而斗争。

八月十七日,浙东纵队开始对浙东敌伪发起大反攻。三五支队分头横扫三北的日伪据点,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桥等。

浙东纵队一旅一部与二旅向鄞西日伪进攻。十七日,奉化萧山庙伪保安队一个中队全部反正。接着,我军连克鄞江桥、集士港、黄古林、凤岙市、布政市、蟹蛟弄、东新、栎社、庄市等日伪据点,直逼宁波城郊,攻克距城仅三里的西城桥据点。

淞沪支队于十六日攻占上海市郊之北新泾日伪据点。接着攻占南汇县城、新场、祝家桥、六灶、黄渡等市镇。

金萧支队在诸北、诸义东、金义浦兰和路西等地区也向敌伪展开攻击,攻占孝顺、三江口等伪据点。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期内,浙东纵队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除几个主要城市外,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地区顽抗的日伪军,使浙东广大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

正当我浙东纵队各部在大反攻中对日伪作战取得一连串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鄞西、浦江等地向我发起进攻。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率领八十八军,则从天台日夜兼程赶来浙东内战前线。及至九月下旬,国民党正规军好几个师分别向四明、三北和金萧地区的浙东纵队各部进逼。浙东的内战危机十分严重。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为了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人士的同情,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愿意主动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解放区。

九月二十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秘密武装人员外,在七天内全部撤离浙

东,开赴苏北。九月二十三日,区党委在上虞城(丰惠镇)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的命令和指示,并对北撤后浙东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根据华中局指示,我军开始进行“精兵简政”和收回抗币的工作,准备北撤。为了照顾伤、病、残废人员的生活,区党委决定由朱洪山、黄明等组成“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与国民党谈判,处理我军北撤后的善后事宜。同时,决定留下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去苏北)、马青、王起等一批党员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

九月三十日,浙东区党委、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浙东行政公署,在上虞召开群众大会。即日起,浙东纵队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约一万五千人,在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下,从古窑浦到临山的沿海各港口分路分批渡杭州湾北撤。并散发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北撤部队经历了澉浦、南丰等多次激战,击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堵击,在苏中新四军和沿途党组织和军民的接应下,渡过长江,进入苏北解放区,至十一月中旬,胜利完成了北撤任务。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是华中抗日的东南前哨阵地,拥有四百万人口,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军民的团结战斗,在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谱写了无数曲胜利凯歌。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根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底,大小战斗六百四十三次,克复县城南汇、上虞两座,攻克大小据点一百十余个,解放同胞四百万(四明、三北二百万,浦东一百万,金萧一百万);毙伤敌官兵六百一十名,俘敌顾问军曹以下二十一名,毙伤伪旅附、团长以下官兵三千零六十二名,俘伪团长、支队长以下五千五百零四人;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浙东军民的抗战,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杨福茂执笔)

第二部分

历史文献和报刊资料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从淞 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 战争致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电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

少奇、陈毅、小姚：

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组织，请考虑电告。

毛朱王叶

三十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发给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的电报。年月是编者制定的。

陈、曾对谭启龙提议的答复*

(一九四二年六月)

一、浙江情况由于敌人进攻占领金华后,整个浙东十几县都要沦陷,实利我向前发展创浙省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此次敌人进攻比往常不同,确有控制浙江重要城市外,相机打通浙赣路的企图。

二、由粟师长转来你的提议,除对余姚浙东的提议意见要改变外,我们认为你对苏嘉沪三角地带环境分析是对的。但对嘉宝昆地区[应]加强巩固坚持斗争;淀山湖青松地区组织工作力求秘密活动,方式采取和缓、合法,组织少数群众性的游击,但坚持斗争指导机关宜设浦东,加强浦东领导向平湖沿海发展。保持余姚浙东联系及指导。以上地区工作仍归启龙等指挥。上海不宜设领导机关,只能建设秘密交通机关,用单线的间接方法,取得各地党的经常联系。

三、启龙与一师抽调出来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组织浙东行委,尽可能抽调部分干部随同所抽调的武装电告,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提出配合同[国]军作战与保家保乡口号,广泛开展敌后统战工作,采取多种多样名义和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力量,创造敌后根据地。详情请遵照前二电内容坚决执行。

四、(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此电是陈毅、曾山对谭启龙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关于《苏浙地区一般情况和开发该地区工作意见》的报告的答复。该电是由粟裕转谭启龙的。

关于派谭何主持浙江工作并责成 谭传达华中局“七·一”决定的通知

(华中局致启龙转浙江各属
党的负责同志)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

一、华中局“七·一”发表对浙江游击区决定,特责成谭启龙同志代表华中局向浙江各属党的组织传达。

二、特派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来浙江工作。谭任浙东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任区党委军事部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

三、责成谭启龙与浙江各属党的组织发生联系协同工作。

四、浙江各属特委工作即与谭、何发生联系,经过谭、何电台直与此间联络,不必派人直来苏北,以免往返。

五、望启龙电台直接与军部电台联络。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 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

谭启龙

(一) 目前国内外形势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略)

(二) 目前浙江敌后形势的基本特点与华中局关于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决定与指示:

1. 日寇为了破坏民主国反攻基地(尤其是空军根据地),加紧沿海经济封锁,减轻其京沪杭中心所受之威胁,并作为向我大后方可能的战略进攻的准备步骤起见,于五月中旬开始进攻浙东,迄目前为止,日寇已占领了诸暨、金华、兰溪、上饶、东阳、义乌及缙云、丽水、温州等许多重要城市,浙赣铁路已被打通。浙江形势乃起了基本变化,整个浙东广大地区已变成沦陷区,但由于日寇兵力不够,其现所占领者仅为重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两侧广大乡村仍为我国所控制,或陷于一时的混乱状态。

这样,日寇已占领浙江之重要城市与重要交通线,浙东大部地区已变成沦陷区,而广大乡村则日寇尚无法控制,这是浙江形势第一个重要变化与特点。

2. 由于近几年来浙省国民党及其军队执行了反共分裂的反动政策,及其对敌估计错误,毫无准备,以致在此次敌人进攻时遭受相当损失,节节向后撤退,未能予敌坚强抵抗与打击;使得敌以顺利灭陷全浙;使浙省我国政权之整个完整的统治,被敌分割;使三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有所变动;使我浙省宝贵国土及城市被敌所

* 这是谭启龙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占；同时也使一部分顽固派头子逃跑撤退，一部分虽仍留于敌后，但其统治势力已经大为削弱，人民的抗日自由条件大大的恢复增强起来。

但由于敌兵力不够及华北华中争取敌后根据地的经验，今天顽固派在浙江敌后广大地区仍保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有大部分地方政权，以及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于武夷、枫林、怀玉等接近前线之山岳地带，则因顽固派军队之结集，其控制力量必更加强。

这样浙江顽固派之完整统治已告破裂，其反共计划已遭挫折，但在敌后它尚保有相当强大力量，必将与我党及人民作争夺敌后的尖锐斗争，这是浙江形势第二个重要变化与特点。

3. 由于日寇的侵略及其对我人民的烧杀掠夺、侮辱之加紧，由于顽固派恶势力对人民之种种压榨与骚乱，由于浙江人民过去所受广泛的抗日民族教育及其革命传统，以及由于我浙江党的基础等，浙江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已日益高涨起来，抗日游击战争必然会在广大民众中发动起来。

但同时浙江我党及人民进步势力，历来在浙省当局的反动高压下被剥夺了一切抗日自由，大批党员干部及进步青年遭受了囚禁的痛苦。领导机关遭受了顽固派特务的数次破坏，以致今天我党与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最迅速的发展起来，使进步势力在目前暂时处于劣势的地位。

这样浙江我党和广大人民有着雄厚的潜伏力量与基础，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将随着敌人的压迫政策，必然会广泛的发动起来，但同时目前此种进步势力则〈不〉处于劣势的地位，这是浙江形势的第三个重要变化与特点。

4. 综合敌、我、友三方情况，说明浙江敌后斗争形势一开始就是三角斗争的形势，如象今天华中一样，在此三角斗争的形势中，敌在重要城市及交通线占绝对优势，顽固派在广大乡村中尤其在军事上及社会基础上，暂保有极大优势，我一般的处于劣势，但我

在广大人民中，在政治上保有相当优势（虽尚不应过分夸大此种优势）。

5. 根据上述情况的估计，我党在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华中局曾有如下决定指示：

甲、敌寇向西进攻，已达到控制浙赣路，在敌继续西进或确实控制该路之条件下，浙江抗日游击战争，必在广大民众中发动起来，浙江党必须站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线上，来配合国军，抗击敌寇，阻止其继续西进。

乙、浙江党及当地人民历来在浙省当局的反动政策高压之下，被剥夺了一切抗日的应有自由。我浙江党且遭受了反动特工的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及抗日人民遭受了幽囚屠杀的痛苦，浙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顽方破坏，是引入敌寇沦陷全浙的主要原因。浙江党必须立即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抗击敌寇，促进顽方的觉悟。浙江党应以最大可能去团结抗日各阶层及浙江的国民党员如黄绍竑等恢复旧好，共同抗战，对许绍棣、宣铁吾等的反共破坏抗日的罪恶，必须在人民中公布之，促其觉悟，争取其回到抗战团结的道路上来。

丙、浙江党自己在敌后，应有建立抗日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独立政策，在××〔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诸地，首先取得自己的控制权，这是坚持浙江敌后的首要条件，必须利用华中抗战的经验，迅速占领阵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丁、在敌寇进攻，国民党背信进入山岳地带之条件下，国民党在武夷山脉，仙霞山脉控制力量必然加强，因此那一带苏区老游击〔区〕的党仍须应付其艰苦斗争环境，其工作方针，应该是继续艰苦游击，继续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不宜轻举妄动，暴露自己的组织和企图，反予长期斗争不便。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应与浙省敌后地区的党取得联络，以便利双方的坚持，老苏区老游击区的党，除保持原有阵地外，应撤退暴露的干部到敌后，作抗日游击工作。（下略）

这就是在今天的形势下华中[局]给予我们浙江党的总方针。

(三) 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本[础]和条件

1. 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首先有着下述诸主观力量的基础。

甲、在抗战初期,浙省当局比较进步的环境下,我浙江党及基本群众组织,有了相当普遍的发展。以后政局逆转后,在顽固派的高压下面,虽然遭受了数次破坏,但基本上保持了下层组织和干部,保持了一部分力量,这是浙江同志努力[的]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今后发展的一个主要基础。

乙、抗战初期浙江党的统战工作,在全国除武汉方面以外,是做得最好的,尤其当时的政工队有了很大的作用,它广泛的组织群众,提高了群众对抗日的认识与斗争精神,在各党派各阶层人民中间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以后虽遭逆转,但当时之影响,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无疑是有很大大作用的。

丙、浙省许多地区有过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活动,群众对我党有过血肉相关的联系,有过武装斗争的经验,今天还有一老苏区保持着力量,坚持着艰苦的游击战争,这些力量在今天的斗争中,将自会证明其重要的意义的。

丁、浦东党在上海附近敌伪压迫下,五年来创造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并在伪军工作中发展了一部分力量,灵活的转移到浙东一年来,在浙东比较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到今天,成为发展浙江工作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也是浦委同志努力[的]一个很大成绩。同时浙江党在若干地方也已在敌后建立了一部分武装,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还有弱点,但在今天新的发展形势下面,显然已成为我党大量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的一个主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发展将更加困难更加缓慢。

2. 此外,有下述诸客观条件:

甲、中日矛盾,蒋日矛盾,仍为当前主要矛盾,顽固派虽然反

共,但在敌人后方是无法自由活动的。

乙、敌后顽固各种派别,各个武装部队虽然在反共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其内部仍有矛盾,各人主要的还在争自己势力,图升官发财,很难联合一致。他们虽欲与我争夺敌后,阻碍人民进步力量的生长,但敌后斗争是艰苦的,目前敌人虽然比较放松,但至相当时机可能是要回来扫荡的。而顽固派一般人员怕吃苦、怕牺牲,在比较困难的时期,是不能忍耐的,必然要逃跑分化或者投降,至于大部分下层士兵与中下级军官,则基本上均是抗日的,反对投降,也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

丙、广大民众身受敌、顽双重压迫,抗日情绪必然日益高涨,日益团结,在我党领导下面,这是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

丁、敌寇兵力不够,尤其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是绝对无法对敌后作全面控制的。

戊、浙东为山岳地带,其地利〔理〕条件之有利,与苏北等有天怀〔壤〕之别。

己、我党在华中华北已有丰富经验,在政策上,在经验教训上,在人力上,我浙江党今后均将得到上级很大的帮助。

3. 根据上述主观力量基础及客观有利条件,我党在浙东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敌、伪、顽亦已有敌后斗争的经验,汪逆已派专员来浙东布置工作,顽方亦必有所计划,故一开始即为很尖锐的三角斗争。同时我们今天尚有很多弱点,如部队战斗力还不强,各种军政制度尚未健全,新干部多,学习机会少,许多战士尚未了解我们的任务方针;浙省领导机构遭破坏,现虽积极补极〔救〕,但已慢了一步,因此我们必须看清这些自己的弱点,认识斗争是艰苦的。但只要我们能正确执行中央及华中局的指示,不犯错误,这些弱点是能够克服的,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是能变成现实性的。

(四) 发展浙江敌后具体工作任务:

根据上述浙江敌后情况的特点及华中局的指示,我们当前的具体任务是:

1. 团结浙江敌后各党派人士、各友军、各地方政府、各阶层人民、各宗教团体,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为坚持浙江敌后斗争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为达到此目的,必须:

甲、向全浙人民各友军各党派人士指出,浙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顽固派破坏是引敌灭陷全浙的主要前〔原〕因;指出,假如没有许绍棣、宣铁吾等破坏黄主席初期抗战的许多措施;假如没有他们的反共破坏抗日的罪恶;假如没有顾祝同造成的皖南事变,那末此次日寇是决不能如此轻易胜利的。此次日军进攻浙东不足五万,而中国军队在十万至十五万以上,其所以迅速失败者,完全由于军队素质不进步,官兵不合作,党政军不合作,军民不合作,政治上落后,对敌企图麻木所致。只有这样明白指出此次浙东作战迅速失败的基本原因,才能使民众不致因此对整个抗战前途发生悲观,才能促进顽方之觉醒,才能推动恢复黄主席初期的抗战进步政策。

乙、为了达到团结全浙人民,共同坚持抗战,我党的政策与行动具有决定作用,如果我们的行动超过统战限度,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故我必须向全浙人民,各抗日党派,友军着重解释下列各点:

(1) 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拥护英美苏合作,尤其拥护最近英美苏条约,关于战时战后长期合作,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内政的基本精神。

(2) 拥护国共长期合作,并合作建国。……

(3) 拥护浙省黄主席抗战初期的各种纲领与办法,我们竭诚希望与黄主席恢复合作,以实施这些纲领。

(4) 我们坚定遵守我党六中全会决定,将自己的行动限止〔制〕在敌后,只向敌后发展,决不向国民党地区发展,开展敌后抗战是为了阻止敌人前进,牵制消耗敌人,阻止敌人利用占领区域,是完

全符合于抗建纲领,完全合法有理,完全有利于抗战的,完全不是什么野心,我们只是为了中华民族彻底的整个的解放与胜利,我们决没有什么野心。

(5) 我们对于敌后之友军友党人员、地方政府,在坚决抗日,实行民主,不反共三个基本原则下,一概拥护,互相团结援助,并愿商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

(6) 对友军友党及行政长官等留在敌后的家属及地主资本家,只要不做汉奸,不破坏抗日,一概〈重与〉保护其人权、财权、地权。

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即一面进行减租减息,一面进行还租还息的政策,应用各种方式,向人民解释宣传,这是有决定作用的。

应向群众说明,只有实行我们上述这些主张,才能坚持敌后斗争,有效配合国军作战,停止敌之进攻,并准备反攻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丙、对顽固反共派的反动政策,必须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抗日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反共方面是孤立政策,对其抗日方面也是一样,对于坚决抗日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动摇方面是斗争与孤立政策,必须把顽固反共派与亲日投降派分别开来(详见华中局关于策略问题的指示)。必须深刻研究中央指示,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周围友军、友党人士,分别处理,任何粗枝大叶的办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应求多方与人接近,就是最坏的亦应直接间接向其表示我们愿与他言归于好,共同抗日,要耐心争取,不怕碰钉子,不求近效,不求急就,长期艰苦工作,一方[面]可以至诚动人,一面可剥夺顽固派的反共资本和借口,使各方面增加对我同情,即使不得已而战,亦可有政治基础,使人民及对方下层明白我之态度(即在顽方已公开向我进攻时,亦不应放弃最后一分钟的争取有理的原则)。

丁、执行上述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针是“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1) 对任何地方武装与外围军的“吞并一切”、“新四军化”，政权中的“包办一切”，把顽军内部一切人看作顽固分子，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等时，只顾工农利益，不顾地主资本家利益，待人接物中的自高自大，多得罪朋友，多树敌人的办法，应严予防止。

(2) 发扬民主作风，民主精神，是统一战线交朋友的必要条件，对一切军民，各方人士均应虚心请教，态度谦逊，以说服来达到实现党的领导，而不是盛气凌人命令强迫。

(3) 在不失去我党立场下，多帮助别人，体谅别人，不为难对方，多替人家解决困难，适当的照顾人家的利益，是做统一战线交朋友的秘诀，对一切真心抗日部队，不是多打击，而是多帮助，只要我有诚心，即使离我而去，亦可能后来彼必衷心感觉，替我散布好名声。（参阅华中局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决定）

戊、加强全党及干部中之策略教育，是保证统战成功的基本条件，由于我们长期分散和长期埋伏，和国民党的长期压迫，今天仍很容易犯过左的毛病，必须懂得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是橄榄形两头尖，中间大，即是说：真正的大地主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员与真正的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员皆为少数，最大部分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中间分子；谁能争取这最大多数的中间分子，谁就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对每个地方派别，地方领袖人士作深刻的调查研究，讨论他的根本意向何在，了解其有何理〔利〕益，才能确定我们的具体政策，尤其浙江是全国财阀的大本营，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大派系，我浙省党政策的正确与否，对全国的团结合作，有很大影响。许多人说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切都是对的，但下层所做则常有不对，这种批评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不要忘记统战的基础是广大群众，因此统战工作的内容决不是上层应付，必须把广大下层小资产阶级农民等等最大多数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才有我们统战的基础，才有力量，才能与人家谈统战，方有上层工作。

至于个别同志，因长期隐蔽合法及今天顽强我弱的形势，而至犯过右的倾向，亦应及时注意防止。要了解今天的形势已经不同，如果今天在敌后仍旧要合法要隐蔽，不要加强干部，不敢向人民申说我们的主张，不要在部队内建立政治工作等均是错了。过去在政治上，取退让，在组织上求精干隐蔽，是对的。但今天如继续如此，便不能迅速发展自己，便不能转变优劣形势，便要损失时机，便是右倾机会主义。要知道只要符合于抗战纲领，抗战利益，便是合法的，凡是违反抗战利益的行动，便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便是非法的。我们所应该尊重与提倡的，是这种真正的合法，我们应反对顽固派利用“合法”的借口来进行破坏抗战团结、压迫人民自由进步的非法行为，我们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是可以而是偏向群众大大宣扬的（当然这里并不完全否认利用“合法”的意义，尤其在今天发展群众运动中，利用各种现成的纲领法令是很重要的，如三民主义抗建纲领，黄主席的初期抗战纲领及工会农会等）这种多是很重要的必须利用。

2. 大量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的占领有利阵地是坚持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党的领袖曾多次的说过，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为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过去廿年来，我党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到今天能够保持今天党的全国的地位，就是我们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也可说革命是一个力量的竞赛，特别是武装力量的竞赛。

一、由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特殊环境，是国民党占着极大优势的情况，因此我们发展武装的方针，应该在人民抗日自卫保家乡的原则下，运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去建立与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不要用千编〔篇〕一律的名称，不要过早的用新四军号召，只要有利于我武装的发展与坚持，任何名称都是好的。

二、我们武装活动与发展的主要地区，应以沦陷区为限，为了避免顽固势力的嫉妒与借口，为了促成整个形势的好转，我们应将自己武装行动限于敌后地区。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目前重要地区

是巩固××〔三北〕,开展沿海三东及××〔四明〕、××〔会稽〕两山区及金萧路,钱江南北广大敌后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寇,阻止敌人伪化浙东企图,配合国军作战,停止敌之继续前进。

三、加强及扩大现有的武装力量,培养几个有战斗力的坚强武装,是坚持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前提。部队同地方党应用全力发展三支、四支、五支的力量,具体的计划是:(略)。同时应使这些部队逐渐地方化,与本地人民打成一片,使人民了解这是他们自己的保卫者,为此部队目前应加强政治军事教育,提高其军事、政治水准。建立各种制度,现有干部均应加紧学习,从现有的能力上提高一步,只有这样才能〔做〕消化新战士的工作。

四、在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条件下,各地方党应积极在抗日保家乡的口号下,组织广泛人民抗日的群众性的武装,做到每个敌后县委成立一个游击队,每区应有脱离生产的半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队。其武装来源:(1)利用现在地方上地主士绅现成的武装,推动组织之;(2)利用各种办法(政治的军事的)收缴土匪武装;(3)收买民间所剩武器,不管手榴弹、子弹、大刀等都可。其次尽量利用土枪土炮,大家要认识,新武器当然好,但旧武器也能抗日,纠正只爱新武器,不爱护旧武器的弱点。

五、加强对敌后其他武装部队中的工作,经过各种关系去帮助与推动他们进步,建立成为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对那些顽固派的部队,一面从政治上去劝告他们共同团结抗战,同时亦不要忽视其内部下层争取工作,中央曾号召争取二百万友军共同抗日战争,我们应坚决的执行。

六、军事上斗争原则,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主要方针是:(1)积极打击敌伪,在保卫群众利益的原则下,对敌伪的任何行动,应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下,选择有利条件予以坚决打击,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2)对破坏团结抗战专以扰害地方压榨人民的土匪部队,应予以打击,保卫地方治安;对顽固派的任何

进攻,在有理有利(其中特别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应予坚决击退之,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华中局给予的任务。

七、发展武装初期的最大困难,如干部问题,除了我们希望上级的帮助外,基本的办法,积极开办各种临时性的短期游击训练班。这种训练班要求不要过高,只要能使用武器,了解打游击的办法就可以。同时地方党同志,应加紧学习领导武装的经验和积极性。

八、斗争的领导问题,根据苏北经验,按照地理条件,划分几个游击区,组织党军统一领导机关,内设军事部,负责指导各县区游击武装(具体办法以后再讨论)。

九、对抗日军人家属,应推动政府,按照优待条例予以优待,并发动人民协助,这样才能巩固部队情绪。

3. 准备粉碎敌伪之扫荡,打破敌人伪化浙东敌后阴谋,估计敌人打通浙赣线,巩固重要交通线告一段落后,可能来一次对敌后地区较大的扫荡,以便达到[对]沦陷区之统治,最近传说敌拉夫与汪逆派员来浙推进行政及十三师调绍兴等消息,都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我们应:

(1) 在政治上应进行反对敌人扫荡的动员,使部队同志认识敌人扫荡的可能性,向群众宣传敌人要来烧杀抢劫的暴行,指出敌人伪化敌后来吸收中国财力、人力、物力,实行“以华制华”的阴谋,指出“不参加伪组织”“不当伪军”“不帮助敌人”“参加游击队保卫家乡”等口号,大大的提高人民抗日情绪。

(2) 在军事上应该利用时间,加强部队的整训,提高军事的技术,保证在反扫荡战中,取得不断的胜利,并求得新的发展。

(3) 地方工作应争取时间进行一切可能的群众工作,建立武装,打下工作基础,以便配合部队打击敌伪进攻。

(4) 向现有伪军伪组织进行政治攻势,应当向伪军伪组织指出,虽然日本取[得]了暂时胜利,但仅是初期的现象,而所以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是由于敌人偷袭和同盟国主要战场在欧洲,不在远东,指出日本的胜利不是稳固的,其困难已日益增长,失败的前

途已决定。号召伪军伪组织站稳自己的国家民族立场,看清道路,用各种方式在平时战时及家属等去接近与影响他们,在目前基本上不是帮助发展伪军而主要是瓦解争取与分化,并设法打入内部进行长期的工作。对伪军反正问题,目前不是主要的,但如已暴露,不能立足,或在主要的决定斗争中,或为了打开局面,创造游击区,反正是必要的。

(5) 对最坏的伪军,应予坚决打击消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争取的目的。对伪俘虏除最少数的为人民所痛恨者处理外,其余应优待,争取及释放,这样才能动摇伪军内部。

(6) 在敌伪据点及附近伪军伪组织,应打入进行埋伏工作,对两面派应予以争取,只要他保持抗日人员活动及各种工作便利,不过分为难他,尊重他两面派的立场,有时劝其隐蔽亦需要。

4. 发动并组织敌后广大民众,适当的为改善人民生活而斗争。

一、由于日寇侵略及摧残,和顽固派长期统治,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要求抗日与改善生活的斗争将普遍发展起来。我们应站在团结和领导人民在不妨碍抗日的总原则下,为他们切身生活的改善而斗争,不管细小的利益亦好,必须帮助他获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与勇气。目前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原则:

(1) 不妨碍团结大多数人民抗日容易取得胜利,并且是广大人民参加,不应少数人突击。

(2) 不过分暴露我之面目之原则下,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目前应进行秋收斗争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

二、目前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主要的是集中力量,发动农民、盐民及沿海渔民和知识青年四大对象。对于组织形式,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一律的办法,应按照各地实际环境去做,根据昨天各同志报告,农会是很好利用的形式,在抗战初期,浙省曾有过的许多组织方式,如政工队、青年救亡协会、盐民协会等均可利用,不要受多方面限止〔制〕,应以独立精神组织起来,充实其各种工作内容。

三、中央关于土地政策决定,是目前阶段解决人民生活的好办法,党应利用各种方法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在今年秋收中,我活动区应发动农民实现这一决定,在开始一般的可以减少一点,少于“二五”或以下都可以,只有〔要〕有利于团结多数人民,过去曾有的“二五”减租办法应予研究,但必须注意:(1) 不超过统战范围;(2) 要成大多数人民斗争;(3) 争取初期胜利,以提高群众积极性;(4) 注意组织工作及培养群众领袖积极性。

四、部队应帮助进行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组织的积极性,但不要直接去组织,对于破坏〔帮助〕群众抗日组织的分子,部队应以抗日原则予以保护与协助。

五、设办创立小型的报纸,帮助群众〔提高〕抗日政治水准,以及时事研究座谈会等团结群众,发扬民主精神与作风,反对把党内问题和作风搬到群众中去,群众自己的问题应由群众解决,反对党去包办。

5. 适当的改善现有的行政机构,并逐渐的使之成为人民抗日的民主政权。

(1) 应用各种办法,尽量暴露现在政权中的压迫和榨取人民,不顾人民生活,不给人民自由权利的种种恶劣行为。尽量宣传抗战期间民权主义,抗建纲领,黄主席战时施政纲领之特别需要,去引导群众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在开始的初期,过去的保民大会新保甲制等都可以利用。

(2) 目前改造行政的主要方法,不是直接发动群众去废除保甲,而是经过多数群众起来控告和撤换最坏最顽固的保甲行政人员,经过民选方法,选举人民自己的保甲长,党员应尽量争取选举。

(3) 在敌占区行政遭受破坏,地区混乱情况下,可以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或〔成〕立临时行政机构,如动员会〔委〕员〔会〕,军民联合办事处,或各界抗日联合会兼办,使之逐渐走向正规的行政机构。

(4) 在现在国党占优势的游击区,设法经过地方士绅,进步名流青年,推动人民组织民意机构,建立各级县区参议会,保民大会,

使人民意见经过这种方式向政权提出。

(5) 必须认识在浙省今天条件下,还不能立即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不能马上建立象华北华中那样的彻底的民主政权,还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度〔渡〕阶段的办法,应当防止政权工作上的“左”倾与包办一切倾向。

6. 财政经济政策,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整个工作和统战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规定:

(1) 我们财政经济来源,不应放在打汉奸或罚款或临时捐款等等的 基础上,我们应主张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及人民不应有的负担。一切抗日经费的来源,应由全体人民(除最贫苦者免收外)合理负担,不应放在少数人身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能某种特殊情况下临时应用)。应当使全体人民了解,向国家缴纳一定的抗日经费或税收是每个人民应尽的义务。

(2) 关于一切进出口税收,应力求统一合理征收,按照实际情形规定一定的最高最低税额,这些办法,可以按照以前国民党方法,加以适当的改良。

(3) 与敌伪的经济政策作斗争。禁止物资粮食资敌,禁用伪币,维持法币,适当的抑平物价,调济民粮,限止敌人毒品及消耗品运入,适当的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

(4) 对汉奸财产处理,除个别的真正当汉奸者没收其个人应得的外,其家属及次要的伪军伪组织一般人员由政府保护。对于逃跑在外无人管理之财产,可由军政共同保存,回时发还并用各种方式促其回头或参加抗战工作。

(5) 由于敌伪严厉统治与上海内地交通断绝,商业日益衰落及法币低〔跌〕价,因此部队今后经济来源,主要不能完全依靠进出口税收,应当把中心注意农村来源,这里据说已有公粮办法的规定,应细心研究,下半年应与政府商讨公粮问题,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具体办法,现款应换成实物。

(6) 提高与帮助农民生产事业,政府应奖励农民工业生产,这

是解决人民生活与部队生活的主要办法。

(7) 实行统一的经济制度,做到统筹统支,按照最低生活水准,规定一定的生活费,实行预决算制度,反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办法,一切都应长期打算,因此部队应提倡节约运动及艰苦奋斗生活的锻炼,使[每]一个同志、战斗员都了解浪费一分钱,即加重人民一分负担,要造成我们部队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亦能坚持的精神。当然我们现在部队中有各种统战关系,不能一律这样很快实行。但必须进行这种教育,争取逐渐的改造。

7.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浙江文化教育相当发达,知识青年相当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忽视,同时亦须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环境不能进行彻底改革教育,只能按照情形,注意一些重要的问题。

(1) 目前文教中心,是提高与发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及抗日的技术教育,广泛的告诉人民打鬼子的具体办法,提高人民抗日的自信心,与汪逆奴化愚民欺骗政策作斗争,发扬民族气节与正义感。

(2) 一切学校应以上列原则作中心,并发扬学生抗日民主自由权利,给予学生言论、集会、结社、抗日自由,改善教职员生活。

(3) 欢迎并爱护知识青年,文化工作者,开办农村小型报纸及刊物及一切有利于抗日团结的文化事业,尽一切可能方法,进行群众文教工作,如座谈会、戏剧等。

(4) 大量的吸收当地抗日知识青年参加部队工作,并大胆的使用与提拔担任各种工作。

8. 与敌探、奸细、国特进行斗争。(1)当着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抗日部队大量发展,敌伪及反共顽固派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打入我们的内部,进行直接与间接的破坏工作,对付敌人这种破坏的基本办法,是时刻在我们部队及组织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教育,揭破敌伪种种阴谋破坏行为,只有这样去提高我们的民族警觉性与阶级警觉性,不[才]能使敌探、汉奸、国特无法入手,无藏身之处。

(2) 对于真正破坏我之敌探、奸细、特务，与死心反共分子，为了保卫革命的力量，必须坚决的镇压与肃清。但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应该细心与分别主要的次要的，分别死心的汉奸反共派与一般的被欺骗的分子区别开来，决不能乱杀害一个人，牵连一个无干分子，除了最坏的非处决不可者外，一般的应有宽大的处理和待遇，在询〔讯〕问这些案件时，应废除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我们必须知道“不放松一个坏人”“不诬害一个好人”“宁愿放差〔错〕一个坏人”“不愿杀害一个好人”的政策。(3) 对伪军伪组织的除了群众痛恨的个别分子须取〔处〕决外，应一律释放，其中有革命性的分子，应争取回到抗日方面服务，如再犯再捉再放，一切以和蔼诚恳态度对付之，这对于动摇敌伪营垒是非常有效的。(4) 对曾经参加革命，以后转变的叛徒分子，应予自新之道，在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一般群众态度看待，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以予以优待，但不能重新入党。至于因其他关系失了联络或别种情形者不在此限。(5) 对国民党一般特务情报人员，应与日本特务加以区别，不得混为一谈，应细心分别处理，一般的不应捕获处理，应有其他有效办法去转移他特务工作的对象。

9. 国民党统治区与敌人中心城镇工作(略)。

[10.] 为建立群众性党而斗争。

(1) 过去这几年来，由于国民党反共政策，我们所采取的隐蔽精干政策是对的，但现在浙江大部分土地变为沦陷区，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将日益发展的新的情况下，精干政策与单线领导的机构已不能适应领导武装斗争的要求。因此在敌后地区顽固势力较弱，我们能够发动武装斗争的地区党的组织形式应有适当的改变，应按照地理条件及武装斗争的要求，敌占情形，领导上便利重新划分地区，恢复县区支部委员〔会〕制度，不要依老县区作标准。

(2) 在游击区与武动〔装〕活动区，县区支部组织一般的可设下列各部门：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统战，其他各部门，按今后工作需要再定。在党员数量少与干部缺乏的条件下，可以组织临时

工作委员会的办法亦可。

(3) 在敌后游击区,今天必须发展党的组织,做到每保五人至七人的支部。目前发展的主要对象是沿海盐民、渔民,及山地之基本农民及知识分子,发展的方法不是大量的吸收,而是经过审查,个别的、按入党手续吸收,防止拉夫现象及坏分子混入,对于过去因精干政策而停止或失了关系的组织,应按照情形分别审查重新恢复,对于外地(如江西、福建等)来找关系者概不能发生关系。

(4) 由于我党我军在浙东力量还不够强的条件之下,党的组织原则仍然采取秘密组织形式,党在群众中一般的活动,只能以抗战面目出现,尤其在国民党占优势的地区必须注意。至于我军的活动区,党的组织亦须保留一部分秘密党员(一般的三分之一),建立秘密系统,以便适应情况之变化。

(5) 加强党员中教育与学习,今天党内的教育中心,着重于入党条件,党的纪律,党的生活的建立。思想上应以中央关于党性决定作教育的方针,由于长期的分散隐蔽,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占着相当比例,对于思想意识的改造非常重要。要使每个党员同志了解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切应以党的利益为利益,并终身不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整个利益;一切我们所做的功绩,不归功于个人,而归功于党;一切成就如无党的领导,全体同志努力,一个人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任何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必须克服。全党应团结在中央及华中局的周围,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必须无条件的遵守。目前有个别同志,有对于我们所执行政策表示怀疑及违反整个利益的倾向应予纠正。

(6) 加紧调查研究工作,是执行各种具体政策的主要前提。中央在调查研究工作决定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廿年来对中国社会历史情况了解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够得很,要求全党加紧调查研究,深入的了解自己周围的具体环境,及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加以深刻的研究,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战〔路〕线。中央指

出每个特委要能了解特委的周围的具体环境,能把自己周围的敌、我、友三方面的重要人物出身、背景、利益等详细的写出来,我们应根据这种精神坚决做到(我现在自己申明,我这次报告只是华中局一些原则,缺乏实际内容,希同志愿〔原〕谅)。

(7) 其次是关于干部问题,工作开展最困难的就是干部缺乏。当然我们希望华中局能帮助是对的,但基本还是自己培养,因此我们目前解决干部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大胆提拔,只要有办法开辟工作,只要积极努力,应派他出去,放手给他工作,记得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华北经验时,曾说他们大量发展时,开始没有干部交通员,甚至候补党员亦派出去当区委书记、游击队长,这种经验,在有些发展地区可以这样。但另一方面应开始注意培养,按照可能环境开办短期的训练班,把即刻需要做的办法告诉讨论之后,立即分出去工作。至于大批训练干部的办法,只好以后巩固好再讲。

最后,这次华中局给予我们的任务非常重大艰巨,为着完成这一任务,须要全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华中〔局〕领导之下共同努力。由于我们浙江省委被顽固派破坏之后,我们许多同志独立坚持,由于大家过去〔在〕秘密环境工作及部队大多数是浦东来的,我们的区党委这个战略单位,是由各单位集合起来,这个特点,在许多问题解决上,尽量的经过讨论,互相交换意见及工作经验。过去在秘密环境下民主缩小,今后尽可能的一切经过大家的讨论,只有广泛的发展了党的民主,才能保证党的坚持〔强〕团结。区党委的干部还未到齐,一切工作尚在开始建立,能力、工作经验都很差,希大家帮助。

这一报告,区党委未成立,没有经组织通过,只是我个人根据华中局指示原则提出的意见,请大家详细讨论决定。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区党委关于最近 浙江形势发展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浙赣战事,仍在进行,但战局发展,时断时续,时缓时烈,我军有时反攻,日军亦不断击扰,成了拉锯状态。最近一周来,则我军已先后克服了温州、上饶、广丰、横峰、贵溪、鹰潭、玉山等重要据点,但此仍不外是浙赣战争的余波,战争很难有太大的发展。

二、在目前世界战争正在酝酿大的决战,日寇正积极准备大规模新的军事行动的前夜,由于日寇兵力不够分配,故在其打通浙赣路达到了[破坏]我浙赣线上空军根据地及其他重要军事设施的目的之后,可能放弃控制浙赣路全线的企图,缩短防线,以便利其巩固控制金衢重要战略据点、金萧路、金甬路以北地区。现日寇已在新昌、嵊县建立据点,正在修筑金萧、金甬二重要交通线,增调伪军十三师来浙东,若干地区已开始举行扫荡,最近在其放弃浙南及浙赣前线一部分点线之后,可能乘此时机,回头对敌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三、顽方力量,在敌伪扫荡情况下,已开始表现出动摇、分化、削弱的倾向,估计在敌进行大规模扫荡时,必将更甚,同时在敌撤退一部分地区,后方国军可能部分加强其对敌后地区的争夺,但在敌伪没有放弃金华时,顽方是不能大队深入敌后,浙东形势,基本上对我继续有利。

四、我们的工作华中局发展浙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总方针下面,正在相当顺利的开展中,但一个月发展速度,

还跟不上客观形势的要求,而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发展浙东敌后斗争的形势,可能进入与敌伪及顽方比较尖锐艰苦的斗争时期,因此,区党委对各地党及部队在执行发展浙东敌后斗争的总方针时,特着重指出如下各点:

1. 在敌顽还未开始在敌后地区增强行动的有利情况下,各地党及部队必须遵照区党委一贯指示,迅速争取时间,猛烈发展党及武装力量,站稳足跟,并即加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迎接更尖锐更艰苦的斗争环境。

2. 在完成上述发展任务时,应严格遵照人民抗日自卫原则,广泛开展上下层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善于利用各种形式与方式方法,切莫过早暴露自己的力量和企图,必须认识这个原则方针,一方面不但不应因此限止〔制〕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亦是為了适宜可能的情况变化。

在上述方针下,对埋伏在伪军及顽军内部的力量,一般的以长期埋伏为原则,只在必要时方拖出一部分;对埋伏在中间势力内部的武装,则宜长期保持原样,以达到争取中间势力长期合作的目的,伪方顽方中间派三方我均可去争取武装,发展武装工作方式方法,则应按各别情形,灵活运用。对伪军一般的采取阻止其发展的方针,但对已经有的及无法以我力量阻止其成立的伪军,则应有计划的经过各种关系打入作埋伏工作,并善于运用打击、分化、瓦解、争取、控制等不同办法。

3. 在我部队力量比较薄弱,而又不隐〔稳〕固的地区,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仍应保持秘密,但同时不能因此减弱发展任务。在我部队比较稳固控制的地区,地方区〔党〕的双重组织,必须按照过去指示原则,迅速划分清楚,关于秘密部分必须严格按照长期打算的基本方针,精密布置。

4. 三北工委应从政治上群众工作上,〔党〕的工作上进一步精细布置,深入工作,迅速达到完全巩固该地区的目的。四明会稽二工会〔委〕及部队应大胆发展,迅速站稳足跟,以建立我长期坚持的

根据地。浦东及三东公会〔工委〕,应用最大的努力,坚持原地斗争,并求得适当发展。

5. 部队及机关应即加紧反扫荡的准备,一切力求战斗化,必须保证在敌扫荡中不受损失,给予敌伪适当打击,以进一步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求得自己的发展。

6. 在敌伪扫荡顽内部及中间分子起动摇分化的情况下,我应有计划的广泛开展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自己周围,共同坚持抗战,以进一步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发展抗日力量。

五、华中局曾指出浙江前线战局基本上存在:1. 敌继续向西进攻;2. 确实控制浙赣路;3. 缩短防线退守金华;4. 放弃金华等四个不同的可能前途,最近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华中局指示之正确,目前日寇撤退浙赣线上若干据点,可能是退守金华的形势,今后基本上还存在上述四个可能性,因此,各单位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按照可能情况变化,根据总方针适当决定自己地区的方针,望将执行情况报告此间。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区党委报告华中局 关于接受华中局十月二十三日及 十一月九日指示的决定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兹报告区党委的决定,请指示。

(一) 区党委完全同意华中局二十三日以后的各项指示,并一致认为这是华中局决定后有划时期意义的原则指示。决定是在敌寇继续西进与控制浙赣铁路的条件下,当时浙东党的方针是猛[烈]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占领四明、会稽主要阵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十月二十三日以后指示,则是在敌寇撤退浙赣路、固守金兰阵地、浙东形势趋于稳定而我军在敌后地区尚未站稳脚跟的条件下,因此浙东党的任务应争取时机集中力量,迅速打下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基础,巩固现有力量,准备应付将要到来的严重情况,这是两个不同方针[的]转变。

(二) 区党委详细研究华中局指示与检讨这一时期工作之后,认为浙东党四个月来的工作虽然抓住了时机争取了某些发展,扩大了阵地,但这种发展还落在客观形势有利发展的后面,没有完成华中局给予的任务及区党委的决定计划,使我党我军在浙东至今尚未站稳自己的脚跟。推其原因,固然客观上敌寇迅速西撤,国方在农村控制力量的相当强大,以及我党基础事前先被顽方摧残,我党在浙力量不大,但同时指出主观上区党委本身及全党同志努力不够,以及个别领导上错误缺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 在敌寇固守金兰前线,浙东形势暂趋稳定与国军可能集中力量向敌后发展的情况下,浙东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应从政治

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积极准备,以便应付将要到来的严重情况,但同时也不放弃有利的发展机会。基于此一方针,区党委完全同意华中局此一指示,集中力量向敌伪控制力量较弱的地区发展,首先巩固现有力量与三北阵地,并以游击战坚持姚南慈南原有阵地,并尽可能的争取发展,但须避免大吹大擂的方式,以松懈敌的注意力。全党要有埋头苦干长期忍耐的精神,求得逐步的发展。

(四) 由于姚南忠救李文俊部全部消灭及诸暨部队东来会合与88团态度的明朗化,使我们与忠救在三北力量的对比有了大的变化,这就造成了我解决三北问题的有利条件。但同时认为忠救力量相当强大与88团北去后使三北局面更加复杂化,不但我们在解决三北问题时必须灵活的运用中立、争取、分化、打击等各种不同的政策,纯粹的用武力统一是不对的。

(五) 三北地区是一长形沿海地带,军事上不利大部队的辗转,只能作群众性的游击根据地。为应付今后敌伪的大规模扫荡,并造成长期坚持条件,因此,必须在不妨碍解决三北问题的条件下,抓住目前四明山部〔区〕姚江南岸沿地〔江〕山区空隙与有利条件,迅速开展统战及群众工作,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这对于行将到来与敌顽我争夺四明地区的斗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四明党必须坚决执行这一方针。会稽地区系敌顽接合地,离我中心区太远,不易取得配合,为保存力量,主力撤回实为必要。但会稽党必须坚决采用分散荫蔽方式,坚持原有地区,并争取一切可能机会,发展新的武装力量。

(六) 宁奉沿海地区,敌伪控制较弱,国方力量也弱,且我有相当基础,有最大可能创建成为我之游击根据地,与三北一样成为我长期坚持斗争的依托,区党委应有计划帮助这一地区工作的发展。

(七) 华中局关于扩大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在今天新的条件之下,更有其特别的意义。全党全军应用一切方法去团结一切抗日友党友军地方人士,特别是以黄绍竑为首的各级行政

的军事的进步的力量,共同抗战。对宣铁吾、许绍棣^①等最顽固派系的可能进攻,必须从政治上予以揭破,促其觉悟,争取其回到抗救的道路,这是今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重要条件。

(八)为着完成上述任务,区党委本身必须健全自己的领导,除调回杨思一同志专任组织工作外,应当健全委员会的生活,加强思想上意志上的团结,实行有计划的领导组织与检查自己的工作,克服目前一时期中的各种弱点,这是完成华中局指示的重要保证。为了打开三北局面,必要〔须〕加强三北领导,区党委即移回三北办公。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通过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① 宣铁吾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处长,许绍棣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陈、饶、赖^①致浙东：敌后为我 最好的发展地区，应首先巩固三北， 保持四明、会稽游击坚持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克希、启龙及区党委部署并一师谭粟^②电悉。

二、根据五年来我军发展的经验，敌后为我最好的发展地区，敌顽接合部其背靠我敌后根据地者，我能长期坚持，如苏南竹箠桥一带。敌伪接合部其不靠敌后地区或距敌后较远者必遭失败，如皖南云岭，如前四师之豫皖苏边区。我五师独处敌顽之间，但亦因背靠武汉，有广大敌后游击区，仍能长期坚持，但处境特别困难。又因五师力量较大，领导亦较坚强，特别各委在苏区才能支持至现在，在顽后方则无发展抗日游击的可能。这些具体的教训是应该认识的。

三、浙东形势，南进机会暂无可能，四明会稽地区为敌顽接合部，必须首先在巩固三北敌后地区的条件下，才能在四明会稽作敌顽我长期性的三角坚持。如不首先巩固三北，平均使用兵力，必造成以后极大困难。因此区党委及浙东主力应将三北作统一三北的工作，而四明会稽地区则暂保持游击坚持工作。这个工作应立即付诸实施，谭粟师长的意见都是对的。

四、所谓统一三北工作，一面依靠群众，一面依靠对忠救各部采取中立、争取分化、抗击，分别多方的不同的政策，纯粹用压力统一是不对的。

① 陈饶赖即陈毅、饶漱石、赖传珠。

② 谭粟即谭震林、粟裕。

五、浙东武装及党政军民工作应统一于区党委领导之下，区党委随指挥部行动，区党委之军事决定交指挥部执行之，政务民运之决定用政治部名义执行之。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浙东区党委关于开展 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 自我军开始在浙东地区活动以来,由于全党全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执行了党的正确政策,我军一贯的优良传统。一年来,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已经建立与提高起来,人民已从他们的实际体验中认识到我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与爱护人民的军队。因此凡是我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积极的起来,拥护与协助我们,并要求我军帮助他们解决切身问题。我党我军对一年来的群众工作,虽然曾获得了一些成绩,开始进行了一些宣传组织工作,建立了一部[分]群众组织,领导了某些群众斗争。但不可讳言,到目前为止,群众工作仍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人民抗日情绪还没有高度发扬起来,他们对我们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还未体验到人民与我们的生死相关,血肉相联,广大人民还没有动员与组织起来,使我军在行动中还不能取得人民有力协助,人民的伟大力量还没有发动起来。主要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与我军在浙东活动时间较短,另一方面还是由于我浙东全党全军同志对于群众工作还不够深入,与对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之地方党与部队党对这一工作还没有按照各地的具体环境给予有力的明显的领导,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 自敌寇退守金兰以后,我党我军所处的斗争环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敌伪正在积极加强对敌后的控制,从军事上进行扫荡,政治上利用目前政府及一部分游击队的各种弱点,采

用威胁、分化、利诱、收买、毒化等政策，来欺骗和麻醉人民，削弱人民的抗战意识，收买民心，离间敌后游击队的团结，企图这样来达到他的伪化、奴化敌后地区，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友党友军中一部分不大明大义的分 子，不与敌人争夺，而反来对我抗战武装摩擦，集中力量向敌后发展，来与我争夺敌后地区，压迫人民的抗日的进步势力。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要在浙东敌后站稳脚跟，建立起长期坚持斗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我们只有进一步的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建立坚固的群众基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能将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建立起坚强的群众基础，任何困难环境都可战胜，任何困难都可克服。国内战争时期与同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五年来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真理。全党全军同志，必须认识，如若没有广大群众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斗争就孤立无援，一天也不能坚持的，反之若我们的广大群众作后盾，即我们可战胜一切困难。

(三) 群众工作的开展，首先要求全党全军同志深刻的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与善于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华中局指示中指出，浙东环境[是]多变的、多样的，故我们群众工作的政策亦必须适应其地方性的特点，根据各种不同环境，采取不同方针，不同的活动方式。按照目前浙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一般的有如下的几种不同的地区：第一是我军比较能控制的地区；第二是国、敌、我三方面接合地区；第三是接敌区域(即敌我来去的游击区)；第四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第五是敌伪完全统治的地区(即敌伪据点及城市)；我们群众工作的方针与活动，应根据上述不同地区来确定，但这只是一般的划分，至于具体情形还应按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来决定适应的方式方法。

第一，在我军较能控制的地区，群众工作的方针，一般可以运用华中游击区方式方法，以军队面目出现公开号召，大量的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建立各种(工、农、商、学等)独立的抗敌群众团体。这

些团体的组织形式与名称应该适合于顺利的吸收和团结抗日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及游击区各种建设为原则(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自卫队、参议会、合作社等),过去隐蔽时期的那种组织形式(如姊妹会、兄弟会、观音会)已不能适合于抗日游击战争环境(关于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法,由各地委或部队政治部机关,按具体情况拟定,一般的可以利用过去的组织形式充实新的内容)。在开始进行群众工作的时期,为着顺利的开展与统一的领导抗日的群众运动,决定由部队政治部(或部队办事处)出面公开号召群众起来组织各种团体。地方党利用抗日的群众面目,把〔在〕各团体中主持推动,不用我党的名义号召,但我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则必须经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行,不要因避用我党名义而造成政治上自己束缚自己,但执行政策的方式方法,需要十分灵活。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与领导应有的独立性,部队及办事处行政机关,均不应干涉群众团体内部的一切工作,除积极的协助政府军队抗战工作外,应特别注意群众自己切身利益与要求的适当解决,健全内部的生活,只有群众团体切实解决了人民的切身问题,内部生活健全时,才能使这个团体在群众中树立起坚固的政治威信,群众活动才不致变为空热现象。在我军活动区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应大刀阔斧的去进行,如组织政工队、工作团分派下乡用部队名义,公开号召,先由下而上——建立各村各保各种组织,然后召集各村各保各种群众团体开代表会,产生区的上级的领导机关,或由上而下——先由区乡选举适当干部,建立上层筹备会或团体联合办事处,经过这个机构去开展下层的组织,这二个方法,都按具体情形采用。但所谓大刀阔斧在目前浙东环境下,应避免大吹大擂,以致引起敌伪顽注意,而遭受不应有的打击与阻碍。

第二, 接敌区域(敌我来去的游击区),这些地区,因为接敌较近,时常遭受敌伪威胁,而我军又不能完全控制,因此我们群众工作,应采用同情区的活动方式,不但要避免大吹大擂,而且要避用我部队名义,群众团体的组织,应注意隐蔽,以同情我军的立场进行

各项工作,即对敌伪敷衍为我忠实。但为了保持我们的工作不断的进行,我们的行动与方式,应尊重人民、及地方人士两面立场(即所谓内心是红的外面是白的),如果我们不尊重人民这个要求,人民就会受敌伪打击,我们的工作亦无法进行。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同志,应设法隐蔽党的组织,应保持秘密,免受敌伪打击。如同情区工作做得好,在敌伪扫荡中心区环境严重时,我们可以依靠同情区群众,掩护我们部队及工作人员的转移。

第三, 国敌我三方接合地区,这个地区基本上虽是沦陷区,但国方游击队及行政仍占优势,同时我军也可能活动,因此我们对这些地区群众工作方针,一方面可以采用游击区同情区的活动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善于利用友党友军公开号召的一切合法机会与可能去开展抗日群众运动,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但同时还须抓住人民的迫切要求(如防匪自卫等)去开展抗日防匪保家自卫运动。总之,在这些复杂地区,我们的方式方法,按照具体情况,灵活的采用。

第四, 在国民党完全统治地区,我们的方针,一致的应参加到一切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内部,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与可能去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在这些团体的领导权,广泛进行交朋友工作,对一切封建性的落后的群众组织形式(只要具有群众的)都可以利用[来]团结群众,但须充实其中的新的工作内容,否则就会助长人民的落后意识。我们在这些团体工作的同志,应竭力避免突出,不要提出过左的要求与口号,以免暴露自己的面目,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第五, 在敌伪完全控制的地区(即敌伪的据点和城市),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方法,打入敌伪的群众组织内部,进行群众工作,争取领导地位,利用敌伪一切合法的可能与机会,去达到群众的要求,对一切封建性的群众团体亦应尽可能利用去团结群众。为了我们工作长期埋伏起见,必须设法使这些群众团体取得敌伪的信任,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做些不妨碍抗日重大利益的敌伪所要求做的工作,以便求得敌伪的信任去达到长期埋伏的目的。

(四) 要使广大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党须用一切方法去帮助人民在不妨害抗日总原则下,尽量改善人民的生活,即使部分的改善与细小的利益,我们都应加以注意,只有人民经济生活获得了改善,才能提高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与进一步的与我建立血肉相关、患难相共的联系。在我军活动地区,首先必须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央关于土地政策中规定减租减息原则及保护人权、地权、财权的规定,我们须用一切方法求得实现(在开始时少减一点也可以,只要人民有利)。军队到的地方,必须减轻人民的痛苦。今年年关到来时,党去组织年关斗争,注意游击区的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产热忱,帮助人民解决各种困难(如犁牛,种子等)。总之,党必须成为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必须去做,那种对人民漠不关心的态度,必须予以纠正。关于改善人民生活及领导群众斗争,应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具体的是:① 不妨害党的统战工作政策。② 每个要求与斗争必须以胜利结束为原则,不要提过高的要求。③ 口号必须适合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斗争必须是多数人民的行动,不是少数人的突出。④ 尽可能不要因斗争暴露党的组织,影响党的组织破坏。⑤ 斗争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要乱斗。

(五) 由于主要交通道路都被敌占领,我军的活动都处于农村环境,以人民计算,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因此我们工作地区主要应以农村山区沿海区为中心,而农村山区则以农民为主要对象,沿海则以盐民、渔民为主要对象,其他如青年、学生、妇女、儿童,应围绕盐民农民工作的周围同时进行,这是必须注意[的]。知识青年对于初期工作的开展具有桥梁的作用,各级必须注意大批的吸收知识青年参加各种抗日的工作,及送来教导队受训。

(六) 为着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与建立党在群众中的高度威信,必须利用一切方法,把党的主张与政策,有计划的散播到群众中去,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必须在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中大量吸收优秀的工人农民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以扩大党的组织。在

我军活动区,做到民众团体政权机关,各级委员会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参加,必须在民众团体各级组织中建立党团(党团是由参加民众团体的党员中最优秀最有威信之党员组织之),党团任务是保证党的主张政策,在群众团体内的实施。但党内的每一次决定,在群众团体中实现,须经过自己党员用自己面目表现出来,而不是命令群众。关于我军流动区,开始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党政军民的正确关系,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的决定中有明确规定。民众团体是民众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军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的党团同。政府和军队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帮助军队,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协助政府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府机关,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应互相帮助,不应互相干涉,因此在各地建立根据地的时期,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建立正确关系,防止不必要的混乱现象。

(七) 最后各级党必须注意,在抗战初期,由于黄绍竑的较进步的政治纲领与我党积极推动浙东各地,曾经有过热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产生了许多抗日群众组织及方式方法,这些影响到今天,在基本上对我开展群众工作仍然有利。各级党必须细心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工作,收集过去经验教训,了解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及人民的切身要求,灵活的变换自己的方式方法,必须了解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能决定正确的政策与正确的方式方法。各级党必须根据这一指示详细检讨过去群众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重新决定今后工作方针,经常检查与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区党委。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区党委关于准备 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对三北部队及地方党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 自我军杨葛殿、竹山岙、云溪几次反“扫荡”斗争,敌伪遭受严重打击,以及我最近周家路、黄家埠、后家塘连续不断的〔反〕艾自卫战斗胜利的影响后,使我军在三北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威信,大大的提高起来,这些战斗的胜利和影响,给予了敌伪的严重威胁,特别三北是敌伪的中心,后方经济资源丰富,因此,三北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给予宁波、杭州等敌伪严重威胁。我们要把三北建立成为抗日根据地,敌人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希特勒的夏季攻势全部的失败,红军冬季反攻的初期胜利,英美在北菲〔非〕登陆后的胜利,日寇在西南太平洋战斗中不断失利,迫使敌寇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有先集中力量向我大后方再来一次新的大举进攻的最大可能。但在没有大举进攻之前,敌必然用全力加强〔有〕对敌后扫荡强化其占领区统治来减轻其后方的威胁,同时吸收财力、人力达到他“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三北的斗争形势已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全党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进入了与敌伪斗争为主的新阶段。根据最近各方面之消息,敌人已有〔由〕上海运到宁波大批铁丝,余姚城敌伪向姚南购买十万元毛竹,伪十师师长〔及〕姚城伪维持会长已由南京回来,宁波、慈溪、余姚敌伪均有增加,传闻将大举扫荡三北,并于明年开始对浙东清乡。姚城至庵东公路正赶紧修筑,甬杭路亦有修改公路之说,估计敌伪〔对〕这种行动,可能是布

置对三北进行较大规模的扫荡与进行清乡的准备。我党我军对于敌伪这些行动必须予以密切的注意,并进行必要的准备。

(二) 根据敌伪在江南与沪杭地区以及华北、华中各地屡次扫荡与清乡运动中所进行的政策,一般的都是在:1. 军事上敌首先占领主要的交通要道,建立据点修筑公路、碉堡、筑竹墙,实行封锁包围,然后分区清剿,烧杀,威胁;2. 在政治上宣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反共反新四军,挑拨国共关系,利用政府、游击队的各种弱点,散布抗日失败情绪,强制与收买、利诱落后人民建立各种伪组织、伪军,编制伪保甲,然后再利用他清查户口建立门牌,发给良民证身份证等等一套加强统治的办法;3. 在经济上(即)大肆抢劫财物,吸收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破坏封锁我们的经济。敌伪这些政策都是非常毒辣与非常残酷的,因此敌伪对三北地区,它必然要把这些毒辣政策运用来与我争夺敌后地区。因此,我们今后同敌伪进行斗争是一个全面的、非常艰苦残酷的过程。

(三)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不管敌人采取的政策如何残酷毒辣,但敌伪今天所处的环境,已经不是江南与京沪杭地区那个时期,它现在的困难增加了。首先国际形势,敌寇是处于空前孤立与困难之条件下,反之我国全民抗战的意志则由于国际有利形势与几年来抗战的经验,胜利信心日益提高,国内团结亦在日益进步中。特别由于敌寇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兵力不够分配,使他不能再象过去江南时期那样能集中强大的兵力,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举行扫荡与清乡,再加上敌人对人民的掠夺行为与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影响,使敌后人民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我们,反对日寇的。敌寇今天在浙东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社会基础,而我们自己经过最近以来历次战斗的锻炼,再加上我党正确政策的领导,我们有充分的胜利条件和信心,把三北建立成为我游击根据地,打破敌伪的阴谋计划的。

(四) 但我们对于敌伪的阴谋企图及其所执行的毒辣政策仍然不可忽视,相反的必须针对着敌伪这些政策和过去各地反扫荡、

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事先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够胜利的粉碎敌伪阴谋企图,完成我们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因此,区党委对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有如下的指示:

1. 必须在全党全军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党全军同志清楚的指出,今后三北的斗争形势与敌寇可能采取的阴谋企图及其毒辣政策,说明我们今天所处的有利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全党全军的同敌斗争的胜利信心,克服由于江南浦东几次[反]清乡斗争中所产生的个别惧怕敌人清乡的心理。应使全党全军认识,坚持三北阵地与坚持浙东的意义。因此,各级党及各部队应召集党内外各种会议作报告,举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2. 必须向各阶层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反敌伪斗争的宣传鼓动,用各种方式(如召集乡保甲长会议,群众会,街头宣传等)告诉人民,敌人对三北可能采取的恶毒政策,把敌寇在江南、京沪杭、浦东敌统治地区人民所过的生活及受压迫的苦头实际例子,如吸[抢]掠物资、吞并工商业,强占土地,强迫收税,统制粮食清仓收谷(每人只留一个月用粮),捉拿壮丁,稍有嫌疑者捕捉、屠杀等等实际例子告诉人民,揭破敌伪“建立东亚新秩序”“反共反新四军”的宣传。指出今天叫喊反共其用意是想借此离间中国人民团结,借此挑拨中国各阶层人民间的关系,借此争取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麻痹一部分落后人民,以便利它各个打击中国人民达到其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本质和目的。广泛向人民宣传我提出的“十要”“十不要”的口号。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甚至可以举行人民宣誓会议,这样去揭破敌伪的阴谋政策,提高人民为[对]抗日胜利信心,团结人民在我们的周围。

3. 在军事上对敌伪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破坏敌伪的计划,打击出扰的少数敌伪,有计划的广泛的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及游击小组,并使用它来不断的破坏敌伪的修路,建立据点的计划,打击真心投敌的汉奸,要使得敌人感到草木皆兵行路困难。为了顺利的执

行这些工作,必须加强情报及调查研究工作及交通联络,及时的了解情况,灵活的运用我之战术。

4. 必须抓住敌伪尚未准备充分与没有大举行动之际,争取时间开展我军活动区及接敌地区的群众工作。各级党、部队必须根据最近区党委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在全党进行深入的讨论,按照各种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形,去团结抗日的各阶层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只有争取了广大群众,才能在任何敌人扫荡清乡中坚持我们的斗争。但在执行各种政策与组织群众中,必须防止过左的倾向,切莫脱离群众,如果我们没有广大群众的同情拥护,不与广大群众建立血肉相关的连〔联〕系,我们在敌伪扫荡清乡中就有遭受不应有损失的可能。

5. 关于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各种政策问题,各级党及部队必须根据区党委过去的指示及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研究分析决定适当的对策。这里特别着重提出如下几点:

(1) 在扫荡清乡中,对待区、乡、保各级行政人员态度的看法,应有进步的、中立的、顽固的,汪化的及两面派等等本质上的分析。我们的对策一般的应采取打击汪化的,争取两面派中立或同情我们,对于顽固并坚决反对我们的应以危害抗战论去孤立他,并予〔且〕打击首要者,争取动摇的,团结进步的,但必须注意在实行此项政策时,必须具体研究这些人的出身,过去历史和以往对我们的态度,如原来一贯反对我,现仍利用敌伪势力反对我们,应坚决打击;那些被环境所迫而暂时附敌者,应提高他们的抗日的胜利信心,指出我们反敌伪清乡斗争中的胜利因素,告诉他应付敌伪的办法,但这应该秘密的个别的进行,并得到我们的许可,不许可公开进行。在人民觉悟程度不够的条件下,致影响破坏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2) 对待伪军伪组织,应先以〔从〕政治上采取攻势,首先告诉他们看清当前的形势,站稳自己的国家民族立场,不受敌伪的利用。我们对在扫荡清乡中的伪军伪组织亦应根据中立的、顽化的、

汪化的及两面派等等的分析,我们的政策应是争取与打击汪化的
顽化的,争取两面派中立或同情我们,对已经伪化的两面派,应争取
其回到抗战忠于抗战,敷衍敌伪而不是敷衍我们。各地党及部队应
认识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伪工作的好坏与〔对〕我们有极大
的重要性。

(3)对待地痞流氓土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须根据不同情
形处理之。基本上在争取其抗战,提高他的国家民族观念,适当的
解决其生活,应用其能力,反对他的扰害治安、扰害人民,如其已经
帮助敌伪茶〔茶〕毒鱼肉人民,不可感化者用严格手段对待之,因为
这些人不予以适当处理,敌伪要用来伪化我们地区。对于没有变为
帮助敌伪的分子,应予中立争取之。

(4)对于敌伪的在扫荡与清乡中的工作人员,凡是在扫荡与清
乡时协助敌伪扫荡与清乡的工作人员组长以上的干部及情报员、
烧杀员,检查组应予以分别,予以处理,最坏的积极〔反动〕分子应
坚决处决镇压之,但不能造成恐怖局面。对受压迫来的,又不坚决破
坏、杀害我们工作人员的,则应加以抗战的教育,予以释放,如这些
人为群众所痛恨者,应适应人民的要求,加以惩治,其他一律应分
别轻重处理,同时严格的执行我们对伪军伪组织的俘虏政策,不得
将伪军与特工人员相提并论。

(5)敌伪工作在反清乡斗争中,亦为主要工作之一,各级党应
根据区党委关于敌军工作指示,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各种工作。

(6)必须注意在敌伪未扫荡未清乡前,加紧大批吸收经济物
质资源工作,准备大批的经济,同时对于我现有资源应予以适当的
安置,免为敌拖〔抢〕去,对敌伪向我们封锁的机关及人员要坚决予
以打击。

(7)加强干部及机关人员的军事教育,实行干部“军事化”“群
众化”,我各部队各级办事处地方党工作人员均需加以清理,分清:
要群众化的必须深入群众,留住机关的应执行打游击的办法,加紧
军事学习,杂务人员、小鬼、女同志、老弱者个人的行动担子应有适

当的处理办法,免临时束手无策,遭不应有的损失。

(8) 健全地方党及各办事处,部队内部的组织严防个别坏分子混入内部,进行破坏阴谋,提高全党全军的政治警惕性,肃清暗中的破坏分子,审查干部及各种人员的来历,对于有嫌疑分子,应予以适当的处理,但不造成内部的恐怖现象。

(9) 加强党内的秘密工作,区党委决定建立的双重组织,应迅速划分,决定一定的坚强干部负责秘密,特别估计到敌伪可能建立据点的地区及交通线上更为重要,在这些地方即是公开工作受些影响亦须抽好的干部负责,谁忽视这一工作,谁就是错误,因为这对长期坚持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在必要时还应抽出枪交予秘密的可靠的同志,在某一时与某地区内镇压奸细特工活动,配合公开斗争。其次应打入伪组织的内部进行一切工作,争取一切伪组织中的领导。

(10) 最后全党全军同志,必须认识三北是我们坚持斗争的中心战略支点,(但)是我党我军向南发展的跳板,是我今后向南重要依托,是控制沿海沿江与甬杭等重要城市的前哨阵地,它有丰富的物资资源供我抗日之用,特别华中局曾经号召全党全军要用一切的方式来坚持每一个阵地,那怕是最小的地区、最小的力量的保持与保存,这对于将来伟大时期的到来,都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谁忽视了坚持三北的斗争的意义,谁就会犯错误。必须了解我们此次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有充分胜利的主客观的条件,我们一定是胜利的。问题只要我们能正确的执行党的政策,依靠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同敌伪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必胜不败。假如我们违背了党的[正]确政策,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不领导群众,我们就会失败。因此,我们的行动口号是:“一切为了反扫荡、反清乡的胜利而斗争”!

最后希各地党及部队,尤其是三北党及部队详细加以讨论,并须随时随地根据敌伪的某一具体行动加以分析,及时的布置自己的工作,改变工作的方式方法。华中局指示浙东的环境是“多变

的,多样的”,必须全党同志记住这个指针,灵活的执行党的政策,争取我们的胜利,并盼随时报告区党委。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陈、张、饶^①致谭、何^②： 在国共关系日渐好转情况下 对浙东今后任务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二日)

电悉。根据中央最近指示，国共关系已日渐好转，我党似以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求得国共关系改善与再进一步的合作。这是我们今后军事部署与工作指导的根据。同时，浙东位于长江南岸沿海一隅，连接国民党大后方，我实力孤薄，如在将来反攻时期以公开面目是很难坚持与生存的。因此，我们对浙东今后任务与工作特提出下列意见：

一、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均应采取隐蔽灰色的方式进行。不用新四军番号，不可用民主根据地的一套办法，如政权、群众及财政、税收等，只可采用适应国民党敌后的各种灰色组织形式与隐蔽方式去进行，就可能减少敌顽注意，以便长期埋伏与坚持，并在干部中亦要进行严格艰苦的教育才能做得到。

二、目前我之军事部署原则已不向四明山以南及宁东发展，以坚持和巩固现有阵地为中心。在不危害我之生存条件下，一切磨擦我尽量避免。就是为生存进行自卫战时，亦有一定限度。

三、多注意对各方邻近友军以及各界人士联络，求得关系改善，并要加强对于伪军工作[的]建立，设法争取合法地位之存在。

四、多方设法训练各种人材，就是将来严重情况下被顽军进逼时，亦能以多方面出现，进行坚持活动。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 陈张饶即陈毅、张云逸、饶漱石。

② 谭何即谭启龙、何克希。

三北游击司令部通报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

(甲) 兹将最近调查浙东各县敌伪友分布情况及最近动态通报如下:

(一) 鄞县

(1) 城区:

A、敌军方面

1. 浙东地区日军最高司令部山崎少将(旅团长), 下有山叩队长(上校), 田中大队长(少校), 其代号为枪部队“一二四五”, 常驻城内敌约一千左右。

2. 宪兵队长仓本×(上尉), 在鄞宪兵约四十余, (尚有六十余分布浙东各地区)。

3. 特务机关长泉铁翁(上校), 文教主任为上田五郎(为浙东地区最高特务领导机关)

4. 海军第三舰队百人(全数三百人, 分驻镇海、定海等处)。

B、伪军方面

1. 第十师师长谢文达, 副师长苏玉衡, 参谋长虞根麒, 政训处长高铁欢, 师部率特务连共三百余, 重机一挺, 轻机二挺, 步枪一百余支。

2. 警察大队田景尧部百余人。

C、伪组织方面

1. 浙东行政公署长官沈尔乔, 秘书长宋复, 民政科长史景尧, 财政科长张炎如, 警务科长刘官华, 视察林万燕。

2. 浙东行政公署所领导之各县乡镇联合会, 已改为县政府

制。以鄞县改设整理县政专署，由宋复任专员，余姚首先办理清乡，改为特区公署，由劳乃心任署长。现暂行划归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指挥监督。奉化、镇海、慈溪、象山、上虞五县，三月一日先行改组为县政府，县长多还是代理的，以谢兴如为镇海县长，刘仲和为上虞县长，杨梵涛为奉化县长，委马风为慈溪县长，邓相平为象山县长，新嵊两县最近新划入浙行署，仍用乡联会主持县政。

- (2) 鄞江桥 敌：警备队长×尾，三十余人，轻机三挺。
伪：警察八十左右，步枪四十余支。
- (3) 姜山 伪：鄞西保安队周士英部一百余人。
- (4) 育王岭 伪：鄞镇保安队霍中桂部三百余人。
- (5) 横溪 伪：十师三九团一个连四十余人，轻机一挺，步枪三十余支。
- (6) 于警桥 敌：十八人，轻机一挺，步枪十余支。
- (7) 栎社 敌：警备班二十人，轻机一挺，步枪十余支。
- (二) 奉化 (半月来动态不详，(是)一月前常驻敌伪)
- (1) 城区 敌：警备部部长大野，三百余人，重机三挺，步枪三百余支，轻机十余挺，炮三门(直属宁波最高司令部领导，现新增加二百新兵)。
伪：警察四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
- (2) 溪口 敌：四百余(属宁波最高司令部领导)。
- (3) 三江口 敌：三十余人，轻机二挺。
- (4) 太平庵 敌：四十余人(三江口及太平庵之敌，直属城区大野领导)。
- (5) 黄家埠 伪：十师三七团二百余人，重机二挺，轻机三挺，步枪八十支。
- (6) 白杜 伪：十师师部特务连一个排，三十余人，轻机一挺，步枪二十余支。
- (7) 西坞 伪：十师三七团二营张英部百余人，轻机一挺，步枪六十余支。警察三十余人，步枪二十余支。

- (8) 斗门桥 伪：十师三七团二营一连一部分四十余人。
- (9) 墙下潭 伪：十师三八团一个排，四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
- (10) 黄雁埠 伪：十师三七团一个连四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
- (11) 裘村 伪：十师三七团一个排四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
- (12) 方桥 伪：十师三七团二营一个排，三十余人，轻机一挺，步枪二十余支。

(以上伪十师三七团，孟志杰部共五百余)

- (13) 斗门头、长汀舒家北街等处：

伪：自警队八十余人。

- (14) 小王庙 伪：警察三十余人，步枪二十余支。

- (15) 大桥 伪：警察十余人，步枪七支。

- (16) 华胡街沿海 伪：自警队百余人，步枪三十余支。

- (17) 下地小桥头 伪：奉东独立队黄天行部八十余人，步枪七十支。

- (18) 庙后周 伪：自警队五十余人，步枪二十余支。

- (19) 马岙 伪：自警队五十余人，步枪四十余支。

- (20) 方门、冷水坑、楣岩等处：

伪：自警队六十余人，步枪五十余支(内大部是步马枪)

- (21) 后江 伪：自警队四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

- (22) 孙家堰 伪：自警队五十余人。

- (23) 陈桥下后竺 伪：自警队三十余人。

(三) 镇海

- (1) 城区 敌：海军陆战队经常驻有百余人，小炮艇、小汽艇三(但随时变动)。

- (2) 万家桥 敌：海军陆战队二十余人。

伪：武装警察五十余人，轻机二挺，步枪短枪三十余支。

(3) 蟹浦、邱王、河头市

伪：镇北保安团姚华康部三百人左右，轻机二挺，自动步枪一挺，掷弹筒二个，步短枪二百支左右(河头市属慈东区，系金发智部)。

(四) 慈溪

(1) 城区 敌：四五人(联络官等人)。

伪：十师三九团五百余人(详情不明)。

(2) 丰浦 伪：十师三九团一个排，轻机一挺，步枪二十支。

(3) 河头市 伪：镇北保安团第一大队金发智部七十人，自动步枪一挺。

(五) 定海 敌：第三舰队岛山派遣队司令为左藤庆田(系金岛敌)。

(六) 余姚

(1) 城区 敌：特务机关长稻恒。

宪兵队长稻田。

警备队长上田(上尉)，一百六十余人，炮二门，步枪百余支。

伪：十师三八团一营二个连二百余人。浙保一大队一百余人。

(2) 周巷 敌：警备队田尾百余人。

伪：浙东地区剿匪安民纵队司令部(田岫山)机枪连第二支队共三百人左右。

(3) 庵东 敌：工兵四十余人。田上警备队五十余人。宪兵队三十余人。

伪：盐务税警队三十余人。

浙保张妙根部百余人。税警队第一支队一部二百余人。

(以上敌伪有轻机十余挺,掷弹筒三个)。

- (4) 樟树庙 敌: 警备队六十余人, 重机三挺, 掷弹筒二个。
伪: 十师三八团二营六连连长张志才部九十三人, 轻机二挺, 无线电台一架。
- (5) 浒山 敌: 警备队二十余人, 轻机二挺, 掷弹筒一个。
伪: 十师三八团一营二连连长容吉堂部九十人, 轻机二挺。
- (6) 坎墩 伪: 田部第一支队二百余人(支队长姓郭)。
- (7) 马渚 伪: 十师三八团二营□连八十人左右, 轻机二挺。
- (8) 相公殿 伪: 税警队第一支队一部二百余人, 轻机枪六至七挺。
- (9) 段头湾 伪: 税警队第一支队一部二百余人, 轻机六至七挺。
- (10) 崔家路 伪: 浙保队二十人。敌十人。
- (11) 横河 伪: 十师三八团二营五连八十人, 轻机二挺。
- (12) 郑巷 伪: 十师四十余人。
- (13) 低塘 伪: 十师四十余人。
- (14) 梁弄 伪: 十师三七团二营二个连, 一百三十余人, 轻机枪二挺, 步枪一百支左右。(营长张志清, 连长姓李与姓何)

(二月六日侵占梁弄时共敌伪一百五十余人, 二月九日敌二十余退归姚城。)

(七) 上虞

上虞地区各据点原有敌人均于二月中旬调防至余姚, 原虞城敌森上部队于二月十五日抵姚城。

- (1) 城区 伪: 十师三七团二个连, 一百五十余人。
- (2) 五夫 敌: 七人。
伪: 十师三七团一个连八十人左右, 轻机二

挺。地方部队李华良部百人左右。

- (3) 百官 敌：指挥官兵二十一人。
· 伪：十师一个连，五十人左右。上虞保安队季槐林部一队二百人。
- (4) 小越 伪：上虞保安队季部二百人左右。
(原季槐林[部]现改为上虞保安队，司令刘仲和，季槐林任副司令)
- (5) 崧厦 伪：警备队(领导人林一郎，台湾人)百余人，轻机四挺，步枪五十余支。(最近枪被敌缴去)
- (6) 历海所 伪：浙东自卫纵队滕祥云二百余人，轻机三挺，步枪百余支。

(八) 绍兴

- (1) 城区 敌：五六十名(比过去减少，其他据点也较前少，但去向不明)。

(2) 全县现有的伪据点如下：

1. 城区 2. 东关 3. 皋埠 4. 曹娥 5. 柯桥 6. 樊江
7. 陶堰 8. 长塘 9. 富盛 10. 孙端

以上伪据点中，除柯桥系伪中顺部队百余人，轻机一挺，步枪七十余支，余皆浙东保安司令(姓杨)人数有一二千人，为目前绍兴伪军最大力量，详情不明。

- (3) 汤浦 伪：浙东警备总队第一支队邓光部(属四省行署指挥)四百余人，重机一挺，轻机十六挺(战斗力较强，近来有调萧山临浦说，确否待查)。

(九) 新昌

- (1) 城区 敌：警备队小芳大尉百余人。
- (2) 西山 敌：警备队山岛大尉三十五人，轻机二挺，步枪二十支。
- (3) 竹萍[岸]敌：三十人，轻机一挺，步枪二十余支。

(十) 嵊县

仅城区敌大崎部队三百余人(属宁波军最高司令山崎指挥,武器不洋,其他无据点)

(十一) 诸暨

- (1) 城区 敌: 二百五十余人, 炮三门, 重机三至四挺, 轻机十六挺, 步枪二百支左右。
- (2) 步退岭 敌: 二十余人, 轻机二挺, 步枪十六支。
- (3) 燕尾山 敌: 十余人, 轻机二挺, 步枪十支左右。
- (4) 直埠 敌: 四十余人, 轻机四挺, 步枪三十余支。
- (5) 马鞍岭 敌: 二十余人, 轻机二挺。
- (6) 长兰 敌: 四十余人, 轻机三挺, 重机一挺, 步枪二十余支。
- (7) 祝山汤 敌: 四十余人, 重机一挺, 轻机三挺。
- (8) 三江口 敌: 二十余人, 轻机二挺。
- (9) 张四里 敌: 六十余人, 轻机四挺。(有汽车)
- (10) 三都 敌: 六十余人, 轻机六挺, 步枪四十余支。
- (11) 猪头山 敌: 二十余人。
- (12) 唐头岭 敌: 二十余人, 轻机二挺, 步枪十余支。
- (13) 白门下畈 敌: 六七十人, 炮二门, 轻机六七挺, 步枪约六十支。

(以上敌人据点, 主要是看守铁路)

- (14) 七里 伪: 四省行纵队(周巨英部)一百三十人, 轻机二挺, 手提式二支, 步枪约八十支, 木壳枪十余支。
- (15) 湮渚 伪: 南岸自卫第二纵队三百五十人, 轻机八挺, 步枪一百九十支左右, 木壳十余支。

(乙) 敌伪动态(增减情形)

一、二月十三日姚城敌五十余到梁弄, 有小钢炮一门, 重机一挺, 轻机一挺, 来后一时赴横坎头一带搜索, 于十四日午后一时许经龙坑仍回姚城。

一、二月十四日杭州敌宪兵队长到姚城，内幕不详。

一、二月十五日宁波敌四十余至鄞江桥，配合鄞江桥敌伪百余，十六日至黄云林催收军谷，于二十四日回鄞江桥。

一、二月十六日宁波敌伪四十余出南门至各乡催谷，当日回城。

一、二月十六日宁敌田中队长由姚城经周巷到庵东，主持姚北清乡。

一、余姚清乡先以庵东为中心，清乡委员会于十五日在城内成立，清乡司令为田中大队长，主任为宁波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副主任为姚特务机关长稻恒，清乡办事处处长沈尔乔。

一、姚城敌近日仅留六七十人，大部已到庵东。

一、二月十八日姚维持会长劳乃心由城至庵东，并往相公殿等地视察(现改为〔任〕余姚县长兼特区公署署长)。

一、二月十九日周巷敌三十余人，到临山向老百姓索款。

一、二月十九日伪十师师部派李××率士兵八名到梁弄视察该部伪军。

一、二月十九日宁波敌廿七名伪警十名，带轻机一挺，掷弹筒一个到观海卫，将长兴、宏源二大鱼行抢劫，计布匹、洋烛、肥皂、生油等价值五十万元，于二十日午后捉船十只，动身往龙山返宁波。

一、二月二十日姚城伪浙保一、二中队七十余人由□队长郑鸿猷率领开往上虞，系驻防和改编上虞。(敌特务机关长稻恒也同去)

一、二月二十一日庵东敌十余人，伪便衣队三十余人，有轻机三挺到长河市(其主要是看我五支所解决的匪部的匪首李杏春之尸首)。

一、庵东沿海之竹篱笆已筑到相公殿之六灶，西至断头湾，姚城之毛竹天天向庵东运去。

一、二月二十三日伪十师上校参议郑之盛到梁弄，企图不明(郑原为余姚县长蒋先启投敌伪后所改名的)。

一、二月二十四日梁弄伪军召开梁虞七乡镇长会议，主要是要军谷和钱。

一、郑巷、低塘二处之伪军，主要是赶筑姚庵公路。

一、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宁波敌最高司令部召开军官会议，到会者有各地警备队长如田中等，及伪军高级军官，如田岫山等(主要是讨论布置三北清乡问题，其他内容不详)。

一、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日内，宁波由上海增敌千五百余，并于二十八日敌千余，经鄞江桥向奉化而去，有进攻宁波〔海〕模样。

一、清乡兵力据说最多为一千人(敌军)伪军(十七日由上海调来的)中央税警队第□支队(支队长关铁尉)人数六百余，有机枪二十二挺，步枪……(全部都系沈阳造，新三八式，该部现分驻庵东、相公殿、断头湾三处，每处约二百余人)。其次为田部，全部五百余人，机枪十八挺，炮一门，步枪三百余支，和伪十师的五个连(总计敌伪约二千五百人左右之清乡兵力)。

一、定海军港建设尚无具体化。

一、宁波至宝幢公路已开工修筑，宁〔波〕至柴桥先筑。

一、由浙江第三区专员公署得来情报：敌人近在浙东地区增敌七千，企图不明，并云将分二路进攻后方，一路由新昌攻天台，一路由象山、奉化攻临〔宁〕海，确否待证。

一、据浙江报载，敌人在一个月以前，曾进犯闽浙边的闽属福鼎沿海及进攻浙江云和。

一、敌在温岭、黄岩的海港口，即金港外面的大陈山建设海军兵站，类似海军根据地。

一、台州湾海口及甌江海口和玉环海面的敌舰，近无动静。

(丙) 友军兵力及活动地区与战斗力和对我方之关系

(一) 鄞县

鄞县自卫第三支队郭清白部共计十二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兵力在一千三四百人，重机二挺，轻机三挺，步枪八百余支，短枪七

十余支,枪弹筒三只,手榴弹二百余只,除开赴临〔宁〕海四百余人,步枪二百余支,轻重机亦全部赴临〔宁〕海,其他人枪均活动于鄞西、鄞南一带,主要任务是保护税收及捕捉土匪,故并不流动,大部散居民间,战斗力除特务大队陈炳奎部(二百左右人,重机二挺,步枪六十五支,短枪十四支,但一中队带重机赴临〔宁〕海)比较强,第四大队刘子良部(二百人左右,轻机三挺,步枪一百二十支左右,短枪十五支左右,已全部至临〔宁〕海)为郭部算最强,其他均薄弱,甚至无战斗力,内部不能统一指挥。一般关系除区警察大队吴有杰部(八十人左右,步枪四十五支,木壳二支)顽固而且反动,其他与我们态度还好。

(二) 奉化

(1) 俞济民部第一支队赖云章部一千人左右,重机二挺,轻机七挺,步枪三百余支,短枪五十余支,炮二门,经常在奉东松岙和宁奉交界沿象山一带流动。(现第三大队严纪民部已开往宁海,赖任命张之全为特工室主任,专门对待〔付〕我们。)

(2) 奉化区署特务大队(区长兼大队长)孙修璇部六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因以伪名义固驻奉化徒象、陆家、上张、下张一带。

(3) 县属之抗卫队及自卫队等共七百余,轻机二挺,步枪三百余支,分布于奉南及奉西一带。

(4) 浙保第四团千余人(武器很好,但不详)分布于奉新交界处

(三) 镇海

(1) 苏部特大诸公良部三十余人,轻机一挺,步枪十余支,流动于镇南柴桥以东山区一带。

(2) 第三大队夏继全部六十余人,轻机一挺,步枪二十支,分布镇南以东。

(3) 第二大队二十余人(赵需臣部)枪极少,形同流氓,无一定活动地区。

(4) 县警大队一百六十余人,轻机五挺,步枪百余支,分布于

鄞镇交界及柴桥西南地区。

(以上四部,黄大烈最近积极组织与加强镇海工作)。

(四) 定海

(1) 国民兵团第一大队一中队,机枪一挺。

(2) 海上剿匪司令王继能部二百余人,步枪百余支,轻机二挺,活动于各海岛。

(3) 县长现为朱铁均。

(五) 余姚

(1) 淞沪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一支队长顾小汀(上思)(番号现已取消),支队长张起,指导员朱亚,第一大队长李芳,特务中队长李应宝,共轻机七挺,步枪二百余支,枪弹筒四个,三百余人。现特务中队长应宝部已投姚城浙保,全部现尚有二百五十人左右,步枪百五十支,机枪共四挺,枪弹筒三只,近来活动于姚上一带。

(2) 平湖自卫队负责人谢友生,黄百美(王八妹)百人左右,轻机一挺,步枪四五十支,活动于余上交界处。

(3) 浙江省第三区国民自卫第一纵队,第二[支]队,萧文德为支队长,副支队长杨善生。少校参谋董旺楣(特工),上尉参谋黎楚平,全部二百余人,步枪百余支,轻机二挺,活动于姚南及上虞交界处。

(4) 梁弄区署独立中队队长李华克,三十余人。

(5) 梁弄区署区长陈思寿。

(6) 县长夏铭章。

(六) 新昌

(1) 忠救四百余人,重机二挺,轻机十挺,步枪不详,活动于新嵊公路间及西南区(时常调动增减,一月份开到),直属于嵊县司令部指挥。

(2) 县自卫纵队张晓松部四百人,重机一挺,手提式二支,步枪二百支左右,木壳八支,战斗力不强。

(七) 诸暨

(1) 淞沪游击队总指挥部薛天白部七百五十人,重机一挺,轻机约八挺,步枪二百九十支,木壳十九支,活动于诸、绍交界处。

(2) 苏浙行动第一支队杨九飞部约一千人,迫击炮一门,重机一挺,轻机九挺,步枪约四百五十支,战斗力不强,内部分三派,意见不一致,与我关系部分好部分坏。

(3) 小东联乡自卫队四百二十余人,轻机四挺,步枪二百三十余支。

(4) 县警察义勇队向步耀部二百人左右,轻机三挺,步枪百三十余支,活动于南乡一带。

(5) 区署警察队祝根〔更〕生部约五十人,步枪约四十支,木壳约五六支。

(6) 第一二三联乡总队(1.周林镇〔麟振〕.2.赵雪昌.3.裘竹馨)共计七百余人,重机一挺,轻机十七、八挺,步枪五百支左右,木壳枪约七十支,手提式十五支左右,战斗力不强,分布于〔嵊县〕南西北乡一带,一般的对我关系还好。

(7) 高坎自卫队邢传穗部四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木壳四支,其任务是抗日活动,分布于〔嵊西〕太平乡一带(邢是很进步的,本地人,对我们很信仰)。

(8) 武械自卫队张士楷部一百十余人,步枪八十余支,手提式四支,无战斗能力,下层对我们还好。

(9) 忠救安我华部约三百人,重机一挺,轻机六挺,木壳十支,步枪二百四十余支,战斗力还好,活动于东嵊交界处,任务是扩大部队,和我们的关系不好,(安是前忠救的卸职团长,收编了伪十三师二百多人而扩大的。)

(10) 东九乡自卫队陈兆龙部六十余人,步枪四十余支,木壳约二十支,活动于须下赵家一带,该部与宣铁吾关系很好,其任务是暗杀工作,与我不利。

(11) 三战区行动队赵勋部三百余人,轻机一挺,步枪一百五十余支,木壳约二十五支,战斗力平常,活动于诸绍交界处。(专

做特务工作,同特务系统有关系,对我不利。)

(丁) 友方军动态:

一、闻张发奎部一万余人,已抵仙居,不日开天台。

一、三战区派员到宁海,专门处理运米事宜,据说自三月份起,每乡抽派民伕一千七百名,并在宁海、天台设立兵站线,已运来军米五万包,准备国军来时应用。

一、浙江保安第五团在临海,第二团在天台。

一、闻三十二集团军八十八军全部将开天台,辎重已到天台。

一、大后方传说国军将反攻武汉与浙东。

一、浙保安五团,系过去驻象山之浙保纵队改编而成,共三个大队,一千二百人左右,每大队有机枪连,共有炮四门,重机十挺至十二挺,轻机五十余挺,该团总部现在黄坦城区一带,有一个大队深入到奉化大堰一带,该团有学生队,大事〔肆〕招收知识青年,该队官兵大都中央军校毕业,属兰衣社。

第三战区所属之浙东挺进军司令郭履州部之一营已开至宁海北乡深剡,大蔡一带,企图不明。

一、又息〔悉〕:挺进队司令部设丽水,有一部分已开到仙居,番号标明突击,内有英美顾问,符号背面亦有二国国旗,有到六区之消息。

一、镇海县政府所属之突击队大队长叶志清,共约二百人,数日前开赴镇海境。

一、慈溪县所属之游击第三大队约一百六十人,在于沙与我接触后,已退至宁海西乡,在招兵补充整理。

一、铁卫团(宣铁吾的)约三百四十左右,内中三分之一是女的,大部是学生成份,学员均有长枪,在天台受训。

一、黄绍竑由重庆返浙后指示全省中心任务六项,内有一项为全力办理绥靖工作。

一、一月底,临海民报载浙省为整饬三六两区治安,主持对敌斗争,特划定萧山、绍兴、上虞、余姚、慈溪、镇海、定海、象

山、新昌、嵊县、宁波、奉化、东阳、义乌、诸暨等十五县为绥靖区域，成立绥靖机关，并由宣铁吾负责兼主任，负责兼任指挥该区绥靖工作，现绥靖指挥部设于天台。

一、浙省行政会议在云和召开，尚未结束，各县长均参加，传六区专员徐箴调动另用，由苏本善兼任六区专员，俞济民升任七区专员，镇[海]县长黄大梁亦调动，现任李经民为镇[海]县长(李乃保安处第三科科长，与苏关系很好)。

一、省府会议决：自三十二年度起宁绍等十五县县政府设民政、军事、财政、教育四科，秘书、会计二室，上列各县之国民兵团团部撤销，关于自卫队及军事事项，均归军事科办理。

一、六区保安副司令钱俊法辞职照准，任命浙保五团团团长蓝钟伍兼任六区保安副司令(蓝极顽固与苏关系极好)。

一、天台现驻浙保第二团、伪十师反正之二十五旅，闻三十二集团军所属之十四师开天台，另一消息三十二集团军有三千人已进入新嵊境，因敌阻于新嵊路以南。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张^①、饶、赖致浙东：关于浙东 抗日人民自卫军改为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命令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时]）

为适应目前敌后环境，开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任务，特决定：着该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于令到之日即改名为新四军游击纵队，并任命何克希为纵队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即着手整编并去部队中正式公布。

① 张即张云逸。

华中局致浙东区党委：同意 成立浙东行政委员会 及其纲领之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 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是迫切需要的。但要以坚持敌后抗战, 实行民主, 推进敌后抗战文化教育, 发展工商农业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等作为号召。

(二) 同意以连柏生为主任, 罗克为行政, 黄源为文教, 并选择几位地方上进步人士(包括开明士绅与各抗战的首领)。谭何两同志也当参加为委员, 能起大的号召作用。杨思一是否也要参加, 望你们考虑。

(三) 全浙东敌后区政权机构之建立, 可用召集浙东各县人民代表举行各界临时代表会议形式决定之。临时会议之代表可用政治部公函聘请或用谭何名义聘请之, 但需包括工、农、商、学、士绅各阶级比较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士。临时代表会议除了推选临时行政委员会各委员及政府主任外, 并可选举数人成立浙东参议会筹备委员会, 负责筹备召集正式参议会之工作。在临时与过渡时期中, 各县行政人员可用上级行政机关(全浙东敌后区政权机关)聘请和委派方式行之, 一待减租减息运动起来, 依靠群众的基础来进行各县各区乡政权进一步的改选。

(四) 要调选一位党性强的同志任财政处长。

(五) 关于政治纲领, 只说到根据抗建与十大政纲基本精神及适合浙东敌后具体环境颁布之, 作为浙东敌后党政军民整个抗战与民主的人民目前斗争目标。

(六) 纲领内容应包括下面各条意思：

1. 坚持抗战, 建立敌后各阶级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主政府。
2. 团结一切抗日人民与抗日党派团体为共同事业而巩固团结并奋斗到底, 誓达驱逐日寇出浙东及浙江各地。
3. 组织与武装人民, 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4. 肃清根据地内汉奸与破坏抗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工分子。
5. 实行抗战与民主的普及教育, 提高人民抗敌胜利信心。
6. 实行保障人权、财权、地权, 协助根据地工商业自由发展。
7. 发展农业生产, 实行减租减息, 增加工资, 改善人民生活。
8. 废除苛捐杂税, 以公平负担原则下建立一定的抗战税收制度来保证抗战经费。
9. 建立公粮制, 保障敌后抗战机关与部队给养。
10. 救济难民灾民, 实行优待抗属。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公布施行)

本委员会为进一步加强浙东敌后抗战力量,以达坚持浙东敌后抗战、粉碎敌寇侵略阴谋、增进人民福利、与最后收复失地之目的,特根据总理手订三民主义及其遗嘱,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之基本精神,并适应浙东敌后具体环境之需要,拟订本施政纲领,自即日起坚决实施之。

(一) 团结浙东敌后及大后方各地一切抗日军队、抗日党派、抗日机关团体、各阶层抗日人民,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共同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保卫浙江收复失地,驱逐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设革命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浙东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二) 健全各级抗日行政机构的组织与领导,筹组各级参议会建立浙东敌后各阶层人民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主政府,为摧毁伪政权,粉碎日寇伪化浙东的企图,建设与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

(三) 拥护新四军及一切坚持团结抗战爱护人民之军队,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后方勤务工作,增进军政民的亲密团结,并加强地方人民抗日自卫武装,健全其组织与领导。

(四) 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人民有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五) 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同时改善公务人员待遇，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

(六) 协助根据地内工商业之自由发展，奖励私人企业、保证私有生产、欢迎外地投资、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协助山货的推销、扶助手工业的发展，以达到根据地内日用品自给自足 抵制日货之目的。

(七) 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协助解决贫苦农民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协助山民解除兽患、开展水利、消灭灾荒，开辟荒地，以发展平原与山区之农业生产，并禁止粮食向根据地外流、调节根据地内各地之食粮，以保证根据地内全体军民之粮食。

(八) 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同时保证交租交息、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九) 调节劳资关系、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同时保证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

(十) 废除苛捐什税，以公平负担，建立一定抗战税收制，居民中除极贫苦者应予免税外，大多数人民均应负担抗日经费，以保证抗战用费，并建立公粮制以保证敌后抗战机关部队之给养。

(十一) 实行抗战与民主的普及教育、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提高其文化政治水平，改进学校教材、推行社会教育、奖励抗日书报之出版发行、提高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各地科学艺术人才来根据地工作，给予教师及公务人员以学习进修之机会、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普遍提高人民政治认识及文化水平、加强抗战胜利信心。

(十二) 拟订并实行优待抗日军人及其他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的办法，务使新四军及一切抗日军队机关人员在根据地内的家属得到物质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十三) 推行卫生行政、建立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痛苦之目的。

(十四) 加强对敌伪政治攻势、欢迎并优待反正伪军伪组织人员。

(十五) 肃清汉奸及破坏抗战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工分子,同时提倡坦白运动,实行宽大政策,坚决废除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除怙恶不悛、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在人民一致请求下,必须予以必要制裁外,一律争取感化,给予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

(十六) 优待俘虏,对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捕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处理,对于其他进攻抗日部队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十七) 欢迎大后方及敌占区各地青年及抗日的各党派各界人士,来敌后根据地参加各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共同为发展浙东敌后抗日力量推行民主运动,而一致努力。

(十八) 团结根据地内外各会门组织、协助其合理解决会门人员之生活、提高其民族意识与抗战热情、共同为坚持浙东敌后抗战收复失地复兴中华而奋斗。

(十九) 切实救济本地及外来之灾民难民、帮助灾民难民进行生产工作发扬互助精神。

(二十) 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扬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积极性,实行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区党委关于出版《新浙东报》 与加强报纸工作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四月)

(一) 一年多来“时事简讯”的出版在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上,在团结争取与教育浙东敌后各阶层人民上,在反映浙东党的工作与群众的要求上,以及在帮助全党全军的政治教育与思想领导上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部份的完成了党报的任务。但由于时间历史斗争环境、人力物力的限制,由于全党对党报的认识、爱护、帮助不够,以及由于领导上的某些弱点,因此“时事简讯”在内容上还没有做到与我浙东全党全军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最紧密的联系起来,还没有能及时反映人民的切身要求与实际斗争的经验,还不能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很好的贯彻与深入到群众中去,还未完成对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的指导作用,在发行上还不够普遍深入,不能完全满足各方面的希望,因此还没有完成党报应负的一切重要任务。

(二) 根据上述对过去报纸工作的检讨,以及根据目前国内外革命形势及浙东实际斗争的需要,区党委认为有进一步加强党报工作领导的必要。为此,特决定将现有之“时事简讯”改为“新浙东报”,并明确决定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今后凡“新浙东报”上所发表之社论、区党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之文章以及中央的、华中局的、与浙东党的各种文件,均即为党的正式指示,各级党必须经常组织研究讨论,与自己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要善于自动根据这些文献的精神去布置与改进自己的各项有关工作。今后各地党政军民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应该注意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及时反映到党报上

来,应该利用党报来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研讨当前工作的实际问题,来教育同志,推动与领导自己的工作,并使党的各部门的工作取得应有的经常密切联系。今后各级党委与全体党员应该在中央“全党办报”的号召下把对于党报的关心爱护,把研究出版推销党报为党报写文章写新闻通讯作为自己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区党委并决定以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张瑞昌、江岚、五同志成立党报委员会,以谭启龙为主任,经常注意检查与确定每一时期报纸之政治方针。

(三) 为了加强“新浙东报”之编辑、采访、发行及阅读研究工作,区党委特有如下具体规定:

1. 特指定各地委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各支队宣教股长、大队教导员、行政委员会各县级办事[处]之秘书、文教科长、督学、文教指导员,凡为党员者,均为“新浙东报”之当然通讯员,但所写成之文章通讯新闻均经该负责首长之审阅,以表慎重。各级党委及行政部门负责首长应经常检查本部门之投稿情形。“新浙东报”之正式编辑及正式记者应该加强,由区党委宣传部审查后决定之。区党委对“新浙东报”编辑部、各党委与各部门负责首长对自己地区之报社记者,应随时给予有力的帮助,使之及时了解形势与政策,给予采访上编辑上之各种便利,应随时关心各种消息与论文是否有碍军事的与党的工作秘密,及是否符合于各部门工作之具体政策。

2. 特规定每个文化水平足够的党员均应经常仔细阅读研究党报,作为自己主要的经常学习任务之一,并应经常注意引导群众来阅读研究我们的报纸,建立各种“新浙东报”的读者会研究会等等,并将自己与群众阅读之心得及时[对]报纸之批评意见随时报告上级或直接写信给报社编辑部。

3. 各级党委及各部队政治机关应负责检查督促,布置本地区之报纸发行工作,分配适当的有能力的干部负责之,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报纸发行工作不受间断。各地交通机关应将报纸之运送作

为自己的当然重要任务之一,应该经过行政手续,通令各乡镇公所所有运送推销“新浙东报”以发扬抗日文化事业的责任。每一个党员及一切党政军民的机关均应随时随地注意报纸之推销工作。对于地方上重要士绅应由各有关机关有计划按期署名赠送之。对伪军伪组织反动派军队及机关人员内部,应动员全党多方面深入散发出去。每个文化水平足够的党员自己均应自动去订阅报纸,并很好保存,以为经常学习与工作上之参考,严格禁止随便把党报包东西等错误现象。

4. 各级党委会议,至支部为止,应对报纸之阅读研究投稿关心爱护推销发行等工作,作为经常议事日程之一,并将对这一工作的成绩作为考核各级党委与各个党员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

(四)“战斗报”为部队内的党报,它的任务主要是作为部队工作的指导中心与教育工具。但许多文章对地方党的工作与学习也是有着密切关联十分重要的。许多战士教材同时可供下层党员及基本群众的教育之用,因此除部队党应根据政治部训令来重视战斗报之外,各级地方党同志也应该经常研究战斗报上的重要文章,善于运用战斗报上的各种教育材料,把它与自己的工作适当的联系起来,并经常注意供给战斗报以各种适当稿件。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行委会财经处 给各级财经工作同志的指示信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

各级财经工作同志们：

在抗战即将转入反攻的阶段，敌伪与破坏抗战的反动分子，必更疯狂以图一逞。随着军事斗争的日趋急〔激〕烈，经济斗争亦日益艰苦。掠夺与封锁亦更加剧，可能有更艰苦的日子在等待着 我们，为了保证这革命的根据地能坚持下去不垮台，经济战线上的工作同志与军事战线上的同志有同样重要的任务须要完成。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经济战线上的工作同志，与敌伪顽不断地作英勇斗争，正给根据地创造的全部工作上有了许多光辉的成绩，特别是各同志在危急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岗位，自我牺牲的精神，如杨定、孙瑞祺等同志的英勇牺牲，王佐一同志等被捕后的顽强不屈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尚存在许多缺点，如单纯的经济观点，单纯的技术观点，中间有许多同志不能正确地掌握策略，与灵活地运用策略等等，造成不能与军事胜利相调和之现象，甚至影响到军事胜利不能更迅速更伟大地展开。因此，本会特于上月二十三日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上对财经问题上作了详细的研讨，并有多项决定，除发给会议记录，希各级坚决而切实执行外，再作详细的说明，补充与指示。

首先，要说明的是今日我们地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问题在新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里，为敌伪顽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频繁的客观条件所限定，我们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阻碍敌人的掠夺，减少敌人的掠夺，缩小敌人的掠夺，保护人民的生产，提高人民

的生产力,增加财政收入。前三个原则是对敌的,后三个是对自己的。前三个原则与后三个原则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阻碍了敌人的掠夺,就是保护了人民的辛劳所得的生产,减少了敌人的掠夺,就可以给人民以提高生产的前提,缩小了敌人的掠夺范围,就可增加我们在财政上的收入。因为社会生产的总数只有这一点,人民负担能力是有限的。这三个原则又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推进财经工作的三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是逐步提高的。在第一阶段,我们在人民方面可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人民自动地广泛地对敌人的供给尽量推拖赖,由时间的延长,减少供给的次数,同时我们用军事的行动的方法破坏或阻碍敌人预定的掠夺计划。这样由于掠夺次数的减少,渐渐达到敌人掠夺总收入的数量日趋减少,而自然地转入了第二阶段,使人民有充分的提高人民生产的物质前提,如有充分的施肥,购置工具,多下功夫的资本。由于第二阶段量上的发展,逐渐进入第三阶段,使敌人在时间上空间上缩小了掠夺的范围,使我们财政上有很多的财源可以开发。如果财政上大大有了办法,就可帮助军事上、政治上、建设上大大地开展,如果军事上、政治上,或建设上有了大的开展,财政必更有办法,它们是相互影响着,在某一时期,某一具体环境内,某一方面的斗争起了主导的作用,如目前在反内战和反敌伪蚕食扫荡的环境中,经济困难的克服就有决定的意义,因为经济如能保证有办法,部队就能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总的斗争中,在某种客观条件下,别种斗争又起了主导的作用,如在目前款急,敌人“蚕食”窜扰之时,用军事的行动,打击敌人的要害,就可展开局面,征集税收,解决财政急需,这在目前三北地区应该如此做,但在四明地区则不同,因反动派军力占着相当优势,又进行三光政策,和欺骗宣传,造成空前惨象,部队给养,人民生活,均成严重问题。所以广泛深入地展开政治教育工作,使人民清楚认识反动分子的真面目,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坚决拥护我军,群策群力,渡过难关,那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这样辩证地把握这些原则,

运用这些原则，才能在经济战线这一部分上尽了坚持革命根据地的责任。

其次，要说的是具体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我们浙东敌后的整个地区，严格地讲起来还是游击区的性质，目前正处在严重的武装斗争环境中。但我们整个军事活动的地区是可分为四种，即伪化区、顽化区、游击区、基本区。这四种地区，前二种和后二种是有性质上的不同，前二种对我是没有政治上的认识，不接近我们的，但我们的军事威信是流行于这两种地区，游击区与基本区的人民对我是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认识，但二者间有程度上的差别。不过，伪化区也好，顽化区也好，他们的政治基础是很薄弱的，所以在整个浙东敌后地区讲起来，我们政治基础比一切的敌人强，但军事力量他们比我们强，所以基本上这地区还是游击区性质。若以个别地区来说，有些地区我们在政治、军事上都占优势，就成为基本区；有些地区我们在政治上占着优势，但军事的优势敌我时相变换，就是游击区；有些地区敌人的政治基础虽然不怎样好，但我们的政治工作一点也没有，而军事上它们占着绝对的优势，就是伪化或顽化区。在这些地区中，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同，欲达到转变这些地区为革命的根据地的目的，在军事战线上我们是必须做到一面要使游击区逐渐变为基本区，而伪化区或顽化区逐渐变为游击区，另一面要使基本区逐渐巩固和扩大，而成为革命的根据地。但欲达此目的，没〔应〕有正确的策略领导，和主观上加以极大的努力，不然，基本区亦有变为游击区，再变为伪化区或顽化区的危险。在经济战线上各区也是有不同的任务，并须用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与方法来完成这些不同的任务，藉以完成总的工作方针，兹分述如下：

A. 伪化区或顽化区——在这种区域内的经济斗争，主要的任务是阻碍敌人的搜刮，增加敌人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以利我军的骚扰和进攻。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必须以合法斗争的工作方式来领导人民进行反搜刮斗争，采取

推、拖、欠、赖、请愿、恳求等等的方法，来达到斗争的目的。另一方面用见隙突入逐步深入的工作方式展开财经工作，藉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这是主要的)，获得财物上的实利，那就须采用抓住各种有利的时机，利用各种关系，让与部分的利益，团结部分社会人士，替我们进行各种的税收。(税率应很轻，因我们目的是在人民心理上增强对抗日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视)。或收买必要的物资，甚或可以扰乱敌人的市面，以增加敌人的困难等种种方法来进行。顽化区亦以如上的方式方法进行斗争、因今天反动的顽固分子已积极进行破坏抗战的内战，顽化区正成为破坏抗战的反革命的堡垒或据点，所以有摧毁这些地区的反革命的统治的必要。

B. 游击区——在这种区域内的经济斗争，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减少敌人的掠夺，保护人民的生产，缩小敌人的掠夺范围，扩大我方财政收入的范围，使敌我在经济战线上力量的比重随着军事力量的比重，逐渐我方占着绝对优势。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第一要把革命的两面政策运用得正确，一般地允许抗战的与反内战的两面派的存在，但应尽量避免与敌伪或反动派有所接触，因人碰到时他们就要以绑票勒索的方式达到掠夺的目的。我们进行斗争的方式，应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方法是用推、拖、皮〔欠〕、赖、讲价还价，阳奉阴违或一面公开缴付，一面暗中通知军队、政府，在途中武装夺回，而再去回报敌人等等。(如敌人派粮，我们向它们说明困难请减免或暂缓，这是合法斗争)。在没有办法再缓时，一面缴给它们，一面通报我方武装夺回(这是非法斗争的配合)。在夺回后，又去向敌人报告被夺的经过，以免累及(又转到合法斗争)这是一个例子。还有扩大秘密武装活动，逮捕敌人的税务人员，使敌人无法征收税款等方法亦可进行，这样可使敌人掠夺的范围日趋缩小，我方税收地区日渐扩大。

C. 基本区——在这种区域内的经济斗争，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停止敌、伪、顽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掠夺行动，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安定人民生活，可使基本区巩固逐渐成为革命的根据地。要完成这样

的任务,我们必须应用广泛的号召、深入的动员,相配合的工作方式,并采用组织民兵,制止敌伪顽的武装的或非武装的各式各样的掠夺,组织劳动力,协调劳资,解决佃业纠纷,改良生产技术,在每个生产的季节,适时地提出号召,组织一种运动(如春耕运动等)造成一种生产的热潮等等方法进行之。(增加生产运动——如春耕运动等,均已发专门指示,或将发专门指示,不详述)。

再则,要说到如何完成每个任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执行任务的干部如何去把握每个时期不同的方针与任务,如何有步骤地把一定时期内的每一任务化作具体的工作,如何动员干部和群众,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完成的任务,这些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是在人的问题,即所谓干部决定一切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胜任的财经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县区一级的执行干部,一切困难都可克服的,不然,任何正确的周到的计划,也要成为具文的,当然,这些干部决不是天然地涌出来的,是艰苦地培养锻炼出来的,前一点是要领导者负责的,后一点则由干部自己负责,因此,我们有要求于各级财经的工作同志们:

第一,先来个思想上的总动员,自科长级起一直至税卡工作人员止,在思想上要清楚地认识财经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总的革命的政略。因此,在每一项的财经工作准备进行时都应考虑一下,如此做是否合于今日的总的策略方针。在考虑工作如何着手时也应先在主观上存在着除财经有所收获外,还应在政治上有所收获,至少要无损于政治观念。这样,可使财经工作与别部门的工作取得一致的步伐与密切的联系,收得更大的工作效果。同时,还可克服单纯的经济观点与单纯的技术观点,忽略策略,无明确的工作中心等等的缺点。

第二,县级以上的财经工作干部,要深刻地研究每时期总的革命的策略方针和深刻地了解当前的本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考虑如何将这一时期的总的策略方针在当前的本地区的经济状况下,实际地应用到具体的财经工作上。此外,还须研究专门的知识,经

济学, 财政学、金融货币学、贸易统计、会计学等等, 并帮助区级的财经工作同志了解当前的任务, 把握策略方针, 布置具体的工作, 随时指导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的问题。

第三, 除了以上所说的较专门的东西须要研究外, 区级以上的干部还须懂得一般的领导艺术和群众工作, 并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领导艺术和群众工作。把自己的这两项的工作技能不断地提高。

第四, 要全体的财经工作同志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决定和指示, 如在这次的补报补缴的工作中, 有许多下层的同志对这一工作没有信心, 怕得罪基本群众, 又提不出反对的充分的理由, 就影响了这一工作的展开, 所以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和指示是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 以上的四点, 如果做得好, 每个任务的完成, 是有保证的。

最后: 我们希望各级收到这一指示信后, 立即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不仅是财经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做, 该级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应参加讨论, 定出各部门的工作互相配合的具体办法。该〔各〕级的负责同志应担负组织和领导这一讨论会的全部的责任, 并根据这一指示的原则精神, 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记录的经济与财政的部分, 以及本地区当前的环境, 定出分期的工作计划, 切实执行, 并按级汇报。

敬致

抗礼

财经处兼处长 连柏生

副处长 陆慕云

五月五日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行委会财经处 关于财政开源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六日)

(一) 几项财政开源的办法

自行委会成立以后,军队经费划归政府统筹,加上政府本身的行政、教育和民运经费的支出,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由于自卫战争的继续,敌伪的乘机蚕食,使财政收入大为锐减,造成了入不敷出的财政上的严重困难,为解决此困难,提出了财政上的开源和节流问题。关于开源方面:四月二十三日行委会行政工作会议关于财政开源问题,有一个决定,兹加以说明如下:

A. 征收田赋:

1. 为减轻人民负担,三十二年份及以前旧欠田赋一律豁免,但个别地区(如鄞西)已开征三十二年份田赋者,可将征收情形报告本处备核,并继续征收。

2. 开征三十三年份的田赋(过去征收田赋是以年度计算的,从三十二年的七月起至三十三年份的六月止为三十二年度,现在提出的三十三年份是从本年的一月起至十二月止之谓),赋额暂定每亩征收官田七十五元,民田六十五元,地五十元,山荡五元。第一期一个月半,自五月二十一日起至七月五日止。

3. 征收田赋应尽可能召用旧田赋征收人员(应有地方士绅或殷户富商之保证),不可能时由乡镇公所代收。手续费暂规定10%,成绩优良者,另行酌给奖金。召用旧田赋征收人员者,每人每月并得津贴谷一百斤,但以三个月为限,前二个月于每月底发给,第三

个月则于征收工作完全结束时发给之。

4. 粮赋册,以用旧田赋征收人员所藏本为宜,如不可得,由各乡镇公所调查登记,另行编造之(新编造之粮赋册应注明地址及佃户姓名)。

5. 开征田赋之地区,应以原来旧县面,成立县田赋管理处,由县办主任及财经科长分兼正副主任,各区设田赋经征分所,区长及财经指导员分兼正副主任。

6. 粮串由行委会统一印发,准备开征田赋之各县田赋管理处,可预先将需用份数报知后向本处领取。

7. 粮串由县田赋管理处编号加印后,空白发经征分所转发给各征收人员,但为防止贪污起见,当纳粮人缴纳款项掣给新粮串时,应收回旧粮串(去年度以前),粘于存根上将来与存根一同缴经征分所备查。该项存根各经征分所应妥善保管以备明年份征收田赋时之用。又粮串存根上应注明该田地址和佃户姓名,以便与征收公粮之田亩册,相互交核,检查弊端。

8. 田赋征收员向经征分所五天缴款一次,但当积满十万时,即不足五天,亦应即刻缴解。

9. 区署之收入会计,兼任经征分所之[会]计,其帐目即记入区署原来之帐表内,不必另立帐册,解款日期,亦根据原来规定。

10. 田赋开征之前,必须先召集地方上层人士,进行解释,并张贴行委会所发布告。

B. 征收各种地方税:

I. 屠宰税:

(一) 税额:暂定猪每口六百元,羊每口六十元,耕牛禁宰,菜牛经区署检查准许,照 10% 税率征收。

(二) 征收办法:每逢市集,区署派员直接前往,按口征收,或按月由屠户自认宰杀口数,向区署缴解屠宰税,或委托乡镇公所代收(酌予手续费)。

II. 油坊税:

(一) 税额:每车油征收二百元。

(二) 征收办法:由油坊按日呈报该日打油车数,缴解税款,区署派员随时检查之,必要时亦得由油坊主自认车数照缴。

(三) 菜子不收税。

III. 牙税:

(一) 税额:平均每月佣金收入约在十五万元以上者为甲等,税额每季一万元,收入约在十万元以上者十五万元以下者为乙等,税额每季五千元,收入约在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为丙等,税额每季二千元,收入约在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者为丁等,税额每季一千元,收入约在一万元以下者为戊等,税额每季三百元。

(二) 征收办法:由区署举办牙人登记,估计其佣金收入额,分为五等按季征收牙税,未缴税款之牙人,应予取缔。

(三) 以所给之牙税收据为凭,不另给帖。

IV. 营业税:办法另行订定。

V. 地方税:(税单格式附发)由县办缮印加盖县印并编号发给区署使用之。

C. 加紧补报补缴工作:

(一) 去年秋征之田亩数,一般的匿报在三分之一以上,为数甚巨,并且补报补缴之理由提出甚为合理。根据慈西区,一个月的工作成绩,查报田七千三百亩,可知这工作是可以进行的。且其不但有补于目前之收入需要,并可增加今后年份之公粮收入,所以此工作是有其重要性。

(二) 但由于农民的自私心甚重,农民还未普遍的发动起来和未有高度的民族意识。

(三) 补报田亩补缴公粮之办法,前已颁发,除第八条补报和处罚之时间,各区署可根据具体情形,酌予变更外,余仍适用。

(四) 补报补缴工作进行时要注意几点:

1. 动员要广泛深入——在区政会议、区行政会议、乡镇保甲

长会议、保民大会上,广泛动员,务使自区负责干部起至每个保民止,皆了悉此工作之重要性,及补报补缴办法,此种动员要普及全区,不能仅限于一二个乡镇。

2. 要民运工作同志配合——在地方组织及群众团体内深入动员,要求地方同志及群众团体成员,非但要自己做模范,而且要推动别人家,在保民大会上布置几个人补报,来推动大家补报,在每个保里调查一、二个破坏补报补缴及不肯补报补缴,平时又对我们不同情的,告诉区署作为打击对象。区署开补报补缴工作会议时,要区委列席。民运工作同志召开会议时,要区长及财经指导员去报告补报补缴问题。

3. 打击个别,推动补报——要发动密报检举,执行处罚,打击个别,推动大家。

4. 要运用乡、镇、保、甲机构——由区推动乡镇,乡镇推动保,保推动甲,甲推动户,可以自上而下的带点强制性的责令限期查出短报。

5. 组织粮征工作队——因为乡镇保甲长大多对于这工作是带敷衍性的,所以除叫他们自己去做以外,各区还要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三人至十人)集中力量,逐乡突击,每乡工作三天至七天,督促乡、镇、保、甲长工作,密查田亩,执行处罚,并开放数天自动补报不处罚。区长和财经指导员,要亲自下乡帮助粮征工作队,工作一个乡,得出经验教育大家,以后每当工作队完毕一个乡之工作后,即应开会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6. 补报——补报告一段落后,即行补缴,除特殊情形者,可酌收代金外,余一律收实谷,由检举查得之田亩,其应缴与处罚之谷查出时即行缴公。

D. 结束征粮:

1. 各区署其有未曾与各乡镇公所结算公粮帐目者,应根据田亩数,每亩应缴公粮数,除应扣除手续费,损耗、灾荒(代金不得除损耗)等详细结算,其欠缴数由乡、镇、保、甲长掣具切结,限期

结束。

2. 其欠缴之原因,应探求明白,根据原因,设法帮助乡镇保甲长按期结束。

3. 在基本地区及游击区内,最好能召开各乡镇保甲长会议,或保甲长会议来催缴,在会议上追究欠缴原因,奖励好的,惩戒不好的,如按期不能结束,其个别特别狡顽的,可以请他到区署来谈话,待其自己承认错误,保证限期缴解后,释放之。

4. 开展伪化区、顽化区征粮工作,多通过社会关系邀请乡、镇长及士绅个别谈判,限期征缴,其如数次邀请不来,或逾期不缴者,择其最顽固或伪化者扣押个别,推动其他,但既经承认错误获得保证后,即应释放。释放后,其如又不肯缴来,说服不通时,则予以押缴。对于伪化区顽化区,在决定完成数字上,可以比基本区游击区酌减些。

5. 催缴公粮,尽量采用政治上的说服手段,漫〔漫〕骂和恫吓等官僚作风是不可以用的。

6. 应抓紧我军事上的威信提高之有利时机,及每一空隙时机,根据具体环境与条件灵活的拟定各种办法积极进行。

7. 不能征收实谷之地区,酌收代金,代金照当地(以区为单位)平均市价征收。

E. 结束酒捐:

1. 捐额:每缸六百元,不分家酿坊酿。

2. 征收办法:

(一) 区署派员直接征收。

(二) 委托乡镇公所代收(酌予手续费)。

(三) 招商承包(边区乡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包给当地有力分子)。

3. 酿酒时机将过,应设法尽速结束。

4. 未开征酒捐之地区或乡镇,应尽速设法补收。

F. 加强缉私:

1. 增设固定税卡及流动卡。

2. 商请部队协同缉私。

3. 发动民众缉私。

G. 控制沿海税务：

1. 责成三北沿海税务所与海大配合，开展海上税收工作，加强沿海税卡。

2. 夺取敌人海运物资。

H. 控制航运：

1. 由航运管理处统一登记管理，征收船舶航运捐。

2. 姚江之船舶航运捐，委托慈南区署代收。甬江之船舶航运捐，委托慈镇县办代收。奉化江之船舶航运捐，委托鄞奉县办代收。海上之旗照税，委托慈姚县办转委托海大代收。各代收机关，每月应将船舶登记数字，收入捐额，报知航运管理处备查。

3. 各代收机关，关于轮船航运捐之洽定，尽可能介绍到航运管理处来接洽，以资慎重。

↑ **征收盐税：**税率不超过5%为原则，依照担数征收，由盐务管理处拟定办法，呈报本处核准施行之。

↓ 夺取敌人物资，各机关如自己独立不能进行时，可就近商请部队协助进行。

(二) 五六月份各地区具体工作计划

一、慈姚县办：

a. 浒山区署

1. 以结束征粮为主——要求征收实谷约三十万斤，运存姚山及慈北沿山一带，余收代金，要求完成三百万元数字。若有质地较好的白土布，可以抵款征收，唯匹数不要超过四千匹。

2. 加强税卡——注意缉私，注意税卡人员之教育与按时检查工作。

3. 补收未开征乡镇之酒捐，结束已开征乡镇之酒捐。

4. 设法开征地方税——其中特别是油坊税,应立即开征。
5. 收集材料,准备征收田赋——限于六月底前完成准备工作,七月初开征。

b. 文亭区署:

1. 加紧补报补缴——五月十五日前为补报阶段,十六日开始补缴,最少补征实谷十万斤,不能征收实谷者,征收代金。

2. 开征田赋——五月二十日前完成准备工作,二十一日开征,六月底以前要求完成二百万元数字。

3. 开征各种地方税——除营业税待办法颁订后再行征收外:余即可开征。

4. 结束征粮——六月底前要求完成代金一百万元。

5. 结束酒捐。

6. 建立流动税卡。

7. 相机开辟孝西高枫二乡镇之财政工作。

c. 观城区署:

1. 加紧补报补缴——五月三十一日前为补报阶段,六月一日开始补缴,最少补征实谷十万斤,不能征收实谷者,征收代金。

2. 开征田赋——五月二十一日开征,六月底以前要求完成三百万元数字。

3. 开征各种地方税——镇北东埠头油坊税划归观城区署征收。

4. 结束征粮——以代金收入,抵还上期借款。

5. 结束酒捐。

d. 三北沿海税务所:

1. 货物税——加强缉私,深入伪化区工作与海大密切配合,加强海上税收工作。

2. 委托海大代收旗照税。

二、慈镇县办:

a. 龙山区署:

1. 补报补缴——五月三十一日前为补报阶段,六月一日开始补缴,最少补征实谷八万斤,不能征收实谷者,征收代金。

2. 开征田赋——五月二十一日开征,六月底以前要求完成八十万元数字。

3. 立即开征各种地方税——东埠头油坊税划归观城区署征收。

4. 开辟山南八乡(镇)财政工作——以设法征粮为主。

5. 加强税卡。加强缉私。

b. 庄市区署及庄桥区署:

1. 以结束征粮为主——要求征收实谷约三十万斤,运存镇北、慈北、沿山一带,余收代金,要求在六月底以前完成六百万元数字。

2. 设法建立税卡征收货物税。

3. 接手征收顽方未了酒捐。

4. 六月底以前完成征收田赋之准备工作,七月初开征田赋。

5. 设法开征甬江之船舶航运捐,及永耀电灯公司特捐。

6. 设法开征地方税。

三、余上县办:

1. 结束征粮——征收实谷十二万斤,余收代金,要求在六月底以前完成五百万元数字。

2. 立即开征各种地方税。

3. 加强税卡,加强缉私。

4. 六月十日以前完成征收田赋之准备工作,六月十一日开征田赋。

5. 结束酒捐。

四、四明山地区——尽量争取空隙之时间、空间进行行政财工作。

1. 征粮——征收实谷,其数目要能供给该地区之全部军政人员自食至本年秋收时为度,余收代金。

2. 夺取敌、伪、顽各方之物资。
3. 征收货物税——建立流动税卡，必要时随军流动。
4. 设法开征各种地方税，其中尤以油坊税为主要。
5. 结束未了之田赋。
6. 结束酒捐。
7. 要求二个月内，能征收现金二百万元。

(三) 关于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方法及如何达到这些任务等，在给财经工作同志的一封信中，我们一般的已经谈及了，这里指示的信是关于财政开源的几个具体问题，及我们对于各地区的要求，各级行政机关接到此指示后，应逐项详细的加以讨论，根据具体环境，决定详细办法及步骤后进行之。

同志们：财政上的困难，已到了空前的严重的阶段，再不允许我们有一分钟时间对工作懒堕〔惰〕、拖延与犹豫了！我们要绝对负责的抓紧每个时间与空间来进行工作，解决财政上的困难问题，配合争取整个革命斗争的胜利。

主席兼财经处长 连柏生

财经处副处长 陆慕云

1944年5月6日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 三十三年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依据本会施政纲领抗战公约之规定，参照具体环境人民经济状况，及坚持浙东敌后抗战之实际需要而订定，所有三十三年份公粮田赋之征收，悉依本办法办理之。

第二条 公粮田赋之征收，一年一度，一次征足。

第三条 自本办法颁布后，田赋改征实物(谷)与公粮合并征收，但本年已先此开征之地区，得仍继续其原办法办理之。如改征实物，应呈报本会核准施行之。

第四条 自本办法颁布后，所有人民以前欠缴前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之抗卫军粮抗卫经费，一律仍依照原办法办理结束。

第五条 公粮田赋以征收食谷为原则，非种稻或部分特殊地区无谷可征或不便征谷者，得以现款(简称代金)或指定之其他农作物折合征收之。

第六条 公粮之征收，以田地为对象，工商业及经营或投资工商业之殷富人民，除其所有之田地，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公粮外，其工商业部分应酌量负担抗卫经费，其办法另订之。

第七条 凡我基本地区之人民，均应依照本办法之规定缴纳公粮田赋。其有慷慨输难自愿额外捐助者，其全部捐款数移充地方事业经费。

第八条 凡我同胞寄身沦陷地区,处于敌寇奴役煎迫之下,其抗战爱国之热忱,不亚于我基本地区之人民,而愿贡献其力量争取最后胜利,以求解放,自动慨捐抗战经费者,不受本办法之限制,并严守秘密,以保障其安全,于适当时期表扬之。

第九条 大后方同胞如有顾念敌后抗战之艰苦,自动捐输粮饷经费者,依照前条办法。

第十条 本会征收之公粮田赋,除田赋部分悉数拨充军事费用外,公粮部分包括下列三项:

1. 军事公粮;
2. 行政公粮;
3. 乡镇公粮(乡镇行政及文化教育等各种事业经费)。

军事公粮行政公粮之征收,由本会划一办理,乡镇公粮之征收,按照各县区实际情况,另行订定征收办法征收之。

第二章 征收标准及征额

第十一条 征收公粮田赋之标准及征额,按照土地之性质,分为下列四种:

1. 甲田(平原水田)每亩征收谷二十七斤。划分如下:

- ①军事公粮 十六斤;
- ②行政公粮 七斤;
- ③田赋 四斤。

2. 乙田(山田)每亩征收谷十七斤。划分如下:

- ①军事公粮 十斤;
- ②行政公粮 四斤;
- ③田赋 三斤。

3. 甲地(包括上等地及地改田)每亩征收谷十三斤,划分如下:

- ①军事公粮 八斤;
- ②行政公粮 三斤;

③田赋 二斤。

4. 乙地(次等地)每亩征收谷七斤。划分如下:

①军事公粮 四斤;

②行政公粮 二斤;

③田赋 一斤。

第十二条 公粮田赋之征收,以纯净干燥之上等谷为标准,属什〔杂〕潮湿之不合标准者,拒绝收受。

第十三条 本章规定之征收标准及征额,不得任意变动,如有特殊情形,必须呈准本会后,酌量办理。

第三章 分担率

第十四条 公粮田赋之负担,除田赋部分由业主完全负担外,公粮部分依照下列规定分担之。

1. 自耕农(自有田地自行耕种者)独自全部负担。

2. 租佃之田(甲田乙田)由业主及佃户平均各半负担。

3. 租佃之地:甲地由业主负担三斤半,佃户负担七斤半,乙地由佃户独自全部负担。

第十五条 凡田地有大小业之分者,公粮之负担,由大业业主、小业业主及佃户三方平均负担各三分之一,大业小业属诸同一业主者(该业主收双重租谷者)应负担三分之二,佃户负担三分之一〔部分地区有大业业主负担四分之二,小业业主及佃户各负担各四分之一,大业小业属诸同一业主者(该业主收双重租谷者),应负担四分之三,佃户负担四分之一〕^①。如再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临时规定之。

第四章 征收手续

第十六条 公粮田赋一律向田地耕种人征收之,其应由业佃分担者,业主应行负担之田赋及公粮部分均由佃户代为交纳。凭

^① 此为原文括号。

本会之征收收据,于业主应得之租谷项下扣还之,佃户不得托词推诿,抗不代交,业主亦不得有所异议。

第十七条 公粮田赋之征收,以本会统一印发各县办事处盖印之收据为唯一凭证。其他任何机关之任何收据均不作为凭,其具体手续可由各县区按照实际情形规定之。

第十八条 公粮之转移及支领,非有本会所发之粮票或区署以上政府机关之正式文件,不得支付,其详细办法,另行规定。

第五章 减 免

第十九条 凡参加新四军主力部队及其他抗日正规军队,有各该部队正式文件证明者,每出征军人一员,免征其家属公粮五亩。

第二十条 凡参加本地区地方军队(脱离生产者),有该军队之正式文件证明者,或参加其他抗日军队不能取得该军队之正式证明文件,而有地方证明者,每出征军人一员,免征其家属公粮三亩。

第二十一条 凡参加抗日军政机关工作之连级(尉官)区级(委任)以上人员,有各该机关正式文件证明者,每员应免征其家属公粮三亩。

第二十二条 前三条所称之家属,系指其配偶及直系血亲而言,所免公粮如系租佃者,限于其本身应行负担之部分。

第二十三条 凡鳏寡孤独及贫苦人民,出租、自耕、或租佃田地,在三亩以下,无力交纳公粮,经申请调查属实,而由区级以上政府批准者,得酌予减免,但限于其本身应行缴纳之公粮部分。

第二十四条 凡因灾害荒歉由地方评议免租之田地,经区署勘实者,免征其公粮,但无故荒芜者,仍予照征。

第六章 蚀 耗

第二十五条 为保证存谷之绝对干燥,依据保管时间之久暂,

复晒经过之情形,得由区署酌准报销蚀耗(征收代金者,不在此例),但其蚀耗率以百分之五为最高限度。

第二十六条 负责保管者,应将公粮存放于高燥严密之处,如有潮湿霉烂,散失虫蛀或鼠雀噬食等而致发生不应有之损耗时,保管者应负赔偿责任。

第七章 奖 惩

第二十七条 征收公粮田赋之工作人员,能各照规定办法,认真积极廉洁忠诚,依期完成任务者,得提取征起额百分之五充奖。

分配如下:

甲、负责一乡之征收人员得征起额百分之一·五。

乙、负责一保之征收人员得征起额百分之一·五。

丙、负责一甲之征收人员得征起额百分之二。

第二十八条 凡征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著有特殊成绩者,除前条规定之奖励外,另予特殊之褒奖。

第二十九条 征收人员如有徇私舞弊情事,或故意怠懈,未能依期完成任务者,视其劣绩之轻重,分别予以警告,扣奖、惩办之处分。

第三十条 人民对于公粮田赋,应按其实际田亩数报缴,如有匿报短缴,一经查觉,除应责其补交外,并得视情节轻重,酌予处分。凡人民由于一时蒙昧,匿报短交,在未查觉前自动补报补交者,则免于处分。

第三十一条 本会征收公粮田赋全充抗战军政必需之用,其征收成绩之优劣直接影响抗战建国事业之进行,如敢蓄意破坏,妨碍征缴,以破坏抗战论处。

第三十二条 如有密报或检举第三十条之匿报短交经查属实者,得将其密报部分提取罚征数百分之四十充奖,密报或检举之属于第三十一条者,亦得视情节之轻重,酌予奖励,对于密报者之姓名,严守秘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如有未尽善处, 得由本会命令修改之。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第三届浙东文教会 决定新的文教方针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对浙东敌后文教事业之改革有决定性的文教处第三届文教扩大会议,在“教育与群众结合”、“教育与实际联系”、“学与用一致”的精神下,决定了新的方针是:“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大会于十七日开幕。文教处长黄源在开幕式中郑重批判了旧的传统教育与实际脱节,指出本次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根据与抗日民主联系的文教政策与浙东人民的要求,来彻底改造浙东的文教事业,使之对浙东的抗建事业做更大的贡献。“这些新的文教方针,在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中,早已明确指出了。”黄处长并举了一个例证:“目前我调查了一个村子的人口,其中成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儿童却仅占百分之五,试问:今天的教育对象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成人重要,还是百分之五的儿童重要?抗战的贡献是成人多,还是儿童多?还有一个调查研究资料,就是南山和三北两地区共有小教一千多人,小学生约三万三千余,平均每个教员教学生三十一个,人民与抗日民主政府每年要替每个学生负担公粮七十二斤(谷子)。如果以这些干部与经费拿来教育成人,则不是对浙东人民的贡献更大!?”大会于传达中共中央文教政策及毛泽东同志文艺运动新方向后,即展开热烈讨论,并做了具体决议。

开展社会教育

今天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切教育内容

与方式方法,就都要以切合农民要求为第一。根据这个原则,决定今后社教工作的中心为:(一)各地建立农村俱乐部,要把农村俱乐部做为团结各阶层,宣传党、政、军各项政策、法令、设施及造成下层人民舆论,有系统吸收人民反映的机构,并将它做为各项社会活动(纠纷调解、议租)的中心场所。俱乐部的名称,组织形式,内部组织分工等,均可视当地条件不同而规定。以当地小教及民间艺人作骨干,其工作可包括演戏、唱歌、识字、问字、代笔、弈棋、说书、壁报、通俗讲座、巡回图书等,经费则尽量运用地方力量。(二)争取和团结民间艺人——由于民间艺人是生根在广大农民心目中的,他们用艺术为工具,密切的联系着农民,对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是最熟悉的,因此,成为今日新教育工作的重要桥梁之一。民间艺人的种类:包括职业性的,如戏子(的笃班为主),唱滩黄的,唱新闻的,说书的,小唱,画神象的,靠卖唱为生的乞儿等;业余性的包括一切能唱、能做、能玩乐器的有职业者,如理发师等。争取民间艺人是基于自愿为原则的,先从解决与帮助其生活上,营业上的困难入手,运用其技术,然后从政治上教育上巩固。对职业民间艺人进行登记审查旧剧,供给新剧等办法,并进而使其自动演唱若干或全部新编歌剧。对业余民间艺人则动员其参加就近的农村俱乐部,由就近学校教员进行辅导工作。(三)提倡与改造民间艺术形式,如戏剧(的笃班、绍兴高调等),音乐(小调、山歌、胡琴、锣鼓等),绘画(连环画、年画、门神、壁画等),小说(章回小说、宣卷本等),舞蹈(马灯调舞蹈、高跷、舞灯等)运用这些来进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是最有效的。今天重要的是要不断的创造新内容的作品,以造成热潮,推动各地区的社会教育工作。因此决议设立一个专门编写通俗读物的机构来负责组织这部分工作,各地小教,民间艺人则组织座谈会、研究会等形式,来研究与提高民间形式。(四)学校社教工作,决定目前各校社会部主任、音乐教师的当前工作,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并规定各校均须普遍出版大众壁报,黑板报,其内容须和农民生活,各地情形密切联系,以报道地方消息,生产知识

为重心,经常进行读报工作,并尽量使各校集中小先生和艺术才能之儿童,成立“儿童社教学队”,在附近设立巡回施教系统。

改造学校教育

决定如下:(一)学校行政方面所有公私学校,应向“民办公助”的方向发展,尽量尊重地方上的意见,运用地方上人力物力来办理。在学校组织上校务分掌,学校与群众团体关系上必须民主,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必须充分发挥民主集中精神,并规定学校中的一定会议生活,教师须分工。按敌后条件需要作简要切实的设备。(二)学制改革方面,为适应农村及市镇的实际需要,各校可视所在地具体环境,择用全日制,半日制,认识班,二部轮流制,旁听制,间日制,雨天书,小先生夜校,晨校等。在学年方面,决定平原地区,基本上仍采用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制,山区则可灵活改为一年制,二年制均可。星期放假制也可视实际需要,改变为“市日放学制”等。此种改革,均本人民实际生活与生产情况的要求。(三)课程改革方面:总的原则是着重抗日战争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增加,启发民主的精神,培养劳动观念,集体观念等。国语课增加抗日故事讲读,其体裁多采用当地民歌、民谣、小调等。作文:着重于农村中普通应用文、写信、写帖、练习听写、速写等。说话讲学:着重于辩论讲话,读报及其他农村口头宣传等。常识:社会教学上,高中级增加时事讨论、时事报告。地理方面:着重先研究本村本乡,再普及到本县、浙东、全国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大后方与国际间重要国家,由近而远的研究。历史教学方面:亦以中国抗战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为重心。公民教学:则着重于民主建设常识,如开会常识,政府法令传达,及配合各种活动(秋收斗争)等。自然课:则注重本地实用农事及生产常识,普通生产知识,与本地流行的疾病的预防治疗,破除迷信观念之常识等。算术课:增加心算、珠算、连算、簿记、记帐,减少不合实用[的]分数循环、小数等;算术教材亦以普通实用教材及与战争有关的材料为主。劳作课:以种植

制作简单日用品为主,并督促学生勤作家庭劳动及在校劳动,培养其集体劳动观念。美术课:注意宣传漫画的绘制,多采取战斗与农村生活材料等。音乐课:以增加新内容的民间音乐,如新编的笃调、小调等,减少普通歌曲的比重,并练习民间乐器,如胡琴、响器等以改造民间音乐。体育课:着重于发展儿童身心与抗战生产配合。

(四) 儿童组织与训导方面:规定了训育须采取集体检讨、竞赛、奖励、个别谈话、耐心说服等方式,提倡为民族为大众的新英雄主义,教师需与儿童订定公约。关于每周中心训练事项,亦依据实际需要与儿童身心规定其范围,如纪律、整洁、勤学、劳动、集体观念、民族气节等。

大会先后进行六日,到连主席及南山、三北两地县办文教科长与区署文教指导员二十余人。最后总结中,黄处长指出:这次大会最大的收获是能够根据新的文教方针。这些方针均散见于各期新浙东报的社论与消息,善于掌握这些文件与指示中的精神与实质,根据浙东的具体环境及时改变方针,提出文教任务。这种对新方针的研究精神与对文件报纸的运用方法,是值得我们发挥的。而大会的缺点,如报告还有些一般化,注意搜集典型不够;在大会领导上发扬典型也不够。会议开始与中途休息时间均以民间音乐及留声机伴奏,并当场分发各种新编的笃戏、小调、音乐工作调查研究资料。其间举行了一次民间音乐晚会与传统教育座谈会。会议于廿三日结束,是晚全体与会人员前往观摩越剧,由社教队演出新编越剧《大义灭亲》。

(原载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新浙东报》)

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节录)*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谭 启 龙

第一部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中央最近指示的基本精神(略)

第二部分：浙东敌后斗争形势与我军的任务

- (一) 浙东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略)
- (二) 目前敌顽我一般情况及其特点(略)
- (三) 目前敌顽的战略动态(略)
- (四) 对今后浙东斗争形势之估计及认识

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着着前进,其在中国沿海的登陆日益逼近,因此浙东地区对敌对我的战略重要性已大大增加起来,使浙东地区的斗争形势正在起着重大的变化。

一、敌人方面：敌人目前主要的战略行动是以迅速的贯通西南至安南的联系,以及打通粤汉路,同时积极部署逐步进占东南沿海各地区以防止盟军登陆。因此,今后浙东地区对敌斗争将要更加紧张尖锐,这是浙东敌后斗争基本的发展趋势。我军活动地区位于沪杭甬三角地带及沿海,尤其三北、浦东、处于上海及杭州宁波水陆交通点之间,敌人为了防止盟军登陆,将来一定要回头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随时有对我们进行扫荡及局部清乡的最大可能,敌据点可能增加,敌人的兵力可能部分增强。政治经济的斗争也将随着紧张。敌人最近对三北的扫荡已较过去为周密,采取了与

* 此为第一次浙东纵队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华中、华北其他地区一样的战术，以便作前卫侦察，时时占领高地，几路并进，声东击西，找到主力则几路出动，非常谨慎而狡猾。估计敌将来对三北地区政治上的怀柔政策，经济上的破坏，搜括〔刮〕，也定会加深。对四明地区则有可能采取残酷的烧杀抢三光政策，以摧毁我根据地。因此，今后浙东对敌斗争的残酷艰苦性，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但另一方面，不管敌人怎样的残酷疯狂，而其困难还是存在，而且更多，它已不可能如过去在华中、华北特别如在苏南苏北那样集中兵力对待我们，其兵力更不够，几千里战线上都需要兵力，不能以很大兵力专对付我们，其空隙较多。敌军的战斗情绪与战斗力比以前大大降低。目前对我暂作战之旅团其作战经验也差。在时间上有限制，不能如过去长期地搅他几年，而只能暂时的、短期的。伪军伪组织对日寇的失败与抗战的前途一天天看得更清楚，其动摇情绪及内部矛盾更形深刻，由于国民党之败退，我们的军政威信更高，其“合法”观念将有所改变，其找寻局〔出〕路的心将更为迫切。这一切都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

二、国民党方面：由于敌人的进攻、浙东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消灭我党我军，对我主力全国〔面〕进攻的决心与部署已不得不有所改变。但在国民党全国性的反动政策未改变及政府与统帅部未改组以前，其消灭我之野心决不会全部放弃，一有机会仍有向我继续进攻之最大可能性。根据顽方最近动态，其目前对我主要方针：军事上求得对我各个击破，首先企图解决我会稽山阵地，不让我向西发展。并加强对天台山控制，防止我向南发展。在四明地区则利用××与我长期周旋，对我四明、三北基本地区及主力则将加强奸细活动及利用伪军积极的破坏我们，以防止和限制我们发展，削弱我们的力量。因此，反动派对我之进攻并没有停止，我们仍处在长期的不断的艰苦的自卫斗争中，绝不能有所松懈。但不管反动派还想怎样用尽一切办法来进攻我们，它要想布置如去年一样的大进攻，其困难已大大增多。现在的敌情不允许它这样做，其内部力量亦不统一、不一致，大部分战斗力很弱，对内战之信心不高，突击营

尚不能解决我军,其他部队的信心便更减低,物资供给上也不能如过去那样便利。整个三战区已基本上处于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反动派的困难是增加了,如果它还要向我进攻,我们不仅可能坚持斗争且有最大可能取得巨大胜利。

三、我们自己方面: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五月,这是我军斗争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由于客观形势发展对我有利及自己主观的努力,我们已胜利渡过了这一困难。今后,如形势继续发展,我们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我们不仅要坚持,并能够坚持,而且抗战的需要,要求我们作更大的发展,我们应该在精神上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新的发展形势。但是另一方面,此次敌人正在加强敌后地区尤其沿海地区之控制,我们仍处在敌顽夹击斗争形势中,因而今后斗争仍是艰苦困难的。对敌斗争的紧张,经济来源将受到限制。我们的本身还不够坚强,新成份多,党政军民各种工作没有做得更好,干部不够,这都是我们本身的弱点和困难。我们决不可粗枝大叶,缺乏警惕性,一切应从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作艰苦斗争的打算。

显然,浙东今后的斗争仍是复杂多变的长期的三角斗争局面。但一般的说来,形势的发展是对我们有利的,如果再加上我们主观上的努力,不犯严重错误,我们不仅能坚持斗争,且能求得更大之发展。但是,我们必须防止和反对二种不正确的倾向与认识:一方面,防止和反对对客观形势的发展麻木不仁,一味盲目乐观,急性病要不作艰苦斗争打算,轻视敌人,在精神上做了客观有利形势发展的俘虏,而在紧急情况下则悲观失望。另一方面要防止对敌人和反动派的力量及其对我之政策作过高的估计,而夸大自己的困难,忽视敌人内部的弱点和困难,看不见胜利与远大发展的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或保守等待不去掌握形势的右倾思想。我们的正确态度和认识应是掌握客观形势发展的规律,在精神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工作的布置上向最坏的方面作打算,以作有备无患(去年我们对反顽自卫斗争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不够,这应引以为戒),而我们的工作则应向好的一面努力,掌握发展形势,以主观的能动性掌握与推动

客观形势的前进。

这就是我对今后浙东斗争形势的估计与认识。

(五) 我军今后在浙东的任务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中央指示的精神,过去我们军政工作的总结以及我们对今后浙东斗争形势的估计与认识,我以为我党我军今后在浙东的总任务应该是:继续巩固与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浙东抗战,积极发展浙闽沿海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配合盟国海陆空军作战,并从各方面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反攻时机配合盟军反攻敌人,夺取沪杭甬等大城市,解放东南数千万同胞。这是我们今后总的目标,这是中央华中局与军部交给我浙东部队浙东党的光荣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总任务下面,巩固和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最主要最中心的一环。由于我根据地范围不大,游击性较大,群众工作及党的工作基础不强,政权工作尚在开始,大部基层政权还在封建势力控制之下,如果根据地不能巩固发展,则任何工作任何任务也就不能完成。这便是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的基本精神。要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我们党政军民要做许多工作,这里着重指出军队方面必须完成的各项任务:

第一、必须坚决地粉碎敌伪对我的一切扫荡、蚕食计划及可能的清乡企图,以及来自反动派方面的任何进攻。坚决为保卫我之根据地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到底。

这一任务的能否完成是决定我根据地能否巩固发展的关键。武装斗争是今后斗争的主要一环,武装斗争的胜败是决定根据地各种斗争胜利的枢纽。只有打破敌人的扫荡和来自反动派方面的进攻,根据地才能求得巩固和发展,各游击支点才能顺利坚持,沿海游击战争才能顺利发展,根据地各项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各项反攻准备才能顺利完成。为此,我们各部队各单位必须进行下列各项实际工作:

(1)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常应有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及反对来自反动派方面的突然袭击的准备。随时加强侦察警戒,

严格地反对太平观念及一切不适合于敌后游击环境的组织形式及大后方主义的设施。任何的疏忽大意(即使在最好的形势下)都可能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其他根据地及浙东过去的一些经验,都是血的教训。

(2) 必须加强参谋工作,要经常的、精细的、负责的去研究和了解敌伪等各方的战略动态,加强战略和战术的侦察。对自己在各次战斗中的弱点与优点,应及时总结,得出经验教训,以教育部队、提高部队,使过去的缺点错误不再重复。在对敌斗争上,今后仍应以游击战为主,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敌人的扫荡清乡,破坏敌人的计划。各个地区一方面要坚持统一意图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另一方面应有很好的战略配合,以击破敌人的进攻。对应付顽方的进攻,一般应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提高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准备击退反动派的进攻。

(3) 必须特别注意正确的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过去一些政策上过左过右的偏向,团结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共同对敌。要善于运用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要善于把军事斗争去协助与配合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方面斗争,研究各种斗争的策略与方式方法(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非武装的等),应善于利用与掌握各方面内部的矛盾,达到团结多数,孤立最凶恶最顽固的,要防止树敌过多,把自己陷于孤立状态的危险。今后象过去争取××这类事件将是很多的,因此,正确运用政策,接受经验教训,是我军每个负责干部应很好学习的。

(4) 对于来自任何方面对于我根据地各种建设之破坏,掠夺我根据地人力物力的强盗行为,经济上的封锁统制,政治上文化上的奴化毒化政策等等,我们军队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研究对策,予以适当的打击,军队必须养成高度的群众观点,为保卫人民每一利益而斗争。

(5) 必须加强对人民的宣传鼓动工作,经常将敌伪和反动派

所进行的各项罪恶政策告诉人民,同时以我抗日卫民的实际行动教育人民,使人民了解我党我军无论如何是坚决与人民一起坚持抗战与保护人民的,并要求人民在任何时候与我在一起共同坚持斗争,必须使我们的斗争,不是军队孤立的斗争,而是军队与人民血肉相关的军民共同的斗争,才能取得一切斗争的胜利。

第二、必须坚决与切实依照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巩固、提高并充实主力之战斗力,向建立正规化党军的方向迈进。

目前我浙东部队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大大落在客观形势的要求后面。我们部队是新的,又处于长期分散的游击环境,战斗频繁,没有整训机会,内部还不很巩固,而且干部整风还未进行,思想上政治上还不够纯洁。因此,我们今天一方面应尽可能扩大加强各个支队现有武装力量,充实其编制(下略),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斗的与分散的环境中,也要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时间(即使是一月或半月都好)加强整训,把我们干部和部队在军事上、政治上提高一步。

为此,首先我全党全军应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武装斗争是一切斗争的中心一环,必须认识没有武装便没有一切,发展和充实武装力量,应成为各级党和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但过去某些扩军路线(如在浦东招兵买马式的扩军)是不好的,以后一般的应采取群众路线经过地方慎重审查的扩军路线,注意成份,反对任意收留,应经过一定机关的登记审查。在明年旧历新年实行拥政爱民及拥军运动的时候,应注意大量的扩军,造成群众拥军参军的热潮。教导队应予扩大,以创造培养大批主力及地方武装干部,成立地方武装队、主力队、入伍生队等,全党应从多方面大胆的动员适当的干部来参加教导队。

关于部队整训的内容,根据中央华中局指示,分为军事政治二方面。军事训练就是练兵,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干部应同时总结带兵养兵用兵的经验。练兵方法主要参考中央指示及张宗逊同志关于练兵总结的报告,采取群众路线,学与用一致,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首长亲自动手、创造典型吸取经验的原则。整训期间的

政治工作,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案,及谭政同志的报告,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关于民兵的训练,也应注意,这是我军扩大的兵原〔源〕。这次大会应规定各部队一定的编制表,作为最近期内充实的目标。应严格整顿军风纪,提高部队的勇武精神。

第三、必须巩固、加强、发展各地区的地方武装,建立正规的地方兵团,以达到能独立坚持各地区斗争的目的。

七年半敌后斗争的经验证明,广泛的各县各区地方性游击队与正规地方兵团的发展与建立,是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重要一环。过去我们主力对地方武装的发展培养之注意与帮助是不够的,个别还存在着过早的不成熟的编并地方武装的缺点,这是必须克服的。今后在加强充实主力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地方武装的培养,尤其要在干部的培养与分配上给予地方武装最大的注意。地方武装的发展与巩固应成为我主力与各地方党政民共同的任务。首先应达到每县有一小营、每区有一小连的目的。关于地方武装的整训也应加紧,整训之一般的方法与内容可参考主力的办法。在政治训练上,一方面应提高地方武装指战员为保卫家乡誓死坚持当地斗争的精神,同时应注意逐步克服战士与干部狭隘的家乡观点,养成识大体的精神,造成在适当时机发展为主力的政治条件。

第四、必须开展敌占城市交通要道周围的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展开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团结游击区和敌占区一切抗日的中国人为驱逐日寇而斗争。

这一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可说还没有开始。如我们今后仍不努力迅速地去开展这一工作,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反攻和夺取大城市。今后,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拿出必要的力量来加强这一工作。

为此首先必须强化对敌伪区域的政治攻势,且应使之经常化、普遍化、与深入化,成为我全体党政军民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关系与各种办法,口头的文字的展开这一工作,并在技术上加以研究。(下略)

第五、必须协同地方党政民各机关为建立广大人民的抗日武装,开展民兵工作而斗争。我们的武装斗争应该是全民的武装斗争。华北、华中各地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了人民武装的伟大作用,我们应该很好的研究他们的经验,加紧组织人民大多数的武装,尤其是基干队和民兵武装。为此必须在部队里克服一部分同志轻视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的观点,而去学习与建立起主力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斗争方法,这首先可以使主力减少小的战斗任务,便于自己主要任务的完成,并可抽出时间整训。为此必须帮助民兵解决弹药与武装问题(手榴弹、地雷、土枪、火药等),帮助他们训练与培养干部,帮助他们研究与提高民兵战术及技术,帮助他们进行训练,关于民兵之组织法也应加以很好的研究和制定。这是军事部门应该帮助解决的。

第六、必须加强与健全部队的政治工作,并提高其作用,保证完成党交予部队的每一个具体任务。由于浙东部队历史不久,阶级成份复杂,阶级教育还不够深入,政治组织还不健全,党及政治委员在部队中的威信还不高,且长处期在分散的游击环境,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还要处在分散的游击环境中,在这样的斗争环境中,要建设党军,完成党的任务,政治工作实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政治工作的好坏实为我军的生命线,过去还残存的对政治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必须迅速纠正。

(1) 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部队政治工作。其他关于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友军工作,敌伪军工作,都必须围绕着部队政治工作这个中心环节。

在部队中,目前政治工作的中心方向与主要内容,首先是巩固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提高和巩固党在部队中高度政治威信和领导威信。我们部队中至今党的基础无论数量质量都还不够坚强,本期教导队学员中对共产党与国民党曾提出了二百多个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都是不正确的,且含有毒素,教导队学员都是干部,尚且如此,其他则不必说了。这表现党在部队中的政治领导还

不够坚强。政治教育,阶级教育还不深入,为此就必须提高与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及其威信,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及支部生活,在斗争工作中大胆的吸收新党员,使党成为保证一切任务完成的堡垒。今天我们部队中还有许多人对党的组织抱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甚至有人还把它当作国民党的特工机关一样的认识。为此,应把政治委员与党的工作在部队中进行公开的教育。同时我认为在部队中党的组织也应把它逐步的公开,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党的会议,使党不致于成为神秘的东西。要严格吸收党员的手续,以提高党员的质量,这样才能提高党在部队中的政治威信。尤其是地方部队,对支部工作尤须提高,改善支部的领导,正确的运用军队党的民主集中原则。以后应真正使每一重要的任务必须通过支部去保证,支部应讨论与提出适当的口号,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为完成党交给部队的每一具体任务而斗争。

(2) 要加强党在部队中思想上的领导。首先要切实克服目前部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非组织观念,加强干部的党性锻炼,提高干部的组织观念,改造干部的思想意识。要尽可能的了解与审查干部,多从实际工作中帮助干部,要多鼓励,少批评。干部中发生的不良倾向,应多用教育的方式,多用个别谈话,改变过去“斗争会”的方式。关于克服不良倾向,应把握住中心,不要一般的空洞的提出口号和号召,而应在一定时期以全力克服一个主要的中心的不良倾向。对干部的生活待遇及政治待遇应有明确的规定。

(3) 部队中的锄奸保卫工作是巩固党在部队中绝对领导的重要工作,尤其是浙东部队成份复杂,各种组织不严,加之领导上对下层还不能深入了解,因而便利于日特及国特用一切手段打入我军,进行特务破坏活动,钻空子。过去我们虽曾破获了不少拖枪逃跑的案子,但有组织的主动的防止日特和国特的政治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我全党全军干部,尤其高级干部及保卫机关应有高度警惕与锐利的眼光打破日特国特的活动。为此,军法工作与保卫工

作应严格划分,军事犯与政治犯应加以区别,保卫工作部门应摆脱过去军法琐事,集中注意力对反革命作斗争,加强群众中的锄奸教育,造成群众中对奸细特工分子的高度仇恨心及认识,使锄奸工作成为群众运动,这样才能使日特国特无立足之地。华北华中的经验便是如此,我们应吸收成为今后工作的基本方向。保卫工作应协助和参加整风审干工作,使之与防奸工作相密切联系,使我们部队真正掌握在忠诚于革命的干部手上。

在目前浙东部队的具体条件下,连队锄奸组织还有其必要,但十人团与锄奸网则只采取一个组织够了,求其真能起作用,而不要叠床架屋。锄奸政策的执行必须严格,日特国特分子之审讯,必须由首长和锄奸部门亲自负责,一切应慎重处理,尽量做到坦白和自新,改造他,教育他,这对于我们部队的教育与巩固是有很大意义的。要学习中央处理王实味问题的精神。必须严厉的纠正部队随便捕人迫供杀人的错误,除了军事间谍及直接危害分子战场上的叛变者之外,应尽量做到不杀一个人。毛泽东同志说:“一九四四年各根据地要做到不杀一个人。”这是思想改造的问题,日特和国特已把它们许多组织变成相当群众性的组织,一律格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与敌工奸细斗争是一个群众的思想斗争问题,决不能单用杀所能解决的。

(4) 加强部队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这是提高与巩固部队战斗力的基本因素。必须根据总政治部给山东分局指示及军政治部给我们的指示,采取各式各样的,适合情况的方式与材料,反复说明与养成几个根本思想与精神,例如:战斗中的勇猛、顽强、迅速,平时的勤劳积极,平时战时的遵守纪律与吃苦耐劳、坚定不移、革命到底的决心等。在教育内容上除各种临时问题的教育外,特别应把去年七月中央发表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等文章作对比的教育,养成大家一个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将大后方的生活与我根据地的生活、工农的生活与地主官僚的生活,作对比的教育,以此反复地说明我们的前途与国民党的前途,肃清党与部

队中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任何幻想。这一点对浙东的部队更特别重要。教育方式上,应善于应用部队实际生活及战士或干部中活生生的人和事物,而不是光讲书本,应广泛地应用辩论会,坦白运动,文娱工作以及有组织地开展对中央指示及解放日报社论的讨论(如目前发表的关于改组政府及统帅部等许多重要论文)。

(5) 要在部队中实行拥政爱民教育,养成人民的观点。由于我们部队新成份的增加,政治教育不能及时赶上,一般说,群众纪律是比较退步了,老百姓常说,三五支队没有从前好了,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尤其是干部。过去红军有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等三大任务,今天我们只做了一个打仗,其余两个被忽视了,我们应该吸收这种传统。我们军队应该成为群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以及革命政权的建立者和散布者,现在我们甚至连掩护〔护〕地方工作也做得很不够。在此次大会中,还有人不了解人民今天对我之负担究竟有多少重?我们又究竟给了人民多少利益?只知随使用钱,不了解群众的疾苦,我们现在还不能生产,但也应尽可能减轻群众的负担才对。在今年的旧历年关应开始按中央规定实行“拥政爱民月”,来教育部队,检查群众纪律,坦白自己对群众利益的损害,实行赔偿与道歉,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如对地方工作及地方同志或政府有什么意见、批评,不应该在群众面前乱说,损害他们的威信。应善意地提出意见或报告上级机关转告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6) 政治工作要完成党的任务,必须提高政工人员的业务修养与学习。谭政同志的报告,张宗逊同志的“练兵总结”,“警卫第七连”等文,应作为政工人员一定时期业务修养的主要材料。政工人员不能在生活上与工作中各方面做模范,不亲自动手,不懂得指挥部队,威信就建立不起来。政工人员本身的修养学习和模范作用是巩固党完成任务提高党和政治工作威信的重要条件。今天要改善政治工作,必须首先改善其领导作风,接受浙东部队原有的好的东西,批评原有的坏东西,灵活运用苏北好的东西,改变与舍弃不适用的东西。一切必须适合具体情况,依据具体情况作新的创造。其

次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养成实事求是作风,必须掌握中心,反对平均主义,有了号召,必须贯彻,亲自动手,抓住典型(如三支的“游源会议”政治机关应派员前去了解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介绍并推广至全部队)。应以创造模范工作者、模范学习者及战斗英雄,召集模范工作者、模范学习者、战斗英雄会议作为开展部队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

第七、必须加强供给工作与卫生工作的领导,注意兵工建设,由于历史关系,这三个部门的工作是我军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但过去这些部门工作之缺点,不能完全由这些部门同志负责,我们在领导上对这三个部门在战斗中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还不了解这三个部门是组成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假如没有这些工作便不能取得战斗胜利。

今后关于供给工作,应根据浙东具体情形,参考军部的规定,确定浙东的供给制度。一般的说:在干部方面的待遇,可较军部规定的稍为降低些,士兵生活却要比军部规定应提高一些,一经确定之后,在全党全军中进行讨论,明令颁布,全体执行,如再有违反,须予一定处罚,其次应根据这种供给制度,确定经常的预决算制度。要在部队中建立审计工作,确定大会后严格按月审计的制度,不管谁均应遵守这一制度,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到战争胜利上去,反对任何贪污浪费,并按律处理。为此必须把供给机关本身健全起来,使之合理化,克服手工业方式,建立起严密的上下级机构。

关于军工建设方面,必须健全原有组织,改进手榴弹,并急需研究制造地雷,翻造子弹,做到每一单位建立一个军工所,应缩小卫生工作方面的浪费而来大大增加军工生产上的必要开支。

关于卫生工作方面,最中心的是提高技术与进行部队中卫生常识的教育。应注意各季节对疾病的预防,而把医药费缩小到最低限度。过去因战场上自己不会急救而枉遭牺牲的情形应从卫生教育中克服。研究外科,尽量做到减少伤员的痛苦,不轻易截手锯脚,还有现在一看病,医生就随便说是肺病,弄得人心惶惶而消极悲

观,影响工作也不小,亦须注意纠正。

为此,首先必须加强这三部门的政治领导,从政治上思想上提高这些部门工作干部对党对革命的负责精神,同时要改正各级首长对这三部门工作只提意见,不去帮助重视以及漠不关心的态度,提高对这三个部门在战争胜利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充实与加强其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这三部门的工作效能。

第八、必须争取时间进行整风审干运动。整风运动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是改造思想方法彻底转变全党作风的武器,是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及部队战斗力进一步提高的武器,也是加强全党全军团结,完成一切任务的保证。这一工作,在其他根据地均已完成,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现在那里没有一个同志不愿深入下层,大家都能进行调查研究,首长亲自动手,全党全军团结一致,这些伟大成绩的收获便是完成了新的形势到来前的准备工作。

显然,整风运动对于我浙东党与部队是十二分迫切而必要的。我浙东各单位党的党员及干部,最大多数是在抗战后尤其是最近二年来发展和提拔起来的,在成份上农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及旧军队过来的占多数,一般的对革命与自己任务认识不够。党内思想斗争和思想意识的锻炼很差。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及经过长久斗争锻炼的老的骨干很少,有些老干部也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环境下,学习与思想意识的锻炼也不够,许多老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最好的协调一致。由于部队六年来处于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干部缺乏认真研究文件和学习的习惯,党外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很容易反映到我们党内和干部中来。阶级的认识,一切为人民的这种观点尚未明确养成。浙东是新发展的地区,环境很复杂,国民党的基础强,特工活动多。同时在这次大会中明白地暴露了我们各级干部的缺点,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相当浓厚,对上级指示不尊重,互相发脾气,上下级关系不好,实事求是的作风差、只

想做大事闹地位、闹出风头、闹无原则纠纷而缺乏深入下层,从细小问题做起,眼睛向下的精神。我们可以说,过去许多任务未能更好的完成,主要的是由于干部的作风不正,干部团结不够的原因。这一切说明我们在政治理论上,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上水平的低下,说明浙东部队是如何的迫切需要进行整风的学习。

但同时浙东地区现在和以后仍是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斗争频繁,根据地不大,部队任务多,安定之时间很少,干部不多,许多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集中起来作长期性的整风学习(这是与华北华中的情形不相同的),这是必须解决的矛盾,而不能单凭主观上的愿望。去年提出整风后不能贯彻,除了主观努力不够之外,也不能不承认对客观环境困难的估计还不足。因此今天,我们就应该创造适合浙东环境的整风办法。我认为在今天浙东应该是在实际斗争中实际工作中的整风应重于集中训练的整风,整风的主要对象首先应以军队营级以上干部,地方上县一级以上干部为中心,必须抓住先整上、后整下、先整大、后整小、先整己、后整人的方针,求得突破一点,造成全面整风的基础。只有主要干部中思想打通了以后,其他下级的干部便较容易进行。

关于整风的内容,主要应着重学风的深入研究,检讨思想意识与思想方法,高级干部更应如此。我们干部间的一些问题往往是由于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以致争论不休,不易得出结论。谭政同志说:“思想方法解决了,其他就容易解决”。目前应着重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不深入下层等主要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我们整风的中心不要过多,应一个一个问题的逐步的解决。

关于整风的方式方法,应按这里的具体环境,不能完全采用华中、华北的一套,我们应把整风同战争相结合,在战争中来审查每个同志的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并抓住战争的空隙来进行学习,应把整风与目前各方面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如整军、发展部队等,从各项实际工作中来审查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只有与战斗任务实际

工作以及与处理每个问题相联系,才能充实书本以活的与新的内容。因此,如何组织营一级以上的在职干部的整风学习,应成为我们整风的主要方法,为此要组织学习小组,读文件,互相研究心得,开工作总结会,战斗总结会整训总结会等。要经常以整风精神来举行实际工作的检讨会,以谭政同志之报告作对照,逐渐纠正三风不正的偏向。要健全党的小组生活,多漫谈、多研究。其次可组织一个整风班,尽量精缩部队编制,抽调一部分干部轮训,以营一级和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军队和地方一起进行。

关于整风主要文件,不要过多,可以谭政同志的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古田会议决议案、毛泽东同志的整顿三风报告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等几个文件为主,以练兵总结,第七连及刘子久同志的文章等为辅助材料。

关于审干工作,目前应积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准备,应以整风作为审干的基础,详细办法以后再具体研究。

(六) 今后各单位之特殊任务(略)

以上就是我提出来的浙东我军今后的一般任务,如果能很好加以完成,就能完成中央,华中局及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望同志们加以考虑与讨论。

(原载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战斗半月刊》第一期)

浙东游击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 向党中央、毛主席致敬电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我浙东新四军第一届军政大会全体代表，在听取与热烈讨论谭启龙同志关于目前斗争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后，更深入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化无能及其所造成的中国抗战危机的严重，深刻的认识到我党责任的空前重大。对于中央提出的改组国民党政府与统帅部，我们目睹数月来东南国土为敌骑纵横蹂躏之惨状，身经一年来浙东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出罪恶内战的深痛，更感迫切需要，大会代表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当此大会闭幕之际，特代表浙东我军全体指战员向毛主席及党中央全体负责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对浙东纵队第一届 军政大会给中央致敬电的复电^{*}

(张、饶、赖转浙东纵队诸同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毛泽东

戊敬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这是毛泽东发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转浙东纵队诸同志的电报。年份是编者制定的。

连柏生在浙东临代会上的 一年施政报告（摘要）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浙东敌后临时各界代表大会第二日，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向大会作民国三十三年份施政工作报告。连主席于简略说明一年来国际、国内及浙东环境变化后，就详细叙述浙东抗日政权建立经过：三十二年十一月浙东内战发生前后，浙东各县旧政府勾结敌伪，破坏抗战，挑动内战，敌伪则乘机扩张伪化势力，使我抗日地区沦入混乱状态。我军于民众要求与热望下，由三四五支队办事处会同各地各民众团体，于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在四明山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临时施政纲领及抗战公约等草案，并着手建立区级以上的抗日的廉洁政府。于四明山的慈南、姚南、虞东地区成立姚慈虞办事处，下辖慈南、沿江、梁弄、大岚、虞东等五个区署、在鄞西地区成立鄞县办事处，下辖武陵、古林、章水、鄞江、栎社等五个区署，三北地区则于一月二十七日成立专署级的慈镇姚虞办事处，下辖庄市、庄桥、龙山、慈城、丈亭、游山、中和、临山、马诸、崧厦等十个区署。

行政委员会成立不久，即移三北[办]公，对于四明地区两个县级办事处的领导颇感不便，因此于三月间建立了四明地区特派员办事处，并于特办之下重新建立姚南、鄞奉、上虞三个县级办事处。鄞奉办事处辖章水、鄞江、栎社、亭下四个区署；姚南办事处辖沿江、梁弄、大岚三个区署；上虞办事处辖虞东一个区署，而慈南、武陵、古林三个区署则由特办直接领导，其后成立鄞慈办事处管辖

之。对于三北地区，因慈镇姚虞办事处干部太少，机构不够健全，同时因环境关系，十个区署的直接领导亦确有困难，因此，于四月间撤销慈镇姚虞办事处，而建立了慈镇、慈姚、余上三个县级办事处。慈镇办事处辖庄市、庄桥、沿山、龙山四个区署。慈姚办事处辖庵东、丈亭、浒山三个区署。余上办事处辖中和、临山、马渚、崧厦四个区署。新嵎地方，由于当地抗日军民之要求，于十一月间成立嵎新人民抗日自卫办事处。对于浦东会稽地区之正式行政机构成立较缓。今年一月初，浦东应军民请求，建立了淞沪专署，成立南汇、奉贤、川沙三县政府。至此，连主席总计行委会领导下行政机构称：

“现在我们有四个行政区(三北、四明、浦东、会稽)，十四个县，四十四区，三百七十二个乡，三千七百八十个保，人口二百二十八万八千九百二十人，面积一万一千五百另六万方公里。”

接着连主席着重指出一年来政府工作之方针与任务在于：团结浙东敌后各阶层人士、各党派、各团体，反对内战，坚持浙东敌后抗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伪区，逐渐改造现有的乡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总的方针任务，一年来依据各时期的特点，组织与领导了反内战运动、宪政运动、春耕运动、保卫秋收运动及冬季三大运动(生产运动、冬学运动、民主运动)。”

继即报告关于民政、财政、文教三大工作状况。

首先，民政工作方面：动员与武装民众，对敌伪进行反蚕食、反维持、反应付的斗争，结果使根据地扩大了六十三个乡，使我占优势的基本地区之内、敌伪的“政令”已完全不能推行，大大削弱了游击区的伪化程度，伪政权政令的推行已经缩小到仅仅在其军事直接威胁的范围了。普遍实行二五减租，适当改善雇工生活，大大提高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关于民主训练与实施，主要是反复地进行了抗战民主的教育，局部地调整了乡保行政人员，创建了新型的乡镇机构，使得“昔日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公所一变而为朝气蓬勃、积极负责、坚决抗日的乡镇公所。”此外并举

办民主实验乡,以为今后其他乡镇改造政权的示范,及筹备与召开此次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奠定创造新民主主义新浙东的始基。

其次,财政方面:连主席指出,去年由于战争频繁,支出浩大,加上反动派与敌伪之封锁、破坏、抢劫、勒索,致人民经济与财政收入,陷入十分困难境地。我政府当即组织与领导人民反对敌伪与内战军负担,同时宣布旧政府所收的内河税,内河船捐、行会取缔税与应变费等十余种苛捐杂税,一律废除,确定新政府收入为粮赋、货物税、抗卫捐,并规定粮赋征收一年一度,对于赤贫、抗属及荒歉则予减免,并规定人民负担标准,最多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我们所征货物税依据反封锁政策,按照货物性质或则免税、轻税或则禁止、重税,并坚持一物一税制度,港口收过后,在根据地内即可自由通行,不再重征。对于政府财政支出,为军事经费占百分之七十六,行政费占百分之十四·三,辅助费(文化经费、民运经费、工商借贷及救济)占百分之九·七,都用在抗战与地方福利事业,这与旧政府完全不同。但今年财政收入虽然完成,而因受法币伪币跌价影响,使收支不能平衡,而人民所受损失,更不可胜数。因此,连主席着重指出:今后必须发行本位币,稳定根据地金融,举办农贷与工商业贷款,发展生产;军队政府机关,亦须生产解决部分的供给,减轻人民一部分负担。

再次,文教方面:确定“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的新方针,开办鲁迅学院,解决干部问题,成立社教队,改造民间艺人,推进社会教育,均有显著成绩。

最后,连主席讲述一年来各地艰苦奋斗的工作情形称:在四明地区因国军节节进攻,战祸连绵五月有余,民众遭国军之迭次浩劫,其苦痛之深,诚属旷古未闻。如鄞奉县在内战进入第二阶段时,敌伪乘机增筑了五个据点,并时刻出外骚扰,国军公开联络伪十师进行“清剿”,家家户户不论男女老幼一概遭受软禁,保甲连坐,大小要道严行封锁,暗埋地雷于险要之处,连乡建筑碉堡工事,

并经常包围村庄,抢劫勒索。我该地民众于倾家荡产之余,有受酷刑殴打达三十次以上者,有遭受无故逮捕惨杀者,妇女有被轮奸十五次以上者,而我民众并不因此而有移正义之心,反而进一步与我新四军及新政府打成一片,并予以各种有效援助。某地保长不顾危险通过重重封锁,亲自送饭十七天;某士绅为呼吁团结遭受国军逮捕达四五次,反而更加坚强;某地某农民自动为我军救护伤兵,在火线上来去五六次,结果惨遭国军击毙。我当地新政府工作人员为人民利益,前后牺牲者亦不下数十人,其中如章水区区长徐婴被国军逮捕后,临死前犹为民众抗争;梅园乡女乡长陈晓云亦遭受国军杀害。其他如李敏、袁春妍女士、严培远先生等均为抗日事业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三北方面,敌伪亦乘内战之机,加紧蚕食扫荡,逐步缩小我解放区,但我行政人员仍坚持原地斗争,如余上办事处所辖地区内,内战中敌伪增加了十个据点,该区我新政府工作人员牺牲者达十六人之多。乡镇长及农会干事殉职者共计十八人,先后遭受逮捕者连民众共计为一百二十八人,又如:□塘、中河两乡长亦先后光荣殉职。秋收时期慈东地区敌人建筑飞机场,加强控制,据点林立如梅花桩,而我该地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不懈。

至此,连主席总结行委会一年中施政成绩说:一年来行委会首先领导了各级政府及敌后各阶层人民展开了对敌伪的尖锐斗争,对过去许多乡镇人员所采取的对敌伪妥协苟安应付的错误思想给予了纠正,坚定并提高其抗战的胜利信心与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行委会——各级政府采取了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工作方式,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始终与人民在一起,领导人民进行坚壁清野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组织并扩大了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支持了新四军抗日与保卫人民利益的军事斗争,使其得到必要的粮食、物资、人员的补充及各项后方勤务工作上的援助,而取得了这一年来的对敌斗争胜利,阻止了敌伪扩大奴化伪化我地区的企图,并缩小了敌伪活动地区。其次,行委会在自己艰苦的环境中,对个别地区人民所受烧杀抢劫损失过重之

处犹能及时进行了必要的救济及其他善后工作。个别地区在春耕中能适当解决了人民一部分生产上困难,进行了春耕借贷,发展了人民合作事业,部分的完成了帮助人民解决生活困难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最后,一年来行委会及其他各级政府,随时随地虚心地征求着地方人士意见,热忱的聘请各界热心的抗日人士共同来担负政府的工作。在各种会议上发扬了有话必说、大胆发言的民主精神。在行委会管辖地区,只要不违背抗日利益,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完全有保障的。

然而行委会这一年来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在广大人民中抗战的动员以及深入普遍的抗战教育方面,在领导人民武装阻止破坏敌伪的蚕食与其加于人民的各种压榨,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都还做得很不够。行委会对其所属各部门、各级政府各乡镇机构在政治上与实际工作上的领导与检查督促、具体帮助还很薄弱。在一般行政人员与下层财经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上,还残存着部分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各级参议会与各级行政机构之民主化的建设至今还未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的进行。显然的,行委会工作离开理想还很远。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除了主观上缺乏经验、干部不够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客观环境与时间的限制(内战达半年之久)。至此,连主席结语:“希望到会代表对政府的施政工作多多讨论和批评。”

(原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新浙东报》)

浙东地区施政纲领

—中共浙东区党委为浙东各界临时代表
会而提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为进一步巩固发展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抗日民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以达成〔到〕坚持浙东抗战，准备反攻力量，配合盟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数千万同胞之目的，中共浙东区党委乘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召开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之际，特根据孙中山先生手创革命三民主义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十大政策”之原则，向我浙东各界同胞，提出如下的施政纲领。凡我浙东行政机关内之共产党员，应遵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并号召全浙东共产党员为此一纲领的实现而奋斗。

1. 团结浙东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动员并发挥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智力，共同为坚持浙东抗战保卫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反攻力量，配合盟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数千万同胞，建设〔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新浙东新中国而战。

2.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令与失败主义者的军令，以及一切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寇的阴谋活动。并动员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便团结并统一全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停〔制〕止敌寇进攻，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3. 巩固与扩大新四军及各地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并提高其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实行参军拥军运动与拥

办政爱民运动,以增进军政民之亲密团结。同时,加强地方人民抗日自卫军及民兵之组织与训练,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敌寇“扫荡”,破坏敌人吸收我国人力、物力、财力,实行“以战养战”的阴谋计划;摧毁伪组织,扩大解放区,使被敌奴役的同胞,迅速回到祖国怀抱。

4. 切实执行抗日军人家属优待条例,务使新四军及其他一切抗日军队与机关人员在根据地内之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5. 改造各级旧有行政机构实行民选,组织各级参议会,建立各阶级、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联合抗日的民主政府。确定共产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各级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有该机关之职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擅权包办。

6. 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同时改善公务人员之待遇,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活。

7.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除政府机关,或政府委托军队政治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法律程序与手续以及其他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8. 建立司法制度及各县区乡(镇)调解委员会,正确处理各地民刑案件,肃清汉奸及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特工活动。提倡坦白运动,坚决废除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死心助敌者,给予必要制裁外,其他不问其过去行

为如何，一律实施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并给予政治上与生活之出路，不得任意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分子，例如革命叛徒，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9. 遵照中共中央土地政策，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政府对佃业关系及债务关系，均应本抗日民主之原则，合理调整。

10. 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春耕秋收运动，开垦荒地，兴筑水利，改善与提高农业技术，解决贫苦农民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协助山民解除兽患，爱护与调节劳动力，提倡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奖励劳动英雄，增加土地生产的收获量，保护与培植森林，发展畜牧业及其他农村副业。严禁食粮资敌，调节根据地粮食，以保证根据地内全体军民之粮食供给。

11 建立并发展根据地之工业生产，保障私有生产，欢迎并奖励私人开设工厂投资各种工业，并建设公营事业；提倡部队机关人员的农工业生产运动，实行各种民办公助、公私兼顾之办法，发展人民合作事业。反对敌伪统制政策。协助盐海产品运销，改善盐渔民生活。发展手工业及纺织业，向着根据地自给自足经济方向发展。

12. 实行商业自由流通，保障私人商业之发展，反对统制、[垄断]、操纵、抬高物质[价]；严禁敌区毒品及奢侈品之输入，奖励必需品之输入；协助山货及土产运销，开拓对外贸易路线，以繁荣根据地之商业。

13. 调节劳资关系，保障工人雇工生活必需的改善。工作时间以不超出十小时为原则；工资按生活程度酌量增加；救济失业工人。同时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方有利可图，以发展根据地生产增强抗战力量。

14. 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的收税制度,征收统一的公粮田赋及统一的进出口货物税,务使居民中除极贫困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级或所得多寡,实行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度,使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均能担负到抗日的经费。实行统一收支,建立预决算制度,厉行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同时健全财政经济机构,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打破敌伪及反动派之经济封锁,调剂金融,抵制伪币,发行地方抗币,以利根据地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保证抗战经费之供给。

15. 实行抗战与民主的普及教育,创办各种学校,及各种短期训练班,吸收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及失学失业与流亡青年,训练培养抗建人材,编制抗战民主教材,务使学习与抗建实践生息相联系。给与在学学生及教职员有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及课外正当活动的自由。同时改善各级学校教师的生活,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准。推广抗日书报,奖励自由研究科学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与文艺运动,欢迎各地科学艺术人材来根据地工作。推行卫生行政,建立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材参加地方卫生事业,以达减少人民疾病痛苦之目的。

16. 依据男女平等之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展妇女教育,发扬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积极性。爱护女工童工及产妇。实行基于男女双方自愿原则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17. 切实救济本地区及外来之灾民难民,发扬人民互助精神协助灾民难民进行生产工作。欢迎沦陷区及大后方各界人士来根据地居住,或参加各项抗战工作及建设事业。

18. 展开对敌伪军伪警伪组织的政治攻势,向其指出德日必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一定胜利的光明前途,宣传我之宽大政策,促其早日回头觉悟,回到抗战道路。欢迎与优待伪军伪警伪组织之反正人员,并给予物质上精神上之奖励。援助沦陷区、游击区遭受敌人摧残压迫渴望解放的同胞,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

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沦陷区的兄弟姐妹。

19. 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伪警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对于其他进攻新四军及各地方抗日部队时之被俘者,处理办法仿此。

20. 安定根据地内社会秩序,团结根据地内外各会门组织,启发其民族意识与抗战情绪,使其走向抗日民主的正轨道路。

21. 在尊重中国主权及我根据地政府的法令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我根据地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根据地进行各项抗日与文化宗教的活动,并给予其便利与保护。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何克希作三年来艰苦斗争的 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摘要)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司令二十四日向大会做军事报告，从他的发言里，可以清楚的认识国共两党在浙东敌后所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共产党所走的是团结各阶层，各党派，胜利坚持敌后抗战的光明大道；而国民党所走的则是勾通敌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此路不通”的断头路。

三年斗争：何司令首先总结该军三年来斗争经过，划分为四个阶段加以说明：

(一) **自宁绍沦陷至浙赣战役**(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一九四一年三月杭敌侵陷萧绍地区，四月间，敌人由镇海要塞登陆，连陷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县，国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国民党政府官员弃城弃民而逃。此时期敌人以确保占领宁绍为方针。余姚、慈溪县政府都退避慈南、姚南地区，他们主要任务不是保护人民，武装人民，教育和组织人民，而是向人民搜括。为达到这目的，不惜随便收编土匪，给以“正统”“合法”名义，以为己助。因之敌后人民痛苦不堪，抗战情绪低落，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此时我军一部由浦东转战来浙，相公殿，施公山，长溪岭，横河诸战斗，连战连捷，大大鼓舞了浙东人民抗战热情与胜利信心。本军爱护人民与协助友军之行动深为各界人士所同情，因此许多地方士绅，乡保长，小学教师以及其他抗日爱国人士，差不多没有不同我们建立起亲密关系的。那时我们初来浙东，人地生疏，得力于地方诸先进帮助者，实在很多。

(二) 从浙赣战役到第一次自卫战争胜利结束(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年底)——一九四二年五月浙赣战役爆发,以少数兵力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先后陷义乌、东阳、浦江、金华、兰谿、建德、汤溪、衢县、江山等县,一直沿浙赣线打下上饶;另一路敌军又侵陷永康、丽水、青田、温州,几乎浙江全部,均为敌骑蹂躏,是役敌人采取活寨战术,不久即自动缩短战线,退出金兰以西以南地区,确保金兰及金萧沿线之占领。金兰前线数万国民党大军,未予敌寇丝毫抵抗,匆忙后溃。浙东敌后国民党杂色部队如姚华康、滕祥云、金元智、张正邦、季槐林、赵子英、肖子建等则均纷纷投敌。奋勇队,忠救军,慈溪和余姚县政府武装虽仍挂抗日招牌,但始终均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正是这时期国民党的总方针。当浙赣战役爆发时,我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曾组成南进部队,由蔡正谊同志率领挺进会稽地区。八月二十日诸北龙山风山一战,毙敌尉官柳泽春夫以下三十余名,引起敌连日以飞机向我报复“扫荡”,浙赣路两侧人心为之一振(后遭国军奋勇队优势兵力之袭击,复由诸暨回来与本队会合)。浙赣战役告一段落,敌人回师扫荡,十月八、九日经杨葛殿、竹山岙二次猛烈战斗,粉碎了敌人“扫荡”。此时忠救艾庆章奉令反共,向我节节进逼,企图消灭我军于海隅。我退无可退,让无可让,被迫进行自卫,幸赖全军将士用命,地方父老协助,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姚北周家路一战开始,经黄家埠、谢家塘、小越诸战斗后将艾部进攻予以击退,取得了第一次自卫战争的胜利。

(三) 从第一次自卫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自卫战争爆发(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十一月)——当时敌人方面军事上由全面“扫荡”进入局部“清乡”,政治上配合顽方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反共为资本,向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反动派方面表面上对我缓和,实际上积极准备,借以麻痹我们警惕性,以掩护其从经济、粮食、军事、情报上积极进行第二次反共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以周巷反正之田岫山为拉拢反共的对象,以名誉、金钱、弹药、美女为钓饵,七八月间

第三战区发表挺四挺五名义,委田(岫山)张(俊升)为司令,在这一时期我军首先积极打击敌伪,保卫秋收,进行了梁弄拔掉据点等大小战斗不下数十次。

团结友军:其次,团结友军抗战。对田岫山周巷反正后,我们予以有力配合,打退敌伪“扫荡”,掩护他渡过姚江,给以经济上的援助,以后更给以人事上的援助,目的只是为了团结抗战。对张俊升,我们也曾给以经济和人事的援助,答应他的要求,派了几个干部去帮助他创办政工队和办报纸等。对郭清白,我们三支林支队长曾几度配合他作战,使他“感激涕零”(五月间章村战斗后郭清白来信语)。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为了有利于团结抗战事业。我们与余姚县政府夏县长和肖支队长签定了“抗战公约”,希望他们能够信守诺言,但夏县长却因与我缔结抗战协定而被反动派革职了。此时期我浙东抗日阵地,有了初步的巩固,四明山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去年双十节一二万民众的盛大庆祝会,并不是没有缘故的。我们并进行了整训部队,提高了部队质量,扩大了部队数量,并部分进行了一些军事建设。

(四) 第二次自卫战争阶段(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顽军的围剿与我军的反围剿,成为这一阶段中斗争的主要形式。〈争〉顽固派贿赂敌人,勾结敌伪军共同对我,我则在被迫的自卫战争中,仍尽一切可能打击敌伪。两个不同的政策,成为鲜明对照。敌人方面政策主要在挑动内战,乘机向我解放区进行蚕食,敌伪势力伸展至整个姚北、慈北、镇北地区,并增筑沿江据点,配合顽方封锁姚江,对四明山进行两次“扫荡”,南黄,大山,夏家岭等十余村庄,被焚一空。国民党方面对敌软,对我硬,不惜卑劣手段,买通敌伪,大军通过新嵊奉公路,以达到其围歼我军于四明山之目的。整个自卫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顽方以贺钺芳(挺三)为主力,配合田、张对我;第二阶段,竺鸣涛亲到东林指挥,突一队为主力,配合田、张、贺,挺进队,保安二、五团、俞济民部及其他地方团队对我;第三阶段开始仍以突击营为主力,五月后以三

十三师为主力,配合田、张对我四明山部队,同时以二个保安团,配合会稽地区各县自卫武装,对我金萧支队。顽方凭恃他兵力上武器弹药上的绝对优势,企图一举消灭我军。顽方对于四明山人民,采取血腥的镇压政策。奉化县政府四明办事处代电各县长说:“际此大举剿共时期,政府颁有烧杀全村全乡之法令。”以江西剿共时之屠杀惨状威胁人民。

被迫自卫:我们在这一时期是一方面不得已为自卫而战,但仍[不]放弃力争团结抗日,故当天台二次会议结束,浙东内战危机突告紧张之际,我即发出第一次呼吁团结抗战通电。不料我通电刚发出,十一月四号前进指挥部第一次对我作战命令即发下,田、张态度逆转,贺钺芳挺进四明山,内战已无可避免。我于十一月十六日一面撤出梁弄,一面发出第二次呼吁团结通电,冀挽危局于万一。十一月十九日蜻蜓岗、大俞战斗,我虽获胜,但为表示不愿内战当晚撤退,并发出第三次通电,呼吁团结,冀挽危局。二月中旬又,发出第四次呼吁团结抗战通电,提出三项解决纷争条件:(一)立即停止对我进攻;(二)各返原防,坚持抗战;(三)敌后问题,召开各界会议,协商解决。全国性问题的交两党中央解决。此时期我们在艰苦的自卫战争中,仍不放松积极打击敌伪抢粮,保卫人民秋收,先后有宓家埭及东埠头二次规模较大之战斗及其他大小战斗数十次。

何司令于总结中又指出:当前该军总计牵制和抗击敌军六千余人,伪军一万六千余人。至于该军所以能够持三年敌后斗争,何司令认为是由于党政军民的一致团结和努力的结果。他又谦虚的说:“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如果有成绩,功劳是大家的,如果有缺点,也要大家来批评,来纠正,从爱护的负责的立场出发,希望大家多提改正意见!”接着他就指出部队中还存在着弱点:(一)在对敌斗争中,至今还不能每次都有效的阻止敌伪对我根据地内人民的骚扰和掠夺,以及清乡蚕食,在去年反顽自卫战争中,也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因此还不能保证我根据地内人民不再受反动军队的蹂躏和损害。(二)由于部队新成分多,斗争历史短,对于

群众纪律遵守和执行还有着缺点。(三)在我们部队内还存在着军阀主义习气和游击习气。(四)我们部队一般政治觉悟程度还不够高,教育工作也不够深入和努力。(五)我们部队战斗技术也缺乏严格训练。(六)个别的浪费现象仍然存在。(七)官僚主义作风尚未肃清。

今后任务:何司令继续分析当前浙东敌友我三方面斗争形势后,便提出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巩固与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浙东抗战,发展浙闽沿海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配合盟国海陆空军作战,并从各方面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反攻时机,配合盟国反攻敌人,夺取沪杭甬等大城市,解放东南数千万同胞”。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他又给浙东军政民各界提出下列六大具体任务:

第一,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他号召党政军民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粉碎敌伪对我一切蚕食、扫荡、清乡企图,把一切敌伪守备薄弱的、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化为解放区,以及粉碎来自反动派方面的任何进攻,为坚决保卫我根据地和人民利益而奋斗。同时,政府和人民方面,应该深刻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要一切为着武装斗争胜利,一切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中心而开展,任何忽视武装斗争的观点必须克服!

第二,扩大武装力量——首先必须扩大和充实主力部队;第二,必须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第三,必须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必须将现有武装力量发展一倍至数倍。

第三,巩固与加强部队,提高战斗力——要增强部队内部团结,实行拥干爱兵运动,改善官兵关系,干部本身应进行整风学习,改造自己思想和工作作风;要整训部队,提高其政治认识,提高其军事技术,提高其文化水准;要开展坦白运动,揭露特工奸细活动。

第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规定旧历明年正月为拥政爱民月,开展部队拥政爱民运动。在部队中进行拥爱教育,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和军权高于一切的错误思想;召开军民联欢会,在会议上

展开自我批评；认真处理过去破坏政府法令及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

第五，进行生产运动——今年如果情况许可，我们部队将进行小规模的生产，或者帮助人民以大量劳动从事生产，并力求减少伏役；另一方面要肃清部队内不应有的个别浪费现象。

第六，开展敌占城市交通线据点工作——由于国际形势对我日益有利，对日寇日益不利，敌伪间、伪伪间、敌军官兵间矛盾，伪军伪组织动摇的日益加深，盟军在沿海登陆的日益逼进，加强敌伪军工作，进行政治攻势，建立据点附近游击支点，组织游击区和敌占区一切抗日中国人，准备将来反攻时里应外合，目前有头等重要意义。除部队方面注意去敌占城市，交通要道据点周围多多活动，并进行瓦解和争取伪军工作外，希望地方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等）用一切可能办法去唤醒，去团结和组织被摧残被压迫渴望解放的同胞，并向伪军伪组织进行宣传。何司令最后着重指出：“这一项工作十分重要，不论如何困难，我们都要去做。如果这一工作做得好，反攻日寇就能顺利进行，就能缩短时间，少牺牲许多生命，少流许多血，给中华民族更多保存有生力量。”

（原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新浙东报》）

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 致毛泽东暨中共中央电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

延安毛泽东先生暨中共中央诸先生钧鉴：

当兹民主运动澎湃于全世界与我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聆听了政府与军队关于军政财经文教等等工作报告，并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披诚相讨，使我浙东敌后各阶层各党派更进一步的在抗日民主的大纛之下团结起来了。七年半的史实，证明了唯有民主才能团结，唯有团结才能战胜敌寇。毛泽东先生所指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正是全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正确方向。浙东地濒海滨，海风传来的盟军炮声愈响愈近了！我们深感责任之重大，今后当更加团结一致，积极努力，为实现真正能代表全国民意和团结全国力量的联合的民主政府而奋斗；为准备力量，援助盟军登陆，反攻敌寇而奋斗；为在浙东实现毛泽东先生在边参会上昭示的十五项任务而奋斗。当此大会闭幕之际，我们代表浙东敌后解放区二百万人民谨向先生等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叩

(原载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新浙东报》)

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宣言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浙东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从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开了十天会议，今天当大会隆重闭幕的时候，我们特向浙东全体人民，并向全国同胞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慎〔郑〕重宣告我们的决定与意愿。

这次大会实到浙东各地、各界、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一百零八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司令与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连主席委员向大会做了详细的工作报告，大会代表畅快的提出了各种质疑与批评，党政军各部门主管人做了认真的解答与自我批评。对浙东新四军与行委会坚持浙东抗战、解除人民痛苦的艰苦业绩，大会表示深厚的感谢与敬意。大会仔细研究了浙东抗日民主事业的已有基础与当前任务之后，一致决议正式成立浙东临时参议会与浙东行政公署，当场选举了参议会的参议员，驻会委员与正副议长，及行政公署委员会的委员。大会代表全浙东人民，以负责的精神，把管理政权的责任与权力担负了起来，并责成临参会与行政公署，按照当前浙东的环境与需要，把浙东民主政治的机构很快的建设好。大会号召全浙东各阶层、各党派、各界人民，一致团结在临参会与行政公署的领导下面，并很好的监督它、帮助它，认真负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使这个新生的浙东人民政权得能日益坚强壮大。

大会听取了中国共产党浙东区党委的代表谭启龙先生的演讲之后，对区党委提出的浙东地区施政纲领的精神，一致决议拥护，并接受这一施政纲领作为今后浙东一切施政方针的依据。当四年

前敌寇侵入、人民深陷水火之时，浙东共产党毅然挺身而出，领导人民进行武装自卫，建立了浙东人民的子弟兵——浙东新四军，四年来流血牺牲，不辞艰险，乃能造成现在浙东解放区的光明景象，今天环境稍稍安定，中共浙东区党委就及时推动召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的施政纲领，诚恳的号召与帮助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抗日人士来共同参加政府工作，这种大公无私的民主精神，与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独裁政治适成明显的对照。大会认为中共浙东区党委所提出的这个施政纲领是团结与发动全浙东人民抗日力量、坚持浙东抗战、解放浙东人民的唯一正确道路，大会号召我浙东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彻底改变一切做客与旁观的想法，积极的参加浙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加强各党各派间与广大人民间的亲密合作，共同为了实现这一施政纲领而奋斗。

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三十四年度施政方向，临时参议会与各级政府组织法，惩治汉奸条例，惩治贪污条例，扩大主力军与地方军，广泛建立自卫队与民兵，发行抗币，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新方向……等等重要提案。这些提案决议都是当前浙东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大会责成临参会与行政公署，必须负责很好完成，并号召我浙东全体人民，经常加以检查督促，务使防止一切可能残存的“决而不行”的官僚作风。

这次浙东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结束，临参会与行政公署的正式民选建立，施政纲领与各种重要提案的通过，已使新民主主义的新浙东的建设前进了一步。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万分艰苦而伟大的斗争。大会号召我浙东解放区全体军民，要根据毛泽东先生指示的今年解放区的十五个任务，以及此次大会的各项决议，来大大加强各项抗日工作，进一步巩固与扩大浙东解放区，解放区的人民比了大后方与沦陷区的人民都要幸福得多，我们的责任也更加艰巨，我们必须更好的负起这个责任。大会号召浙东反动派统治地区的青年们与其他各界，一致起来，响应大后

方各地的民主爱国运动,你们并应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及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大会向浙东沦陷区同胞致以深切的慰问,你们应该加紧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来争取你们自己与祖国的自由解放。大会特别宣告一切伪军伪组织人员,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一定胜利,日寇一定灭亡,中国新专制主义者一切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也一定要失败,愿你们及早回头觉悟,参加抗日民主事业,我们一本宽大政策,不咎既往,如有执迷不悟、死心塌地做汉奸者,不但抗战胜利之日,国法不容,本大会已通过惩治汉奸条例,并责成行政公署进行调查登记,宣告国人,严予制裁。

当此大会闭幕之时,苏联红军离开柏林已只有杭州到上海这一段短短的路程,西线盟军的行动也在加强起来,美军收复吕宋岛的战事正在顺利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线日益巩固扩大,新民主主义的新世界的出现,已为时不远,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但中国国内国民党腐败无能的一党专政尚未结束,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危机更为严重,解放区军民的责任是日益加重了。我浙东全体抗日军民,誓必追随我国与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之后,再接再厉,为促成全国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成立,为坚持浙东抗战、准备反攻力量、配合盟军、驱逐日寇、收复宁波、杭州、上海、南京各大城市,为彻底消灭一切法西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浙东新中国新世界而奋斗到底。

谨此宣言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行政公署令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 财字第拾伍号)

兹制定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公布之，此令。

主任 连柏生

副主任 吴山民

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

第一条 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业、稳定金融、平准物价、奠定根据地经济基础、积极准备反攻，特根据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决议案，发行抗币，以为本行政区之本位货币。所有发行事宜悉依本条例办理之。

第二条 抗币以圆为单位，分以下四种发行之：

- 一、壹圆币；
- 二、伍圆币；
- 三、拾圆币；
- 四、伍拾圆币；

第三条 所有发行抗币事宜，责成浙东银行经理之。

第四条 抗币发行数额，由浙东银行董事会根据社会需要，拟定计划呈准实施之。

第五条 浙东银行应始终维持“抗币壹圆币值”接近于食米一市斤之价值。

第六条 抗币发行基金以下列实物及保证准备充之：

- 一 储存金银；
- 二、拨存稻麦〔谷〕；
- 三、在本地区有市场价格之有价证券；
- 四、有确实抵押品之债券或票据。

抗币发行数额不得超过全部准备基金实际市价相等之价值。

第七条 浙东银行董事会应将抗币发行数额及其准备基金“数量”与“实价”，按月造表送浙东银行监察人会审查，并于本行政区参议会开会时提出报告。

第八条 浙东银行监察人会或本行政区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得根据本行政区内合法成立之县级民众团体三分之一以上之请求，向浙东银行检查发行账目。

第九条 凡有伪造及其他破坏抗币行为者，依照刑法从重惩处之；其有汉奸嫌疑者，并依惩治汉奸条例办理。

第十条 本条例由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会议决公布施行，修改时亦同。

（原载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新浙东报》）

浙 东 行 政 公 署 令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 财字第拾陆号)

兹制定浙东银行条例公布之，此令。

主 任 连柏生

副主任 吴山民

浙 东 银 行 条 例

第一条 本行政区为调剂金融市场，发展社会经济，充实抗战力量，特设立浙东银行，依本条例所规定经营之。

第二条 浙东银行资本总额定为抗币二百万元（约相等于食米贰百万市斤之价值），由浙东行政公署分期拨充之。前项资本额拨足四分之一时，开始营业。

第三条 浙东银行总行设于行政公署所在地，并视业务上之需要在本行政区内各地设立分行、支行及办事处。前项分支行及办事处之设立，应先拟定计划呈请行政公署核准。

支行及办事处应依据业务上指挥之便利，分属各分行或直属总行。

第四条 浙东银行业务范围如下：

- 一、经理发行抗币；
- 二、经理政府金库；
- 三、放款及贴现；

- 四、存款及储蓄；
- 五、收买金银及有价证券；
- 六、汇兑；
- 七、兑换及代收代付；
- 八、信托事业；
- 九、保管寄存品；
- 十、其他政府机关委托经理事项。

各项业务经营规则另订之。

第五条 浙东银行设董事会，由浙东行政公署任命董事九人组织之，并指定董事长一人、常务董事长二人，主持日常会务。

第六条 董事会之职权如下：

- 一、议定各项业务方针及计划；
- 二、议定抗币发行步骤及数额；
- 三、监督业务之进行；
- 四、计划建立分支行及办事处；
- 五、决定总分支行负责人选；
- 六、审定关于业务及人事各项章则；
- 七、稽〔稽〕查帐目及库行；
- 八、审核总分行预决算；
- 九、审定全行职员考绩事项；
- 十、决定其他重要行务。

第七条 董事会应于总行开始营业前，及每年度开始前编具业务进行计划，呈报行政公署核准。

第八条 总行设总经理一人，秉承董事会之指示总持行务。

设副经理及襄理各一人，协助总经理处理行务，并依次负代理之责。

第九条 总行设下列各课：

- 一、总务课；
- 二、会计课；

三、营业课；

四、发行出纳课。

视业务繁简，各课必要时得分股办事。

各课、股职掌分配，另订办事细则规定之。

第十条 分行设经理、襄理各一人，承总行总经理之指挥、监督，主持分行行务，并视业务繁简，分设二课或三课，分掌总务、会计出纳及营业等事务。

第十一条 总行总经理、副经理、襄理及分行经理、襄理，均由董事会报请行政公署核委。

第十二条 总、分行各课职员及支行办事处课员级以上职员，由总行总经理遴派之，并按月报董事会备查。

职员分级制度及任用保证手续另行规定之。

第十三条 总、分行每月各举行行务会议一次，由股长以上职员参加。

总行行务会议由总经理召集，并请董事出席指导。

分行行务会议开会时，由经理召集，并请总行派员出席指导。

第十四条 浙东银行设监察人会，由浙东参议会推选监察人二人，及行政公署委派一人共同组织之。并互推一人为首席监察人，负责召集会议及处理日常会务。

第十五条 监察人职权如下：

一、审查董事会所议定之各项业务进行计划；

二、检查银行业务进行情形，必要时并展阅簿册及查验库存。

第十六条 监察人直接向董事会提出审查意见，或提供改进行务意见。董事会或总经理如认为不能接受者应说明其理由。监察人如认为前项理由不能成立者，得报请行政公署处理之。

第十七条 监察人对于银行经营情形，除向参议会负责提出报告外，未得政府同意不得向外发表意见，并负保守业务上秘密之责任。

第十八条 浙东银行会计年度自每年七月一日起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每年度分二期决算,以十二月底为上期,六月底为下期及全年度总决算。决算时应编造下列书表分送董事会及监察人会查核,并由董事会转呈浙东行政公署备案。

- 一、发行报告书;
- 二、经理金库报告书;
- 三、一般营业报告书;
- 四、资产负债表;
- 五、损益计算表;
- 六、资产目录;
- 七、负债目录。

第十九条 本条例由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议决公布施行。

(原载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新浙东报》)

浙东区党委关于发行抗币 与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

(一) 由于欧洲战事解决在即, 太平洋上美军一天天向日本本土及中国海岸逼进, 敌伪最后崩溃灭亡的时间愈加接近, 其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飞速下降, 各种困难飞速增涨, 在财政上更加依靠滥发纸币图救一时之急, 故最近敌占区一般物价已暴涨至战前一万倍乃至四五万倍, 这种形势必将继续急剧恶化下去, 伪币的最后结局必将如第一次大战后的马克一样, 这是一般人民都已认识到了的。又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集团, 只图少数人私利的错误罪恶政策, 大陆交通为敌打通, 正面战场不断溃败, 沦陷区不断扩大, 使整个大后方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危机更形严重, 法币的恶性膨胀也在急剧发展, 重庆人家已把法币来糊墙壁, 今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固执其法西斯统治的条件下, 其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将继续发展, 法币之濒于崩溃也是必然的趋势。伪币与法币的这种恶性膨胀与狂暴跌价(虽然程度还有若干差别), 是敌寇与少数大汉奸及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剥削沦陷区与大后方广大人民(包括中等资本家及中小地主在内), 使广大人民生活空前下降, 工农商业及全部国民党经济陷于破产的最直接与最重要的手段与原因之一。与此相反, 在我敌后各先进解放区内, 由于我党我军及人民民主政权采取了抗日民主的各项正确政策, 由于生产运动的开展, 我们正确的执行了财政经济政策, 发行了抗币(各根据地的地方本位币), 坚决的展开与敌伪的各种金融、贸易与财政上的斗争, 因此我解放区乃能做到金融稳固、物价平定, 农工

商业欣欣向荣,各阶层人民生活日趋改善,与敌占区及大后方黑暗世界完全相反的光明景象,使我解放区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日益成为反攻日寇的中心力量,而且我解放区军民的物质经济条件亦日益超过敌占区与大后方,成为自力更生达到经济上、物质上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奠定反攻日寇建设新中国的物质基础模范。

(二)我浙东解放区,由于开辟历史短,以及其他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对敌人的各种经济斗争,尤其是货币斗争上,至今还没有最好的开始,我解放区之金融完全为伪币所控制,这是当前浙东工作中最重要的弱点之一。现在,伪币价格迅速狂跌,我解放区军民生活及一切经济活动已受到严重威胁,抗币之发行已成为全体军民热烈希望与迫不及待的任务之一。同时由于我党我军四年来在浙东执行了各项正确的抗日民主政策,胜利的坚持与发展了浙东解放区,地区日益扩大稳定,政治、军事威信日益提高,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地位与威信日益巩固提高(尤其是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的召开与浙东临参会及浙东行政公署的正式成立),群众组织力的提高,这一切都造成了我们在浙东建立银行、发行抗币的足够的条件与基础。因此最近浙东行政公署决定成立浙东银行,发行抗币,以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便利根据地农工商业的发展与反攻的经济基础的准备,这是完全适应浙东广大人民与抗日民主事业的迫切需要的,是有着胜利推进这一事业的足够基础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三)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由于我们浙东解放区地区还不大,解放区内较大的市镇大多数为敌伪控制,斗争频繁,对外贸易管理不易,生产运动尚未开展,经济上对敌占城市的依赖仍大,农村中印刷等技术条件较差,伪币与法币都有着较长的历史与基础,而国民党反动派仍未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对我解放区仍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因此估计我们抗币开始发行的时候,必然会碰到各种困难与来自敌伪反动派的破坏,他们必然要在政治上利用敌探奸细反动分子放出各种谣言来动摇人民,在经

济上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来扰乱我们，在军事上采用扫荡、骚扰、抢劫，乃至屠杀镇压等残酷手段，来企图阻碍我们抗币信用以及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再加以管理金融贸易财政及各种经济建设事业是我们干部最缺乏经验的一个工作部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发行抗币决不是一件简单的轻易的事情。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复杂的，其紧张尖锐程度不下于军队作战，其胜利或失败将大大影响我们几百万军民的生活，影响我党我军与民主政府的政治影响，以及影响准备反攻的经济建设事业之顺利完成。因此这决不是财政部门同志单独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我党政军民各部门同志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这一斗争的完全胜利。

（四）为此，区党委特对我浙东全党党政军民各部门各级同志有如下具体指示：

第一，必须在全党全军及广大人民中，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关于发行抗币与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思想教育与动员工作。我全党同志，尤其是区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对敌纸币与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必须学习对敌纸币与经济斗争的规律性，学会领导这一斗争的一套办法。各级党委必须亲自领导一切军政民机关开展一次广泛的群众性宣传运动，根据行政公署公布的一切法令条例及《新浙东报》上公布的一切有关文章及社论，把发行抗币的意义，发行抗币与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害关系，将敌伪及反动派可能采取的各种破坏手段及我们的对策，将人民应该遵守与注意的各种具体问题，将民主政府发行抗币与伪币法币根本不同的方法、目的与前途，详细向人民说明，使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及[广]大群众了解抗币是我们用以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同时又是用来开展生产、改善民生的一个有力的推动机。各级党政军民必须将这一工作最密切的与当前解决春荒、发补农贷、开展春耕生产、组织各种合作社等等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联系起来。我全党全军同志及各机关团体干部应成为执行政府法令、维持抗币信用的模范。

第二，行政公署财经处、浙东银行，及各级财经工作部门的党

员干部,应很好研究各先进解放区发行抗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经验,真正掌握我党为民众服务为抗日民主事业服务的财经政策,坚决肃清与预防财经工作人员中一切国民党的残余作风,与一切错误的财经政策的可能发生,防止与克服一切单纯财经观点与闹独立性等倾向,以及一切忽视经济工作的不正确观点。必须很好的使财经工作为全党各部门与广大人民服务,并很好的把财经工作的一些必要知识来教育全党与人民。同时军队及其他部门工作同志,必须克服把财经机关当作单纯军队的办事机关,只知向财经机关要钱用,不能了解财经工作的基本任务,并配合帮助财经工作解决问题的国民党观点。尤其在抗币刚刚发行的时候,军政民各机关各团体应以最大努力来帮助树立抗币的威信,用各种方法防止与打破敌伪及反动派的各种破坏,必要时军事机关应予以武力的协助,保护各税收及银行机关,打击出扰破坏的敌伪,肃清特工分子的阴谋活动等等。

第三,抗币发行的基本路线,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事业,必须避免[单纯的]财政发行。因此各级党必须保证生产贷款及投资要贷给有组织的群众,以刺激群众参加自己的组织,并要注意贷给基本群众,切实照顾工农群众的利益,避免走上层及富农路线。同时必须做到款贷出去后能够收得回来,避免把贷款变为救济性看待。只有如此,才能使银行威信高度建立起来,并真正达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反攻的经济基础的目的。

第四,今后各级党委、党团必须加强对本地区与本机关有关抗币、金融、贸易、物资管理、税卡等财经工作的领导,加强对财经工作干部政治教育与业务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业务之一。并加强这一方面的调查研究,根据各地区各时期的不同环境特点,定出本地区本时期的斗争方针与策略,吸收财经工作有经验的干部,很好的定期总结这一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将发行抗币后的一切情形随时报告区党委。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行政公署令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 民字第六十二号)

兹制定“浙东行政区减租交租及处理其他佃业关系暂行办法”公布施行,前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处理三北地区二五减租及其他佃业关系暂行办法”即予废止。

此令

(附浙东行政区减租交租及处理其他佃业关系暂行办法一份)

主任 连柏生

副主任 吴山民

浙东行政区减租交租 及处理其他佃业关系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农民抗战热忱,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合理照顾业佃双方利益,增强抗战的战斗力量,特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附件、浙东行政区施政纲领、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期间浙东地区佃业关系之实际情形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除森林、畜牧等地外，一般农作土地皆适用之。

第三条 处理减租交租及其他佃业关系时，如为一方涉及荣誉军人、抗日军人家属及贫困孤寡、贫困佃农、贫困业主者得酌量变通办理，以适当照顾其权益与生活。

第四条 任何团体或个人如有违反本办法，意图破坏，对于农民施行压迫、欺诈，假借减租从中渔利，或明减暗不减，及煽惑农民怠租抗租者，均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

第五条 各行政分区及各县在本办法范围内或在不违背本办法之精神原则下，得依据当地实际情形制定更具体之施行细则，呈请行政公署核准施行。

第二章 减 租

第六条 凡公私租佃之土地不论定租制分租制议租制等均须实行二五减租。

一、未实行减租者应按原交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

二、虽已实行减租，但不及百分之二十五者，仍应按未减租前之交租额，减至百分之二十五。

三、已实行减租且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者依其约定。

四、未减租之游击区及敌占区减租可按实际情形另订办法。

第七条 减租后交租额之最高数量不得超过土地正产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最低也不得低过于千分之二百，副产一律归佃农。如遭特殊情形者，由各县政府按实际情形处理之。

一、稻田一亩之全年正产量，按各地土质及习惯者实际情形以三百斤至四百斤谷为最高标准，超出此数皆归佃农所有。

二、若因年成荒歉时得依照歉收比例减低交租率或免租。

第八条 习惯上系看花议租者依其习惯，如其实际租率低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按其实际租率改定办法。

一、各乡之评议会以佃业代表各四人至五人，乡镇公所、乡农

会代表各一人组成之,并以乡镇公所代表为当然主席,会议时应请由上级政府派员列席指导,区农会得派代表列席。评议会如系联乡组织者,与会代表之比例类推,其主席则由各乡代表互推之。

二、评议会应以民主方式讨论,佃业双方对于议租争执不下时由区署裁定之,如仍不暇〔服〕,得向县政府请求重裁。

三、议租应分畝分段分级。

四、田地之交租额应依田地所在地之乡镇议定。

五、如双方自愿按减租后之租率将议租改为定租时,得改定租制。

第九条 计到实抱等死租应按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办理,惟遇歉荒,得由双方协议减免地租,如有争议由政府调处之。

第十条 小租如无永佃权或从中渔利者,应予禁止,但如以代价而获有永佃权之小租,得暂保持其习惯,惟大小业两者共同收租量须依第七条规定,如遇特殊情况得酌量变通办理。

第十一条 预租制应予禁止,如因故不能废止者应按第七条规定扣除利息及业方应负之粮赋交租,其跑租部分应予以取消,其佃权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海田海地等特殊土地之租额依照习惯办理。

第十三条 业主应依本办法所定之减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租,禁止租鸡、租力、租脚及无偿劳动等不正当需索。

第三章 交 租

第十四条 佃农应依本办法所定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并禁止有和水掺秕等不正当行为。其有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业主得请求政府依法办理。

第十五条 交租期及交租各物依当地习惯办理。除第十一条规定之情形外禁止预收地租或收取押租。

第十六条 交租用之衡量器一律通用市秤、市斛、旧衡量器改新衡量器时,不得另行增加。

第十七条 佃农如因收获减少而确系极贫或遇意外无力交清地租时，得与业主协商分期缓期交纳之，业主对欠租不得作债行息。

第十八条 民国三十二年以前之欠租应予免交。

第十九条 减租后抗日军政公粮由业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田赋)由土地所有人负担之(依照粮赋并征办法办理)。

第四章 租佃契约及佃权

第二十条 租佃土地应按本办法之规定订定租佃契约共同遵守，该项契约应觅具见证人并经当地乡镇公所农民会证明之(不得收手续费)。

在本办法颁布前所订定之租佃契约有与本办法相抵触者应依本办法之规定办理。

在本办法颁布后所订立之契约，与本办法抵触者无效。

第二十一条 对于年租制之田地为使佃农安心生产提倡长期租约(如规定五年以上之租期)。

第二十二条 在租佃契约下〔上〕或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者不得强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无永佃权之田地非因下列事情之一时，业主不得借故撤佃。

- 一、租佃契约期满后，而不愿续租者；
- 二、佃农非因不可抗力无故一年不为耕种，而又不交地租者；
- 三、佃农将田地转租从中渔利者；
- 四、减租后佃农力能交租而故意不交者；
- 五、佃农死亡无继承人者；
- 六、佃农自愿抛弃其佃权经签字证明者；
- 七、业主确因贫困，非收回自耕而无法谋生者。

第二十四条 业主依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撤佃时，应照顾第二佃农之经济状况，第二佃农确系贫困者，仅能收回第一佃农本

人之佃权。

第二十五条 业主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七条规定撤佃时，应当顾及佃农之生活或仅撤佃一部，如有争议由农会或政府调处之。

第二十六条 业主依本办法第二十三条撤回之田地，业主有自由处置之权……包括出租、转让、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

第二十七条 业主依据本办法撤佃时，应于收益季节后，次期作业前为之，并须于一年以前通知佃户。

第二十八条 田地因买卖典押而转移其所有权时，新业主非依本办法之规定，不得任意撤佃。

第二十九条 业主将田地出典出卖时原佃农以同样条件有承典承买之优先权。

第三十条 业主撤佃自耕一年后重行出租时，原佃农除有抗租等不正当情事外以同样条件有承租优先权；自收回自耕之日起未滿一年，而即出租者，原佃农得以原条件承佃。

第三十一条 禁止藉口自耕收回土地暗行出租，或使其荒芜，以及假典假卖之行为。

第三十二条 私荒不论生荒熟荒须先促业主开垦，如业主无力开垦任其荒芜时，政府得招人开垦或经政府登记许可之承垦人得为开垦，熟荒至少一年，生荒至少三年不交租。土地所有权仍归原主，承垦人有永佃权。

第三十三条 佃业双方发生纠纷时，应由田地所有地之乡镇公所农会会同调解，如调解不成得请求区署或佃业仲裁组织处理之。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经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议决通过，由浙东行政公署公布施行。

（原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新浙东报》）

浙东区党委秘书处转发华中局来电

(一九四五年八月)

顷接华中局来电照转于后：

一、苏联参战，日本投降，沪宁杭三角地区群众均普遍发动，对国际与全国影响，及反内战均起极大作用。

二、各地党委及武工队，应即依照当地具体情形，在下列口号下，广泛发动群众。当地以群众起义方式夺取敌伪土顽武器，夺取据点，消灭伪军、忠救、国顽各种别动队，建立民主政权。大量武装民众，以达完成控制这些地区，以准备应付内战。

甲、欢迎新四军解放一切沦陷区。

乙、缴除敌伪武装，武装人民自己。

丙、摧毁敌伪一切政权，建立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权。

丁、没收敌军食粮与罪大恶极汉奸卖国贼资财，立即救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民，逮捕大汉奸卖国贼交人民公审，对一切反正自新的伪军保证其生命财产。

三、上海、杭州、南京在我军未到达前，即令以上述口号，首先在工作集中地广泛号召工人斗争，在敌投降与城市混乱，以便发动群众夺取伪军、伪警武装，武装工人自己，普遍广泛成立工人武装自卫队、纠察队。建立工会组织，摧毁敌伪政权，成立民主政权。立即没收大汉奸敌军粮食，救济工人、贫民，以工人地区为基础，继续向全区发展，为达此目的，浦东、浙东、江南部队，应派部分主力出发或隐蔽方式，迅速进入工作地区，作为组织领导发动斗争的核心。

四、对各阶层，可以用新四军代表和新四军新派市政府名义

与各界接洽,依靠工人与城市贫民基本群众的发动和基础,在彻底肃清敌伪建立民主政权,恢复民主秩序口号下,建立各阶层广泛的统一战线。

五、群众初期发动的阶段,必然会产生过左的倾向,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各地党与群众干部必须正确掌握政策,以免造成秩序混乱,侵害各抗日阶层人民,以免陷自己于孤立,以致失败。

六、上述各点由江苏、浙东、苏中立即转达有关地区,立即进行。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对敌伪军通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顷奉延安总部总司令朱电令：“延安总部命令：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部反正听候编遣，逾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敌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总司令朱德，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二十四时。”我浙东纵队司令部奉令，特向我浙东解放区附近各城镇驻守之敌军与伪军伪政权通牒如下：

（一）所有敌军于接到本通牒后，立即停止抵抗，并即派遣代表前来本军接洽投降事宜，解除全部武装，一切军用器具，不得破坏与损毁，留驻原地，听候接收。

（二）所有伪军伪政权于接到本通牒后，立即率部向本军反正，听候编遣。

（三）一切缴出武装之后敌军与率部反正后之伪军伪政权官兵人员，本军当依照优待敌军俘虏条例与优待反正伪军伪政权条

例，分别予以生命安全之保障与优待。

(四) 一切接到本通牒后之敌军与伪军伪政权如拒绝投降缴械与反正，本军决采取必要惩罚坚决予以消灭。

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 何克希
(原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新浙东报》)

关于日本投降形势下 我军事行动的电文(三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十六日)

一、注意侦察敌情动态

何、张并告张、丘、王：

甲、据方晓同志信称：慈敌于本日(14日)下午六时起大批向西撤退，迄今晨为止，尚有五、六百名离慈，步兵最多，亦有骑兵及卡车，均全付武装。

乙、慈城日撤退后原驻赭山之敌开始往慈城，共百余名，迄今晨未起赭山敌继续撤退说。

丙、慈城敌工队设施均未完全，迄今晨慈城伪方对于无条件投降事尚不知道。

丁、现驻慈城敌尚多，宪兵队等均未撤离。

上项各点确否请注意侦察。

谭刘 15日夜

二、全歼三北伪中警的战役部署

张、王、丘并与庙(?)王、罗、刘：

电悉。为造成将来反顽政治军事上优势，同意争取时间，解决三北伪中警，以使三北东西地区联成一片，但在组织此一战役时，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 首先动员三北党政军民，通过一切关系展开政治攻势，

造成伪方内部混乱、恐慌，促进反正，因此可首先延长限期反正，否则给予消灭。

(二) 组织进攻时，要则不打，一打必须把他们彻底歼灭，因此可首先选择周巷或庵东集中兵力，不可分散力量，以求各个击破达其投降之效，以提高我军政治威信。

(三) 为此，我们意见将一旅三、五二支队全部及必要时二旅一个团以及三北地武全部集合三北，由张冀〔翼〕翔统一指挥。二旅机炮连、四明地方武装由张副司令俊升统一指挥，围困与牵制余姚之敌，不向三北增援。

(四) 在开始攻击时姚城与百官派出有主力警戒与侦察。

(五) 你们注意及布置情况希随时见告。

谭何 16日夜

三、抗战胜利，积极准备收缴三北一带敌伪武装

张、王、丘、张、蔡：

中苏已订立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南京伪中警七师四千〔人〕向我反正，日皇已接受盟国投降条款，准备命令投降，据说半已奉命投我们，如何行动正请示中，但你们可积极准备行动，收缴三北一带敌伪武装，相机进入宁波。

据说听到日皇已自杀(华中意见另发)

电台即派人来修

警大可到余上临山归张副司令指挥

谭何 16日晚19时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浙东区党委关于敌寇投降敌后 形势与今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

(一) 敌寇投降的原因

1. 苏英美三国会议圆满结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国的团结。日寇企图拖延战争的时间,挑拨同盟国团结,等待时机,以求生存的阴谋已经失败。

2. 日寇对国民党的诱降反共,由于其本身失败,英美对国民党的援助,人民的反对,以及国民党无把握发动反共内战,日寇的反共计划看看失败,因此挑拨国内团结的阴谋亦未全部实现。

3. 由于美机大举轰炸日本本土,国内损失惨重,人民厌战,反战情绪高涨,日寇愈打愈弱,困难日增,胜利信心完全丧失。

4. 苏联对日宣战,迅速攻入伪满,是迫使日寇迅速投降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二) 投降后可能发生的影响

1. 全世界法西斯堡垒已最后肃清,法西斯残余分子仍要结合各种反动势力继续活动,但今后只能隐蔽的在地下活动。

2. 伪方失掉依靠,只有反正、投降两条路,现在正动摇于国顽与我们之间。同时敌占区经济发生困难,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暂时呈现纷乱。

3. 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现在必然要配合国际帝国主义集中全力,积极向我争夺抗战果实。

4. 全世界全中国人民为民主斗争的胜利信心空前提高,人民武装力量要迅速扩大与发展,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也要空前

高涨。

(三) 发展趋势与前途

1. 全世界正以更快的速度向民主团结的道路前进：

① 全世界人民的公敌法西斯已被打倒，人民已经减除了一重最重的压迫。

② 苏美英的团结基本上是不会分裂的。由于苏联力量的强盛，英美人民对苏联的同情，全世界人民都反对反苏战争，以及苏联党领导的正确，苏美英的团结仍能保持与巩固。

2. 远东的民主势力要迅速增长，今天我党已与苏联红军蒙古军队联成一片，占有半个中国的地位，敌后解放区我军在解决日寇武装后，力量也要大大增加。各弱小民族如朝鲜、缅甸……等都将获得解放，沉默的远东将跟着民主的欧洲前进。

3. 今后中国一定要实行民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我军力量的壮大，全国人民众心所向，国民党反动派虽欲倒退阻止进步也不可能，尤其是中国的解放区，除本身打成一片外，还要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

4. 浙东金萧地区由于根据地建设的时期太短，军事力量不够控制全面，而且处于顽我斗争的前哨阵地，与浙西联系还不够顺畅，不能不要有短时期艰苦与困难。但我们依靠广大人民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我各个地区的武装发展与存在，浙西我军随时随地给我支援，反动派浙西失败，信心与力量均遭重大损失，因此我们能胜利的坚持斗争，克服一切暂时的困难，而取得部分力量的发展。

5. 可能产生三个前途：

① 由于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因此中国人民获得胜利。

② 自己在努力抗战，果实反为反动派获得，中国人民就要继续受反动派专制统治的压迫。

③ 反动派与我们势均力敌，斗争就要尖锐而长期，但胜负总要分明，以今天条件来看，以第一个前途为大。

(四) 目前形势的特点

1. 敌伪武器尚未完全解除,仍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进攻来完成这一任务,即使在敌伪武装解除后,法西斯残余势力还勾结反动势力,企图死灰复燃。

2. 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正乘机大肆活动,企图同我争夺胜利果实。

(五) 今后任务

1. 方针:解除敌伪武装,迅速发展与扩大武装力量,继续团结民主势力,肃清法西斯残余,打击反动派,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权。

2. 工作原则:

① 以先解决伪军为主,因为伪军战斗力量薄弱,情绪动摇,容易取得胜利。

② 解决敌伪军,应找取敌伪军最薄弱,我们本身力量最有把握的一环解决之,从而影响与动摇敌伪其他据点。

③ 要认识占有地区为次,占有力量为主。收缴敌伪军武装是主要,因为只有开展武装力量才能巩固与扩大地区。

3. 工作方法:

① 加强对敌伪顽,人民,民兵的宣传工作。

② 正式的通谍(向我们主要的打击对象)并与敌伪进行具体谈判,促使敌伪向我投诚反正。

③ 立即动员民兵自卫队,暂时脱离生产,配合地方主力,包围封锁敌伪据点,展开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及解决与消灭之。

④ 通过现有投诚我军的日本朝鲜士兵去进行敌军工作,并要他们教育部队全体同志学习日语口号。

⑤ 向敌伪军普遍散发归来证。

⑥ 优待敌伪军,严禁杀害或侮辱。成立专门编写、管理编审教育敌伪军俘虏的机构,并及时利用新来敌伪军去进行对敌工作。

⑦ 普遍彻底破坏敌交通线,阻止敌伪军集中逃跑。

4. 建立总的领导机构,成立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

5. 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倾向:

① 以为抗战已经彻底胜利,而降低自己的警惕,忽视反动的力量与阴谋的极端乐观倾向。

② 以为浙东浙西联系还未畅通,浙东局面还未完全打开,敌寇失败,反动军队就要深入,我们要遇到严重困难,而忽视我们现有力量与有利条件的悲观害怕的错误感想观念。

③ 过低估计敌人的抵抗力,以现在军事上轻进〔敌〕冒进的冲锋主义;但同时亦应注意把敌人估计太高的畏惧心理。

④ 不了解今天一天的工作是平时十天数十天工作一样重要,是决定今后抗战果实落于谁手的决定性工作,不认识抓紧时机的重要性与突击工作。

(六) 我们的困难与有利条件

(一) 困难:

1. 对于敌寇突然投降,过去思想上准备不够,因此影响目前工作与物质上的准备不充分,一切都临时做起。

2. 部队太少,战斗力不强,不能解决多数敌人。

3. 过去敌伪军工作做得差,影响今天不能获得很大成果。

4. 浙东局面还未打开,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仍存在着一些困难,人民对我展开斗争的信心不够高。

5. 此地处于顽我斗争的前哨阵地。

(二) 有利条件:

1. 大部分敌军在我根据地周围,有利于我们就近解决或打击。

2. 大部分人民均有了组织,尤其是数千民兵,可以配合我军作战。

3. 反动派比我们还要做得差,并且浙西失败损失很大,要调大军来是困难的。

4. 一般我们日鲜士兵可以帮助我们做瓦解敌军工作。

5. 苏联外蒙古是世界民主势力的增长,有助于国内的团结。

浙东区党委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谭启龙、何克希为浙东游击纵队 北撤致知名人士告别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

×××先生：

我们告别了！我们居于斯、衣于斯、食于斯已经将近四年，一旦分袂，诚不胜眷念留恋之感！先生磊落，胸怀旷达风度，爱国热忱，直言谏论，将于〔与〕东海烟云四明风月，为我们永志不忘；

我们四年前挺进浙东，与宁绍健儿驰聘于钱江南北、金萧两岸，今日委曲求全，义让浙东，是为了贯彻和平。一来一往，决非为了一党一派少数人之私利，莫不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前提。今后无论江南漠北、海角天涯，我们仍将一本此旨，在本党中央领导之下，在中国人民监督帮助之下，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真能获得幸福、彻底解放奋斗到底！一息尚存，决不稍懈。

我们告别了！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大地上开遍民主自由的鲜花的时节，我们能够握手言欢，长歌痛饮。我们走后，在此间尚有少数留守人员，以王剑鸣^①为代表，办理善后，请先生多于〔予〕关照协助。对一切抗日军人家属及荣誉军人，尤盼饮水思源，予以优待，以慰抗日先烈们在天之灵！

我们限于时境，不克一一道别，行矣先生！四方多难，国步维艰，敬请为国珍重，努力加餐！

何克希
谭启龙 九月 日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① 王剑鸣不久亦随军北撤，区党委改派朱洪山、黄明为新四军浙东留守处正副主任。

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们：

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

自从三十年春宁绍弃守，敌伪猖獗，我军转战来浙四年多来，孤悬敌后，艰苦奋斗，未尝一日稍懈。自日寇投降后，政府当局对于受降地区的不公平待遇，各界人士与本军指战员，表示非常愤慨。但我们本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对目前时局宣言的精神，一再竭力说服自己的指战员，奉令退让，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冲突。现在国民党军队已进驻宁波、绍兴、余姚各城市，虽然敌人尚未缴下武器，而“肃奸”、“剿匪”之声已甚嚣尘上，各界人士，忧心如焚，群情惶恐，奔走相告，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为避免内战，力求全国和平建国的新时期早日到来，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与让步，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

父老们！兄弟姐妹们！八年抗战，我们中国人民的牺牲是空前巨大的，现在抗战胜利结束，全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人民实在不能再遭受战祸了，中国的内战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因此，虽然浙东解放区是我们与大家四年来共同流血流汗艰苦从敌伪手中夺回来建设起来的，我们对这块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无限的热爱，对于浙东的父老兄弟姐妹具有真正骨肉之情。我们实在不愿离开你们，任何人也没有理由要我们离开，只是为了委曲求全，相忍为国，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才不惜这样决定。我浙东

新四军与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中共中央及本军军部这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完全拥护,并已决定即日坚决执行从浙东撤退的命令。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对于浙东解放区的地方治安与行政管理,我们已派人去请浙东国民党军政当局迅速前来接收。我们很知道,我们走后,各位的处境将有很大的变动。这几天我们行军所经各地,许多父老姊妹与我们同志谈话时,大家不禁潸然泪下,当各位知道我们决定全部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我们是能够想象的。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携手抗战,互相依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此情此景,是忘不了的。这四年中,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所给我们的许多帮助与教育,我们更深深铭感,没世不忘。今天我们只有要求各位冷静下来,压下你们的感情,来理智地认识你们今天新的处境,大家多想办法,来保护人民自己的利益。虽然以后的政府与军队,其作风与我们有所不同,但只要你们大家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那末我们在此时的一些进步设施,你们是能够继续做下去的。关于军队纪律的严明,官兵关系的平等,军民合作的融洽,民主精神的发扬,政府工作的廉洁,社会教育的推进,人民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保障,以及发展农工业生产救灾备荒,保障自由贸易,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这些都不是共产党一党一派的私事,而是有利各阶层人民的,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由之途,我们希望各界同胞及政府当局仍本精诚团结互助互让精神,一致继续贯彻。其中一部分你们应大胆劝导当局加以采纳维持,一部分是可以靠了你们自己的力量来继续进行的。现在毛主席正在重庆谈判,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的中国民主同盟、实业家、文化界、妇女界、青年学生,都在积极起来说话了。经过四年解放区民主生活锻炼的浙东人民,我们深望,在我们走后,你们能继续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加强自己的各种组织与团结,争取浙东的政治逐渐走向开明。这是我们对各界的期望,也是我们对来接收防区的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和期望。

回忆四年来,我们虽然为抗战为地方尽了自己主观上最大的努力,但由于对敌战争频繁,环境紧张多变,政府不能体谅,使我们许多想做的事情不能完全做好,特别是对地方福利建设的事业做得更少。我们的干部,都很年青,热情感人,经验不足,照顾各阶层要求有所不周,许多工作未能尽满人意。比如,减租减息,有些地方减得太多,有些地方则仍然明减暗不减;在惩办汉奸工作中,有些地方有乱抓人乱杀人的毛病,有些地方又对坏人太宽容了……这一切,以后只有靠各位大家团结,互相商量,互相让步,大家检讨改正,切莫发生成见仇恨,使坏人可以从中挑拨利用。当此离别前后,四年来我们在浙东一切活动,历历在目,虽不无建树,但缺点亦实不少,内心深感不安,现在只有在今后新的岗位上,更努力、更负责、更虚心的为国家为人民继续奋斗,来报答你们四年养育之恩,来满足你们对我们深厚的期望与关心。

军令倥偬,我们还有不少伤病员同志与残废荣誉军人不能随军撤退,分布在各地,同时还有少数人不及集中,或行军掉队的,拜托各位父老兄弟姐妹给予帮助关怀,保障他们的安全与生活。此外,我们的指战员与工作人员在浙东的家属,以及其他抗日军人家属,有许多都是生活困难的,他们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为了国家与人民的事业,而背井离乡,对他们的生活及安全,亦恳请大家继续多多照顾。

亲爱的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四年来同生共死的朋友们!我们要握手分别了。我们深知,我们的路途是艰辛的,我们走后你们的处境也是艰辛的,我们的双眼已经湿润了。我们巴望我们的退让能够换得全国的和平,能够减少人民当前的损害,我们将能在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中,再回来与各位畅谈衷情。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与环境许可,万望不要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你们的近况,因为我们每个指战员与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关怀着你们。

祝福你们的康宁！

祝福民主的新浙东、新中国早日降临！

中国共产党浙东区党委书记 谭启龙

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 何克希

副司令 张俊升

张翼翔

政治委员 谭启龙

政治部主任 张文碧

浙东行政公署主任 连柏生

副主任 吴山民

王耀中

率全体党员、指战员与工作人员同启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新浙东报》终刊号）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四年战绩

抗战已胜利结束，浙东新四军对敌伪之作战基本上告一结束。兹就本社（按：指新华社浙东分社）不完全的材料，将四年来浙东新四军之战绩先行简报如下：

从一九四一年五月本军前身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由浦东渡海来浙东到今年八月底为止，大小战斗六百四十三次，克复县城南汇、上虞两座，攻克梁弄、观海卫、周巷、庵东、鄞江桥、大团、新场等大小据点一百十余个，解放同胞四百万（四明二百万^①、浦东一百万、金萧一百万）；毙伤敌官兵六百一十名，俘敌顾问、军曹以下二十一名；毙伤伪旅附、团长以下官兵三千〇六十二名，俘伪团长、支队长以下五千五百〇四人；缴获迫击炮五门，曲射炮四门半，手炮一门，土炮二十九门，重机二十五挺，轻机一百七十六挺，手提司十五支，掷弹筒二十五只，枪榴弹筒二十八只，冲锋式轻机一挺，步马枪六千六百三十五支，短枪一百七十四支，机步子弹三十八万四千五百九十九发，手榴弹二千六百十枚，无线电六架，战马十三匹，千磅炸弹五十枚，刺刀二百九十把，其他军用品物资无计。

我方光荣牺牲干部二百余名，其中团级以上的有陈洪（四明地委书记兼南山自卫总队政委）、曾平（浦东支队政治部主任）、邱子华（政治部锄奸科长）等三名；营级的有周振庭、蓝碧轩、陈清、张世万、姜文光、陈洪才、朱学勉、陈体康^②、卢宗渭、陈同志（以上均系营长、营附）、余旭（作战参谋）、郑永发、陈行知、雷泽、戈阳、徐明（以上均教导员）、陈一竹（军需主任）、陈龙（特派员）等十八人；连

① 这时的四明地区包括三北在内。

② 陈体康系陈铁康之误。

级的有张文荣、孙细明、董明、观杰、王志祥、张强、贾同志、周德禄、徐真民、黄强、陶少卿、程同志、孙宜奎(以上均连长连附)、成君宜、张崇逸、毛仲青、俞菊生、肖张、柳剑青、凌汉祺、王春松、钟璜、洪珠、赵树平(屏)、黄志祥、周乃德、周伯平、周若萍、江浩、朱美郎、沈肇锋(以上均系指导员副指导员)、杨奚(政工组长)、金关壁、司马政(政工队员)、李克福、王志清、童坤、钱俊、张震、朱纲、朱亮、张宝德、庄平、倪德康、朱炳南、陈雄(以上均系连长连附)、康竹道(参谋)、黄峰、陈秀、张正贤、陈大江、卫一民(以上均系政指)、王平(报务主任)、马步方(副官)等五十四名。光荣牺牲战士七百八十八名,光荣负伤干部二百九十四人,战士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失踪指战员三百七十九名。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新浙东报》终刊号)

杨思一日记(节录)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一九四三年

〔1943〕年十二月五日，晴。宿陈家岩

何[克希]提出叫我与蔡[群帆]同志率六中赴诸暨，会合小三八及义乌部队，来会稽区活动，策应主力第二次的反顽战争，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

下午漫谈具体反顽军政对策。

晚间商讨南进具体问题。

十二月六日，晴，宿原地

晚间谭[启龙]作会稽工作指示并饯行。

(一) 浙东工作的长期艰苦性：

(1) 浙东地区对反动派的重要性与反动派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较强。(2) 基本上长江南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势力范围。(3) 我们较孤立(离十六旅与一师一隔江一隔海)。(4) 十年来国民党的破坏。(5) 敌控制不强。(6) 接近大后方。

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办法克服的，因为：(1) 国民党的力量与威信已大大削弱了。(2) 是敌后，敌不允许顽有过大的兵力深入。(3) 我党的政治军事的威信空前提高了。(4) 党的力量已经过锻炼，不易摧毁。(5) 国际国内形势有利。

(二) 全国形势可能好转，但国民党的局部进攻不会停止。

(三) 到会稽去的意义：(1) 从顽侧后组织力量与主力作战略战术上的配合。(2) 广德失陷后十六旅已到太湖南长兴、吴兴找

我，我向西出发，有战略配合的意义。(3) 防止与避免顽敌对我之各个击破。

(四) 此时到会稽去的有利条件：(1) 我三支过去的影 响。(2) 中上层分子的同情拥护。(3) 顽注目于四明。(4) 有发展对象。(5) 敌据点多。

(五) 到会稽去的任务：(1) 创立金萧路两侧的游击根据地，金华会稽两山脉的战略支点。(2) 配合主力的反顽。(3) 发展自己的力量。

(六) 发展方向：(1) 依靠诸北与大东向北向东发展。(2) 在诸义交界处建立立足点。(3) 向路西发展。

局面打开后，(1) 顽可能先会稽，但果如此，则战略配合作用已取得，我应准备力量击破之。(2) 可能是顽仍以四明为中心，则会稽应积极发展。(3) 可能是不取积极进攻政策，仍限制我发展，则我仍须积极求得发展。

(七) 方式方法：(1) 要长期打算，不仅是配合主力反顽。(2) 要注意统战政策，打击最坏的，要避免中上层对我反感。(3) 群众工作开始时要采取分散隐蔽方式。(4) 经济不要勉强摊派乱搞，要使群众自愿供给。(5) 注意铁路线上的伪军伪组织工作。

(八) 领导问题：(1) 暂时金属会稽不建立党政军民的统一机构。(2) 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3) 义乌仍须留一武装坚持。[诸暨]赵[汉波]可仍挂大队长名义。

十二月七日，晴，宿备龙〔佩弄〕岗

上午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下午得情报：[余]姚到梁弄西岭半坑，奉化敌到雪里两岙[薛家岙、李家岙]。自卫战之后接着就是反“扫荡”，这好象成为必然的规律似的。

四时许出发，他们到南黄、菱湖，我们是开始第二次向南进。

备龙〔佩弄〕岗是不满十家的山村，但两次南进都从此出发，因为也就成为富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了。

十二月十二日，晴，宿杨芝山头

[钱]之桢、[何]文隆等来谈。朱[学勉]、马[青]等也来会合。下午诸负责同志先赴杨芝山头。小三八整队欢迎我们，利用晚饭前半小时时间，与朱、马等商讨区党委指示。

晚间与马、朱等商讨经济、情报、弹药等具体问题。

十二月十五日，晴，宿白枫岭[脚]

原拟到大坂与义乌部队会合的，但到白枫岭脚，义乌部队已前来欢迎，会合后，全体指战员欢愉兴奋之情，难以形容。

十二月十八日，晴，宿大坂

去电谭、何，告诉他们彭[林]部情形。郑[嘉治]、陈[雨笠]到来，举行军政扩大会。

十二月十九日，晴，宿大坂

上午继续举行扩大会。本拟下午举行联欢大会，因吴山民先生来停开。为争取吴，仍用会议形式交换关于部队集结与集结后之任务方针与发展方向。吴全部同意我等意见。

十二月二十日，晴，宿大坂

上午八时起至下午六时止，集合排以上干部作政治报告。

中途吴来参加，他申述二点：第一无论工作学习要站稳为大众为人类的观点与立场；第二要在工作中学习。

晚间，我邀吴作个别谈话，征求他对党对当地干部的意见，谈得还爽快。

晚接得情报，苏溪开到敌兵二大队，明晨将来九都坑“扫荡”。我们准备派一连打埋伏，余于明晨三时出发移王家店。

十二月二十一日，晴，宿王家店

晚间召开联欢大会，情绪甚热烈。

吴联系日期数字说明今天的意义与部队的光明前途。

十二月二十八日，宿苦竹溪

晨二时出发，向挺进[第三纵队]的后方进军，原想作拂晓进攻，但未及目的地天已大亮了，至东头遇顽排哨，我部只发了一枪，

打毁了顽机枪弹盒，俘二人伤一人，缴获机枪一，步枪四。至十时顽溃退，我进驻苦竹溪。午后一大也来会合，知一大围攻郑坞坑袁家岭敌，俘方纵队长、大队长以下廿余人，缴获步枪九，表廿余只，在缴获的证件中知方镇平系顽军八十八军团长，也担任伪忠顺部三师师长，在这里也证明顽伪确是脉脉相通的。

电谭、何报捷。

一九四四年

一月七日，晴，宿小朱

派朱大队长前去出席越山区行政会议，一面报告我军立场、任务、态度及坚持会稽山区斗争的决心，一面向大会提出二百石军粮之要求，结果通过筹二万五千斤。

给谭、何电告知挺进及蔡廉部动态。接谭、何电同意释放方镇平，并谓我主力已宣布接受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番号，叫我们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或金萧人民抗日自卫支队二者中择一应用。

一月八日，晴，宿小朱

上午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我作会稽山区新形势策略及任务的报告。

下午开军人大会，一面庆祝主力接受新四军番号及我部改用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新番号。

晚间与崔[洪生]同志及东阳王[力群]同志商讨解决该处土顽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阴晴，宿上王

到王城午膳，捉住挺五第一支队的军需。

电台联络到了，知主力已到双江溪，并叫我们到赵湖会合，全队甚为兴奋。

当我队到赵湖时，三支已先到该处，因事前未曾派人通知，几乎发生误会。与三支会合后同去双江溪，再与谭、何会合。

主力转移至河西后,搞到大批物资,三万多发子弹。
晚膳时谭、何告诉我们整个行动方针及作战计划。

一月二十九日,大雪,宿十五岙

晨得通报,昨晚被敌占领各据点,已全部为我夺回。

我为集中力量,避免顽突破阵地,主动移朱[紫]龙庙之线。

我队一大二中与五支一个中队接战于芑湖,稍一接触,我即主动转移。

下午谭、何召集各支队首长会议,我为避免被动,保持主动地位,决分两单位高度流动。会议将结束,得报告说89团从金岙转向龙坑,我决派三、五两支出击。

一月三十一日,阴雨,宿史家

部队实行彻底轻装,担子减少,私人用品规定数量,政治处工作同志及政工队员全体出发检查,从此不但部队行动轻快,群众纪律也将大为提高。

下午谭、何召集三支及金萧支队干部会议,决定将金萧支队编为四个连,并决定蔡协助司令部参谋工作,我协助政治工作,支队部则由钟[发宗]多负责。

晚间,召集大队干部,传达部队缩编意义及干部调动计划。

二月十日,晴,整夜的行军,休息于桃花岭下

据确息田顽率部合突击营一营宿前方,准备向我进攻。我为争取主动,决于今夜出击。

三时晚膳四时出发,经过三天的休息,全队情绪甚高,士气甚旺。

二月十一日,晴,宿十五岙

晨二时开始接触,因系夜间,双方无进退。拂晓我加紧攻击,[重]要阵地全被占领,但顽据民房顽抗,我无法逼近。且突击营及张部继续向田增援,估计一时不能解决战斗,久持可能造成被动,故决转移阵地,再行找取机会与之决战。此役顽我伤亡各约百人。

约十时许我部开始后撤，至横溪午膳休息，晚饭后移动到十五番。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又经过半夜半天的战斗，相当疲劳。

这两次战斗，是对最近未来期间的斗争有相当决定性的战斗，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同时撤退时略带被迫性，将使我部增添一些新的困难，将使战争更确定的走入长期艰苦的道路。

二月十二日，雨，宿施家

上午举行区党委会议，各支队首长参加，估计此后斗争形势并确定今后斗争策略及领导机构的调整与部队部署。

下午突击营向我进攻，我派三支掩护退却，接火四小时，双方死伤各十余人。

当我部与突击营接火时，陆埠伪军也向我发枪声援顽军。

傍晚到达里外岗山顶烧晚饭休息。晚饭后，我赴金萧支队传达新任务。

二月十三日，晴，宿芝林，后移宿里大香圆觉寺

金萧支队南进。

[叶]瑞康等返嵊西。

白天检讨前方战斗，我因与瑞康等谈问题，未参加。晚间由何司令作总结。

二月十七日，雨，宿五磊寺

晨参加区党委会议，根据华中局及军部指示，讨论目前浙东内战形势及今后行动方针及党务行政宣教群众工作诸问题。

三支四、五中与林[达]政委归队，知他们曾几次与顽遭遇，三支伤亡颇重，林鼻上受微伤。

二月十八日，晴，于原地

根据新的分散游击方针，作新的部署，决定我与蔡、钟率金萧到绍[诸]北。

二月十九日，晴，于苏塘岗

晨，最后确定了向西北发展的方针，并将主力与主要干部按照四个战略单位来分配。

午后二时与谭一同向南，由教导队派一个排护送。

三月十七日，微雨，于墙头

举行第一次地委会议，朱[朱学勉]参加，讨论了粮食经济。

三月二十三日，晴，于大坂

上午独大来此会合，大家都很高兴。

下午召开联欢大会，会后接着聚餐。

三月三十日，晴，于金村

晨六时，正[在齐村]演习紧急集合，浙保来袭。

为了贯彻原有计划，主力决于今夜返诸北，派小三八去小东顽敌后方游击。

下午六时半出发，直至次晨七时许到达宿营地。

四月一日，晴，于杨芝山头

下午开地委会议决定新阶段的工作方针，以巩固为重。

晚间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

四月二日，晴，于竹月湖

晨九时，部队开赴江藻参加诸东北各界欢迎义乌独立大队脱离反动领导取得抗战自由大会。

四月七日，雨，于远蓬山

晨一时三刻浙保联合蔡伪四团与特务营(据老百姓说，城内伪军也出动三百人前来配合)前来袭击。我因情况不明，撤出大宣，伪即纵火焚烧大宣、墙头、石家弄等村子。我与蔡决定集合地点后，即与一大二中先来金村，午饭后转移至张家坞，不料该村住有县府税收人员六人，有手枪二支，见我队到村即开枪射击，我包围搜索，结果俘获三人，缴获手枪二支。因村子已暴露，我们又转移至一小村庄休息。适进村，蔡率一大三中独大三中至，于是会合后又移至桥里烧中饭，待至傍晚集合向全队说明战斗详情后即出发。正出发时，钟派人由赵家出发前来联络，我复条，如能南来，则来此会合，否则坚持在原地游击，顺便收容失散人员，继续了解情况，并收容被难后无家可归之青年壮丁。

四月十二日，雨，于陈宅

上午[在楼下张]召开政工会议，总结同志们的汇报，现在队内比较严重的倾向，有下述几点：由于几次被动战斗的结果，同志们有些怕打，怕跑路，怕困难，至于应该深入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打”。午时会议尚未结束，本拟午饭后再開，但正散会，浙保又来袭击，仓促撤退。为了便于休整部队，星夜通过封锁线。

部队的确在进步，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也不曾休息，但都没有讲一句鬼话。

四月十三日，晴，于何四路

上午休息，下午三时出发，本拟移至石明塘，旋中午接得陈主任等来信，叫我们改驻何四路，李[一群]大队长率三、六两中，喻[更生]大队副率二中都将在此会合。

四月十八日，晴，于五坪山

上午举行军人大会，作三次被动战斗的检讨，并进行分散游击的动员。

四月二十日，晴，于鲤鱼山

上午与地委诸同志商讨分散游击的具体部署。晚间召集大队以上干部作重新部署。最后决定二大和独大暂不改变建制，二大去诸义东地区，独大留义西与八大坚持金义浦地区的斗争。

五月三日，晴，于桐家坞

敌十余至下岭脚掳掠，我如无其它任务，这该又是我们极好的打击机会。下午谣传下王[汪]到部队，我一面派侦察员前去侦察，一面托保长派人前去打听。

夜十二时，钟率独大带电台前来会合，相见之下，不胜欣慰。

五月二十七日，雨，于××

七时许转移至墨城湖半山，到达目的地刚刚集合部队，即接得地方同志的飞报，说是麻车角有情况，麻车角离半山不过二里路。我为避免被动，同时情况又不完全了解，故拟向西转移。刚出发，前卫发现敌人[蔡伪]向我方向前进，我即回转抢占墨城后面之制

高点。敌则占领庙西后之低山，我二中推进半山后面之次高山时，发现庙西敌人，即接火。我拟集中力量解决庙西敌人，故将二、三中全部集中，除二个班警戒高山外，余都隐蔽下山，拟到达一定目的地后，即发动冲锋。但不久敌陆续增援至百余人，解决不易，故又将冲锋部队撤回山上，旋见敌大队增援，我为集中力量固守阵地计，故决放弃次高点。敌活动甚为积极，见我撤退，疑已动摇，故猛烈冲锋追击，我因掩护部队力量薄弱，少数同志被敌追住，幸经战士们奋勇抵抗，得全部安全撤回，仅一、二同志受微伤。内一战士机警奋勇过人，将落在身边的重磅手榴弹迅速拾起还掷敌阵；另一战士用手榴弹炸死敌数人，自己被刺刀刺伤。当时二、三中退回至制高点后，敌继续组织冲锋，战斗激烈，形势紧张，我因弹药缺乏，不多打枪，待敌逼近，即用手榴弹阻击，我朱大队长、王[志清]中队副于敌火力最猛时，壮烈牺牲。战斗至晚，敌不支溃退。是役敌死伤连长以下百人左右，我也死四伤七。战斗是胜利了，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朱大队长之牺牲，为此种代价中之无法计量与补偿部分。我与学勉在革命事业中共患难已六七年，今突然永诀，痛惜万分。

黄昏敌退后，我也转移，因天黑路滑，行军甚难，十几里路直走到天明。

六月六日，雨，于燕窝

蔡[群帆]等在归途上遭遇前进指挥部派来蔡伪处联络的上校参议张铁汉[即张铁生]，当被我格毙三人[张铁生及卫士二人]俘获一人，并缴获快机木壳左轮各一，金镯一副，金表一只及其他用品甚多。

午后侦察班带来一浙保的情报员，了解情况后，托他带回给兰团长及唐词章的信释放了。

蔡原想率三中去祥路岭设伏，打击张铁生、楼允文等，但行军至火烧吴，遭遇何步耀之行动队，我牺牲一区队副，伤一战士，因目标暴露，只好折回。我率二中行至汤家店附近，闻东南方向有枪声，即派出侦察前去了解情况。

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约二小时，蔡等亦到。

六月十九日，晴，于翁家

上午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分散游击时期的工作，同时进[行]缩编部队的动员。会议直延至下午五时才结束。

九月十六日，晴，于门家坞

上午继续出席办事处行政扩大会议。

下午为了钟、彭即将赴三北，特地举行一次党的小组会议检讨同志关系。我觉得我自己在把握原则性这一点上，始终是非常不够的。

晚饭，为去三北的钟、彭及其他受训的同志话别聚餐。饭后召集去受训的同志向他们提出几点希望。

十一月十八日，楼家坞

昨晚与蔡、俞[慕耕]估计内战形势，可能趋向缓和，因此我们的行动方针应从争取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转变为巩固与充实，加强原有力量与地区。谈毕电告谭、何征求他们的意见。下午得谭、何来电同意我们意见，故我们决于明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同时部队在迎接钟、彭回来即回诸北活动。

十一月二十六日，晴，于×××

上午召开地委会议，听钟报告指挥部军政大会的经过与决议。下午，讨论了部队办事处最近的具体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晴，于×××

上午举行地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下午会议正式开始，先由钟传达军政会议决议。

晚，大会代表聚餐，[寿]文魁于聚餐时到。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六日，晴，于江下

接谭、何电，叫我随参加行政会议代表同去指挥部一行。为此决将地委扩大会议即日作最[后]总结，提早一天结束，将地方工作

的几个具体问题,交地委讨论决定。

一月二十一日,晴,于梁弄

会议开幕。上午举行仪式及连[柏生]的开幕词与何的演说。下午由各代表自由演说。大家对一个工人代表的演说,一致称好。晚上由连代表行委招待聚餐,饭后开晚会。

一月二十四日,晴,于梁弄

由谭报告三年来浙东党的斗争经过,目前形势及施政纲领,一般反应很好。

晚饭后召开支干会,检讨三天来工作及指出今后应注意之点。

一月三十日,雨,于梁弄

上午通过各项宣言。

下午进行行委与驻会参议员的选举。选举办法,由主席团提出名单作为介绍,再经各代表无记名票选。

一月三十一日,雨,于梁弄

上午举行闭幕式,下午检阅部队。各代表看了部队的庄严阵容,甚为兴奋。

晚召开四明、三北、金萧三地区工作同志的联欢座谈会,相互介绍群众斗争、政权工作具体例子。大家感到这样的会议教育的意义极大。

二月一日,雨,于梁弄

上午召开代表大会临时支委扩大会议,检讨与总结十天来工作,直至下午二时许才结束。本想与王[耀中]、刘[清扬]、罗[白桦]到谭处出席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因时过晚,索性待明天再去。浦东支队收容来的一位美国飞机师由三北自卫队护送来司令部。这美国人面部手部都被灼伤了,看去好象[很]疲劳的样子。

二月二日,晴,于梁弄

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方针,一致同意大规模的发展方针。

二月三日,雪,于梁弄

上午继续开区党委扩大会议,解决三北与金萧地区工作。下午,雨笠、[王]平夷、我、谭、何谈义西工作。

去电蔡、钟、彭,告诉我等归期,并叫他们通知李一群同志来支队部,以便随队来指挥部。

二月十六日,晴,于龙眼山脚

上午粟后同志来访。

午后,向各首长道别后即出发西返。

二月二十二日,晴,于洞桥头

中午各户请全队同志吃饭,我们再三谢绝,不获允许。大宣村民与部队,确实是血肉相连的。

晚,开地委会议,讨论区党委新的指示。决定[部队]于廿五日出发东去。

二月二十五日,晴,于金鸡坞

晨,东去部队出发,出发前,我做了队前讲话。午饭后,与八中及自卫队转移至×××。

二月二十六日,晴,于原地

午,房东请客。饭后召开诸暨中心县委第一次会议,布置今后工作。在总的发展方针下,以发展武装扩大解放区与开辟新地区,建立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为目前最中心的工作,至半夜才结束。

三月三日,雨,于溪华

开了一天的工委会议,传达了目前形势及中心任务后,即讨论各项具体工作,如部队合编、干部调整,确定打击对象等。

三月九日,晴,于溪口

上午整理敌伪工作材料报告区党委。

接马来信,浙保一部到漓渚,一部到江下,扬言将到诸北。

下午召开全队排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军事行政及政治工作的一月计划。

我指出队内外环境的四大特点,即(1)我们是处在新的发展形势面前;(2)我们是处在敌伪顽的夹巷里;(3)我们几个打惯游击的

单位新集结起来的部队；(4)我们有很多新的成分。我们的工作方针与具体任务及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应该依照此四大特点去布置与研究。

五月十三日，晴，于大宣

七时许，得谭电告，将于今天到大宣，并告知他们在新桥头缴获郑顽重机二，轻机四，步枪二十四，手提枪一，手枪二，俘八十余人，全军振奋。并即集合部队，去大宣欢迎。

晚，计划去路西部署及日期。

五月十九日，傍晚微雨，于大毛坞

上午与彭、寿[松涛]、陈[景明]等研究如何定期完成粮经与情报两大中心工作。为了加强领导与分明责任，分别[成立]了临时的粮经委员会与情报侦察机构。

五月二十日，雨，于石宣岭下

上午看《新浙东报》。下午接谭、蔡电及信，知他们与十一支队主力会合，完成迎接任务。会合前，曾与挺三一个大队激战于中埠，结果顽被我击溃，我伤亡十余人，毛指导员(仲清)阵亡。

派出两次侦察赴河上店了解情况。

五月二十四日，晚微雨，于乌岭脚

上午去司令部，与谭商讨今后工作方针，与金萧各县委领导范围的划分。回来时带来十几个工作干部，部分留队分配工作，部分送医院，部分送石宣岭下打埋伏。

六月七日，晴，于盛村

上午七时许开赴章村，特中与直属队由黄[磊]、丁[干成]率领与区署合并行动，我与彭率八中赴场口，到盛村知指挥部已移龙门，并接谭、张[翼翔]来电，谓顽可能向我们反攻，十一支队为解决浙西顽军，暂不南来，叫我们将野战医院搬移至诸北，以防万一，并通知我们不必去他处。我以既到盛村离龙门不过十里，故决继续前进，二时许到龙门。

晚与谭、张商讨工作。

六月十四日，晴，于乌石头

谭政委向金萧及三支排以上干部[作]总结及工作报告。

端午加肉半斤。

下午谭交给我们以新的任务为：坚持原地斗争；侦察了解沿江情况及继续筹措粮食，三支为策应五支解决田顽，于今晚东进。

六月三十日，晴，于××

下午先后接指挥部来电，浙西反顽战已胜利结束，十一支队已到临安，不久即将东来，叫我们西去迎接。旋又得报，谓三十三师两个团及浙保五团都为[我]击溃，我主力已追击至下岙，将向王城方向继续追击。

七月四日，晴，于廿八都

上午四时出发至下安。

为与张副司令等商讨行动具体步骤，决于晚饭后开赴廿八都会合。六时半出发，九时许到达目的地，弄好营房警戒之后，即去司令部。谭、何刚来电，谓顽虽被击溃，可能卷土重来，故我取稳重方针，主力暂退王城以北一线，三支一部及金萧支队，即去路西接应十一支队东渡。

七月六日，晴，于苦竹溪

上午与寿、叶、应[怀易]谈嵊西工作。下午四时半出发开赴苦竹溪。

晚，[向]谭、何提供意见，趁敌正在防御性撤退，同时我浙东、浙西主力先后击退顽之进攻，我应集中全力打开会稽局面，打通会稽四明联系。

八月十一日，晴，于盛兆坞、徐家坞

昨天接谭、何来电，谓苏联已对日本宣战，我想此后远东形势将跑步前进了。果然，今天又接新闻电讯谓日本已无条件向英、美、苏投降了，大家的情绪都有些激动。

傍晚，蔡率三支一大及开会受训人员、军区干部出发东返。

八月十四日，晴，于金鹤坞

上午召开部队与民兵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会议，作反攻动员。

昨天接谭、何来电，主力为配合浙西、苏南部队收复沪、宁，即将开赴海北沪杭线。今日下午接续电，除部队进发作更具体部署外，叫我与彭开赴四明坚持斗争，并领导地下党。

八月十六日，晴，于金鹤坞

接谭、何转来中央华中局指示，江浙党不作进占大城市计划，重心放在农村，积极作即将到来的自卫战争准备。

与马谈诸东山区工作。

九月十七日，晴，于东河

上午召集指导员会议，讨论如何作深入新形势新任务的教育动员、发展党、加强锄奸工作。

下午接谭、何来电，因顽大军逼境，叫我立即去指挥部商讨对应方针，我决即日出发东去。

九月二十三日，晴，于章镇

早饭后，与汪大铭同志赴司令部看谭、何，并参加区党委会议。中央命我立即集结力量与地方干部，转移至××[苏北]。

下午谈好了几个主要问题，即准备出发西返。

九月二十八日，晴，于苦竹溪

晨五时许，彭率队来上步溪与我们会合，但不见路西部队与小坚勇，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下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我们转移方针及如何向连队动员与进行精简轻装工作。

晚饭后刚想出发，寿、江[征帆]等率小坚勇及路西部队到达泄头，我到泄头去晤谈。

九月二十九日，晴，于王城

上午先与营以上干部商讨部队编制与干部配备问题。这一会议结束后，彭即与连以上干部作精简轻装动员，我与蒋忠同志谈坚持原地斗争工作，布置他们回原地分头继续坚持。

下午三时许作队前行军动员后出发，从此浙东与金萧地区斗争即转入新的阶段。

十月六日，晴，于船上

顽集结宁波百官部队于余姚，拟歼灭[我]于三北，我决于今日十二时上船。十时余到海边，船只食米都已筹集齐全，我安然上船。顽的围歼新计划又落空了。

十月十日，晴，于陶家角

继续出发，通过发生情况可能性最大的沪杭铁路，出发作了加强战斗准备与行军的队前讲话。下午五时许到朱泾浜，司令部与三支即在东泾浜宿营，我们宿陶家角及附近小村子。

此次执行转移任务，已渡过最困难的阶段，此后发生情况的可能将逐渐减少，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了顽方地区及重要的封锁线了。

十月十一日，上午晴，下午微雨，于蔡家巷

上午六时许集合，作了简单的人员武器及逃亡统计。我们这一支队，从金萧地区拉出时统计一千八百余人。路上逃亡144人，遣散及调回原地坚持斗争约计100人。此外，大部工作队员及全部女同志、病员坐船直到苏中，四中随张副司令行动，机二中队一个班与司令部部分工作同志先渡杭州湾时掉队等，现实到计一千三百十三人。步枪765条、轻机20挺、冲锋枪及汤姆机枪6挺。

十二时抵观音堂附近，因观音堂住不下，我们退回住蔡家巷。

十一月四日，晴，于东台

晨得参谋长通知，知何司令已于昨晚返部，拟于今晨召集各团主要负责同志传达军部指示。与何见面后，知军部已决定将江南部队，整编为几个纵[队]。浙东部队编成一个旅，与刘旅陶[廖]旅合编为第一纵队，由叶副司令任纵队司令，军部赖参谋长任政委，谭启龙任副政委兼主任。三旅由何任政委，张任旅长。彭决调刘旅任政委，并拟将我调去旅部工作。何与我等略谈片刻后，即率我们去见叶副司令，谈物资补给问题。

我参加了新四军

岩冈文雄

我于去年四月，随同自己所属的枪一一一五二部队从满洲到宁波。

在宁波，有时担任街市的警戒，有时下乡抢粮，有时出发扫荡，做了许多自以为应该做的事。后来，有一个时期，驻扎在镇海柴桥，构筑防御美军登陆的工事。今年四月上旬，到慈溪的汶溪，我们部队的番号就改作驰驱二三一零七部队，补充了许多兵员，每天依然忙碌着掘堑壕，不知道何日可以回去。

度着长期的军队生活，只见给养是一天比一天坏起来，所谓小菜，只是盐汤酱油上面浮几片菜叶子，豆酱汤也不大吃得到，配给品简直完全没有，生活是越过越坏，官长的压迫却更加凶暴了，动不动就是打、骂，简直比坐牢还难受，而且教官又告诉我们“必须准备死在这里”。我早就怀疑，这次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人？

最近我得到国内信息，我的父亲为了自己正当的要求和言论，被警察逮捕，以“触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法西斯军阀私刑虐杀了；我的母亲在美机空袭时炸死了，我的哥哥在南洋阵亡，弟弟不知下落。

因此我更加仇恨日本的军部，燃起了反抗的火焰，正在这时候，我知道了在新四军根据地中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所做的事业，决心要来参加。

五月二十六日得到了一个机会，我只说去与采伐队联络，骗出了步哨，背了枪，一口气向新四军所在的方向跑来。走了五六里

路,在一个小市镇上,向一家烟店里,打听这里有没有新四军,因为不懂言语,写了“新四军参加”五个字给老板看,他就叫我把衣服换过,正在换衣的时候,新四军的战士,拿了手枪跑来,嘴里说:“晓得、晓得,没有关系。”我就把枪和子弹交给他们,他们笑咪咪的说:“一道去吧。”我便被带到他们的宿营地,走来一个懂日本话的人,他说:“欢迎,欢迎,大概肚饿了吧?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好菜。”说着,就拿来很丰盛的菜肴。立刻有许多穿各种服装的战士跑来欢迎我,我简直有点木然了。我开始实际了解新四军,欢喜得连眼泪都留不住了,因为从此我可以继承父亲的遗志,为建设新日本而奋斗了。

后来,又走到一个村子里宿了一夜,第一件使我惊奇的事,是老百姓对新四军战士非常亲热,我亲眼看见一个老百姓和战士睡在一床,真使我十分感动。

第二天又出发赶路,带我的人一路照顾我,几次问我“辛苦了吧?休息休息”,一到老百姓家里,就弄茶和点心给我吃,见我流汗,就打面水叫我洗脸,大家都叫我“同志”,听了十分快乐。不久到达了目的地,在这儿,我见到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使我满心的感谢。

在这军队中,不管长官和兵士,穿的吃的都完全一样,没有打骂,大家跟弟兄一样亲爱团结,不到这里来,简直不能想象。晚饭又是许多酒菜,听了许多歌,还特别为我唱了一只日本歌,我记得似曾在什么地方听过它,为了对新四军战士表示感谢,我也唱了几首歌,最后我喊:“新四军万岁!新日本新中国万岁!”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到了司令部,科长亲自出来迎接我。不多一回,完全出于意外,一位从前在同一中队的栗花落君,同几位日本同志一同走进来迎接我,使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司令亲自对我致欢迎词,请我吃饭,真是光荣之至,于是我更加决心和新四军诸同志一起,为新日本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新浙东报》)

欢迎新同志岩冈文雄君

栗花落岩

二十九日早晨，听通讯员说，昨天晚上有一位日本兵到司令部来了，我们和司令部相去不远，决定吃过了午饭就去。

几个同志一经在路上走，一边想着你，是年青的，还是年长的？是兵士，还是下级军官！知道你是自觉来参加的，这对于我们同志是无上的光荣，是令人兴奋的。

刚刚见面，突然听到一声“喂，栗花落！”简直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你就是我从前同中队的岩冈君，刹那之间只有互相握紧的手和手，互相注视的眼和眼，兴奋得说不出话来，胸头一阵热潮，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原来是你！平安健好么？”这是第一句话。

以后，由我一一的替你介绍了一同来欢迎你的日本同志，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简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高兴过，从来没有这样的兴奋过。

我到新四军来已经八个月了，你说我“变了，简直嗅不出一点兵士气，而是一个战士了！”真不相信自己会变得这样快，过去在部队中受长官的虐待，畏缩得跟一只老鼠一样，但在这儿是没有阶级的，大家都是同志，亲爱和睦，自由地过着日子。

但是岩冈君，这一次，你下得好决心，你平安地来了，我衷心地向你致敬和祝福，我欢迎你。

你过去在满洲的兵营生活受过多少痛苦，到华中以来，几次参加战斗，遭受危险。近来为了日夜赶筑工事，过着牛马一样的奴隶生活，还要忍受打骂。但是在这中间，你明白了这次战争完

全是军部、财阀的野心，不是为国民大众的大东亚建设圣战，而且看出了自己的出路。

你的父亲是我们同志的先辈，被可恨的警宪的手虐杀了，他是被压迫国民大众而斗争的光荣牺牲者。你的母亲炸死在空袭中，你的弟妹不知下落，我们向你致唁，我们要帮你报仇。

你下了决心来参加我们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从今以后，我们叫你同志，我们是同心同德的，为了这次无意义的侵略战争而受苦的几千万同胞，为了事实上等于锁在牢狱的锁链中等死的可怜的兵士战友，为了东亚各民族的解放，我们的任务是艰重的。

我们要和国内的同志，同心协力打倒军部，呼吁立刻停战，使国民大众，早日觉悟，脱出军部的魔手，迈进到建设真正能够代表民意的新日本的道路中去。

我们的胜利已在眼前了。

岩冈君啊！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毅然和我们一同斗争，直到光明、幸福、和平的社会完全实现。

为了日本，为了中国，为了东亚全体被压迫大众，一同前进。

（原载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新浙东报》）

第三部分
回忆录



浦东部队渡海到浙东敌后 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

顾德欢 吕炳奎

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宁绍一线之后，浦东部队陆续渡过杭州湾，转战浙东敌后地区。一九四二年成立浙东区党委之后，浦东与整个淞沪地区的党组织就划归浙东领导，淞沪地委是浙东区党委领导下的四个地委之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渡海经过淞沪地区，浦东、浦西老区的人民，含泪送别自己的子弟兵。浦东与整个淞沪地区和浙东抗日根据地有着深厚的血肉联系。

一九三七年底，日军攻占上海、南京、杭州。上海郊区的浦东、浦西、浦南十来个县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仓皇撤走，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的大灾难，也加快了人民的觉悟。许多地区，群众自己出钱买枪，组织起来，抗日保家乡。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遗志，疯狂反共之后，上海郊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曾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未能取得胜利，至抗战开始时，党的组织几乎已全部破坏。但很多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如浦东的姜文光、姜文奎、周大根、吴建功等，青浦的顾复生、顾达真、黄琴芝等千方百计到上海找到了党的关系。他们和当时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就成了从事抗日斗争的骨干与领导者。恢复组织不久的江苏省委即抽调干部下乡工作，建立了党的浦东工作委员会和青浦工作委员会。有些地方的进步青年与民主人士，如嘉定的吕炳奎、昆山的陶一球、南汇的连柏生，组织了抗日武装，部队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吕炳奎、陶一球、连柏生都入了

党。抗战爆发时,各县都有一批知识青年(包括一些党员)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有的后来到了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有的学习后又回到家乡参加游击区工作。从上海下乡到郊区游击区工作的工人、店员、学生等有好几百人。上海党大量出版进步报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对郊区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促进作用。在日本侵略者逐步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时,许多挂着抗日招牌的游杂部队纷纷公开投敌,只有我党领导的几支人民武装,人民习惯称呼的连柏生部队、顾复生部队、吕炳奎部队、陶一球部队,始终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上海郊区人民抗日自卫的四面旗帜。

一九三九年夏,根据陈毅的指示,叶飞和何克希、吴琨等同志率领“江抗”军东进,直达上海近郊,在昆、嘉、青地区活动了大约两个月,与地方党、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土匪武装,给上海市区与郊区人民以极大鼓舞。这次江抗东进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打通了从苏南根据地(茅山地区),经“澄锡虞”、“苏常太”(“东路”)地区,直到上海近郊的联系,这种大胆阔步前进的战斗作风,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是我们后来开辟淀山湖地区,特别是敢于渡海转战浙东敌后的重要思想基础。

日本侵略者很快发现,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对它的最大威胁,是必须集中进攻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经常处于频繁的战斗之中,再加是平原水网地区,交通发达,斗争是很艰苦的。一九三八年底,南汇抗卫第二中队遭日军优势兵力进攻,在海滩激战终日,周秋萍与战士三十多人壮烈牺牲。一九三九年春,青浦三支队一中队一部遭日军许多小汽艇围攻,驻地四面是水,未能突围,中队长王正方和战士二十多人全部牺牲。敌人还时常残酷杀害我基本区群众,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对青东地区的大围剿、大屠杀,群众惨死者千人以上,民房被焚数千间。但许多基本区群众,在日军的大暴行面前,宁死不屈,誓死保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勇就义。

青东大屠杀之后,顾复生部队分散转移到东路根据地。吕炳奎部队已于一九三九年随江抗主力西行。上海党先后把嘉定、青浦与浦东的党组织移交给谭震林负责的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谭震林决定建立“淞沪中心县委”(先是“昆嘉青中心县委”),以便各地区直接联系,互相支援,有利于游击战争的灵活展开。根据东路领导的指示,中心县委以昆山东乡陶一球的基本区为立足点,依靠昆、嘉、青三县老区的基础,重建了一支主力游击队“昆青支队”,于一九四〇年秋,跨越吴淞江向南发展,经半年时间,从吴淞江至淀山湖北部,东南至青松交界的天马山、小昆山地区,西至苏嘉铁路附近,形成一个抗日游击区。在我军基本活动区,还建立了半政权性的办事处、地方武装、群众团体与党的组织,可以说是一小块游击根据地了。浦东部队曾一度渡过黄浦江,眼见打通浦东、浦西联系的任务即可完成。但一九四一年春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忠救军”从浙西分路向我东路根据地进攻,我昆青支队指挥员周达明率部在淀山湖边的谢石关村宿营时,突遭顽军优势兵力围攻,周达明与大多数指战员经过顽强战斗,英勇牺牲。顽军进攻兵力占绝对优势,东路领导决定昆青支队全部转移至苏常太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五月,新成立的江南区党委(谭震林为书记)决定把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把浙江的“海北五县”也划归路南特委领导。这样,沪宁铁路之南(故称路南特委),西至苏嘉铁路,东至上海近郊、浦东海边,以及沪杭铁路至杭州湾之间,这一大块地方建立了统一领导。当时只有浦东有武装,其他十多个县,只有党的秘密工作,或正处在从游击战争转入秘密工作的调整过程中,困难很多。特委工作的重点是抓浦东的武装斗争。自日军占领宁绍一线之后,浦东部队陆续转战到浙东敌后开辟工作,乃逐步以浙东工作为重点了。

浦东工作,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好的经验。一九三八年初就建立了党的浦东工委,陈静任书记,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一九

四〇年初,江苏省委派金子明接替陈静任浦委书记,坚决执行江苏省委与东路领导的指示,工作更顺利了。在浦委集体领导下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陈文祥为书记)、军事工作委员会(朱亚民为书记)、伪军工作委员会(朱人俊为书记),这个组织形式,有利于调动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浦东的知识分子干部多,中上层关系多,浦委完全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许多干部,在东路教导队学习后,回到或调到浦东工作。五支队在朱亚民、蔡群帆、张席珍等的领导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党的建设,积累了在敌人据点林立的平原地区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作战方法,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浦委把伪军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十三师五十团,在该团中上层争取了很多同情分子,在下层好几个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经常借口出发“剿匪”到乡间流动,以锻炼夜行军能力,在防区内把那些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当特务、汉奸的民族败类加以肃清,并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使干部和战士都有思想准备,在适当时候,能迅速拉出来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的事实证明,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领导的这项工作是完全成功的。这样,党在浦东就有了两支能够依靠与调动的武装力量。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军攻占宁波、余姚、绍兴一线,以巩固沪、杭、甬与舟山群岛这个重要侵略基地,是它准备发动更大军事冒险的一着棋子。浦委的同志很注意浙东形势的发展,对情况的了解也比较具体,这是因为他们与驻在浙东的宗德公署薛天白有统战关系,加之来往于杭州湾的商人多,所以消息很灵通。三北沦陷后,他们又派少数武装前往侦察,发现三北地区象所有敌人新占领地区一样,也处在一种混乱与空隙的状态。浦委认真研究了新的形势,根据上级党指示的精神,提出了一方面坚持浦东,进行反“清乡”斗争;一方面把浦东党能够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有准备地渡海到三北敌后,协同当地党组织,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谭震林完全支持这个方针,经常给予指示与关怀。从六月至九月,

浦东党的两支武装力量就分批到达浙东。原五支队的主力游击队，由蔡群帆、林有璋、张席珍等率领，在三北的较东边的地区活动；从五十团拉出的部队，由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负责，在较西边的地区活动，对外还是两支独立的部队。特委派军事部长吕炳奎于九月中旬到达浙东，在党内统一领导这两支部队。同年秋冬，在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紧张时刻，谭震林调东路特委委员王仲良来参加路南特委，并指定王常驻浙东工作。在新四军六师从东路根据地北移之前，谭震林又派机要员康志荣、台长王平到浙东建立电台，并通知成立浙东军分会，指定吕炳奎为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为委员，以进一步加强对浙东部队的领导。

浦东部队虽已称得上是一支主力游击队，但终究是在比较狭小地区土生土长的，一旦远离家乡，独立转战到浙东新区，人地生疏，渴望得到当地党组织的密切合作。但在皖南事变之后，华中局与浙江省委的联系还相当困难，因此一时不能经过上级党的介绍使双方取得正式联系。浙江党的基础是很好的，但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后，处境困难，对特务活动不得不提高警惕。浦东部队一到三北，坚决抗日，纪律严明，与其他杂色武装迥然不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它。而我们地方党的同志则不能不以某种疑虑的心情来观察它。除了由一些上层工作的党员在公开活动中与部队接触，进行了解外，还曾派党员设法“打入”这支部队进行“深入”考察。不久，双方终于互相取得了信任，此时真是烟消云散太阳红，大家是多么高兴。我们和宁绍地区党的负责人杨思一、王文祥，以及余姚、慈溪、镇海县的地方党取得了直接联系。地方党的同志，当然非常渴望能有一支党直接领导的主力游击队来支援他们，双方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浦东部队转战到浙东新区之后，所以能很快站住脚跟，没有浙江地方党的密切合作，是不可能的。

浙东军分会成立后，首先是加强部队的建设。在军分会的统一领导下，设立了五支队的工作委员会（蔡群帆为书记，林有璋、夏治行为委员）和“三纵”的工作委员会（王仲良为书记，朱人俊、方晓、

吴建功为委员),分别负责两支部队的经常工作。成立了教导队,统一培训两支部队的军政干部,有些干部按工作需要作了统一调配。上面谈到,浦东部队不少干部在东路教导队学习过,故教导队和整个部队的经常教育,基本上都是江抗与新四军六师的一套,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又有提高。在部队内部,全体指战员都知道,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不这样做,部队是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也不可能取得群众的拥护。在群众中,对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心里也是有所了解的,一支部队,终究和秘密党不同,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隐蔽党的领导。在此之前,淞沪地区的基本区群众,早就认定,顾复生部队、吕炳奎部队、连柏生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公开用新四军的番号,和不公开用新四军的番号,在当时的斗争条件下,还是大不一样的。在相公殿战斗之后,薛天白要我们去报告战绩,我们就要林有璋带了一些礼品去拜访他,薛很高兴,对林说,“五支队”太红了一些,我给你一个“三支队”的番号,当场就给了林一张三支队支队长的委任状,并要林有璋改名为林达。林回到三北后,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如朱祖燮等,就设宴祝贺。以后浙东人民总是把我们的部队称做“三五支队”,可能和此事有关。朱人俊负责的部队其中先到三北的一部曾接受薛天白第三大队的番号。后来这支部队又接受了苏鲁战区第三纵队的番号,朱人俊任司令。顾小汀的部队原也在浦东活动,顾对浦东我党的情况是有些了解的,到三北后对我们的态度仍较好。对各县的“国民兵团”等,我们也多做工作,尽量争取团结抗日。在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又有我军坚决抗日、纪律严明,保护人民利益的实际行动,三北地区较有声望的地方士绅对我态度都比较友好,部队主要领导人经常亲自和他们交谈,商讨团结抗日大计。

经过一年时间的共同努力,至一九四二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前后,三北地区,西起临山,东至蟹浦,沿海岸东西近二百里,南北数十里,初步形成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比起我们的干部和战士

所熟悉的浦东或昆嘉青老区来,是宽阔得多了。我们很重视扩大部队的活动地区,除三北外,“山南”与姚江两岸的某些地方我军都曾到过。我们的方针是:日本侵略者到达的一切地区,我军就要打到那里去,并向人民宣传抗战的道理,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并由地方党调派干部,建立了很多个县、区办事处,有一定的自卫武装,是半政权性的机构,既是部队的后勤部,又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活动中心。后来又设了一个总办事处。我们的主力游击队始终保持着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老传统,部队每到一处,就进行调查,开展群众工作。宁绍地区的党组织是有战斗力的,群众基础很好,他们有很多政治、文化工作干部,再加浦东部队的文化水平较高,故三北游击根据地内的政治、文化生活相当活跃。这一年三北敌后地区的斗争形势还比较好,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但我们都关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全国抗战的整个形势。皖南事变发生不久,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尚未过去,周达明部队在淀山湖边的惨痛遭遇记忆犹新。浙东远离苏南、苏中根据地,是一个突出孤立的小根据地。在姚江南面的四明山区,就有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形势的可能变化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无论是反抗日寇的侵略,还是对付反共顽固派的可能进攻,我们都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尽快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江南区党委、苏中区党委、谭震林同志与粟裕同志,多次给我们指示的核心问题。领导还向我们指出:必须坚持浦东斗争,加强整个淞沪地区与海北地区的工作,开展海上与海岛工作,使我军能在杭州湾两岸机动跳跃,互为依托,我们的回旋余地还大,不要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估计过高。开辟三北敌后抗日斗争第一年的基本情况,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大概就是这样。

一九四二年五月底,日军攻占金华、兰谿,继续西进。浙东军分会当机立断,立即抽调部队组成南进支队,由蔡群帆带领,六月初即从姚北出发,在诸暨北乡与杨思一会合,商定以枫桥为中心开展抗日斗争,部队活动地区,南北近百里,东西数十里,为创造会稽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一年浦东部队初到三北时,在相公殿伏击日军取胜,军威大震;这次南进支队初到会稽地区时,应地方人士的请求,全歼土匪徐文达部,为民除害,各界人士热烈拥护。看来,开辟新区,首战告捷,对迅速打开局面十分重要。

华中局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就曾准备派重要干部到浙东主持工作,加强领导。一九四二年春初,又专派谭启龙与吴仲超两同志到上海,由顾德欢、姜杰、吕炳奎三人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浙东的情况,由他们两人向华中局报告之后,再决定加强浙东工作的具体措施。随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于六月间在上海主持召集路南特委在沪成员顾德欢、姜杰、金子明(吕炳奎、王仲良已在浙东)开会,传达华中局指示,并决定暂由姜杰留沪,以浙东区党委特派员身份领导淞沪地区工作,顾、金均调浙东工作。浦委的一项紧急任务是组织船只与护送部队,和苏中地区配合,接运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领导干部,以及几百名各级党、政、军干部到浙东工作。同年七、八月间,正式成立浙东区党委与三北游击司令部,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全体干部和指战员,都能照顾大局,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定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大家深深懂得,如果不这样来加强浙东全党全军的统一领导,如果没有谭启龙、何克希等大批有经验的干部的到来,那末今后更重大、更艰巨的战斗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从此,浙东敌后地区的工作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华中局的关怀下,大家团结一致,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击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创立与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直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浙东四年

谭启龙

一、从皖南到上海组织闽浙 皖赣四省联络站

一九四〇年春,我从苏皖区党委调到皖南,担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过了一段时间,东南局曾想要我带一个电台到浙南去,同刘英一起进到龙跃那里,准备建立新的闽浙省委,由刘英负责,我做他的助手。后来由于那时浙江省委在金华的联络处已不存在,交通线被封锁,我没有去成。这年年底,也就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我患了病。这时,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正准备北撤,组织上要我转道上海去治病,不要跟随部队一起行动。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离开皖南,由南芜县委的李友白护送至芜湖,再经南京去上海。

皖南事变爆发时,我正在上海治病。不久曾山、饶漱石等一批批突围到了上海。大约在一月中旬,突围到上海的同志先后分三批由驻沪办事处护送去苏北,我于二十日左右离开上海,与我同一天走的有饶漱石和曾山。我们三个人去苏北途中,在苏中区党委停留了两天,然后到盐城。

大约二月三日或四日,刘少奇和陈毅找我谈话。这个谈话的中心内容,一方面是指出顽军反共已经达到高潮(指皖南事变),蒋介石还想把我们主力从江南赶到江北,再从苏北赶到黄河以北,有一个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另一个方面,日本侵略者想乘这个机会集中力量进行“扫荡”和“清乡”,部署对江南、包括苏北四分区和浦

东在内进行大规模“清乡”，估计我新四军在江南大规模武装坚持有困难，可能大部要北撤，在江南只能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还有一个情况，当时同东南几个省委的关系，由于新四军军部、东南局的电台和通讯设备都丢光了，所以华中局和这几个省委的联系都中断了。根据这个情况，他们和我说，华中局有一个设想，准备成立一个江南区党委，要我当书记，任务是以苏中为依托，向江南伸展。

一天，我正在苏中一师师部开完会，研究了组织区党委的事，突然刘少奇、陈毅发来电报，说华中局决定不成立区党委了，要我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一个闽浙皖赣联络站，任务是打通华中局与这四个省的党组织的联系。这个联络站有五个人，由我负责，其他四个是涂峰、周一光、戈冰，还有一个叫施琼，我当时名义为四省联络员，涂峰他们是政治交通员。

我们到上海后，同上海的江苏省委取得联系，我们的生活、住宿和看病，都是由江苏省委安排的。他们也经常来看我们，如王尧山、沙文汉，刘晓则较少出面。四省联络站成立之后，首先要取得与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联系，分两路出去，一路是涂峰从陆上去，一路是周一光从海上去。涂峰在温州和刘英联系上了。其次，到皖南去的是戈冰，他到了屯溪，没有联系上。同福建那里联系了一次。后来，福建省委曾镜冰曾派交通来浙东，由我们的电台把他们的报告转送给华中局，又将华中局对他们的指示由交通带回去。

二、从浦东到三北建立 中共浙东区党委

大约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江南天气已很热了，华中局打电报给上海江苏省委转交给我，要我到苏南去找谭震林。那时他们正活动在无锡周围的澄、锡、虞地区，我爱人的家乡在无锡，我就利用这个关系，与严永洁和涂峰三个人到谭震林那里去接受新

任务。我们先住在严家。刚好谭震林和江渭清他们的司令部驻在离严家十里路的寨门。隔了一天，我就去寨门会见了谭震林。

我见到谭震林后，他对我讲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谭震林对我讲的主要内容，一个是蒋介石搞的反共高潮还未过去，顽军还在苏南加紧部署，日伪在苏南的“清乡”活动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六师的主力大部分有离开苏南到江北去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日本侵略军已经打通了宁波至杭州一线，杭甬路以北已经是沦陷区，我们已派了姜文光的五十多人的武装去进行侦察。据他们侦察的报告说，三北地区比较空虚，我们去了能够站住脚。谭震林还告诉我，浦东敌人已开始全面“清乡”。我们在浦东有武装力量，一个是连柏生部队，他是国民党的区长，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党员，在他的领导下，已建立了一支武装，叫“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支武装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里面有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训练过，林有璋、蔡群帆就是教导队出来派回去的。还有一个张席珍，是上海巡捕房的，他也同这个部队有联系。这是我们自己的武装，在浦东那里活动。第二支是党派朱人俊去工作的伪军十三师丁锡山部队的五十团，那里面发展了一些党员，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谭震林介绍了这些情况后说，浦东有个工委，这个工委由路南特委领导。路南特委由顾德欢任书记，姜杰、吕炳奎、金子明等为委员。他说决定将路南特委、浦东工委包括伪十三师五十团里的关系都交给我。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浦东作为跳板，设法向南发展，开辟浙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是为浦东“清乡”时部队可以向南转移，以便保存力量。谭震林当时没有明确给我任何组织和名义，就是指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并把顾德欢在上海市区住家的地点和一些具体情况都告诉了我，叫我去同他接头。现在来看，我就是特派员的样子。原来我负责的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也没有撤销。

我们回到上海后，即和顾德欢接上了关系。以后，我首先见到了连柏生，是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园附近，谈了十几分钟。第二个

见到的是吕炳奎，他汇报了浦东工委在伪十三师工作的情况。第三个见到了朱人俊，他汇报了部队到三北庵东一带活动的情况，以后和姜杰也见了面。朱亚民（当时叫诸亚民）、金子明都未见到。从此以后，我知道派到三北那里去的武装可以站住脚，他们要求增派部队去。

据我了解，浦东第一批武装到浙东三北去，是谭震林决定派去的，蔡群帆和林有璋他们去三北，是我同顾德欢还有吕炳奎在上海顾德欢家决定的。

当时由浦东南进浙东的武装，除了我们直接掌握的连柏生部队外，还有在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林有璋、朱人俊他们去浙东以后，三北的武装力量就增加了。我们在上海研究决定成立浙东军分会。军分会领导成员是吕炳奎、王仲良和蔡群帆，书记是吕炳奎，统一领导已进入三北的部队。派他们去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取得与地方党的联系。他们去了以后，开始与宁绍地方党的王文祥、戚铭渠、张光等有些联系。

林有璋他们带去的武装，打的旗帜还是连柏生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就用这个旗帜去开展统战工作。当时三北地区有个薛天白的宗德指挥部，属国民党第三战区，林有璋以同是第三战区的淞沪游击队的旗帜和薛天白拉上关系，名义上归他指挥，后来又和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顾小汀拉上关系，这样就站住了脚。他们还结交了几个地方上比较开明的上层人士，记得有慈北的虞家芝、虞在璋、镇北的朱祖燮等人，与他们搞好了统战关系。所以我们在三北的部队，开始没有暴露。当地群众看到我仍的部队纪律严明，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另外就是相公殿打了一仗，真正打鬼子，所以在群众中影响很好。

由于我们的部队与地方党建立了横的联系，与群众关系也较好，这样，我们就在三北基本上站稳了脚跟。这段时间，我仍旧在上海。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设在温州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国民

党特务机关的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一批同志被捕,刘英的爱人丁魁梅和林尧来到上海,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后来见到了我。我就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华中局。华中局回电指示要我们设法同龙跃打通关系。我到浙东以后,曾代浙南特委与华中局用电报联系过几次。

一九四二年五月浙赣战役爆发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和吕炳奎等商议,决定为了争取时机,从三北派一个部队(南进支队)去会稽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蔡群帆带领。南进支队很快就在诸暨方面站住了脚。

以上说的是我从接受任务到去三北以前这段时期的情况,约有一年的时间。

一九四二年五月底或六月初,我离开上海到了浙东,是由张大鹏(他在伪五十团有一个名义)带我到南汇县大团镇,先在五十团团部吃了一顿午饭,再通过朱人俊的关系到吴建功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张大鹏通过关系在海边找到了连柏生,然后就送我到 he 那里去会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经过研究,我和连柏生、张席珍还有一个青年王荣桂同去浙东。六月间,我们带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由南汇上船,在古窑浦登陆。登陆后即与吕炳奎、林有璋会合在一起。这时蔡群帆已率领南进支队到会稽地区去了。我们到浙东后不久,顾德欢也到浙东来了。

我们去的最初任务:第一是熟悉地形,了解情况,经常流动,几乎天天晚上都要换地方;第二是统一部队党的领导关系,包括连柏生的部队和朱人俊的部队;第三是同地方党宁属特派员王文祥、绍属特派员杨思一正式取得联系,我们还从杨思一那里知道台属地区的党组织还存在,但他也没有联系,光知道是刘清扬负责。以后,又找到了定海的王起。这样,就把地方党的关系联上了。

我初到浙东的时候,这时的浙东军分会,由吕炳奎、王仲良、林有璋、连柏生他们几个人组成,公开对部队实行统一指挥,我公开身份为连柏生的秘书,化名胡志萍。我来浙东以后,不再直接和谭

震林联系了,是通过新四军军部派驻上海的杨斌与华中局和一师粟裕联系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我在浙东敌后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还有浙东区党委《关于坚持浙东敌后长期斗争的决定》,这些报告和决定的内容,都是传达贯彻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随身带什么文件,只能凭脑子里记忆的东西作了口头传达和说明。

我们到了浙东,从六月到七月一个多月时间,把情况摸清楚了,向华中局发了一个报告,要求华中局增派军事人员来,因为当时的部队缺少真正懂军事的负责干部,大都是文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何克希、刘亨云、张文碧、罗白桦、余旭、张季伦、张浪、戈阳等就是华中局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来的,是第一批来浙东的。何克希等到浙东和我们会合后,即正式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区党委开始由我和何克希、顾德欢、杨思一四人组成,我为书记。不久,华中局对所属各区党委作了全面调整,浙东区党委改由我和何克希、张文碧三人组成,我仍任书记。一九四三年九月底,华中局又同意我们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要他多注意地方党的工作。

关于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使用什么名义的问题,根据华中局指示坚持灰色隐蔽的方针,我们打算这个机构最好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把国民党在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等武装都统一起来,用“三北游击司令部”名称为好。这个司令部由谁来当头?根据华中局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指示,准备争取顾小汀当司令,何克希、连柏生为副司令。谈了好多次,顾小汀还是不肯干。于是决定我们自己搞,叫做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更名何静)当司令,连柏生当副司令,刘亨云当参谋长,张文碧当政治部主任,余旭为参谋,叶清达是文书,司令部就这么几个人。我对内来讲是政委,对外还是叫“胡秘书”。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支队,定名为三支队、四支队、五支队。这个司令部是在鸣鹤场成立的,时间是在区党委成立之后不久。

我们建立了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以后,就在浙东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我们还将宁绍地方党也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四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和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不久,这些工(特)委都改成地委了。

从浦东武装南进,到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可以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阶段,也可叫做准备阶段,组织力量的阶段。

三、坚持三北、挺进四明, 开辟浙东敌后根据地

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在三北地区活动。我们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在群众中间的威望越来越高,三北地区基本上为我所控制,各地的办事处(是政权性质)也都统一建立起来了,以三北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基本上形成。

我们的声势大了,对敌伪的威胁也大了,于是日本鬼子就在三北增加了据点,进行“扫荡”。国民党也开始发现我们是新四军、共产党,想加强对四明山的控制,国民党慈溪、余姚县政府的部队加强了对姚江南边一带的防备,企图阻止我们向南发展。这时浦东的敌人也加紧了“清乡”,我们在浦东的主要干部和武装都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鸣鹤场开会研究,讨论确定了战略方针,决定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还有在镇海、定海方面,有王起、钱铭岐、陈子方等领导的一支小武装,我们准备去那里发展沿海一带的游击战争。同时我们认为浦东这个基点不能丢,决定派朱亚民负责,回去坚持斗争,他们共十二个人,都带的是短枪(木壳和快慢机)。这个部署确定后,我们在三北进行了反“扫荡”战斗。杨葛殿一仗打得好,鬼子来袭击,我们司令部和四支队居高临下打死打伤敌人好几十个。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转移到游源,按原来的部署分开行动,我们往南渡姚江

向四明发展。

当时刘亨云和张席珍等带领五支队在三北坚持斗争。我和何克希、张文碧等带司令部与四支队渡过姚江,先到十五岙,然后到石门,遇上慈溪国民兵团打了一仗,把它打垮了,一直追到芝林。这样,我们就解放了陆家埠、杜徐、袁马、左溪和芝林等姚南、慈南的一部分地区。不久就发展到翁岩一带(大岚还没有),并与鄞西的严式轮和林一新保持了联系。林一新部是由我党掌握和领导的国民党鄞县郭青白部第六大队,这时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慈溪国民兵团被我们打垮后,就一直逃跑到鄞西靠奉化那一边去了。朱之光在开辟四明地区中起了相当好的作用。朱之光的父亲朱祥甫老先生是一个国民党的乡长,朱之光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在姚南开展了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余姚县国民兵团肖文德和区长陈恩寿还控制梁弄。我们首先团结他们抗战,如果他们搞磨擦反共,就根据自卫斗争原则消灭他。所以,实际上从鄞西鄞江桥一线以西的四明山区,都为我们所控制。

当时,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田岫山,八十九团张俊升,因为三战区暗杀了他们的师长,对国民党不满,所以率所部先后进入敌后,在章家埠、下管建立他们的据点。这两人也同我取得联系。那时,田岫山部以下管为中心,张俊升部以章家埠为中心,日本鬼子和伪军则在沿江一线。我与敌伪顽形成三角斗争的形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为阻止我军南进,令艾庆璋的忠义救国军自海北向南进攻,企图把我们消灭在三北海边,于是我们被迫进行了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区党委当时研究,要在浙东建立根据地,必须巩固与坚持三北,决心集中力量消灭艾庆璋。所以把南进支队、诸北八乡自卫大队都调回来,和三、四、五支队一起全部集中到三北,投入反顽自卫战斗。我们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运用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结果消灭了艾庆璋部二千多人。这次战役主要打了三仗。第一仗胜山战斗,首战告捷,歼灭了张立民的忠义救国军特务大队和顽

金山县自卫总队五百余人。接着黄家埠战斗，我们也取得胜利，艾庆璋率领所部逃到谢家塘靠近华盖山那边，我们又组织力量给予歼灭性打击。后来又打垮了顽平湖县自卫总队，并俘获顽平湖县自卫总队总队长谢友生。艾庆璋率残部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王八妹部逃到小越伪军据点里去，我们又攻打小越，消灭他五百人，艾庆璋最后刮掉大胡子化妆逃生。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使我们在浙东站稳了脚跟，三北地区除了日伪几个据点外，全部为我所控制。

这时的四明根据地，由四明地委书记王文祥、副书记罗白桦率领少数武装，在左溪一带坚持。

在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中，我们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还有孙运达，都保持中立，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这中间，还有一个何克希“单刀赴会”，会见田岫山的故事。有一次，我们从芝林、陆家埠向梁弄挺进途中，得悉田岫山因不满国民党对他的排斥和歧视，决定投降日寇。何克希带参谋张任伟及警卫员等几个人，赶到三七市，劝阻田岫山不要去宁波投敌，同我们联合抗日。当时区党委认为太危险，对他的安全很担心。后来虽然对田岫山劝阻未成，何克希却安全返回。何克希的这一壮举令人钦佩。后来日本人要田部驻在周巷对付我们，但田仍同我保持来往，结果他杀了日寇官兵几十个，反正到下管、许岙。何克希又一次去下管和田岫山谈判，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张俊升则比田岫山进步些，他向我们靠拢，还要我派干部去。当时我们与田、张的统战工作搞得不错，田岫山也曾到梁弄来和何克希谈判过。我们派黄源、金乃坚、俞菊生、马婉青等去田部工作。派王文祥、金子明、俞德丰等去张俊升部工作。由于争取了他们两部的中立，使我们在四明和三北地区稳定了一个时期。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区党委缺一批中层干部，于是华中局又接连派来了两批干部，加强了

组织建设,提高了部队素质。这时区党委的机构逐步建立起来,顾德欢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思一为组织部长兼会稽地委书记,朱人俊为敌工委书记,方晓协助他。敌工委主要工作对象是伪十三师和杭州、宁波、余姚等城市的敌伪军工作。以后还曾派柯里去杭州建立地下党的组织——杭州临工委。丁公量是区党委兼部队政治部的保卫科长(后来由邱子华接替)。另外,五支队改由王胜当支队长,邱相田当副政委兼主任(后来汪志华当主任);三支队是余龙贵当支队长,林有璋当政委。这时力量大了,每个支队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

这时区党委在杜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我们到三北以后,经过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进入四明这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又讨论了浦东的问题,因为当时敌人在浦东“清乡”,浦东武装和干部基本上已到浙东。我们讨论后决定了今后的方针,就是坚持浦东,巩固三北,发展四明和会稽。另外,还研究了部队要向正规化发展,进行整军训练。

这时几个地工委已改为地委。王仲良为三北地委书记,黄知真为地委组织部长。陈洪接替王文祥为四明地委书记。三东地委由吕炳奎、王起等三人组成,书记是吕炳奎。后来,吕炳奎兼任海防大队政委。王文祥调任区党委城工委负责人。城工委成员还有原来负责保卫工作的丁公量和王起、王槐秋。还有会稽地委,杨思一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那时海北工委也归浙东区党委管,是刘明在负责的。区党委后来曾派一支武装去海北,金子明也去帮助过工作,因为站不住脚又回来了。区党委还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派王平夷、郑嘉治、李一群等去金华地区,和金属特派员联系上了,是同陈雨笠、江征帆他们联系的。由杨思一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那时,台属特派员刘清扬那里已联系上了,后来我要刘清扬、林尧他们到三北根据地来。顾春林从狱中逃出来后,也到了四明山。以后我们也同浙南特委联系上了。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以前,浙南特委的交通郑加顺和龙跃的爱人王琳芳都到了三北。以

后同浙南还有过三四次交通往来。华中局委托我们与浙南特委保持联系,但是,我们同浙南特委没有领导关系。

建立三东地委时,吕炳奎、王起他们想挺进定海,建立海岛根据地。他们到了宁波,打算从宁波进定海,结果进不去。后来,一九四四年八月间,区党委同意吕炳奎、张大鹏组织一个连队,打算经大鱼山岛挺进定海,结果被敌人发现,打了一天,血战大鱼山岛,大部壮烈牺牲,只有小部分人突围出来。

为了保持同苏北交通联络,我们组织了一个海防大队,政委是吕炳奎(初建大队时由何亦达任教导员),大队长是张大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对付土匪张阿六、王八妹等部;第二,维护海上交通,输送干部,保持浙东与浦东、苏北的联系;第三,输送军用物资、保障军队供应;第四,保护税收,开辟海上经济来源。海防大队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二月下旬,当我们在芝林的时候,华中局派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凯来到浙东,传达华中局的指示。华中局指示的精神,是要我们作好配合盟军登陆浙东沿海的准备,加强部队整训,积极向南发展。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实际上没有执行这个指示。在张凯来到四明山住了一段时间后,沙文汉又来到四明山芝林。他传达的是华中局饶漱石意见,主要的精神是估计盟军登陆浙东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我们把部队分成数股,插到天台山、会稽山、浙南等地去,留下少数武装坚持四明。我们分析当时浙东的实际情况,认为要看整个形势发展之后再定。华中局还要浙东部队尽量坚持灰色隐蔽的方针,不要急于公开新四军的旗号。另外,要我们建立一套秘密组织,以备万一武装斗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持地下党的斗争。

当我们在三北进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时候,伪军乘机占领了梁弄。所以,当我们一九四三年春再次挺进四明后,就决定攻打梁弄伪军据点。拔掉梁弄伪军据点后,我们就顺利地开辟了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区党委和司令部都迁到横坎头,部队

进行整训,提高军事素质。建立了教导大队,先后由蔡群帆、唐炎、张浪负责;建立党训班和党校,先后由谢飞、涂峰负责。提出部队正规化,一个支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团,力量更大了。在这时期,林一新大队也拉出来了,三北、四明两个自卫总队武装起来了,定海五大也来会合了。

到这时候,我们巩固了三北地区,建立了四明根据地,坚持了会稽地区的斗争,也取得了浦东反“清乡”斗争的初步胜利,浙东的局面基本上已经打开。以上也可以说是第二阶段。

四、坚持四明,巩固三北,浙东 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到了第三阶段,我们的面目已彻底暴露,国民党第三战区命令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副总司令竺鸣涛组织天台前进指挥部,首先派贺钺芳的挺进第三纵队由北庄进占唐田,并要田岫山的挺进第四纵队、张俊升的挺进第五纵队联合向我进攻。我们一再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是顽固派都置若罔闻,疯狂地向我大岚山阵地进犯。我们被迫进行了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当时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争取田、张中立,集中力量消灭贺钺芳部于北溪。军事上作了如下部署:以五支队(主力)在蜻蜓岗建立正面防御工事,阻止贺钺芳部从正面进攻,而以三支队出击大俞。开始田、张也表示中立。但是田岫山很快变卦了,占我梁弄,抄我后方,把我南黄、茭湖等地的后方建设,如兵工厂、印刷厂等等都破坏了。当蜻蜓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张俊升却从侧翼向我进攻,使我两面受敌,只好撤出战斗。三支队在大俞也打成一个相持战。不久,发现贺钺芳部已进至东西岙,于是我们下决心奔袭贺部,发起东西岙战斗。这仗打得还好,打伤了贺钺芳,击溃了贺部主力,但我们三支队和警大也伤亡很大。战斗中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山头被敌发现,顽敌组织兵力冲上来。当时何克希、张文碧和我只带了一个警

卫班和几个警卫员,大家一起冲击,一阵手榴弹,把敌人压下去。接着,刘亨云带了部队赶到,我们才得以脱险,到了峙岭。这时田岫山正好从鄞西来,拟经大岚山回许岙去。我们决心就在蜻蜓岗伏击田部。本来应该是打歼灭战,结果也只打了一个击溃战,田岫山逃到许岙去了。他们躲进碉堡,我们没法消灭他。不久,田岫山见我们重返梁弄,竟下书要我们让出梁弄,退至龙坑、南庙一线以东,限三小时内答复,否则即以武力解决。我们当时即回信给田说,条件可以商量,但如必欲武力解决,不妨听便。信去后我们从梁弄移驻横坎头,筑起了防御工事。次日田、张都来了,但他们兵力分散。于是我们就在晚上出击,把他们打跑了。这就是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打了三仗。

这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阶段没有打好,没有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消灭贺钺芳的主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军事上的缺点是不应该打阵地战。当时派刘亨云带三支队在唐田、北溪之间出击。而把我主力五支队放在蜻蜓岗一线筑起工事堵击,实行阵地防御。本来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如果我们先占领华盖山,以少数兵力实行积极防御,牵制敌人兵力,然后以主要兵力(百分之七十)出击唐田、北溪一线,这就有力量了;不应该以一半兵力,特别是以主力五支来防守,兵力就分散了。第二,对田岫山等的反动性认识不足,没有估计到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会遭到他们的突然袭击。

这时,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我们正式公开宣布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并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中,我们把贺钺芳部打垮以后,顽方下狠心动用主力,调来全部新式装备的突击营第一纵队三千多人,从仙居、天台、新昌经奉西到四明山,采取步步为营,向我进攻。同时,田、张也与他们配合。突击营一进来就占领了北溪、唐田,与田部的驻地下管、张部的驻地章家埠联成一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

么办？贺钺芳算是被击溃了，但田、张并未受到什么损失，对田、张也不能相信，区党委和司令部反复研究，认为我们处境比较困难。突击营如何呢？突击营一到北溪，就有一个便衣队长向露云带了十几个人，携带一挺机枪和十多支步枪来向我投诚。我们了解了一些突击营的组织、编制和装备情况，感到要消灭它也不容易。我们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想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但突击营鬼得很，不分散行动，不好打它。于是我们决定避强打弱，先消灭张、田，这个方针是对的，群众也欢迎。我们先打章家埠，顺利地占领了制高点和章家埠，可是它的几个大碉堡没有打下，张俊升率部逃过曹娥江以西，我们只占领了曹娥江以东一线。这一仗没有消灭张俊升部，于是我们经上虞回师梁弄。后来我们又第二次出击章家埠，并渡过曹娥江以西追击张部到会稽地区，缴获了张部一批弹药，又渡曹娥江东返，回到杜徐、袁马一带休整。这时我们得到情报，知道田岫山进占了梁弄以北的前方村，决定集中三支、五支和金萧支队等部兵力，打前方，消灭田部。结果这一仗没有打好。什么原因呢？第一，我们原来部署以三支队打铁猫山、狮子山，从南往北攻前方，另以五支队从北往南攻前方。结果，前方村所有的外围阵地都为我五支队占领了，田岫山固守前方村据点。我们命令三支队迅速向前方攻击。可是突击营却来增援了，我们没有力量阻击，只好撤出战斗转移，结果打了一个消耗战。前方战斗虽然给田部以重大打击，可是我们也牺牲了一个营级干部，五个连级干部，伤亡二百多人。第二，我们没有了解突击营就驻在田部附近。当时我们曾考虑过这个仗到底打不打？是不是回避一下。根据侦察所得材料，只知道田部在前方村，不知道突击营在什么地方。鉴于田岫山反脸无情，大家都很恼火，又因为自卫战争开始时，四明地委书记陈洪牺牲在田部手里，大家要报仇，所以决心打这一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部队为什么从会稽山撤回四明山根据地？我们决定部队重返四明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原先决定主力向会稽山地区进军，只是一个军事上的战术行动，目的是为了调动敌

人,把进犯四明山的顽军引出来,保卫四明山根据地。所以部队第二次打章家埠,过曹娥江,只到达绍兴的上王一带与金萧支队会师,并没有进一步挺进金萧地区的打算。所以我们一接到关于四明山已无顽军主力的电报就返回四明山。回去才发现顽军主力并没有走,结果打了一个被动仗。

前方战斗之后,我们还想再打一仗,经过研究认为没有条件再打了,于是决定由刘亨云带五支队,警大和四明自卫总队在四明坚持,区党委、司令部带三支队和教导大队经芝林、石塘渡姚江到三北。我们幸亏决策早定,及早撤离了四明,不然在姚江南岸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们过姚江时,遭到宋庆云伪军部队的阻击,幸亏找到了两条小船架了两挺轻机枪,封锁住了他们一挺重机关枪的火力点,我们强渡了姚江。到了汶溪附近又碰上了鬼子,即往北转移,拂晓前到达慈东金夹岙村宿营。指战员刚睡下,突然遭到日伪军的袭击,我们赶快抢占山头,三支队撤上了山。谁知从西面又来了一股敌人,司令部和三支队又仓促转移到北面山上,我们与余龙贵、林有璋失去了联络。结果,林有璋负了伤,我和何克希第二天才与他会合。这样,我们就率三支队在三北坚持,刘亨云与五支队、四明自卫总队在四明山打游击。不久,刘亨云率五支队一部也来到三北。

当时四明山区军民在四明地委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自卫战斗。多少英雄儿女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沙场上,却牺牲在反共顽军的枪口和刺刀下。坚持鄞西斗争的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女)等五人,各被顽军连戳二三十刺刀,壮烈牺牲。樟蜜区长徐婴受尽酷刑,被顽固派剖腹挖心,残酷杀害。五支四中转战至鄞西后杜桥,遭到顽军突击纵队第五营勾结日伪军的四面围攻,全体指战员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英勇奋战,除二十多人血战突围归来外,陈行知、毛明孝、肖张等四十三名指战员均壮烈牺牲,表现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

这时发生了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豫湘桂战

役。日寇为了战略配合,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初,在浙江发动了第二次浙赣战役,金、兰之敌再次攻陷龙游、衢县等地,并企图打通温州、丽水一线。这样,国民党在天台山就受到威胁。同时日寇又对四明山区进行“扫荡”,突击营就撤退南下,这次自卫战争不久就告结束。

当顽军主力撤出四明山后,我们又从三北回来,主力集中在以梁弄为中心的一带地方,进行休整和补充,并恢复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这时,控制奉化东西岙的土匪王鼎三、单孝升(即小白脸)部三、四百人,与我们拉上关系。我们派了陈山等几个人去做争取王部的工作。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底把王部争取过来,拉上四明山。后来该部编入四支队。这时四明根据地又扩大到嵊新奉公路以北地区。

在金萧地区,杨思一、马青、陈雨笠等在对敌斗争中坚持下来了,部队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区党委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决定:将金属党组织与会稽地委合并,组成金萧地委,杨思一任书记;并将该地区武装统一编成金萧支队,蔡群帆任支队长,杨思一兼政委。不久,彭林的独立大队也从国民党那里拉了出来,编入金萧支队。

还有,朱亚民回浦东去坚持斗争后,搞得很好,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支队(淞沪支队),游击区从浦东发展到了浦西。一九四五年初,华中局派陈伟达来当淞沪地委书记,顾复生来当淞沪专员。

与此同时,浙南邱清华、周丕振的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建立后,他们派人来四明山同我们联系,我们报告了华中局。华中局有指示,意思是要他们北进括苍山,和台属特委联成一起,建立一个以括苍山为中心的据点。一九四五年春我们派余龙贵去永乐总队。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的情况下,一九四五年一月,区党委召开了浙东人民临时代表会议,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通过了施政纲领,连柏生任行署主任,吴山民任副主任。还有统战对象开明士绅如三北的毛契龙、虞家芝,慈南的李纪佑,梁弄的邵之炳,还有鄞西、金萧、浦东的一批乡长和士绅,也都靠拢我们。我们就找这

些人开了一个会——浙东临时参议会，我当议长，郭静唐、何燮侯为副议长，这样，浙东抗日根据地内的统一战线从组织上形成了。

这里须说明一下，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曾两次派郭静唐来四明山同我们谈判。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二次反顽战争开始之前，浙江当局企图实行政治解决。但提出的条件我们不能接受，没有结果。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夏第二次反顽战争结束之后。黄绍竑通过陈沛派郭静唐找我们，郭把陈沛的部署和兵力都告诉我们了，说陈要我们同他合作。我们要郭静唐再回去做陈的工作，可是他第二次来，知道国民党的意图，下决心不回去了，就在四明山参加我们部队的抗日斗争。

接着，中央指示我们向西发展。这时苏浙军区在粟裕指挥下已在浙西打了几个胜仗，准备组织部队由叶飞率领南下，同我们会师，向南发展。我带了三支队一部和一个电台去金萧路西接应他们。去时我们在绍兴新桥头遭遇顽绍兴县自卫队一个营的兵力，这一仗打得好，把它消灭了，还缴获了轻重机枪。当时贺钺芳的挺三纵队一个护运大队驻在场口以北的中埠，是南下部队预定渡江点。我们决定出击消灭它。这个大队经激战后逃了，我们占领了中埠，迎接主力部队从汤家埠过江。过江来的是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支队，在场口与富阳之间的中埠会合，苏浙军区并派张翼翔（新任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等来浙东工作。原来说叶飞要来，可是他没有来，还在新登。十一支队过江后，我们一同攻打河上店时，正好碰上诸暨出来的鬼子，我们转移到山上，守了一天，鬼子也不敢打。到了晚上鬼子就撤回去了。后来，十一支队和我们一起活动了一段时间。不久，叶飞从新登前线来电，命十一支队迅速赶赴新登东北十里处配合作战。这样，十一支队就过江回去了。我们也就率部返回四明。我们中途从路西回到诸暨时，与杨思一、何文隆等会合，住了几夜。在那里，我们曾与诸暨著名的开明人士，当过北大第一任校长的何燮侯等开了座谈会。然后我们就带了部队回到梁弄。这期间留在四明的部队，对第三次投敌的田岫山发起

了“讨田战役”，攻占了他的老巢许岙，消灭了田部，解放了浙东第一个县城——上虞。这里关键的一仗是消灭了田部，结果张俊升起义了。新四军军部决定张俊升部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并任命张俊升为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旅旅长。原第三、四、五支队编为第一旅，由张翼翔副司令兼第一旅旅长。

这时形势大好，会稽和四明基本联成一片，浙东和浙西互相呼应。特别是田部被歼、张部起义，对于我们以后的北撤和北撤后留下坚持四明山区的斗争，都有很大的好处。

到这里，可以说是第三阶段结束。

五、抗战胜利，全军北撤

我们在浙东四年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处在敌、伪、顽夹击的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曾被迫进行了三次反顽自卫战争，以便坚持敌后抗战。我军四年多来，与日伪军作战大小六百多次，歼灭日伪军共达九千余人。浙东新四军健儿在对日作战中，谱写了不少胜利的凯歌，如三北地区的相公殿、杨葛殿、竹山岙、孟岙、长石桥、筋竹岙、宓家埭、虹桥、马家桥、洪魏、东埠头、第泗门等战斗；四明地区的梁弄、银山、许岙等战斗；会稽、金萧地区的龙凤山、萧皇塘、吴大元村、大宣、吴店塘西桥、墨城坞、诸暨三都、曹宅、黄宅、莲塘潘等战斗；浦东地区的分水墩、朱家店、赵屯桥等战斗。同时，也记录了那些英勇杀敌的悲壮史诗，如宗德三大的横河血战，海大一中的血战大鱼山岛等战斗。特别是大鱼山岛战斗，开创了我新四军抗击日寇陆海空军联合进攻的光辉战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我党中央连续三次发来指示，这是中央的三次战略决策。第一次指示，命令我们以一部兵力进占宁波，另以一部兵力配合苏南苏中主力，接收上海。这时，陈伟达他们已到了沪西，诸亚民部已打到上海市郊区附近；何克希带了一部兵力，一直挺进到宁波城下，但

没有进去；而我们主力集中在三北，准备过江进占上海。这时国民党从峨嵋山上下来，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内战危机十分严重。于是，我党中央来了第二次指示，说国民党已空运军队抢占了上海，同时由浙赣路北上的国民党部队，也已到了杭州、海盐、海宁等一线。由于这个情况的出现，中央估计我浙东的部队很难北上，决定要我们准备主力南下，与浙南武装会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而留少数部队坚持四明、三北、金萧的游击战争。当时我们决定由何克希率领张俊升的二旅在浙东坚持，我率领张翼翔的一旅（三、四、五支队）南下与坚持浙南斗争的永乐总队会合，并准备以张翼翔、余龙贵为正副旅长，我为政委，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刘亨云为参谋长。我们刚部署，并拟派一支小部队先去侦察，中央第三次指示又来了，叫我们全部北撤，留下少数精干武装秘密坚持，限我们七天作好准备。因为重庆谈判已取得协议，面临和平民主新阶段，所以中央下令南方八个根据地的部队全部北撤。于是我们集中到上虞，开了会。

关于传达布置北撤问题的干部会议，是在上虞城（丰惠镇）开的。开会的内容：第一，要搞船。决定刘亨云和张翼翔率领五支队封锁钱塘江口和杭州湾，集中全部船只，并电请苏中派船南下。因为当时党政军干部和战士共约一万五千人，要做好七天后北撤的准备，没有大批船只不行。结果，船调集了不少，机关人员和部队都过去了。第二，留下精干的短小武装，带一部电台坚持浙东。当时就决定刘清扬、邢子陶，还有朱洪山、朱之光、陈布衣、陈爱中等留下坚持。要刘清扬带一支小武装和一部电台，在四明山隐蔽坚持，秘密活动。凡白区城乡的地下党组织和活动，统由邢子陶负责。金萧地区则留下马青等负责坚持。第三，所有公开人员和武装部队，全部撤离浙东。少数病弱人员不能跟部队走的，经由宁波去上海，再往苏北。第四，后方的印刷所、兵工厂、伤兵医院等，统归朱洪山、黄明负责，建立公开的留守处，由朱洪山、黄明分任正副主任。并由何克希写信给宁波的国民党专员俞济民和原在天台的“绥靖指

挥部”指挥陈沛，说明我们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按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决定北撤，留下人员要他们保护安全。第五，决定由顾德欢起草发布一个《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和发表通电。第六，决定将抗币限期收回，用粮食和现金兑换，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到损失。第七，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估计到国民党来了后会搞白色恐怖，我们的党员可以以参加过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名义“自首”登记。

北撤的路线基本上分三路：我与顾德欢等带区党委机关人员、教导大队、警卫大队先走，是由古窑浦下船，在奉贤登陆，渡黄浦江至青浦的。张翼翔带四支队跟在我们的后面走。何克希带五支队和后勤机关、银行人员为一路，由临山北渡，至漊浦打了一仗，过沪杭路至青浦。张俊升带二旅比何克希先走，也是过漊浦的。原定经漊浦通过沪杭路到青浦会合，途中因情况发生变化，而改道至浦东，坐海船直到苏北。张文碧、刘亨云和杨思一带三支队、金萧支队为一路，完成掩护任务后才走。我们北撤部队最终在（青）浦西重固镇、观音堂会合（缺二旅），在那里集中休整了几天，中共上海市委曾来慰问过我们。在上海的美国人，还有其他不少人，都到观音堂我们那里来参观，还一起拍了照。然后继续北上。

原来粟裕要陶勇部队到淀山湖边策应我们北上，但他们来不了，我们就自己过江了。

我们北撤途中，有两次损失。一次是漊浦战斗，伤亡较大。另一次是张俊升旅到海宁、海盐后，中途走散了一些人，还有一个参谋长徐学道投敌。其他各路部队都没遭到什么损失，顺利到达目的地。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华中局交给的历史任务。最后武装人员在苏北涟水整编，一旅编成第一纵队第三旅，二旅和余上大队编成独立第一旅。

涟水整编后我们兼程北上。那时中央决定要挺进东北，我们一纵三旅也要去东北。但当我们到达临沂时，天气严寒，渤海湾已封冻，船过不去。同时国民党军队已抢先空运到东北，占领了重要城

市。结果,我们就留在山东了。

六、正义的战争是无敌的

浙东抗日根据地从浦东武装南进三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算起,前后一共四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这块根据地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比较小的又是最年轻的一块。浙东抗日根据地处于祖国的东南海滨,沪宁杭三角洲之南侧,物产富饶。因此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大上海的东南外围阵地,也是南进太平洋的一个基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最终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浙东地区成为配合美国盟军登陆对日作战的重要基地。所以我们在浙东敌后的抗战,对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都具有战略上的配合作用。可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孤悬华中敌后,与新四军和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不相毗连,为什么能在浙东敌后建立起战略支点屹立于东海之滨而不败呢?

第一,抗战初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浙江的共产党组织和基本群众组织都有了相当普遍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日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后,虽然浙江共产党遭到几次破坏,尤其是一九四二年春省委书记刘英等被捕牺牲,但浙江党的地、县组织和干部基本上保存下来,特别是宁、绍、金、台等地党的组织坚持着地下斗争,这就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没有浙东地方党的配合与支持,我们要在浙东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

第二,浙东地区自近代以来,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以后,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的压迫,人民富于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东地区于二十年代有过萧绍农民运动,余姚庵东的盐民大罢工,慈溪、奉化、宁海等地的农民暴动;三十年代有过诸暨、富阳、武义、新昌、天台、余姚等地的

农民暴动,在余姚还建立过“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在浙南红十三军的斗争与挺进师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的足迹到过奉化、新昌、东阳等地;在浦东也有过泥城暴动,在浦西有过农民起义。所以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建立之前,共产党与红军在群众中有较深刻的影响,到处有革命的种子。

第三,浙东是蒋介石的家乡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党政军要员有不少是浙东人士。战前,浙江省被国民党统治当局列为模范省。抗战初期浙西沦陷后,广大浙东人民曾寄希望于国民党当局抗日自卫保家乡,“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但曾几何时,国民党即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自皖南事变后,大肆摧残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力量。当时国民党在浙东驻有大批军队,却是守土抗日无方,反共扰民有余,以致在日寇发动宁绍战役后,蒋介石的溪口老家和浙东大片国土很快沦入敌手。浙东人民盼望能有真正抗日的军队,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所以,谁抗日,谁就得人心,这就是我们新四军到浙东敌后来打鬼子保百姓,深得各界人士拥护的道理。

第四,浦东的共产党组织,在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在上海和浦东沦陷后,即创建了武装并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他们还在伪军中开展工作,掌握和控制了一部分武装。浦东党组织在浙东宁绍地区沦陷后,根据上级党的决定,及时派武装到浙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建立和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的主要基础。

第五,抗战初期浙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来说算得上是最好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当时浙江省的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为政工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广泛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提高了群众对抗日的认识和斗争精神,在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中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以后时局虽然逆转,当时的影响还有很大的作用。后来我们在浙东的四年中,统一战线工作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在浙东敌后,高举抗日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

逐步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了浙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三北、四明地区的虞家芝、虞在璋、朱祖燮、叶志康、张志飞、毛契龙、李纪佑、邵之炳、朱祥甫等，金萧地区的吴山民、何燮侯、钱之桢等，他们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坚持在浙东敌后抗战。解放初期，刘少奇到浙江视察工作时，在绍兴对我说过，当年你们在这一带（指绍兴南面）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得到胜利与发展，这是和搞好统一战线、搞好群众关系分不开的。

第六，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建立浙东这个战略支点是很重视与关注的。如及时指示我们抓住战机，以浦东为跳板，组织浦东武装南进；我们到浙东后，又经常地及时地得到华中局和军部对浙东各项工作的指示；还多次派遣干部来浙东，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使浙东敌后抗日的战略支点得以迅速建立和巩固。如果没有华中局和军部的领导并指派一批领导干部来，把由浦东南进浙东的武装力量和宁绍地方党的力量以及华中局派来的干部这三种力量统一起来，搞好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内与党外等等方面的团结，拧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党领导的浙东军民抗战，也不可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七，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全面抗战的路线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思想，以及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建立得比较晚，比较年轻，并且处在敌伪顽包围的极端复杂而又困难的环境中，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皖南事变后新组成的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浙东区党委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根据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结合浙东斗争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反顽自卫战争，经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历尽艰难困苦，逐步得到发展，走向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主

席远在延安,也很关心我们浙东,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为了准备反攻,亲自指示浙东纵队,要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配合盟军驱逐日寇。我们在浙东的四年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胜利的旗帜。

浙东四年敌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抗日群众的艰苦奋斗与流血牺牲换来的。陈洪、曾平、邱子华等二百余名干部和约八百名战士,都为了保卫国土和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为浙东四年抗战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都是光荣的功臣,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

(吕树本整理)

根据地建立前的 浙东地下党及其抗日斗争

浙江省委党史办公室

“七七”抗战爆发后恢复发展起来的浙东地下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国内时局逆转后，坚持隐蔽斗争；在日寇发动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后，纷纷组建武装，开展了抗日游击斗争。浦东武装南渡到浙东后，浙东地下党与浦东武装互相支持，紧密配合，推动了整个斗争形势的发展。浙东地下党的恢复和发展，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开展，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基础。

(一)

浙东地区党的组织，几经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至抗战前夕，已被破坏殆尽。抗日战争开始后，为解决抗日干部的需要，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一些在国民党监狱中坚持斗争的同志被释放出狱。朱镜我(因病提前释放)、张三扬、邢子陶(尹阿根)等出狱后，先后受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委派，回到浙江作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经恢复了一批同志的组织关系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徐洁身任书记，张三扬任组织部长(后由邢子陶继任)，张崇文任宣传部长。在此前后建立起来的浙东临时特委和台州工委，分别由朱镜我和张崇文负责，后均属省临工委领导。一九三八年二月，东南分局派顾玉良来浙江工作，省临工委改组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由顾玉良担任，组织和宣传仍为邢子陶和张崇文。省临工委(省工委)成立后，主要

活动在宁绍、金衢以及台属一带。抗战爆发后，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党员、工人和青年学生，纷纷回乡参加抗日活动；一批文化界人士（大部是地下党员）也来金华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延安陕北公学、抗大等毕业的青年（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也派到浙东各县工作。因此，浙东地区党的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至一九三九年十月，宁绍地区共建有党支部 220 个，党员发展到 1903 名；金衢地区有党支部 165 个，党员发展到 1654 名；台属地区党员发展到 2766 名。

一九三八年五月，根据东南分局的决定，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工委同时宣告撤销。浙江临时省委随即在浙东地区分别建立了宁绍特委、金衢特委和台属特委。宁绍特委由顾玉良任书记。一九三九年二月顾调往浙西特委后，杨思一继任特委书记。金衢特委先由省委常委王易（汪光焕）兼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底改由林一心继任。一九三九年九月，林离金华准备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特委书记由王明扬接任。台属特委先后由宿士平、刘清扬、郑丹甫任书记（郑调省委后，仍由刘接任）。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县的组织情况是：宁绍特委管辖的十四个县，除象山、宁海外，宁波（鄞县）、余姚、嵊县、诸暨建立过中心县委；慈溪建立县委；定海、镇海、奉化、上虞、新昌、萧山、绍兴建立县工委。在宁绍特委期间，象山县没有建立过党的组织；宁波沦陷后，象山划归台属特委领导。宁海县的城区、北乡、东乡的党组织，先隶属于宁绍特委，后也划归台属特委领导，并建立了宁海（三门）县委。金衢特委管辖十九个县，其中兰溪、义乌、江山曾建立过中心县委；金华、东阳、永康、浦江建立县委，武义（称永武工委）、龙游、富阳、建德建立县工委；开化和常山合建过开常工委；汤溪、衢州、寿昌、淳安、桐庐等县建立过特支。台属各县都建立过县委或县工委，另外还建立过黄（岩）温（岭）中心县委，括雁工委和盘大工委。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

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时局开始逆转;同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根据省委决定,一九四〇年一月,宁绍特委划分为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不久,金衢特委也划分为金属特委和衢属特委。王文祥(高子清)任宁属特委书记;杨思一任绍属特委书记,并以省委后补委员身份,兼管宁属特委的工作;王明扬任金属特委书记(后由朱维善担任);朱维善任衢属特委书记(后由张贵卿担任)。

对坚持抗战,中央、东南局和省委均有明确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巡视后,来到金华,视察浙江的抗日设施,检查和了解浙江党的工作。视察期间,曾对刘英等省委领导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党克服困难,反对投降,增强抗战力量,阻止敌人进攻,准备反攻,收复失地。省委对此作出了《关于(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同年七月,省委在平阳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党代会上,通过了《对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决议》,强调要加强全民动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民族意识与抗战意志,反对投降妥协,发展民众团体,扩大群众运动,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救亡工作。同年十一月,刘英率领我省出席“七大”的代表到达皖南中共中央东南局集中。正在待命出发去延安之际,党中央发来了电示:国内形势恶化,蒋介石加紧反共,刘英应返回浙江坚持斗争(大意)。刘英率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返回浙江前,与东南局书记项英研究决定,为了应付时局突变,避免损失,把浙江各地面目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撤退到新四军工作。所有这些指示和决议,都成为浙东地下党开展抗日工作的指针,各级组织都作了详细讨论。金衢特委除总结检查过去的工作以外,根据形势和任务,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决定。

在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浙东

地区的各级党组织,一面继续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一面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的活动转入隐蔽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上级指示,党组织的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面目较红的党员作了转移。台属地下党接受浙江省委的委托,为浙东等地撤离面目已暴露的干部,从三门海游建立起一条通往苏中的地下交通线,并在上海设立地下交通站负责中转。绍属地下党从有利隐蔽出发,还决定实行干部对调。实行特派员制后,王文祥、杨思一分别担任宁、绍特派员;省委并要杨思一负责联系指导宁属的工作。陈雨笠为金属特派员,张贵卿为衢属特派员(各地沦陷后,有少数县由特派员制陆续恢复为委员会制)。正由于浙东地下党重视党的发展工作,并及时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隐蔽精干”的方针,注意斗争策略,从而使浙东的大部分党组织没有遭受大的破坏和损失,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这对以后建立浙东地区党的统一组织和领导,建立浙东敌后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浙江各地普遍建立起“各界抗敌后援会”、“抗日自卫委员会”、“动员委员会”、“各界抗敌协会”等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抗敌组织,在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九年冬,余姚县还建立了“游击战争准备委员会”的统战组织,吸收了郭静唐等上层抗日进步人士参加,每月集会一次,商讨有关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广大爱国进步青年,根据党对时局的宣传和号召,还在浙东城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组织起“战时青年服务团”、“青年救亡宣传室”、“民众抗日救亡工作团”、“民众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抗日救亡青年工作队”、“抗日宣传队”、“抗敌剧团”、“歌咏队”、“乡村

救亡协进会”、“读书会”、“民众夜校”、“识字班”、以及“农会”、“妇女会”、“雇农工会”、“儿童团”、“生产消费合作社”，等等。地下党通过并指导这些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和组织，运用各种形式，从城镇到农村，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抗日形势和任务，普遍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抗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抗日保家乡”的号召下，群众纷纷募集棉衣、鞋子等军需物品支援了抗日前线；不少进步青年踊跃参军，或去新四军教导队、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山西学兵队受训，有些受训后回到浙东，成为浙东抗日斗争的骨干。有些地方党组织还开始收集储藏武器弹药，准备日后打游击。

党在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战争中，物色和培养了一批建党对象，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根据东南局和浙江省委的指示，各地还建立了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仅金华、义乌、兰溪、永康、东阳、浦江等县，就发展队员六百人左右，抗日活动十分活跃。

不少地方还以各种名称组织了“农民抗日自卫队”，他们用步枪、土枪、大刀等为武器，保卫家乡。诸暨县各乡普遍成立了土枪队。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诸暨县召开“抗日肃奸大会”，一个晚上，就动员了全县二万多名土枪队员，扛着土枪、土炮、大刀、梭标集中到诸暨县城，接受大会检阅，显示了抗日群众的力量。

抗战初期，金华是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出版了《浙江潮》、《动员周刊》、《抗战论坛》、《东南战线》、《刀与笔》、《浙江妇女》等进步刊物。在绍兴、余姚、诸暨、嵊县、新昌、建德、武义、江山、永康、玉环等地也出版了名目众多的进步报刊，如《浙东日报》、《抗卫报》、《快报》、《政治生活》、《战斗周刊》、《抗战知识》、《抗战十日》、《战旗》、《新新》、《烽火》等；各地还创办了群力、长风、禹风、新新、椒江、陶镛、新知、生活等进步书店。所有这些，对传播进步思想，宣

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各地军民抗日斗争形势和胜利消息,鼓动群众抗日,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党多次组织散发抗日文件和传单。先后在各地散发的有: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简称“七七宣言”)、《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为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等。这些文件宣传了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共、分裂、投降的阴谋,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由于各级地下党对这项工作组织严密、行动迅速、散发广泛,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既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震惊了敌、伪、顽,又鼓舞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抗日斗志,进一步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黄绍竑重新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为了在浙江站住脚跟,发展自己的势力,因而在抗战初期,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较开明的立场。当时,他在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于一九三八年二月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为推行这个政治纲领,从省到县建立起“战时政治工作队”。政工队自兰溪县创始后,到同年夏,浙东各县普遍建立了政工队。浙东地下党正确地运用这个有利形势,派遣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省、县政工队,许多党员干部担任了政工队的领导工作,大多数政工队实际上成为我党的群众工作队。党通过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开展群众抗日活动。余姚县政工队不仅进行抗日宣传,还整训地方武装,培养军事骨干,为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准备。后因国民党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一九四〇年夏,以“统一青年组训和领导”为借口,解散政工队,以“三青团战时服务队”相取代,强迫进步青年加入三青团,甚至进行迫害。为了保存力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得不逐步撤出或被迫转移。

各地党组织还把抗日运动与发展工农运动相结合。一是支持和领导佃农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多数地方由农会组织出面,经与地主谈判,实行了二五交租。但是,有些地主豪绅总想维持剥削现状,因而二五减租也是有斗争的。如余姚县泗门乡,一九三八年粮食歉收,但国民党区分部、区署、地主、佃农(实为国民党当局指定的富裕农民)四方代表议租时,不但没有减租,反而把租金定得过高。当地佃农对此极为不满。泗门党支部就领导农民一致行动,暂不交租,并组织乡农会向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请愿,要求党政当局明令重议租额并实行二五减租。结果,县党部、县政府发出了《联合布告》,规定:租额照旧,在租金内实行二五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二五减租,减轻了广大佃农的经济负担,因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二是发动群众开展反饥荒斗争。一九四〇年浙东各地大旱,在青黄不接之际,奸商屯积居奇,米价飞涨。嵊县等地军政官吏与奸商勾结,进行粮食走私资敌活动,更加剧了当地的饥荒。嵊县米价飞涨,且无米供应,为此,地下党发动六千饥民,于同年六月三日集中县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粮食走私,反对屯积居奇,要求平价供应大米的斗争。这次反饥荒的斗争,虽遭到地方当局的破坏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在县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迫使有关当局调拨了一批粮食供应灾区饥民,使饥荒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东阳县湖溪等地也开展过要求平糶粮食的斗争。一九四二年青黄不接时,义乌县粮荒也十分严重,在县委的组织发动下,在吴店、傅村、上溪等地把国民党政府逃跑时遗弃的几十万斤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通过反饥荒斗争和分粮活动,群情激昂,积极要求组织起来,抗日保家乡。三是发动盐民、棉农、茶农等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特别是积极领导了余姚盐民运动。京、沪、杭沦陷后,余姚盐场的食盐销路受阻,盐民生活无着;而蓬长、地主却加紧盘剥,使盐民生活处于绝境。盐场党组织即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发动盐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展开了反对蓬长、地主撤田夺

板、停止收盐、压称压价，以及反对奸商资敌等一系列斗争。如一九三八年冬，因两户盐民交不出蓬长的重租，而遭到蓬长强收盐板、夺去盐田、封草舍、敲漏碗（制卤的设施）。党就发动盐民数百人，向蓬长进行坚决斗争，迫使蓬长归还盐板、盐田，并赔偿了损失。当庵东盐场公署借口运销困难而停止收盐时，党就发动盐民向场公署请愿，并通过各种合法斗争，迫使场公署组织抢运，恢复收盐，从而解除了盐民生活的危机。随着斗争的胜利，盐民的觉悟日益提高。余姚沦陷后，党就领导盐民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

（三）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发动了宁绍战役。国民党驻军一触即溃。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先后沦陷。沪杭甬铁路曹甬段两侧，杭州湾以南整个地区很快被日寇所占领。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又发动浙赣战役，诸暨、义乌、金华、衢州、江山等县相继沦陷。日寇入侵之后，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各地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氓，也乘机骚扰抢劫，民不聊生。为此，群众纷纷要求抗击日寇侵略，保卫家乡。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已遭国民党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已被捕牺牲。在此形势下，浙东地下党独立自主地坚持原地斗争，并立即部署有条件的地方，着手建立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

在定海、绍兴、镇海、鄞县、慈溪、余姚、上虞、奉化、嵊县、诸暨、新昌、义乌、东阳、浦江、富阳、建德、武义、兰溪、金华等地均建立过抗日游击武装。其中有党直接组建和领导的独立抗日武装（为了有利隐蔽，多数用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番号）；有打入土顽部队，经过工作，建立起由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这些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多数后来成为浙东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在台属的部分县，也组织过武装活动。择要列举如下：

定海于一九三九年六月沦陷后，中共定海县工委负责人王起等，于七月在东区农村组织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吴榭乡自卫队，但于

同年冬即被顽苏本善部所改编。一九四〇年初,县工委决定重建武装,成立了东区警察队,由李志祥任队长。同年秋,宁属特派楼童生(楼明山)、陈子方到舟山群岛,以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翌年初,部队发展到一百余人。李志祥离定海后,由陈子方负责。日寇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调来伪治安大队郑留忠部,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党为了狠狠打击日寇,一九四一年五月,区警察队在浦岙乡的蒲湾地方,伏击了出来“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敌军多名,俘敌一名,缴获步枪四支,极大地鼓舞了定海人民的抗日斗志。同年九月,部队还组织了打击伪东区自治会长王秉楚的大展战斗。战斗结束后,部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寇包围,突围时,楼童生等四同志牺牲。以后部队向镇海东部峙头一带发展。浙东区党委成立后,警察队归三东工委领导,改名为“定象游击指挥部第五大队”,活动于定海、镇东、鄞东一带,坚持了定海东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绍兴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沦陷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皋北抗日自卫队,有人、枪二十余。自卫队成立后,白天集训,晚间进行抗日宣传。九月,因汉奸告密,遭日寇偷袭,指导员叶向阳(叶宗淦)等四人牺牲。部队突围后,转移去上虞县王家埠一带活动。同年十一月,在绍兴前小库又成立了“浙东游击大队”。第二年初,与皋北抗日自卫队会合,改番号为“绍兴皋埠区队”,共有队员五十余人,在绍兴北部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镇海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被日寇占领后,大矸王贺乡乡长王博平(共产党员)根据县工委意见,成立了有二十来人的王贺乡巡夜队,王博平任队长。口号是“锄奸抗日,保卫家乡”。

同年九月,慈东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有三十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即“慈溪县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因处境困难,宁属特派员王文祥遂决定把部队拉到镇海江南与巡夜队合并。合并后,编为“定海国民兵团独立中队”,王博平任中队长,林勃任指导员。后因顽朱铁钧部要并吞“独中”,“独中”即脱离了“国民兵团”。与此同时,另一支三十余人的“抗日青年突击队”,也奉宁属特派员之命,

脱离了“定海国民兵团”，与“独中”合并，编为“独中”所属的一个政工队。至此，“独中”扩大到七十余人，有长短枪五十余支。“独立中队”成立后，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曾袭击过鄞东盛垫桥伪警察所，镇压了青峙一带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匪首流氓，深受群众拥护。从而群众主动为“独中”送情报，查汉奸、送军粮，支援部队的抗日斗争。

“独中”移至青峙后，曾遭顽霍中柱部的偷袭。指导员林勃被俘，绑在大庙前的一棵大树上。日寇闻声也赶来攻打“独中”。这时我军已突围。霍部与日寇一交火即逃窜。林勃惨遭日寇杀害。

鄞县于一九四一年四月沦陷后，国民党鄞县第七区区长郭青白收集散兵游勇，拉起一个大队的武装（后扩充为支队）。我党为争取这支部队，共同抗日，派林一新等参加郭部“政训室”工作。一九四二年，林一新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合法形式，征得郭青白同意，于五月在郭的支队内部建立了一支直接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番号为“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由林任队长。七月发展为中队，十月扩编为特务大队。后因郭青白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妄图吃掉林大队。我党为保存这支武装，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将林大队从郭部拉出，与三支队会合。

余姚于一九四一年冬，由朱之光、赵继尧在姚北和南山一带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称“独立大队”，有二十余人（后扩大到七、八十人）。成立后，与浦东过来的主力“三纵队”取得联系，配合做收集情报等工作。一九四二年六月，“独立大队”参加“南进支队”，编为“三支二大第六中队”，进军会稽山区。

诸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再次沦陷后，绍属特派员杨思一指示诸暨县特派员朱学勉派人协助泌湖乡乡长何文隆（共产党员），建立了泌湖乡抗日自卫队，由何文隆任队长。于同年六月扩大为“四乡抗日自卫大队”，有枪支六十多。与南进支队在大宣村会师后，一起进行抗日游击活动。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四乡抗日自卫大队）建立后，一面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一面杀汉奸、除

恶霸,狠狠打击敌人。汪伪“先遣司令部”派孟明国部前来“清剿”时,自卫大队即在后山给孟部以打击,缴获枪五支和部分弹药。自卫大队还在江藻下陈庙,全歼土匪赵成为部,缴枪十三支,生俘十二人。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部队曾在山下湖伏击日寇。在“三支二大”的参战下,经龙凤山激战,取得毙伤俘日伪军少尉小队长柳泽春夫以下三十余人的重大胜利。

嵊县、新昌沦陷后,县委立即抓组建武装的工作。曾以竹山乡自卫队为基础成立“侠义部队独立中队”;失败后,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重建了“独立中队”(通称陈力平部队)。部队建立后,缴了土匪王鼎三部的一挺机枪和六、七支长短枪,声威大震,不少农民和乡自卫队员纷纷前来参军,部队发展到一百七、八十人。同年秋,“独立中队”改编为“嵊东抗日自卫独立大队”。

义乌沦陷前,金属特派员陈雨笠,义乌县特派员江征帆,浦江县特派员梅凯,以及联络员杨广平(杜承钧)、黄峰在柳村开会,决定以金东义西为中心,发展抗日武装。沦陷后,即在铁路沿线建立起几十个游击小组。在收缴地主武装的基础上,与吴山民(曾任义乌县县长,被国民党开除出党后,隐居家乡)合作,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上旬成立了“金东义西游击训练班”(后改称抗日自卫队),为了使部队有利生存和发展,七月下旬,改用国民党“钱南军别动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简称“义乌八大队”,以后群众称之为“吴山民部队”),由金东开明士绅杨德鉴出任队长,约有二百余人。义乌八大队成立前后,进行了多次战斗,曾取得在义西肖王塘伏击日寇,吉田少尉等八名敌人当场被我军击毙;消灭傅六妹土匪武装和妄图投敌的刘文扬部;在金东溪口击退汉奸傅延文部;以及处决两名妄图组织“维持会”的民族败类等一系列胜利,缴获了一批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武装了自己,鼓舞了群众。

(四)

苏南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指

示路南特委要浦东工作委员会组织力量挺进浙东敌后。浦东武装自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由于浦东部队用的是“宗德三大”、“淞沪五支队”、“暂三纵”等番号,因而浙东地下党开始弄不清这些部队的性质。五支队在相公殿伏击日寇获胜,以及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等消息,时有所闻,更促使地下党要尽快摸清这些部队的底细。而浦东部队来三北后,也急切需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一段时间里,双方都派出人员到对方打听摸底。后来余姚县特派员张光亲自到段头湾五支队驻地调查,经联络人员引见,与五支队领导人蔡群帆、林有璋会了面。经互相自我介绍,终于弄清了浦东部队的性质。于是双方约定,在正式关系未转来之前,先建立起横的关系,以相互配合。

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听了张光的汇报,对浦东部队仍有疑虑。一九四一年冬,他在张光的陪同下,去慈北海甸戎家会见了吕炳奎(浙东军分委书记)。根据吕炳奎的详细介绍,使杨思一确信五支队(包括暂三纵)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从而正式确定了五支队和绍属地下党横的关系。从此,地下党进一步向部队输送干部,帮助部队开展民运、统战工作,并设法使部队摆脱经济上对“宗德指挥部”的依赖;部队也派出适当的干部到地方,帮助开展武装斗争,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浦东部队与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也建立了横的关系。

自从浦东部队和宁、绍地下党建立起横的关系以后,出现了互相紧密配合,全力协作的可喜局面和动人事迹。镇海江南“独立中队”受顽朱铁钧部、霍中柱部和日寇的三面夹攻,处境险恶。为此,县特派员向宁属特派员汇报,准备把部队转移去镇北,与主力“五支队”会合。在镇北龙山党组织的帮助下,与“五支四大”取得了联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独中”通过敌封锁线,顺利到达“五支四大”驻地。“独中”与主力会合后,经过周密安排,正式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投入了浙东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

一九四一年冬，绍兴皋埠区队，一次在皇甫庄宿营时，被日寇包围，我区队顽强抵抗，不幸二十多人伤亡。当晚派人去掩埋牺牲同志时，发现一位战士还活着，但头部被日寇指挥刀严重劈伤，生命垂危。在这紧急情况下，地下党马青就给朱人俊写了一封信，通过“三纵”的关系，把伤员转送去我党控制的余姚马家堰永济医院抢救。伤愈后，重返战斗岗位。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发动浙赣战役，撤走了周巷、浒山、庵东、观海卫等据点，余姚、慈溪等县城的兵力也有所减少。浦东部队弄清日寇意图，以为日军兵力不足，将撤出浙东。因此，命令军队和各办事处人员，以及已暴露的地方干部，到古窑浦海口集中待命。

为了摸清敌情，吕炳奎和蔡群帆派人去镇北，找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了解。王向来人分析介绍了敌人的动态：从各方面情况看，敌人在后方的据点和兵力是撤了一些，但据情报，前线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在偷偷地增加，可见敌人不是撤退，而是集中兵力准备向浙赣线进攻；我们部队不可北撤，要抓住时机挺进，扩大游击区，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来人赶回古窑浦，向部队领导作了汇报。与此同时，五支队要余姚县地下党协助查明绍兴方面的敌人动态。余姚地下党接通知后，连夜派人去绍兴找马青了解，也迅速弄清了敌人不是撤退，而是要大举进犯，诸暨已再度沦陷，敌正向金华、兰溪进逼。

部队领导根据宁属特派员王文祥的分析判断和从绍兴得来的情报，立即命令部队奔向敌后各自目的地，继续坚持斗争。事后证明，地下党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正确掌握了敌情，使得在浙赣战役全面爆发后，我军在敌后能主动地、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日寇突破金兰线以后，绍属特派员杨思一与浙东军分会吕炳奎、王仲良研究，决定成立“南进支队”，向会稽山挺进。“南进支队”（对外称“三支二大”，代号“达谊部队”）由“三支”一部、“三纵二

大”和朱之光领导的“独立大队”组成。在蔡群帆的率领下,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初出发,月底到达诸暨枫桥,会见了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后,在枫桥江下村召开了会稽地下党和“南进支队”干部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要建立一个以诸暨枫桥为中心的会稽山区游击根据地。自此以后,“南进支队”转战诸暨、义乌、东阳、浦江、嵊县等地,与诸暨“四乡抗日自卫大队”(后发展为“八乡抗日自卫大队”)等地方抗日武装一起,英勇打击敌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底,镇海县龙山区区长戚铭渠(共产党员),发动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组成了龙山自卫队,戚任队长。自卫队的二十来支长短枪,是“五支四大”在龙山区歼灭镇海县警察大队(实为一支骚扰地方治安的流氓地痞队伍)时,缴来送给龙山区的。不久,“五支四大”还派了一名军事干部任自卫队队附,负责军事训练。自卫队成立后,经常随主力行动,并掩护和支援地方政权工作和民运工作的开展。

一九四二年六月,谭启龙受华中局委派,来浙东主持工作,杨思一和谭启龙接上了关系。浙东区党委成立时,杨思一任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分管地方党的工作。

以上所述,就是抗战前期(浙东区党委成立前)的浙东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和武装斗争的主要情况。区党委成立后,宁、绍、台、金等地党的组织统一在区党委领导下,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继续斗争。

(沈自强执笔)

回忆浦东游击队

连 柏 生

一、取得番号。一九三八年春，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就酝酿组建革命武装，但是缺乏一个合法的名义。

这时，浦东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长于陶生，自称是南汇县长兼抗日保卫团团团长，并任用孙运达为团附，下设三个中队。孙运达也是南汇人，也想搞点本地武装。当时我任国民党南汇县第二区区长，我们便通过孙运达取得了第四中队的番号。

二、搞到枪支。我有一个堂房姐夫，是本县祝桥镇商人，他们的商团藏有两支枪。我便向他晓以组织抗日武装的必要性，他也怕藏枪惹祸，便将枪给了我，成为我们起家的革命武器。

南汇县四团仑镇，有一个名叫周毛纪的商人，他有一支武装，拥有枪十一、二支，却未能取得合法番号。经过会商，双方同意将两支武装合并，我任中队长，他任中队附。当时有二十余人，除周毛纪外，都是当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年纪都很轻。

三、充实骨干加强领导。部队成立后，中共浦委从上海动员一批工人（也是难民）来当战士，同时也派来了一批政工干部。从此部队初具规模。一九四〇年夏，根据上级决定，浦委书记陈静调走，另派金子明来加强领导。

保卫团四中队逐步壮大，缴获了一些伪军枪支，并依靠同乡向商人弄来了一些枪支。还以部队名义召集会议，向各乡乡长募捐，取得了一些经费。然后通过我一个姓姚的亲戚，购买了一批国民党撤退时丢下的枪支。这一来，部队的武器多了，力量大了，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一九三九年夏，部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

大队(当时大队以行政区为名,我们在南汇县二区,故称第二大队)。

四、与周毛纪、胡振海的斗争。周毛纪原是想利用我们部队的番号,作为他经商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力量。此人在政治上只赞成保家乡,而不主张抗日。他的武装同我们合并后,没有给他个人以任何特权,因此,他很不满意。当时部队的经费由周毛纪总管,他利用职权常捐款把作为其个人经商的临时周转资金。有一次开会时,管财务的同志要他结帐,他做贼心虚,说我们故意要他难堪,一手揪住我,并以手枪逼我出去。我当时立即反抗,夺住了枪,枪就响了,幸好没有伤着人。他既然动了武,我们当然也不客气,同志们就当场把他打死了。

周毛纪的把兄弟、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第四大队长胡振海得到此讯后,立即派部队来进攻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撤至靠近沿海的长沟乡集中。后来当地群众很希望我们回去,同时考虑到老是退让也不行,应当予以还击,于是就回到原驻地叶家祠堂附近。胡振海知道后,就向我们进攻。因为我们据守在楼上,居高临下,他们占不到便宜,就撤退了。准备组织更大的力量来进攻我们。

当时,在我们附近驻有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其大队长李文元,是于陶生的嫡系,他与胡振海有矛盾,胡也怕他。李部有一次打了日本鬼子,我们曾组织群众去慰劳过,从此双方建立起友好关系。于是我去找他,说明周毛纪要杀害我因而被打死的情况,以及胡振海围攻我们的情形,并提出应该一致抗日,要他出来调解。李文元说:“行,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对!”他立即打电话给胡振海,要他不打我们。胡振海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只得答应了。

此时,浦东群众传说:周毛纪要害死连柏生是早有打算。正月十五晚上,周毛纪知道连柏生回了家,便雇了条小船欲去连家,想害死连,结果摇船的人假装迷了路,摇到天亮没摇到连家,周毛纪只好回去了。这是由摇船的人传出来的。我得知后,曾当面问过

那个摇船的人,确实有这件事。周死了以后,周的警卫员把枪支交给我时,也承认周毛纪有过杀害我的阴谋。这件事说明我们在群众中已有较好的基础,由于船工的帮助,我当时幸免于难。

五、与顾祝同打交道。部队扩编为大队后,我们同敌伪军进行了几次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扩大了武装,于是我们便编成一个支队。但是这个支队用什么名义呢?用新四军的名义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和浦东的实际情况,必须继续贯彻“灰色隐蔽”的方针。于是我们派了一个副官主任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那儿去争取合法名义,结果取得了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后来据说国民党发现了我苏南行政委员会委任我为南汇县长的文件,便派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郭守信部来缴我们的枪。郭守信又派他的一个副官主任黄明江先来调查情况。黄与我同乡,又是同学,他就直接来部队找我,吃了一顿中饭,便去调查了解情况。当时为了贯彻灰色隐蔽的方针,我们没有公布这个委任令,所以群众也确实不知道我是苏南行政委员会委任的南汇县长。只是对部队作了一些好评。所以他第二次来时,对我说:“群众对你们部队印象很好,我父亲死了,你们也照抗日家属对待。不过听说你们是共产党部队,实情如何?”接着说了郭守信要他来调查之事。我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说我们是地方上的抗日部队,并晓以抗日大义。他就照此写了一个报告交差。后来日本鬼子一进攻,把郭守信部队冲跑了。

六、反“扫荡”斗争。一九三九年底以后,于陶生、李文元都跑了,只剩下我们支队在浦东坚持抗战。

一九四〇年春,我们部队打死日本鬼子的一个排长,敌人便来报复,出动了三百伪军,二百日军,飞机一架,三路向我们包围。我们事先从敌人内部得到了情报,群众也给我们送了消息,所以就把一个中队撤出包围圈,到周浦一带活动;另一个中队搞了几条船,实行飘海;我带了一个警卫排转移到靠近川沙、南汇交界的地方。敌人扑了空,到处向群众打听我们部队的下落,但没有人告诉。

这时,我们有个文化教员,因病住在群众家里,有一个伪军认出了他,就要把他带走。但这家房东坚决否认他是文化教员,说是他的女婿。他的女儿也哭哭啼啼,一面哭一面向周围群众说:“他是我丈夫,叫××名字,去年十二月才结婚的”。她要日伪军官去问问群众,问问乡、保、甲长就可证明。这时,伪乡长也在旁边,听清了她讲的话,也就照这妇女讲的一样回答,周围群众也都这样说,敌人没办法,只得把我们的同志放了。

七、转移浙东。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起,我们奉上级指示,陆续派部队去浙东,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先派了第四大队去浙东,后把第四大队扩编为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此时,有伪军丁锡山部的第五十团,其中有党控制的力量,后也带到浙东,成立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后来改编为第四支队。一九四二年夏我们五支队到浙东去后,仍沿用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此时,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当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兼五支队长。加强了对浙东抗日战争的领导,打开了浙东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老三纵”的前前后后

朱 人 俊

(一)

从浦东到浙东的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当时余姚人民简称老三纵,它的前身是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掌握的伪军十三师五十团的六个连,加上南汇和奉贤的一部分在我党控制下的叫守望队的伪地方武装。

我到浦委伪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伪委会)工作,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五、六月份。在此之前,发生了日寇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浦东的大扫荡。之后,浦东形势恶化,全境伪化,原来浦委领导的南汇县抗卫二大队在长沟乡和大沙乡的一小块游击根据地丧失,为敌伪扶植的两个伪乡政府所统治,部队的活动和补给都发生困难,这在浦东的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不久,在瓦雪村附近,由浦委书记陈静召集周强、连柏生、林有璋、方晓和我进行座谈,讨论新形势下浦委的工作方针。会上,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地没有了,部队无法活动,主张把武器埋藏起来,人员都到东路(即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去受训。再一种意见认为,要坚持浦东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是人心所向和旗帜问题。陈静说:“江苏省委的方针,是要在浦东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这对上海人民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又说:“部队要精干,对面目太红不适宜在浦东活动的干部要送到东路去。”最后决定:连、林等到东路去学习,朱、方等去做群众工作。决定后,我和方晓到奉贤沿海一个农民家里落脚,准备开展群众工作。

不久，陈静调走，新调金子明来任浦委书记，朱亚民、陈文祥和我任委员。下设三个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朱亚民兼书记，群众工作委员会由陈文祥兼书记，伪军工作委员会由我兼书记。同时决定浦委划归东路，交路南特委领导。这时，金子明从东路带来一份《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指示》，成为我们进行敌伪军工作的纲领。刚巧碰上驻防浦东的伪十三师五十团的团长顾立峰在上海被刺身死，好些人都想当团长。浦委了解这一情况后，认为特务营、第二营、第三营联合一起，支持特务营营长胡汉荣做团长对我党工作最有利。于是我们从多方面去开展工作。我去做胡汉荣的工作，表示大家都赞成他当团长，特务营长仍由他兼，要他的侄儿胡骏来当副营长，胡汉荣同意了。又由吴建功去做二营营长储贵彬的工作，姜文光去做三营营长茅铸九的工作，要他们拥护胡汉荣做团长。结果，胡汉荣当上了团长。这就为我党开展伪军五十团的工作，在上层搭好了架子。

这时候，浦委掌握的伪十三师第六团陈王武部的一个小部队，由何亦达、戚大钧拉到五十团特务营编为一个连。这个连的政治素质好，后来特务营与三营合并，这个连编为八连。党在八连首先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培养班排干部，并派往各连去做骨干。

浦委伪委会确定了团、营、连的工作要上下结合，并把工作重点放在控制连队上。

团长胡汉荣是个爱好享乐而政治上比较平庸的人，我们帮助他巩固团长的地位，政治上教育他同情抗日。随着我们对五十团控制力量的扩大，团长对我们的信赖和依靠也就日益加深。平时主要是通过胡骏对胡汉荣施加影响和了解情况。

一九四〇年春，浦委设法派吴建功去二营当副营长，他同营长储贵彬的关系亲如兄弟，就通过吴做好储的工作；又派姜文光去三营当秘书，营长茅铸九对姜也是言听计从。浦委伪军工作委员会有什么决定，都通过吴、姜去做储、茅的工作，再通过储、茅做胡汉荣的工作。这样，五十团的团长和三个营长都成了我们直接和间

接的工作关系了,能够配合浦委伪委会开展工作。后来,特务营编入三营,胡骏做了三营副营长,党加强了对二、三营各个连队的工作。

浦委伪委会除七连外,在每个连都安置和发展了党员,在连队逐渐建立了支部。蔡葵的七连虽没有党员和支部,但他民族意识强烈,伪委会也能对他完全控制。

为了培训干部,提高部队的思想政治觉悟,加强党对部队的控制,五十团自己办起了干训队,由茅铸九兼队长,吴建功任副队长。讲授课程内容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等等,但是课目名称改变一下,如《社会发展史》改为《中国历史》……军政训练内容实质上是新四军的一套,很受学员欢迎。干训队两个区队长,一个是黄明,一个是张大鹏,都是共产党员,一个兼搞军事教练,一个兼搞文化工作。干训队生活搞得生动活泼,如出壁报、开晚会、演出文娱节目。接着,伪委会又办第二期干训队,但不久部队要去浙东,没来得及毕业,就把干训队拉到浙东。

另外,部队到浙东之前,伪委会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特别是防奸、肃奸的工作。

从一九四〇年五、六月到一九四一年春,仅半年多时间,浦委已经在五十团内掌握了六个连的武装,建立了五个连队党支部,共有五十七名党员,掌握十三挺轻机枪,机枪手都是共产党员。

这时,传来了伪十三师要调防浙西的消息。

(二)

一九四一年春,浦委在南汇与奉贤交界的一个村子里开会,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伪委会在五十团工作的情况和伪十三师有调防浙西的消息。会议讨论了党在五十团掌握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怎么办?当时谈论了三种去向:一是继续隐蔽,跟五十团调到浙西去。但是浦委在浦东,部队远去新区不好办,甚至会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二是拉出来就地打游击。这个部

队的政治素质虽也不错,但没有真正打过仗,缺乏实战经验,而浦东环境相当恶劣,目标大,打游击有困难;三是到苏北去。那时黄桥战斗刚结束,苏北局面虽已打开,但从浦东渡海到苏北去的交通还未打通。最后觉得还是南进到浙东去好,这个去向最合适。顾德欢对此也表示赞同。

要到浙东去,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那时浙东还未沦陷,都是国民党的地区,那里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首先要派人了解情况,找国民党的关系。我通过曾任南汇县长的夏履之的介绍,去找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地区的专员平祖仁。平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过房儿子,他这个淞沪专员实际上是给韩德勤、顾祝同做生意的,钱很多。我找到平祖仁时,借夏的名义说,夏在和平军里拉到一支部队,有多少支枪,多少地区,正副连长可以控制,营、团长也支持,只是不敢出面等等。他听我说后就要我们送花名册。后来我们搞了一个花名册送到平祖仁手里。接着他叫一个姓刁的参谋到浦东来看了一看。

我当时是以夏履之秘书的身份同平祖仁打交道的,平祖仁蛮相信。有一次我和他说,部队要“反正”到浙东去,请他给个番号,给些子弹、手榴弹。他说给番号以后再说,先给子弹。就随手拿过一张报纸,将白边撕下一截,在白边纸上写了给子弹一万粒、手榴弹五百颗,叫我拿此纸条到浙东宗德公署去领,说这是他在浙东的办事处,薛天白是他的秘书,在那里负责。于是我们派朱人侠等到浙东宗德公署去,领来五千发子弹,二百五十颗手榴弹。淞沪游击队五支队(前身即抗卫二大队)知道了想分点去,我说手榴弹是黄绍竑兵工厂造的不能分,否则容易暴露关系,子弹可以分一半给你们。这是浦委第一次派人去浙东的情况,时间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第二次是派潘林儒、张大鹏去的,主要也是去领子弹,他们刚回到浦东,浙东就沦陷了。也在这个时刻,平祖仁在上海被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抓去杀了。平祖仁一死,浙东的宗德公署改为宗德指挥部,薛天白先自称指挥官,后来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

部才承认了他的官衔。

这是浙东刚沦陷，敌伪统治尚未建立，国民党鞭长莫及，力量也很薄弱，各色游击队很多。根据这些情况，浦委研究决定，先把五十团里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到浙东去，便于灰色隐蔽。对五十团采取下动上不动办法，即团营干部一律不动，党掌握的六个连队也留下一个连（戚大钧、刘露平部），胡骏也留下隐蔽坚持，原建制由地方武装及临时招一些老百姓来补充名额。去浙东的部队，浦委最后决定要我带队。

一九四一年五月，浦东武装第一批由姜文光、朱人侠率领来到浙东，找到薛天白取得了宗德部队第三大队的番号。不久，蔡群帆和林有璋带了五支四大队也到浙东来了。浦委于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派我到浙东，公开任务是找薛天白谈判，和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的陆安石拉关系，同时找蔡群帆研究工作。陆安石这时不在浙东，张阿六的另一支部队孙运达同李文元来了。孙运达是国民党崇明县长、海上游击司令，李文元是韩德勤的保安旅长，是在苏北被我新四军赶出来的。我就去找他们打交道，结果由朱人侠带着浦东新来的一批武装，编为孙部的海上游击第一大队。接着姚镜仁带领的守望队也来了，武器差些，人倒不少，大概过来有七、八十人。

我们在浦东还有许多部队准备到浙东来，也想用国民党的番号，由于平祖仁已死，就得另找关系。这时，我们在浦东搞到一部电台，找了一个原国民党的通讯员施乐之（后为共产党员）来做我们的报务员，他熟悉国民党电台的呼号。于是浦委经过研究，要他用夏履之的名义找韩德勤联系。我们几经转折，终于和韩德勤通了电报，要他给番号。他老不肯给，我们就自己搞了个“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编成六个大队，然后上报韩德勤。

关于我的“司令”称号的来历：我们这个部队原来是遥奉夏履之为司令，我以夏履之的秘书身份出面活动的。后来浦东发生李文元被忠救军李雄宝打死的事件，我打电报给韩德勤，想借此引起

韩德勤与忠救军的矛盾。此事果然引起韩的重视，一连来了四个电报要我将此事查清。韩德勤这次从第一个电报开始，用了“朱司令人俊”的称号，他总算正式承认了我这个“司令”。

(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三纵过来了，五支四大队也过来了。为了统一领导，中共路南特委派负责军事工作的吕炳奎到浙东，建立了浙东军分会，由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为委员。王仲良被派来三纵，在三纵又成立了三纵工委，王仲良任书记，我和方晓为委员，后来还有吴建功。我们在三纵工委领导下，依靠当地党和群众的支持，站住了脚跟。

从部队过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抗日。以往，浙东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不敢抗日。我们来了后，除五支四大队和宗德三大队在相公殿的战斗外，还同鬼子打了好几仗。其中有几次是被动失利的，横河和梅园丘的战斗，都牺牲了不少同志。还有一些战斗，条件对我们有利，本可取得很大胜利，由于我们部队军事水平不高，仗没打好。如英生街战斗，我们有好几个大队，敌人只几十人，因为敌情不了解，战斗一打响，黄明、蔡葵两个大队长负了伤，我们就没决心打下去，于是敌人撤退，我们也走了，没有取得大的战果。

第二是剿匪。当时三北道路头以西直到虞北一带，土匪横行，老百姓看见我们部队来了才敢回村。群众既恨土匪，却又怕土匪，有些人明明知道土匪行踪，也不敢报告。我们部队就依靠当地党与部队办事处进行侦察，一知匪踪就去剿灭，群众很高兴。后来对土匪也讲策略了，既要打击，有可能的也要争取分化。这项工作专门派蔡葵负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三是严格执行纪律。借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还，损坏的要赔，门板用过要上好，稻草用过要捆好，部队离开前把营地打扫

干净,不留痕迹。对群众秋毫无犯,老百姓自然很拥护、很欢迎。有段时间我们部队给养困难,棉被供应不上,几个战士合用一条还不够,要向老百姓借用,后来几个保长预先准备了好多棉被,这就是我们部队与群众的鱼水之情。

一九四二年夏天,谭启龙与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先后来浙东后,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把老三纵改编为四支队。

以上就是有关老三纵到浙东的前前后后的情况。

初到浙东

蔡群帆

(一)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浦东工委为了扩大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派我率淞沪游击队五支队四大队共一百多人来到浙东。

当时浙东宁绍地区，差不多都在日寇的控制之下，国民党的数万大军，早已闻风逃往金华方向。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部队，有的与当地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勾结一起，避开日寇据点，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有的干脆投降了鬼子，为虎作伥，帮鬼子在城乡进行“扫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十六日，我们渡海来到姚北相公殿。

部队一进村，除了数得清的几个老年人和小孩子外，其他什么人都找不到。他们一见到我们，老的紧闭门窗，小的嚎啕大哭，显得非常惊慌害怕。我们向屋子里望望，十屋九空，如遭洪水洗劫。在日寇和国民党部队对他们施行残酷的迫害下，突然发现我们这支来历不明的部队，怎么会不使他们惊慌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注意群众纪律。于是，我一面命令部队：各排派一个人守卫村口，其余的就在院子里休息，一律不准进入老百姓的房子去。一面又派人向群众宣传，把老乡动员回来。

当天傍晚，伪保长虽还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但为了“关系”，竟杀猪宰羊办了十多桌酒席，亲自来“邀请”我们赴宴。这个“邀请”被我们坚决拒绝了。经过一番了解，知道酒席上这些东西，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搜括来的。于是我们狠狠地把那个伪保长训斥了一顿，

并责成他把这些东西立刻偿还人民,今后不能再为非作歹。那天晚饭,我们自己出钱向周围老百姓办了柴米,烧了一顿粥。

(二)

这里的老百姓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象我们这样纪律严明的部队,他们觉得惊奇,很快地传了开去。避难外逃的群众陆续回来,青年人拉拉扯扯地要我们进屋子去休息,向我们诉说伤心事;小孩子们搂住我们的腿,不怕陌生地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样。人们不再惊慌了,到处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我们究竟是什么部队?也有的人大胆向我们询问。为了便于隐蔽,我们的同志只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抗日部队,是打日本鬼子的,并趁机广泛宣传抗日的道理。

我们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战士们一有空就帮助群众理家务,搞生产。姚北是盐区,当时正临夏季,天旱雨稀,淡水少,吃水很困难。战士们就主动地给群众到远处去挑淡水。而我们自己呢,又处处讲究节约用水,洗过菜的水经过土法过滤,继续用来洗别的东西;淘过米的水经过澄清,仍然用来烧粥煮饭。这一切,群众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

群众的信任,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开展对敌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不过几天,我们就象住在亲人家里一样,与初到时的情景完全不同了。老百姓不断地来告诉姚北一带的敌情,主动地带路做向导,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不仅是我们驻地的群众如此,甚至连周围许多村庄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我们派部队去驻扎,以保安全。

多少年来,老百姓一见到穿军装背枪支的,就会吓得如同大祸临头,而今天,他们在我们这群身穿军装背枪支的面前,却出现了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支由党领导的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一旦人民群众了解了我们,自然就很快地和我们亲密无间地联系在一起。

(三)

十八日,这是我们来到相公殿的第三天。

突然,群众向我们报告,约莫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从庵东出发,朝我们这里开来。获悉情报以后,我们立即进入战斗准备。一方面动员群众以防万一,作必要的隐蔽;一方面向群众进一步了解和分析了地形,然后确定战斗方案,决定给鬼子以狠狠的打击。

战斗的胜负,群众极为关切,有的要求参加战斗,有的要求分配后勤工作,这些,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

枪声打响了!鬼子兵因无防备,霎时慌成一团,弄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狠揍鬼子,鬼子死命顽抗,双方激战数小时,最后逼得鬼子缩回据点。这一仗我们共打死打伤鬼子各八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当时不可一世的日寇,岂肯就此甘休。二十五日,鬼子又赶来袭击,经我军民英勇奋战,又把鬼子打得一败涂地。鬼子有了两次教训,就不敢轻易跨出庵东镇,大大缩小了他们的活动范围。

这是日寇进入三北以来首次遭到中国人民的抗击。这两次战斗的胜利,不仅大大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轰动了三北地区以至整个浙东地区,而且大大地振奋了人民群众,使广大人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们的部队就活跃在三北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烟消云散太阳红

钱 忆 群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我和我的丈夫，接到上级指示，要隐蔽身分。他转移到邻县去了，我留在余姚县吴家板桥的民校，以教书为名，坚持斗争。四月间，日本鬼子侵入浙东。鬼子来得野，国民党军队跑得凶，十七日丢绍兴，十九日丢宁波，二十三日膏药旗插进了余姚城。一时浙东天昏地暗，烟云蔽日。浙东的党，几次秘密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大都遭到国民党破坏。正在这个时候盛传有抗日武装在浙东登陆。党组织指示我们：其中可能有新四军，要我们注意联络。

一天，一群老百姓惊惶地跑来说，河上来队伍了。我奔到门前一看，果然小河边停了几只运兵的船，上岸的队伍自称是“抗日军”，胡闹了半天，向庙山方向开走了。抗日军？哪里来的抗日军呢？难道说他们就是新四军？我连忙跑到游源去，打听到一些情况，便又折回匡堰头，和两个地下党员商议。我把所见所闻讲过之后，一个同志摇摇头说：“不会是新四军吧，这支队伍一来就派饭、拉人，闹得四村不安。党的武装是有严格纪律的，不会这样。”另一个同志说：“眼下还很难断定，这支队伍口口声声抗日，又招兵，又买马，迷住了许多青年。”我们三人都知道新四军是党的队伍，可是都没见过新四军啥样。议论了很久，没有结论。但是大家认为，浙东已有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在活动，他们对人民说“抗日”，对鬼子又讲反共，因此我们应该警惕，必须继续调查，没弄明白之前，千万不可盲动。

又探听了好多天，还没弄清头绪。我正想着怎么钻进这支队

伍里去摸个水落石出，恰巧他们招人，我就离开民校混进去当了一名政工队员。

是金是铜，这是不难辨别的。走进这支队伍的第一天，味道已经嗅出来了。他们男女混杂，整天嘻嘻哈哈，称先生，呼小姐，麻将牌推得哗哗响，那些穿高跟鞋的小姐，出来出去，无聊地谈神说鬼，还怪腔怪调地哼着唱着，叫人恶心。我虽然没见过新四军，但断定党所领导的军队决不会这样。

几天过后，我终于弄清了这支队伍的来历。它的头目，名叫薛天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余姚办事处主任。办公机关叫“宗德公署”。不久以前，他们在海上截获了两只货船，发了笔横财，就势挂起了“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的招牌，招兵买马。真相大白，我今后应该怎么办呢？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一天，走到街上，忽然听一些人在议论，说从杭州湾以北过来了队伍，六月十八日在相公殿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得全胜；过了一个星期，日本鬼子从庵东出来找他们，又被他们打败了。

这又是什么来历的一支队伍呢？我挤进人群，很想探问个仔细。一位飘着白发的老头说：“什么队伍，说不上，叫什么五支四大。哎，这年头，队伍的名目越多，老百姓受的罪越多。过来了，还不是派款、派饭……”这时一个年轻人插嘴说：“阿公，听说这队伍好哇！不拉伕，不派饭，不近女流，买卖公平。”

“嘿嘿！”那老人笑了两声，再没说下去。这笑声象是在说：青年人没经过冬夏，不知冷热。

我走回住处，又浮起这样的念头：这个“五支四大”，会不会是我们党的部队？会不会是新四军呢？地下党组织曾经说过，我们的部队过来，最初不会公开身分，可能以各种名义出现。我应该用什么办法去了解它呢？

办法还没有想出来，就听到宗德指挥部传出话来：“薛老板到姚北海边去设税卡的打算又灵啦，在那儿打日本佬的五支四大也给薛老板收编了。”一打听，果然是事实，委他们的番号是四大队，

另外还有个三大队。这消息使我失望。这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新四军,我也无心再去打听了。

七月七日那天,宗德指挥部政训处主任口传薛老板的命令,要他带领政工队,马上到新收编的部队去工作。这个政训处主任很阴险,不仅爱财如命,而且还是个反共专家,每天一早起床,就领着大家象念经一样唱国民党党歌,还说共产党的坏话。我们走到半路上,他“训”起话来了:“……那支部队有点红,你们要格外小心!”

听到一个“红”字,我心里一怔。难道说,这支部队是我们的?是进步的?想到这里,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又在心里回升。我的脚步,似乎突然轻松了许多。

可是,赶到这支部队一看,又有点令人失望,看不出它红在哪里。穿戴不整,枪支长短不齐,领导人欢迎我们的时候,口气和宗德部队当官的差不多。会开得冷清清,大家脸孔铁板板。特别出人意料的是,欢迎会草草结束后,没等我们好好歇口气,一声“出发”命令,部队拔脚就走了。

队伍顶着灰暗的夜幕向前走,经过一村又一村,越过一河又一河,政工队的先生小姐们吃瘪了,尖皮鞋把脚磨起了泡,旗袍的岔子撕到腰,叹气声,骂娘声,一路不绝。我自己虽然受过一些艰苦锻炼,但也受不了这样厉害的“见面礼”,汗湿了衣服,气喘不过来,迈步千斤重。而这支部队的人呢,简直是跑夜路的老行家,好象火车头一样直往前奔。

这一夜,足足走了近百里,天亮到了一个村子。我们那些人狼狈不堪地从后面赶上来,连饭也不吃,一头倒下就睡。睡醒起来刚吃下几口饭,准备出发的口哨又吹响了。

“赤佬,依搅七念三,把阿拉找来,自家倒跑啦!”一个政工队员在背地里责骂政训处主任。

“伊拉瘪三!”另一个队员把饭碗猛向桌上一搁:“阿拉到税卡上歇歇去。”

连续的行军,风雨无阻,每夜几十里、上百里。几天过去,政工

队的人，由于政训处主任在队伍出发前就逃掉了，有的借故生病留在老百姓家里，还有的进了税卡再不来了，最后只剩下我独自一个。这时，我才警觉到，这支部队把政工队当作贴在脚底板上的烂臭泥一样，恨不得立时甩掉。他们为什么要甩掉政工队呢？这是不是和政训处主任讲的“有点红”有关系呢？我决心咬紧牙关再跟着走几天，任你走得再快，我偏不让你甩掉，一定要看个究竟。

跟着，跟着，但和他们之间依旧隔膜着。我主动去找些事情做，以便和他们打成一片。每到一地，就去做群众工作；没有卫生员，我就背起了医药皮包。反正这个秘密我一定要揭穿！

有一次休息，我发现一个队员磕坏了脚踝，便去给他包扎。谁知道他竟鄙薄地说：“太太，碰破块皮值不得大惊小怪！”听见他叫我“太太”，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又想趁机从他嘴里勾出一点情况来，便故意激他说：“你不上药，是不是不想打日本佬呀？”

他连忙大声申辩：“你点起灯笼访一下，相公殿两次打鬼子，我装过熊没有？”

我看到勾出一点话头来了，就不松口地问：“你们真在相公殿打过鬼子？”

“怎么会假！”他拍打着手里那支三八式步枪，自豪地说：“喏，你看这就是我缴来的！”他唯恐我不信，接下去讲起那两次战斗的经过。从打埋伏说到战后当地青年盐民的热烈参军，越说越有劲，还不住地表演。我正想从这个“缺口”突进去，问问他们这支部队的来历，他却“哎呀”了一声，原来他的手乱比划，让枪托碰痛了伤口。“缺口”又被封住了。

有一天，刚刚宿营，发现鬼子来偷袭，领导上见处境不利，不能硬顶，连忙转移。谁知行动不久，一场暴风雨来了，立时地下积水漫过脚面，部队到达相公殿附近，又发现敌情，只好淋着大雨折回再走。走了一程，前面被一条河挡住。这时，林大队附喊了一声“淌过去！”便领头跳下河。全队的人，立刻变成一条锁链，向巨流扑去。到河中间，不断有人被冲倒，但接着被抢救出来；有许多人

宁肯自己喝水，却拚命保护别人。一场搏斗，使这支部队化险为夷，渡到对岸。

天快亮的时候，来到一个村庄。队伍在风雨中一夜劳累，每个人浑身泥湿，饥饿、疲劳，急需进屋休息。可是当地老百姓根本不开门。我正使劲敲门，蔡教官在队前讲话了：“天快亮了，大家就在外面坚持一下吧，各人找一个地方避避风雨，不要再去惊动老百姓。”他的话音刚落，队伍解散了。

在闪电中，我看见门道里、房檐下，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战士们肩依着肩，背靠着背，没有谁发出任何怨言。

我站在石阶上怔住了，此时此刻，已经忘记了浑身在流水，忘记了一切，心里象有一团火在燃烧。有生以来，我所见到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少，他们谁不偷鸡摸狗，谁不作贱老百姓，尽管名称不同，都是半斤八两一团糟。可是，眼前这支队伍，怎么会是国民党部队呢？

有一天，他们在上课，我也想去听听，但还没有走拢，就看见课堂外面放着岗哨。奇怪，这个岗哨如果说是警戒敌人，为什么不放到村外去？我判断这岗哨一定是为对付我这“政工队员”而设的，便怅然地走开了。为以上这些事，我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后才下了决心，去找大队的负责人谈谈。

这天起床之后，我匆匆来到大队部门口。刚要进门，发现厢房的竹椅上坐着一个人，正捧着一本书在看。当他用铅笔在书上标注什么时，我看清他正是蔡教官。怕打扰他，我又迅速地退了回来。

走到村头，向左一看，是一片瓜田，香瓜熟了，南风起，飘来一阵阵甜滋滋的香味。向右一看，树荫下，竹林边，散坐着好多战士，他们抱着枪，有的在读书，有的用竹枝在地上划字，有的则在膝头上摊着小本本写什么。竹影摇摇，书声隐隐，这种恬静而亲切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我。我信步走到几个战士的身边。这可惊扰了他们。他们揣上本子，站起身来，有的赶忙用脚抹去地上的字迹，有

的表情很严肃，眼睛里射出警惕的光芒。特别是当他们以轻蔑的目光斜看着我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派来的指导员，我一方面对这感到愤恨，一方面又觉得和这些可爱的青年之间有了共同的感情，心里很愉快。我再也不能平静了，又转身返回大队部。

蔡教官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当他发现我之后，含笑迎上来。我真想劈面问他：“蔡教官，你们是不是新四军？”但是一看他那谨慎的笑容，想到自己还没有公开身份，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都坐下后，我看他桌上放着许多上海出版的书刊，便说了一句：“蔡教官，你们都喜欢读书呀！”

他微微一笑，说：“是啊，休息的时候，读读书倒有益处。”

彼此沉默了片刻，他问我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这下可好了，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一句：“你们的队伍很好，和别的队伍不同。”

这些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稍微挪动了一下竹椅，问道：“你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和别的队伍不同？”

“我觉得你们打仗勇敢，长官和兵士平等，上行下效，和民众的关系好。”

“喔！部队嘛，就要能打仗；打仗嘛，光凭我们这百十号人枪，哪怕尽是天兵天将，也是打不走东洋鬼子的。如果没有民众，要穿没穿，要吃没吃，人地两生，别说在浙东抗日，就是吃海边的苦水也会把部队吃垮。你说是不？”

话说得对极了，我再也抑制不住，便大胆地问：“蔡教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部队？”

他一听，笑了，平静地回答说：“我们是从浦东来的，原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现在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他的话，说的自然顺畅，仿佛已经答复过好多人了。话到此处，还有什么可问的呢？随便谈了几句，向他借了几本书，满怀惆

怅地走了出来。

四大队当中,有几个人常和我接触,其中有一个是三中队的孟班长。时间稍长,我觉察到,他似乎负有了解我的特别使命。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总是转弯抹角问我的经历,问我的家庭,我也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了一番。

这一天,他又和我闲谈,主动地告诉我,他原先在上海工厂里做工。我就插嘴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新四军。他坦然地回答说:“新四军谁没听说过,上海工人偷着去找新四军的可多啦!”我紧跟着又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当新四军?”

他望了望我,说:“为什么?我是绍兴人嘛,抗日回到家门口来抗,不更好?”说到这里,他突然反问我:“你是读书人,又教过书,可晓得工人阶级是什么吗?”

我一听这话,又惊又喜。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班长,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吗?而且这话问得这样没头没脑,我推测,很可能他是在考我,就回答他说:“从书本上看见过,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对吗?”

他似乎有些诧异,一对眼睛象汽车的大灯一样,直瞪瞪地看了我一阵,然后又憨直地笑道:“我没想到,象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平时行军走路干重活,却能和我们一样!”对于我的反问,他却避而不答。

这次谈话,又这样结束了。但是,从此以后,四大队的人对我接近些了,特别明显的是,他们上课时再不放哨了。在一次上课前,我听到他们唱这样的歌:“河里的鱼儿要水来养,老百姓的队伍要老百姓帮……”他们唱得那样熟练、那样热烈,使我听得完全入了神。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揣测、观察,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一次全面分析,觉得真相已经大白了:这支部队是我们党的武装!同时我也完全意识到,他们也已经看破了我是什么人。眼前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把我们之间的屏障揭开。

一天，部队刚到达宿营地，三大队姜文光大队长突然对我说：“钱指导员，蔡教官请你去一趟。”

我一听，连忙问：“有什么事？”

他说：“你到我们部队已经很久了。彼此之间象有些话应该谈谈，你去吧！”

看来，蔡教官在等着我了。他见我进屋，热情地招呼我坐，又征询我对部队的意见。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说：“蔡教官，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一定答复我。”

他好象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但还是冷静地说：“请说吧！”

“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我开门见山地重复了这个老问题。我想，这一下他一定会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了。谁知他顿了一下，反而问我：“你看我们是什么部队？”

“你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我大胆地说。

蔡教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审慎地看了我一会儿，他说：“钱忆群同志，你说对了，我们不是国民党部队。另外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你不是一个政工队员。现在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这句爽朗的话，使我豁然开朗，疑团顿释。自己多少昼夜的沉思、苦想，总算没有错。我们党领导的队伍来到浙东了。从今以后的浙东，势将迅速掀起一个全民的抗日高潮。烈士的血泪，人民的冤仇，都将得到应有的清算和洗雪！

我正沉浸在激动里，蔡教官又以极为诚挚的语调叫我了：“钱忆群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浙东的党，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他目光炯炯，透露出无限的热情和恳切的希望，静待着我回答。

我几乎跳了起来！此时此刻，我觉得象一个踏遍千门万户寻觅亲人的孤儿，突然听到了亲娘的呼唤一样。我的鼻子发酸，嘴唇颤抖，满腹的话一时竟被梗塞了。我很想扑上去，握住他的手：“蔡群帆同志，我是共产党员，中共余姚特派员给我的任务，正是寻找你

们啊！”可是，在白色区域，在皖南事变以后浙东的党遭受摧残的严重形势下，按照规定，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好抑制住满腔激情，说：“蔡教官，你的话我都听懂了，党，我一定能够找到！”说到这里，我才发觉自己的眼泪已经顺脸颊而下，滴滴答答地落到桌上。

蔡群帆向前走了一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同志，我们等待你的消息！”

这一夜，我根本没闭眼，想到几个月来浙东人民遭受的苦难，想到中共余姚县委组织抗日武装的惨痛失败，想到党员同志们的英勇奋斗和牺牲，想到如今有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想到胜利的未来，我巴不得马上找到县委。天，终于亮了，三北平原上晨雾初开，霞光万道，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预示着一个大好晴天的来到。我挥着汗，飞奔着，飞奔着……

四天后的一个下午，有一个穿长衫的人——我们的特派员张光走进了四大队的队部。蔡群帆伸出手来，张光也迎上前，两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进会稽山

黄 明

一组编南进支队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沿浙赣铁路进攻，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短小精干的队伍，尾随敌后，牵制日军活动。计划先进入会稽山区，建立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支队伍由原三支二大、三纵二大和朱之光在余姚新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合编而成，叫南进部队（内部称南进支队）。为了缩小目标，对外沿用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番号，其代号取支队长林达的“达”字和大队长蔡正谊（即蔡群帆）的“谊”字，简称“达谊”部队。蔡群帆任大队长兼政委，我任大队附。华一鸣以支队附的名义出面，与各方联系，搞统一战线工作。下辖四、五、六三个中队和一个直属队，共二百多人，有轻机枪五挺，长短枪二百余支，配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那时有这样的装备算是不错了。

六月六日，部队从姚北的游源出发，渡姚江经慈南、姚南转虞东渡曹娥江到上浦继续西进，经汤浦到王坛、谷来，向西穿过会稽山，到达诸暨宣家大山会合时已是六月底了。杨思一决定在枫桥江下村开会稽地区党和南进部队干部的联席会议。地方同志参加会议的有马青、朱学勉、周柏生等。会议一致认为：建立会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应以枫桥为中心。因为枫桥地区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紧靠会稽山，有利于部队游击活动；枫桥也比较富庶，军粮民食都不成问题。于是决定向枫桥进军。

二 歼灭土匪徐文达部

南进部队进驻枫桥时,枫桥镇上什么部队也没有,过了几天,才得悉诸暨西乡有个徐文达部队正向枫桥前进。据传他们知道达谊部队已进驻枫桥后,就扬言要和我们争夺这个地方,还说什么枫桥是诸暨人的枫桥,淞沪游击队应该回到淞沪地区去云云。对此,我们决定先礼后兵,暂不与该部正面冲突,主动撤离枫桥,转移到枫桥西南三、四十里的山村隐蔽。我部离开后,徐文达部就趾高气扬地进驻枫桥,还不自量力、大言不惭地说达谊部队根本不敢和他们较量,一听到他们来,就逃掉了。

徐文达部是一个土匪部队,诸暨人称之为“烧毛部队”。这帮匪徒一到枫桥,抢劫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搞得镇上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和几天前我达谊部队在枫桥镇上的景况大不相同。镇上居民十分厌恶,当地士绅,原来的镇长等也很恼火,联名写信派代表来找我们,要求我们去消灭这股土匪,甚至一天数次,上午来了,下午又来,晚上再来。最后他们把匪部驻地的地形也绘制成图送来了。为解救枫桥人民,我部决定出兵围歼徐匪。

七月六日晚,我部先移住青山头(该处距枫桥较近),次日凌晨二时,各中队由向导带路从青山头出发。徐匪以为我们达谊部队真的逃走了,根本没有想到我部却似飞将军从天而降。在他们岗哨发觉我们时,其驻地进出的道路都已经被我们的火力封锁。四面同时被我包围,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随着我战士“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话,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帮土匪平时对老百姓是穷凶极恶,无所不为,而面对我人民战士的英勇气势和真枪实弹,却怕得发抖,垂头丧气。有几个顽抗的,都被我们打死了。六时许,战斗结束。该匪部除外出的一个排逃跑和被击毙的外,其余二百余人全部被我俘虏,集中在镇东南角塔山下的民教馆内。计缴获长短枪约一百五十支,各种子弹近万发。检查我们自己的

队伍,无一伤亡。枫桥群众看到我们打了胜仗,清除了徐文达匪部,非常高兴,杀猪杀羊来慰问我军。

关于俘虏的处理,根据党的政策,在两天里逐个问清情况后,晓以大义,大部释放,衣物、现金、手表等一概发还。有几个青年妇女,是被骗来搞什么唱歌宣传的,经过教育后,一律释放。

徐文达匪部被歼以后,南进部队的任务是:一、进一步从各方面熟悉枫桥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二、开展群运工作和统战工作;三、发展队伍,壮大力量。

为了熟悉枫桥一带的地理环境,我部不是固定驻在枫桥镇,而是以枫桥为中心,经常朝东朝西,向南向北流动。我们在枫桥镇设了一个办事处,以便与各方联系。部队活动东到会稽山中的皂溪、苦竹溪,西到浦阳江边的赵家埠、姚公埠一带,南到陈蔡、斯宅附近。北到绍兴的屠家坞、古兰亭等地。所到之处,群众都热烈欢迎(地下党同志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我们部队的军风纪好,又为民除害,积极抗日,还助民劳动,所以,当地的人民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越来越靠拢。

在统战工作方面,华支队附主动与国民党枫桥区的王区长、璜山区的祝区长以及一些当地著名人士取得联系;国民党诸暨县长来枫桥视察,我们也以礼相待,热情欢迎;如此等等,扩大了影响,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我部到达枫桥后不久,淞沪游击队指挥官薛天白也带了他的二、四支队来到枫桥,驻在枫桥区的上京村。我们用的是淞沪游击队三支二大的番号,名义上薛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因此华一鸣特地去向他报告。薛承认我们是他的部队是为了利用我们这部分力量,藉以扩大他的势力。我们则顺水推舟,利用他这块招牌,作为我们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合法依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部到枫桥后,即与乡居在花明泉的何燮候老先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何老先生是一位力主抗日、同情我党的开明人士,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在诸暨一带很有名望。当时

国民党顽固派造谣中伤,诬蔑我党我军是“奸党”、“叛军”,而这位何老先生却敢于仗义执言,公开称赞八路军好,新四军好,说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爱民救国的。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说的话比我们自己说更有力,更有影响。结果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愿望相反,群众(包括一些开明士绅)看到我军纪律严明,又敢于打日本鬼子,很有风趣地说: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是这样的话,那又有什么不好?!

在扩大队伍方面,自全歼徐文达匪部后,特别是后来在八月二十日给鬼子以重大打击后,当地就有许多青年自动报名参军。但我们绝不滥收,尊重地方同志的意见,一般必须通过地方同志介绍。不仅有从诸暨本地来的,还有从绍兴来的,从嵊县来的,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人员增加到三、四百,把缴获来的武器全部配备给新参军的同志还不够。

那时,杨思一也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主要是领导地方党,在部队里的名义是秘书长,一般不公开出面。他在部队中的威信很高,大家都很尊重他。

三 龙凤山痛歼日寇

八月二十日,南进部队进驻阮家埠。上午八时,忽报有一股日军从涓池出发,已经到了西斗门。不久,听到西边有枪声,而且一阵紧似一阵;接着诸北四乡自卫队派人前来求援,说他们在山下湖附近和鬼子打起来了。

诸北四乡自卫队是由地方士绅钱之桢、赵静波等出面组织,实际上是在我们党控制下的抗日队伍。我党诸暨县委书记朱学勉就在这个部队里担任指导员,还有何文隆、骆子楨、骆子钊等也在该部担任领导工作。南进部队一到诸暨,就和该部建立了密切联系,所以支援他们是责无旁贷。大队长立即作了战斗部署:由我带领五中队先上山警戒;大队部跟随华支队附带电台立即转移,由六中

队掩护、警卫，到大宣村会合；大队长亲自率四中队上阮家山。我和大队长在地上会合后迅速前进，在到达阮家山最西的山头时，发现西边还有两座山。问了当地老百姓，才知道一座叫龙山，一座叫凤山。这两山间的山岙小村中似有日伪军走动。此时枪声已逐渐稀疏消失。蔡大队长和我分析情况，估计四乡自卫队已和这股日伪军脱离接触了。于是，他决定：四、五中队分道前进，他带领四中队，迅速占领对面山头，然后出其不意，居高临下攻击小村中的日伪军；我带领五中队，经长山到鸡笼山一带设伏，堵住敌人退路。

这时，四乡自卫队确已转移。鬼子正在这个小村里搞吃的，有的兽性发作，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找“花姑娘”。敌人根本想不到竟然还有敢打“皇军”的部队。蔡大队长率四中队前进到距敌不到一百公尺时，就令队伍散开，出敌不意地对日寇猛烈开火，一下子就打倒了好几个鬼子和伪军。这一突然袭击，使鬼子乱了套，急急惶惶地向村外逃跑。四中队紧追不放，又打倒了一些敌人。我军进村时，一个老百姓向我们报告，说有个鬼子还躲在他家里。蔡群帆叫四中队长派人去抓，自己则又带着部队去追击敌人。

钱中队长派区队附张贤生带了几个战士去抓那个鬼子，把躲着鬼子的那个房子包围起来，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个鬼子不但不投降，反而凭窗顽抗，我们就把他打死了。从他的符号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一个少尉军官，名字叫“柳泽春夫”。

蔡群帆带了四中队继续追击，一路上又抓了一些伪军和汉奸。当地老百姓也把逃散的伪军和被鬼子抓来的民夫抓了起来，送到四中队，共有十余人。后经查明凡是民夫，全部释放；枪毙了几个有民愤的汉奸、伪军，其余的也放走了。

从龙凤山突围逃走的日伪军，沿着枫桥江河堤向涓池方向逃跑，我五中队战士正在敌人的必经之地——鸡笼山阵地上等着他们。鸡笼山是枫桥江河堤旁的一个小山岗，高不过数十公尺，五中队战士就埋伏在这里。鬼子从龙凤山逃出来时，我们老远就看到了。针对敌人的行动，我们调整了部署。二区队长刘祥根抱着一挺机

枪伏在山岗上,对准鬼子。当敌人隔河距我只有七、八十公尺时,我喊了一声“打!”机枪首先发挥威力,接着同志们的步枪,对准各自选定的目标射击,敌人立即一个个倒下去了。鬼子遭我伏击,不敢前进,隔河相持了约半个多小时后,在河边搞到了一条船,七、八个鬼子竟想乘船过河来夺我五中阵地。刘祥根把机枪移了个位置,隐蔽瞄准这只小船,当小船离岸只四、五公尺时,就对准这船上的鬼子夹头夹脑地扫了一梭子弹,立即“报销”了四个鬼子,还有几个哇哇直叫,跳水逃跑。河对面还没有上船的鬼子不敢再下水夺船,只是隔河向我方射击。在双方对射中我们也略有伤亡。

在这次战斗中,不能忘怀的是当我们和鬼子激战时,从鸡笼山下村中来了两个青年,冒着纷飞的子弹,送茶水上山来给我们解渴。我在感谢之余,劝两位青年赶快离开阵地。他们却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有你们在这里,我们就不怕。”仍然背着茶桶从这个班送到那个班,从这个区队送到那个区队。为了抗日,他们不惜冒生命危险来支援我们。这更使我坚信,人民是拥护抗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鬼子想从五中阵地通过是万万不能了,于是悄悄地沿着河堤溜进一个村子,凭着房子和树木的掩护逃走了。我一看手表,已是午后四点多钟,这里离敌涓池据点不太远,为防止鬼子增援报复,就下令撤出阵地。

我军胜利归来,当地群众亲眼看到“达谊部队”打死打伤许多日伪军,还活捉了十多个汉奸和伪军,都兴高采烈地挑茶水慰劳我军,有的还拎着一篮篮煮熟的鸡蛋、糕点塞给正在行军的战士,充分体现我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的亲热气氛。果然,在我们退出阵地后的当天晚上,涓池的鬼子大队出动,到鸡笼山杀人放火。从此以后,鬼子再不敢轻易到这一带来骚扰了。

四 江下、潘村自卫战

八月下旬,南进部队电台报务员夏同志病逝。我们向三北游

击司令部打了报告，除了要求派电台工作人员外，并要求加派军政干部来加强领导。不久，司令部派来了三名干部，一位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浙南斗争的老干部余龙贵，领导上指定由他以支队参谋长名义负责南进部队的军事指挥；另一位是肖松林，派他去八乡自卫队当大队附；再就是电台台长王平。余参谋长来了以后，军事工作主要由他负责，我就侧重搞部队党的工作。这时，从诸暨、嵊县等地来参军的青年日益增多，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他们编到班里后，文化高一点的有的当班长，借以发挥他们的长处，在班里做政治文化辅导员；有的安排在大队的政工队、民运队里。

自从八月二十日在龙凤山、鸡笼山和日本鬼子这一仗以后，引起了各方面对达谊部队的注意。日本鬼子也知道诸暨东北乡一带有一支抗日部队，集中兵力发动了几次“扫荡”。

鬼子的“扫荡”，犹如盲人骑瞎马，是不容易找到我们的，而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却了如指掌。根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我们和鬼子打圈圈捉迷藏，有利时机就咬他一口。由于有群众的帮助，鬼子多次“扫荡”都未能损伤我们一根毫毛。

注意我们这个部队的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鬼子沿浙赣线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拥兵数十万，不到两个月就失地千里。但对于人民抗日武装，他们却凶相毕露，千方百计企图消灭我们。九月中旬，我们得到国民党奋勇队将从义乌来诸暨，扬言要消灭我达谊部队的消息。我们抗日何罪？真是岂有此理！九月十七日从璜山方面送来情报，说是这个奋勇队已到璜山湮浦，有二千多人。其司令叫刘人奎，下面有个团长叫何卓权，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十九日奋勇队进入江下、潘村一带。我部驻在枫桥东南的花明泉村，严密注视敌人动向。当晚其前哨已到花明泉隔河相望的赵家；在花明泉的东南方向，也发现有奋勇队的一部；又传枫桥和花明泉之间的某村也到了奋勇队的先头部队。至此，奋勇队对我已形成三面包围。我们领导上一致认为，必须打退奋勇队的进攻，才能站稳

枫桥这块抗日阵地。十九日晚,最后决定采取中心突破的战术,避开奋勇队设在赵家的前哨,抄山路、小路,直插潘村、江下,打他的司令部和何卓权的团部。具体部署是参谋长带领五中队进攻潘村,我带领四中队进攻江下,蔡群帆带领六中队作预备队,华一鸣、杨子渊等带领直属队随战斗部队一起行动。

九月二十日清晨四时,江下、潘村两处一齐打响,潘村方面开始很顺利,五中直冲何卓权的团部,冲散了对方的一些部队,缴了一些枪支,但没有摧毁对方的主力。天渐渐亮了,对方发现我们人数比他们少,就开始组织反扑。何卓权部有七八百人,超过我五中、六中五六倍。敌我兵力悬殊,我部被分隔数段,十分不利。到中午时分,大队直属队及五中、六中陆续撤出战斗。但损失不小,五中队附张震在指挥队伍后撤时,不幸中弹倒下;区队长刘祥根前去抢救,张震连呼“你们快走,你们快走,我来掩护!”连打了几排子弹后,终于英勇牺牲了。电台台长王平为保护电台也光荣殉职。跟随王平的小通讯员潘金根,拣起王平的手枪、子弹,背着电台边打边走。最后子弹打光,手枪拆散抛弃,人被反动派抓去。他坚强不屈,被反动派剖腹而壮烈牺牲。

江下村是奋勇队的司令部驻地。四中接近江下后,留一个班一挺机枪守在江下村东边的小山头上,其余统由四中队队长钱俊率领,在早晨四时由江下东边小山直冲刘人奎司令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江下的奋勇队全部肃清,抓了二十多个俘虏和缴了二十多条枪。在进攻时,中队长钱俊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抢救不及,不幸牺牲。

四中回到花明泉的当天晚上,大队部派杨子渊来看我们。告诉我们大队部和五、六中队已在大宣集中,预定次日到全堂,要我们也按时到全堂集合。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当四中队押着二十多个俘虏,背着缴获的武器来到全堂时,全大队的人都很高兴;但当知道钱中队长已经牺牲时,又非常悲痛。

我部在这次自卫反击战斗中,虽然缴俘数大于损失数,但是牺

牲了几个年轻英俊的干部，总不免有损失太大之感。二十二日由大队长领队，全体指战员向死难烈士默哀悼念。

我们失去电台，与三北游击司令部的电讯联系中断了，为了沟通对上级的联系，即将战斗经过写成书面报告，由朱之光专程去三北司令部汇报。

五 路西失误

浙赣铁路在诸暨县境内大体是与浦阳江平行南北穿过。由于鬼子占了浙赣铁路，就被分割成路东路西两个战略区。江下、潘村战斗以后，我地方党的负责人马青派人来告诉我们，诸暨西乡新近出现一个土匪部队，有一、二百人枪，匪首叫章西夫，对老百姓敲诈勒索，西乡的人民群众很是痛恨。党组织已派同志打进章部，而且掌握了一部分队伍。但力量太小，希望南进部队挺进路西，里应外合，消灭这些土匪，为民除害。杨、余、蔡完全同意马青的意见。

十月十日，路西方面送来情报说是章西夫部驻在三都西南的某村，把章西夫部驻地的详图连岗哨位置也画来了。我们认为去歼灭章匪所部是有把握的。于是决定当天夜里穿过浙赣线，准备第二天拂晓包围章部，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之。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那天白天是晴天，到夜里竟下起雨来。四周一片漆黑，我指战员虽然臂上都缠了白毛巾，也常常失去联络，耽搁了很多时间，还未到白门，天就亮了，拂晓进攻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为了不暴露我部意图，临时选择在一个山岙小村隐蔽起来。哪知不测的风云又加上了不测的敌情变化。前一天的情报表明这一带并无日伪军，可也就在那天晚上，我军驻地附近到了日军，占领了我们后边的小山，构筑起工事。我部进村休息之时，参谋长余龙贵从望远镜中发现村后山上有人走动，而且人数不少。蔡大队长和我都出来观察，证明山上确有异常活动。于是立即通知各部分三路迅速撤离小山村。这就暴露了我军的行踪。章西夫部的驻地距我仅十多里路，害怕

被我吃掉,就立刻逃跑。等到我们得知前去包围时,他们又逃到别处去了。在凤村被我们追上,也只消灭其一部分,缴获二十几支枪。自此,章部更加狡猾,甚至一夜数迁,追剿更加困难。

十月二十日左右,接到枫桥被奋勇队所占,要我们迅速返回的通知。与此同时,路西地方同志送来情报,说是诸暨路西各乡的游杂部队已联合起来,勾结奋勇队来包围我部。根据新的情况,几个负责同志决定通知各部队从现阵地撤下,令五中在前,四中在后,诸北八乡部队和六中在西边,取山路向南转移。第二日,天色微明,所有部队都到了青口街汇齐。为了迅速跳出包围,部队继续向南转移,当天到达诸暨南乡的里坞底;晚上又由里坞底向西南,经唐仁到边村;白天休息,夜里又翻过山岭,进入浦江县境。

到路西去的目的是歼灭章西夫等土匪游杂部队,结果不但没有全歼章匪,反而枫桥被奋勇队所占,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六 转战义乌北乡

我部进入浦江以后,在旌坞附近休整,研究部队的行动计划。有三个方案:一是重回路西,这不妥当,因为那边的游杂部队已联合起来,我们一口吃不掉,如拖延时日对我不利。二是由浦江向北,经应店街折回下北乡,但对这方面敌伪顽的情况不明,不宜盲目行军。三是由现驻地向东南,经白马桥傅宅穿过浙赣路先到义乌北乡,在那里可以找到义乌地下党,同时据悉奋勇队确已转移去枫桥,那么,我们可以从义乌北乡进入诸暨小东区,打击奋勇队的后方。讨论结果,大家认为第三个方案最好,乃决定由浦江去义乌北乡。

部队从浦江旌坞附近出发,二十三日夜穿过浙赣路,当部队快到楂林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是楂林有日本鬼子。由于对周围情况不大清楚,就通知各部就地休息,不许打开背包,也不许解下子弹带,“枕戈待旦”。并要求炊事班立即起火烧饭,保证在早晨四点钟前开饭完毕,以防不测。

自从四中队长牺牲后，由我兼任四中中队长。我在大队部讨论完毕回到四中队，刚躺下休息，通信员又紧急通知我去大队部。参谋长告诉我，苏溪的日军出动，可能在拂晓前到达龙旗山，大队准备立即转移，由四中担任掩护。我接受任务后，跑步回到四中驻地时，大家已吃饭完毕，就叫中队附李树海先带两个区队到村西南的村口小山上散开；我自己带着三区队上了村口小山。此时天已微明，发现远处从苏溪的来路上有部队运动，李树海比我看得清，指明这是日本鬼子。于是，我就命令各区队各班就地隐蔽，不准暴露。鬼子越走越近，距我只有七、八十公尺时。我喊了一声“打！”机、步枪就一齐响了起来。鬼子遭我突然袭击，都趴在地上还击，不敢抬头。鬼子处境不利，就撤退逃跑。李树海要求带一区队去追击，我同意他的意见。同时命令机枪手掩护他们前进。这时，我自己由于举手指挥，大声呼喊而暴露了目标，只听得脚下“扑嗤”一声，左小腿好象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站不住了，就坐在地上。一个通信员说：“大队附，你挂彩了！”田指导员得知我负了伤后，立刻找来一块门板，派两个战士把我抬下阵地。我要田指导员转告李树海注意，这里离苏溪和楂林的敌据点都不远，不可远追，只要掩护大队都转移了就立即撤出战斗，跟上大队。

没多久，李树海完成任务，带着部队跟上大队。他们高举着缴获的四支崭新的日制三八枪，还打死了四个鬼子。我们离开龙旗山后一个多小时，鬼子从苏溪出动，迁怒于当地人民，竟把龙旗山的村子烧光。

七 重回三北

我腿部负伤后，每天都要抬着走，部队要继续行军作战，这对部队的负担太大，就主动提出让我留在义乌隐蔽养伤。杨、余、蔡都同意了。这样，我就离开部队，几经周折，到了义乌廿三里，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求医于当地一个叫王仲文的医生。

龙旗山战斗以后,部队克服重重困难,由义乌北乡经东阳北乡、嵊县西乡返回诸暨北乡。其时,三北、四明方面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先后派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来浙东工作,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浙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方面察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了三北,就从钱塘江北岸调忠义救国军艾支队和金山、平湖县自卫总队以及收编的太湖土匪王八妹部共两千余人来到余姚,他们自恃人多枪多,向我三北部队步步进逼。何、谭首长集中力量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十一月间,命令南进部队迅速返回三北。南进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从诸暨北乡昼夜兼程进军三北,正赶上参加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

南进部队留在诸暨的一些伤病员在马青的组织领导下,被编入重新组成的队伍。因为这个部队的成员是三支队和诸北八乡部队遗留下来的人组成的,所以当地群众爱称为“小三八”(也有叫“小三北”的)。至此,南进支队完成了南进会稽山的任务投入新的战斗。

杨葛殿痛击日寇

张季伦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半夜光景，我带着四支队随司令部从鸣鹤场转移宿营地，连续爬了几座大岭，大家都已感到十分疲惫了。突然司令部传下了口令：“同志们，加把油，山顶上就是目的地。”果真，山顶上矗立着一圈黑黝黝的高墙大屋，这就是三北有名的“杨葛殿”。

部队一进殿，道士道姑们不知来了什么部队，纷纷在殿内东藏西躲。我们赶忙解释：“不要惊慌，我们是三四五支队，借宿一夜”。道士道姑们才连连点头。

战士们沉睡了不久，突然山下“叭喷！叭喷！”响了两枪，紧跟着一个哨兵奔入殿来报告：“支队附，日本鬼子攻山啦！”我立刻命令战士们起床。顿时，杨葛殿内外哨音声脚步声混和着敌人的三八枪声。何司令进殿来对我说：“张季伦，你组织四支队阻击，马上抢占殿前各个山头，掩护司令部撤退到竹山岙，刘发清带一挺重机枪归你指挥。”

“好吧！”我拔出木壳枪，推上子弹，奔到大殿门口召集各中队长交代任务。

白茫茫的晨曦中，战士们向前山快步奔去。一忽儿，刘发清带了重机枪来到我面前。他是“红小鬼”出身，一听说打仗，就把袖子卷到上臂膀，木壳枪横插在胸前，向我说：“老张，怎么干哪？”我说：“老刘，跟我跑！”

部队按照命令把山头全控制了。刘发清的重机枪也架上了山巅的突出部位。

我到四支队不久,对这支部队的战斗作风还不大了解。我想,对于阵地、士气、武器都得细心检查,可不能疏忽呵!

我去察看阵地,战士们一个个卧倒在岩石间,大树后,竹林中。有个战士看见我抬起头来问:“首长,是打日本鬼子么?”我说:“是啊!打鬼子,你见过日本佬吗?”他轻声说:“见是见过,只是战场上没交过手。”“好,那今天比一比,看看是日本佬厉害还是你厉害。”

猛然间,我发现阵地左斜侧有条隐蔽的山道没人扼守。如被敌人突破,我们的侧后就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好险!我马上抽出一个班,带一挺轻机枪去守住山道口。

天色大亮,云雾消散了,山头抹上一层红色的阳光。这时候,敌人开始进攻了,对面高地上掷弹筒和重机枪轰轰隆隆的响了起来,接着山下就发起了冲锋。从毛竹林的空隙中,可以看见穿黄军衣的鬼子和伪军从各条山卡里向上涌来,嘴里还哇哇地叫着。

我提着木壳枪,一面窥视敌人的动静,一边命令部队暂缓射击。

鬼子靠近过来,唰地散开了队形,向各座山头进行短距离冲锋,敌人的嚎叫声响遍山间。到可以辨清敌人的脸形时,我就命令部队开火,东西二侧,步枪声和榴弹声相继而起。正面刘发清那挺重机枪喷出了长长的火舌。

敌人遭到突然打击,队形立刻混乱,几个举着指挥刀的指挥官,急忙让部队麇集到山洼里。伪军腿长跑得快,鬼子也不落后,涌成一团,有的还不管死活向丈把高的岩石下跳。在他们逃走的路,留下了七八具尸体。但沉默了不到十分钟,几把明晃晃的指挥刀又逼着鬼子和伪军钻出死角,步步逼上山来。当他们进入我机枪火力网时,我们的机枪咆哮了,弹丸密似雨点泼向敌人,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候,左侧两挺轻机枪突然不响了。我回头一看,糟糕,发生了故障,四个机枪手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对着卡壳的机枪发楞。敌人就乘机一涌而上,敌人的榴弹有的扔到了我们的阵地上;有的被毛竹林挡了回去,在半空中炸开火花,眼看着就要和敌

人进行白刃战,我连忙跃出掩体,站立在阵地上,高举木壳枪大声呼喊:“同志们,用榴弹步枪拚啊!”在不知不觉中,我打完了木壳枪子弹,扔了四五个手榴弹,烟火碎石蹦得使人睁不开眼睛,我只有依靠耳朵辨别情况,听着鬼子惊叫着向山下败退,战士们在呼喊:“退了,退了,死了两个……嘿!又倒了三个……打呀!”接连又是轰隆隆的榴弹爆炸声。

在阵地上激战的时候,这种呼喊真能振奋人心,我擦了一下眼睛,向四面环顾,见几个战士半身露出掩体,在瞄准射击。山坡上横倒着敌人的十几具尸体和二十多个伤兵……

面对这幅景象,使我忽地想起了罗炳辉师长的话:“胜利是鼓舞士气的法宝”。我立即在阵地上穿梭起来,因为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有双重意义,一是消灭敌人,二是锻炼部队。我热情地向战士道贺打得好,战士们也兴高采烈地向我报告战果。

短时间的欢腾以后,突然左斜侧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正面失利,就转到后山去摸小路了。这正是后来派去的那个班扼守的位置。我急叫三中队长指挥正面战斗,自己带了通讯员跑步去观察。跑到那里一看,只见班长脖子上挂着轻机枪,站着向敌人扫射,战士们也沉着地打着枪。他们面前已经倒下了七具鬼子的尸首,还炸破了一面太阳旗。

战斗持续四小时,打退了敌人七八次冲锋,阵地前敌人已死伤了一大片。可是,敌人并未停止攻击,进攻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杨葛殿阵地的一部分已被鬼子占领,再打下去,对我们不利,我就命令部队向竹山岙转移。但后路已被敌人封锁了,我率领一支突击队往昨夜的来路杀下山来。碰巧,沿途通行无阻,我们安全地转移了。

我们转移后,敌人即占领了杨葛殿,奸污了十多个道姑,并把她们杀死,最后放火烧了杨葛殿。这是日本侵略者在浙东的又一次暴行。

杨葛殿一仗,军威大震,群众纷纷歌颂这次战斗,还编了许多

歌谣：“三四五支队赛神仙，杨葛殿消灭鬼子二三千……”当然这是夸大了，实际上我们只杀伤了日伪军几十名。四支队从这里起步，树立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在以后浙东武装斗争中，和三支队、五支队一样，成为一支能战能守、顽强不屈的部队。

梁 弄 战 斗

刘 亨 云

攻打梁弄，是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事。梁弄战斗，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首次攻坚战载入战史，为浙东人民所称颂。

梁弄是姚南山区的一个拥有一千多户人家的大镇，山区大宗土特产品在此集散，市面很热闹。该镇地处余姚、上虞、嵊县、奉化、鄞县、慈溪六县边境，四面环山，扼有多条通道，在军事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盘踞梁弄的伪军，属伪第十师第三十七团一营，下辖三个步兵连，及归其指挥的团属情报队一部，共二百余人，配有轻机枪八挺。这股伪军是乘我们集中兵力在三北进行自卫作战时钻进四明山的，妄图牵制我军力量。敌人的兵力部署是：一连驻守在洞桥、民教馆、横街祠堂以南地域；二连驻守在横街祠堂、阴功会、关帝庙地域；三连驻守在狮子山；营部设在横街祠堂。他们盘踞在梁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并在梁弄周围遍设税卡，敲诈勒索，使本来就苦于粮价昂贵、山货低贱、度日不易的山区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了。

为了解救四明山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打击敌伪的猖狂气焰，开辟四明山区的抗日新局面，区党委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决定攻打梁弄，拔除伪军安在四明山腹地的据点。

战斗发起前，我率领参谋处有关人员和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大队的中队以上干部去实地察看地形。敌人经过四个来月的苦心经营，自称筑起了牢不可破的“马其诺防线”。自然，这是一种可笑的自我吹嘘。但是，对于我们这支只打过伪军据点小越的年轻的游击队来说，要攻下眼前的防御工事，确实是相当棘手

的。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有着完整火力配系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敌人不仅利用镇上原有的关帝庙、横街祠堂、民众教育馆、阴功会等较为坚固的建筑物作为依托，设置了鹿砦、拒马、寨栅等障碍物。而且在民众教育馆西南侧和镇西北狮子山的102高地上，各构筑了一个永久性的碉堡，其周围还修有地堡、堑壕、交通沟，拉起了铁丝网。这样的工事，除少数同志外，都是第一次见识。我们利用了山区交通不便，敌人孤立据守的弱点，以参谋处人员为主，在地方党同志的密切配合下，反复而又细致地查明敌情，绘制了包括敌军兵力分布、工事构筑、火力配置等内容的详图，发给部队研究讨论，献计献策。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制订作战方案。

四月二十二日晚，参战的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大队及姚南办事处所属的自卫队，按各自领受的任务开始行动，指挥所向镇东的金子岙挺进。这天，天黑后下过一阵大雨，雨过云散，部队踏着泥泞的山道，借着朦胧的月色，于二十三日凌晨一时到达进攻出发地金岭下。这里距离梁弄镇只有四公里。部队立即按作战计划分三路接敌。开头，进展比较顺利，由中队长肖松林、指导员骆子钊带领的三支队六中队，经金子岙，迅速占领了镇南铁帽山，控制了主要阻击阵地；由中队长都曼令、指导员姚三林、副中队长李树海带领的三支队四中队，于凌晨三时静悄悄地在敌人设置的篱笆栅、铁丝网等障碍物中开辟了通路，直扑狮子山；我带领三支队主力及特务大队，已隐蔽地接近梁弄外围，等待四中队发出夺取112高地的火光讯号，以便统一行动。

同一座狮子山，有两个隆起的山峰，一北一南，北高南低。敌人的防御部署是北轻南重，北边只有堑壕和地堡，摆了一个班。我侧着耳朵，久久地凝视着狮子山方向。忽然，火焰升起来了，红光在拂晓前的天际显得更加耀眼。

火光便是命令，我当即指挥三支队主力和特务大队发起攻击，分别猛扑敌横街祠堂、关帝庙、民教馆等主要支撑点。

原来，都曼令所率领的四中队一枪未发解决了敌人的一个班，

占领了 112 高地。并当即以此为依托，向敌主阵地发起攻击。不料，四中二区队燃草向上级报告已占领 112 高地时，把敌草房烧着了，敌三连的另两个排也进入 102 高地阵地。因此，当我三区队首先向 102 高地冲击时，遭地堡、堑壕里敌人的猛烈火力射击，三区队冲击受阻，伤亡三人，区队长王志强英勇牺牲。接着，又组织了三次冲击，虽都有进展，但均未能攻破敌永久性碉堡。第一次打开了篱笆栅和铁丝网的缺口，被阻于鹿砦前。第二次占领了高地东侧敌前沿阵地，给敌以杀伤并将其逐出堑壕，但先前打开的缺口遭敌封锁，后续部队无法接应。第三次突击部队被敌人运用高碉堡的多层火力压制于碉堡之下，一区队长张懋功等五位同志在反复冲击中光荣牺牲。此时，天色大明，更有利于敌高碉堡居高临下发扬火力。我同意三支队长余龙贵的意见，抽调六中队一个区队配合四中队，待黄昏时再行组织攻击。

负责正面攻击的各路部队，也都未能攻克预定的目标。其中攻击民教馆的特务大队第一中队，在进抵民教馆近旁时，遭敌永久性碉堡和敌占楼房密集火力的夹击，攻击力量受到损失，中队长黄玉负重伤。天明后，经与大队干部研究，决心利用所占楼房，以火力对火力掩护部队再次冲击，并点燃了煤油辣椒抛掷敌方，想借此使敌人睁不开眼，削弱敌人的火力。却又因我方射界不良，加之风向不顺，效果不佳，未能奏效。

这时，暮春的太阳已经冲破薄雾爬上山头。我知道，余姚、百官两个较大的敌据点，都在梁弄数十里之外，敌人一时到不了援兵，而且我地方自卫队预有准备，可以节节抗击，暂时并无后顾之忧。尽管如此，我的内心还是有些着急的。正当我们研究和部署第三次突击时，忽然听得余旭参谋招呼我说，〇一、〇二两位首长来了。我回头一看，果然是何司令、谭政委，他俩正迈着大步朝我走来。我连忙赶上去与他们握手，不等我开口，谭启龙便以平静的口气对我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本来就是准备打硬仗的。”说着，他看了看何司令，问我：“付了一些代价，是不是找到敌人的弱

点了？”

刚才，我们研究的也正是这一点。于是，我就向他们汇报了下一步的决心。他俩沉思了片刻，点着头交换了一下眼光，表示赞同我们的决心。应该充分利用街道、村巷、民房，步步为营，实施白昼连续突击，不让敌人喘气！接着，他俩又和我们一起研究确定：以特务大队少数兵力，由指导员吴锡钦带领佯攻民教馆、关帝庙，迷惑、钳制敌人；以三支队及特务大队主力，采用逐屋打通民房，避开敌主堡、地堡、高屋楼房的火力，稳步逼近敌人，然后以白刃格斗的手段歼灭横街祠堂之敌。

部队按照新的部署行动起来了。各部队在群众的协助下，逐屋破墙穿越而行。当接近街道尽头时，听得隔墙有敌人的吆喝声。无疑这是最后的一堵墙了。我们悄悄地集中了一些体力最强壮的战士，一律放下锄头、铁锹等工具，不声不响，来了一个合力推墙。只听得一声巨响，好大的一堵墙倒塌了。事有凑巧，那倒塌的高墙，不偏不倚正好覆盖在墙外敌人的一个地堡上。地堡里一个排的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震响和猛砸下来的砖石、泥土吓傻了眼，顿时慌作一团。几乎与此同时，战士们踏着破砖残瓦，冲到“乌龟壳”上，举起手榴弹，厉声呼喊：“快投降！”“不出来，就统统炸死！”敌人举起手，纷纷钻出地堡。那种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模样，活象从坟洞里爬出来的活尸。此时，阴功会敌前沿阵地也为我突破，抓了十多个俘虏，另一路部队则相机攻占了关帝庙。这样，镇内残敌已全部退缩民教馆及其近旁的高碉堡，凭藉核心工事继续顽抗。

二十三日黄昏，我军又一次向负隅顽抗之敌发起攻击，歼灭了一部分敌人。梁弄镇和 102 高地之敌夺路逃往百官。这时，驻守在余姚、上虞的日伪军匆匆赶来增援，爬山越岭、气急吁吁地赶到半路，听说梁弄已失，只好缩回老窝去了。

梁弄战斗的胜利，不但锻炼了部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还使我们迅速地在四明山及姚江两岸先后成立了好几个县级办事处，领导着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

浦东支队在反“清乡”斗争中发展壮大

朱 亚 民

浦东地区，东濒东海，南傍杭州湾，西枕黄浦江，北临长江口。就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日伪猖獗，顽方磨擦；而我部在既无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兄弟部队直接支援的艰苦环境中，高举党的抗日救国旗帜，军民团结，孤军奋战，终于夺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彻底胜利。

站 稳 脚 跟 打 开 局 面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委员。八月十六日，日寇上海特务机关长官崎声称上海市第一期清乡地区为南汇、奉贤、北桥三区。日伪为确保所谓“大上海巩固治安区”，从九月一日起，在上海郊区实行第一期“清乡”，设南汇、奉贤、北桥三个特别区公署。接着，侵华日军小林师团的矛字第三八五二部队等主力开到南汇县城，加上“清乡”区域内原较大市镇上的日军守备队、宪兵队和汪伪中央税警队、保安团队等，共约五千余兵力，对“清乡”区实行全面封锁，逼拆民房，砍伐竹园，强拉民夫，筑起全长一百六十七公里的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四十一处，封锁港口和交通要道，盘查来往行人和船只，强迫当地农民成立“乡民自卫队”，为其放哨鸣锣。同时，日伪从上海和当地抽调汉奸、特务骨干，进行专门训练，组成清乡队，分赴“清乡”区组织基层“清乡委员会”，恢复与强化伪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此外，日寇还推行毒化政策，收买地痞流氓，诱使一些

人吸白粉,发展“一贯道”,摧残民族意识,使之最终成为他们的鹰犬。这就是日伪的所谓“二分军事,八分政治”。

一九四二年九月初,也就是我五支队五大队南渡浙东后的一个星期,为了粉碎敌人在上海郊区的“清乡”,浙东区党委决定派我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趁敌人“清乡”区封锁圈尚未合拢之际,返回浦东,坚持斗争。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找我谈了话,他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敌人兵力不足,而战线却拉得很长,所以,鬼子的“清乡”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和特定的时间内才能进行,必然是无法持久的。只要你们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旗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敌人的“清乡”是完全可以粉碎的,我们的部队也一定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于是,我挑选十一名人员,组成了短枪队。这十一人都是部队的骨干,既有懂得军事的连排干部,又有熟悉浦东情况、曾与地方上有过联系的便于开展工作的人员。出发前,我先与当时在浙东古窑浦的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碰了头,研究了一些措施,确定了和地方党负责人陈文祥(又名伯亮)的联络点。然后我们一行乘木船下海北上。原计划在奉贤戚仓墩登陆,因在海上遇到日寇封锁海面的武装木壳船,故随机应变,放慢航速,驶向日伪据点——柘林。这一着果然奏效,敌船真的不来搜查,待他们过去后,我们就在柘林附近登陆。登陆后星夜赶奔戚仓墩,找到靠拢我们的盐行乡伪乡长乔阿五,与黄志英取得联系,了解了浦东的情况,便向南汇中心区移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仍沿用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反“清乡”斗争。

我们进入日伪“清乡”区域时,形势十分紧张。一些对我们关心的基本群众,劝我们暂离浦东,避一避风头。一些过去的统战对象,有的来条申诉自己目前处境的困难,表示无法资助我们;有的不敢在来条上具名;有的干脆避而不与我们联系、接触。那些投敌分子则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与我部作对。如伪军刘铁城就是搞阴谋诡计的一个家伙,他叫一个伪乡长来传他的“好话”,说什么:

你诸亚民(我当时的化名)是抗日的,我们佩服;但你们人太少,可以到我们防区来,我们保护你们。这个伪乡长被我臭骂了一顿,难道我们抗日的队伍要汉奸来保护吗!实际上刘铁城企图把我们诓到他的鼻子底下好消灭我们,只是他的手段更毒辣、更阴险而已!

开始时,我们采取隐蔽集中的方式活动。在流动过程中,向群众宣传反“清乡”的道理,激励群众的抗战斗志;动员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兄弟会”等秘密组织,广交朋友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开展争取两面派的工作,以便掌握敌情,打击敌人。

九月间,我率部在南汇盐仓、祝桥一带活动。此时,在该地以东的薛家泓、潘家泓一带,驻扎着国民党忠救军陈龙生部,为争取其共同抗日,我们先约请他谈判。陈很顽固,谈判未成。他事后扬言要“消灭”我们,并率其所部西进至我部活动区——大朱家宅。我们摸准情况后予以反击,一举全歼该部十余人。我部张正贤、董金根在战斗中负伤,由于缺乏医疗条件,董金根不幸牺牲。大朱家宅一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使地方上的顽固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这对于我们的反“清乡”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九月底,日伪“清乡”进入高潮。于是,浦东地区从沿海到腹地的大、小城镇及主要村庄,到处设立据点,要道的路口、桥梁都有日伪军把守。同时日寇有计划地进行分区梳篦式地反复“清剿”,大批汪伪政工人员下乡实施“清乡”,还强迫“乡民自卫队”昼夜持锣放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即鸣锣报警。此时,我们与浙东失去联络;由于董金根牺牲,与地方党陈文祥也失去联系。在孤军奋战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化整为零,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将全队分成三个小组,由我和党员许培元、张宝生各率一个小组,分散活动,坚持斗争。由于各小组分布各处,削弱了部队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王志欣腐化叛变事件;由于敌人不断出动,环境极度恶劣,加上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天冷了还穿着单衣,因此有的人失去信心,意志消沉,又出现了唐宝生拖枪逃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将分散的队伍召集起来,认真总结了前阶段斗争经验教训,决定恢复集中行动。同时,教育全体队员坚定信心,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恢复集中行动后,为避免暴露目标,我们不进大村庄,也不住到老百姓家里,而是专找偏僻的坟山屋和祠堂居住,甚至蹲蟹棚或宿营在芦苇深处。但是我们并不消极隐蔽,仍是积极寻找战机。一次,我和朱刚等三人,在南汇到新场的公路靠近新场据点的地方,化装成老百姓在路旁“割草”,缴获了三个骑自行车的伪军的武器。不久,我们在三灶一带活动时,朱刚因发高烧不能随队行动,便安置在一户农民家里养病,那家的姑娘是新场伪军刘铁城一个部下的姘头,由于她的出卖,刘部把朱刚抓到新场,百般用刑,甚至将铁丝穿过朱的锁骨,拉着他去认宿营地与同我们有联系的人。朱刚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一句口供。同年十月四日,朱刚牺牲于新场。

我部在“清乡”区内的频繁活动,使敌人大为惊慌。他们派出大批密探,到处侦查和刺探我游击队的活动情报。在“清乡委员会”的指使下,大批胸挂小铜牌的伪清乡人员下乡挨家挨户地清查户口,敲诈勒索,搜捕与我有联系的群众。我方的情报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弄得倾家荡产;也有少数人叛变投敌,成为日寇的坐探,这对我部进一步开展斗争带来了更大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进行惩奸除恶活动。首先,我们打击了那些大摇大摆地挂着小铜牌下乡的汉奸特务,使这些外来的家伙不敢单独下乡了。但那些本地汉奸、特务熟悉地方情况,手段阴险毒辣,对我们的危害更大。于是,我们改变策略,选择其罪大恶极、坚持与人民为敌的,陆续镇压了一百多个。其中尤以南汇大团镇、鹤沙(即下沙)镇的除奸活动,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大团镇是日寇的一个大据点,日军兵力很强,还驻有顾桂秋的一个伪军大队。该镇的伪商会会长、维持会长韩鸿声,是个大恶霸、大汉奸,依仗日寇势力,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我部为了打开斗争

局面,决定从韩鸿声开刀。经过周密侦察、部署,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由许培元带领张正贤、顾才松、林志杰、朱印天等共七人,身穿长衫马褂,头戴大英帽,挂上小铜牌,化装成伪清乡委员会的人员,闯入韩家,骗出韩鸿声。在快要出镇时,韩发现苗头不对,大叫大喊起来,遂在大团镇鸭场头北纸坊桥南下塘将其击毙。

鹤沙镇处于我游击边区,驻镇汉奸、特务、伪军凭借日寇的势力,专事反共,鱼肉人民。我游击队应群众的一再要求,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晚上,由我率卫民、陈金达、张正贤等,在当地民兵顾木生等和群众的配合下,乘该镇的日伪军倾巢外出之际,奔袭鹤沙镇,将伪镇长兼清乡主任樊连奎和警防团、情报员等十个民族败类一举斩尽,并缴获长短枪枝及弹药等一批物资。次日,消息传出,震动了整个浦东平原,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伪政工人员则丧魂落魄。我部乘胜展开政治攻势,迫使那些伪政工人员纷纷前来打招呼,申明自己是假汉奸,表示愿意为抗日部队办事,以后还帮我们在日伪据点里征收抗日捐税。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部的军事影响,我们决定主动向敌人进攻。有一次,奉贤南部沿海有一关系带来情报:乔阿五已与该地苏家码头检问所一伪警士拉上关系,他愿意作内应。经了解,这个伪警在鬼子面前曾吃过亏,又因内部分赃不匀,矛盾激化。此人一心想报复,也有不愿再当亡国奴的表示。我就派人进一步做他的工作,晓以大义,并与他喝了鸡血“同心酒”。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侦察,并与那个伪警事先约定,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晚,我部对这个检问所的日寇与伪警,来了个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仅化了二十分钟时间,击毙鬼子三名和伪检问员与警士各一名,俘虏伪警士九人,缴获枪械十余支和子弹、手榴弹一批。我无一伤亡。这一仗,使敌人很震惊,连忙调运兵力向南搜索。我部趁敌人北边守备空虚之机,迅速转移到南汇境内。

奉贤钱家桥镇上驻有鬼子一个小队,小队长叫赤口。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诡计多端,擅长做特工工作。当我们了解到

这个鬼子小队新近装备了一挺“九六式”轻机枪后，决心袭击该据点，把这挺新式机枪弄到手。经过一番周密的侦察，把据点的地形、地物、兵力部署、宿营地、进路、退路等搞得一清二楚，还绘制了详细的草图。接着，进行了战斗部署，并在争取过来的内线的配合下，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晚，组织了一次奇袭。由于我们行动神速，一举击毙鬼子嵯山秋藏、市川岩次郎、小山薰等三人和伪保安二团一大队士兵一人，重伤鬼子两人，俘虏伪军四人，缴获“九六式”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短枪一支。我无一伤亡。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我们派出游击队员，白天化装进入奉贤青村港镇，分别镇压了日寇宪兵情报员周鹤侠、汪伪青村警察分驻所警长郑贵卿两人。

为严惩曾杀害我部朱刚、金文华等的汉奸刘铁城伪军，我们决定袭击南汇新场镇。该镇设有两个据点，日寇守备队在西，伪刘铁城部一个中队在东，两点相距数百米，平时戒备森严。我部通过一个伪保长的关系，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了伪军特务长、当地人沈墨予（后参加我部队），通过他搞到了敌人的口令，并选择伪军发饷的日子，经过周密部署，于四月的某个晚上，由我率三十余名队员，摸掉伪军据点栅门前的哨兵，一直冲进伪军营房。正在赌钱的伪军措手不及，大部被我缴械，只有少数爬上屋顶逃掉。当时，相距很近的日寇守备队，听到枪声慌作一团，不敢出巢增援。战斗中，我部路秋如不幸牺牲。

紧接着，我部又在南汇坦直南蒋桥唐宝生家竹园伏击敌运输船一艘，消灭全船伪军五、六人。我部中队长许培元牺牲。同时，还在南汇三灶打了两次伏击，均取得了胜利。

上述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教育、鼓舞了人民群众，而且迫使日寇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部署，收缩了那些仅有三五日日军带上个把伪军班驻守的小据点，被日伪强拉到自卫队里放哨的农民也自动解散。我部则由十来个人的短枪队，已发展到三十余人并有长枪武装起来的抗日队伍

了。同时,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有明显好转。日伪在遭到这一系列失败后,“第一期清乡”便宣告破产。我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

改变策略 扩大战果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起,日伪在第一期“清乡”破产后,为了挽回其败局,又搞了个第二期“清乡”。此期“清乡”区域,增加嘉定、宝山、崇明三县,又修筑起二百二十一公里封锁线。

这一时期,日寇的兵力有所分散,因此,他们改变方式,加强特务密探活动,让一些特务、汉奸及穿着便衣的伪军,冒充我游击队,模仿我们的活动方式,住进老百姓家里,如果老百姓不去报告日伪,就说你私通游击队加以迫害;这些家伙用“与游击队失去联络”,或“战斗后失散”、“病后归队”等谎言,蒙蔽、欺骗群众,侦察和寻找我游击队活动的踪迹,隔绝我军民的联系。日寇这一手,开始也不无效果,有些群众被搞得真假难分,受骗上当。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我们采取去其耳目,断其蟹脚;迷惑敌人,主动进攻;集中兵力,避实击虚;利用关系,里应外合;以及采用奇袭、伏击等手段,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伪军顽固势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下午六时,我们派出队员两人,再次进入奉贤青村港镇,把正在饭店用晚膳的奉城日寇宪兵队密探吉家田击毙。临离开时当众宣布:“吉是死心塌地当汉奸,故予枪毙。”这一行动,对日伪汉奸震动很大。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驻扎在奉贤钱家桥的伪税警中队二十一人,雇民船一艘,向北赴青村港,沿途“搜索”我部。下午返回时,伪中队长带十二人步行,其余八人原船返回。该船驶抵护塘桥堍(杨家滩附近)时,我部根据情报,早在那里设伏,来了个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伪上等兵一名,余七人将武器丢入河中凫水逃命。

接着,我地方武装夏筱堂、朱良和群众十多人,在南汇县城东

门伪警察所缴获步枪三十六支,轻机枪一挺、短枪一支、俘获伪警两人。

奉贤庙泾港东侧有一条船港,是通往奉贤县城——南桥的水上交通要道,敌人的船只常在此来往。我们摸清了敌人的行动规律,探明了那里的地形,决定在船港设伏,以居高临下、两面夹击的办法,狠狠地打一次伏击。八月二十三日上午,由周浦开往南桥的班船上乘有日伪军。八时许,当该船驶入我伏击圈时,埋伏在船港两岸的机枪、步枪对准日伪军一齐开火,船老大惊慌失措,急忙躲进后舱,使船只失去控制而转向搁浅,动弹不得。这一仗,只用了二十分钟时间,击毙在奉贤泰日桥上岸的鬼子三人,俘获伪保安队士兵三人,缴获全部武器及其它物品无数。战斗中我地方武装中队副朱良牺牲。当我部行进到钟家宅时,突与泰日桥日伪军遭遇,我部战士沈品芳牺牲,干部卫民负伤。

同年夏秋之际,为了打通南汇与奉贤的交通线,我们派部队两次西进,先后袭击下乡的日伪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我部活跃在日伪的“清乡”区内,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使日伪不得安宁。这时,敌人“清乡”已近一年,但处处挨打,陷入了困境,只得把浦东平原上建立的近百个大小据点撤得只剩下二、三十个。日寇在“清乡”区四周所筑的工程浩大的竹篱笆墙,也被我游击队和广大群众拆得七零八落。我部的威望大为提高,而伪军则日趋瓦解,陆续派人来同我们拉关系。如袭击新场镇后,吓得伪军刘铁城部下的几个中队长主动派人来与我们联系,表示再也不敢与我们为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继续打击日寇,一面加强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进一步削弱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九月初我部和地方党组织在南汇县城东南十公里左右的邬家店,隆重召开了反“清乡”胜利一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场面很大,敲锣打鼓,搭台演戏,十分热闹,附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敌伪军龟宿在县城里不敢出来。鲍季良当即为大会写了一副长联,挂在主席台两边。上下联的最后两句是:“敌伪企图成泡影”,“健儿战绩壮

山河”。这次大会，标志着反“清乡”斗争形势的空前好转，标志着浦东敌后抗日阵地的不断巩固与发展。

经过反“第二期清乡”的斗争，我们的部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一九四三年夏，我担任了五支队支队长，所辖的中队命名为一中队，翁阿坤任中队长。八、九月间，我部改名为浦东支队（对外仍用原五支队番号），我担任支队长，姜杰任政治委员。部队发展到百余人。浙东区党委派鲍季良回浦东负责财经工作，在南汇全区和奉贤第五分区农村与集镇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我们所以能够利用关系在日伪占据的市镇内征收抗经费，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执行我党正确的财经政策与严格的奖惩规定，因此财经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我们在浦东征收的大米、代金，供本部自给有余，还支援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

再接再厉 夺取全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起，日伪在上海市郊实行第三期“清乡”其范围又增加了川沙、浦南、浦北区域。汪伪成立“第三期清乡指挥部”，杜益谦为指挥官，姜西园为副指挥官。又修筑封锁线长五十六公里。实际上，敌人经过前两期“清乡”的惨败，已经力不从心。所以这第三期“清乡”当然也“清”不出什么名堂，而我们部队却在斗争中又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为了彻底击垮敌人的第三期“清乡”，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清乡”斗争成果的战斗口号，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奉贤分水墩的全歼伪保安第九中队的战斗，是作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部署的。早在反第二期“清乡”的后期，我们通过关系调查了这个伪军中队的驻扎点，为将其全歼作了充分准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晚，由中队长翁阿坤率部队，隐蔽地接近该地伪军营房，摸掉了岗哨，一下子冲了进去，击毙企图顽抗的一个伪军班长，除伪军中队长与个别士兵未归队而漏网外，其

余全部被俘。缴获马克沁重机枪一挺、步枪六十余支和全部弹药、物资。该批俘虏除一部分留在我支队外，连同那挺重机枪，一起送到了浙东。

一九四四年春，我支队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加强外围薄弱地区的工作，组织几支小型短枪队，到奉、南沿海及川沙、上海、松江等县边境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扩军、征税。由于这些短枪队的机警、勇敢和努力，在外围的不少地方打开了局面。到同年九月，我们已经能够在奉贤全境内征收抗日经费了。

一月三十日下午，我部宿营在奉贤中部、齐贤桥东南的阮家花厅，不料日寇宪兵队突来该地，与我部发生战斗，我部打死五、六个鬼子后，立即撤出战斗转移他地。但鬼子对该地实施报复，杀害群众，烧毁阮家花厅。不久，我部在黄浦江畔的鲁家汇西边，击毁一敌据点，俘敌伪军三十余人。

三月下旬，我部一中队在南汇朱家店第一次伏击外出骚扰、抢粮的敌伪军，击毙日寇五名，俘伪军七名。我区队长朱文彬牺牲。

三月二十八日，我支队宿营在奉贤北宋宅，由于被敌伪密探发现，日寇调集奉、南两地据点的数百兵力，分五路进袭，企图围歼我部。在敌伪重兵包围的情况下，我部广大指战员奋勇还击，集中火力，攻其弱点，分路突围。战斗刚打响，由鲍季良率支队后勤人员，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之际，迅速撤离北宋宅。我与翁阿坤率一个中队，掩护全村群众向东南突围；赵熊率一个中队向北突围。激战三小时，毙伤敌伪五十余名，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部的阴谋，我支队二十多人在突围中英勇牺牲。这是在浦东地区反“清乡”斗争中的最大的一次战斗。

五月三日，驻扎在奉贤泰日桥的伪保安第五中队一分队长沙千臣等受我党、我支队的影晌，通过张尚德的关系，经打入该中队担任特务长的我地下党员潘平华的策动，率部并携轻机枪一挺、步枪七十余支及全部弹药毅然反正，击毙死心事敌的伪中队长张潮毅、三分队长陈静波和士兵三人，打伤二分队长杨杰与勤务一名。

同时,冲进日寇警备队宿舍,击毙鬼子七名,击伤警备队长畑野少尉及士兵两名,缴获“三八”步枪两支。二、三天后,该部渡海去浙东,编入浙东纵队五支队。

五月十九日,我们通过郁利仁的关系,做通南汇万祥伪保安某区队的两个班长的工作后,派张宝生、李阿全等五人赶赴该镇,俘全队伪军二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二十多支,击毙拒绝缴枪的伪区队长一名。

七月七日凌晨,我支队宿营在界河桥南侧奉贤境内,由张锡祚中队长、陈友新指导员率一个中队,阻击了回奉城据点的二十七名日伪军。在我部猛烈火力攻击下,击毙日寇奉城宪兵队下士伍长丹生谷和伪税警队中士毛大法、周金海等三名,击伤日寇奉城守备队中士军曹畑山和伪税警队中士徐子义两名。二十日凌晨四时,我部在奉贤朱行埭一带,击败奉城伪税警队的偷袭,毙伪警阚广发和重伤伪警樊茂昌、刘坤(均系中士衔)。

七月,我部派顽强中队在中队长赵熊、中队副杜锐等率领下,第三次西进,准备继续设法打通浦东与浦西的交通线。二十六日下午三时许,部队宿营在奉贤的夏家宅,突遭南桥、新寺、柘林等据点的日伪军二百余兵力的围攻。我部指战员英勇反击,毙伤敌伪十余人(包括毙伪税警队大队附一名),我部四人牺牲,四人负伤。接着,我支队还在南汇的黄家路等地多次袭击日、伪,均取得了胜利。

八月二十二日的南汇第二次朱家店战斗,是浦东地区反“清乡”斗争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那天,日寇四十七人,携轻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从周浦出发到瓦屑、六灶一带骚扰。得到这一情报后,我马上与张席珍研究,感到鬼子有朝我部宿营地一带过来的可能,于是决定打伏击。当时,我部在朱家店之南的张家袜厂,与朱家店一河之隔,河上有座石桥。我们根据地形作了部署:由翁阿坤率一个中队向西迂回过去,战斗一打响,就抢占那座石桥。切断敌人退路;另两个中队隐蔽在棉花田东浜芦苇丛里,随时准备夹击敌人;我与一部分战士在张家袜厂设伏,将一挺轻机枪隐蔽地架设在

屋顶上；在石桥以南的池塘东岸，用集束手榴弹埋在路边的毛豆丛中，用一根长麻绳系上榴弹拉火线引到埋伏在百米以外的战士手里。下午一时半，日寇进入我伏击圈，我们拉响集束手榴弹后，立即以机枪、步枪的交叉火力杀伤敌人。毫无准备的鬼子，被我们打得昏头转向，七零八落，击毙日寇二十三人，余敌慌忙逃窜。我部乘胜追击，猛追到朱家店以西的猛将堂附近，逼得残敌丢枪跳河逃跑，又被我击毙十一人。仅十三个鬼子漏网。这次战斗，缴获“九九式”步枪十二支，子弹四百余发及其它战利品。我部一中队战士毛林生牺牲，两名战士负伤。这一仗对日寇震动很大。

在反“清乡”斗争的后期，我支队还在南汇的储家店、滥缺口、五堍桥、六灶等地，打了多次胜仗。但是，我们一起从浙东进入浦东“清乡”区的十二个人中的顾才松、张宝生两人，又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内相继英勇牺牲。然而，日伪苦心经营的所谓“清乡”，已被我淞沪地区军民彻底粉碎，但日伪还装模作样地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宣布：“查关于撤除封锁线及封锁机构一案，经分令所属第一、二两区保安司令部保安第一、二两团暨各县、区封锁管理员。统限于本月十五日起，各检问所一律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真是打肿脸装胖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浙东区党委派曾平、吴建功等来到浦东，并决定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我任支队长，姜杰任政委，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此时，支队主力已发展到三百余人，下设英雄中队（中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姚三林）、特务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鞠涛）、紧张中队（中队长张锡祚，指导员陈友新）、六中队（指导员徐黎）；地方武装有二区区中队、八区区中队、短枪队等。同时，建立中共淞沪支队总支委员会，鲍季良任总支书记；各中队均建立了党支部。支队还配有电台，直接与浙东纵队司令部通讯联络。

一九四五年一月，陈伟达、顾复生等奉派到达浦东，加强党、政、军各个方面的领导。陈伟达任中共淞沪地委书记兼支队政委，

姜杰为副政委；二月，顾复生任淞沪地区专员，吴建功、鲍季良和我分别担任南汇、川沙、奉贤县长。此时，我支队全体指战员，以更饱满的战斗意志，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义乌市抗日独立大队 到金萧支队独立大队

彭 林 孙秉夫 张志萱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党中央为在全国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把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培训的干部派赴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彭林就是在当时被派赴敌后的干部之一。他从延安到上海,再与王文林一同到了浙江。他们先在湖州结交进步青年郎玉麟,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取得当地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吴兴县长的支持,招收数十名进步青年办“抗训班”,成立抗日工作团,藉以培训初具军事知识的游击队员,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准备骨干力量。一九三七年底,“抗训班”结束后,建立了游击小组,不几天,游击小组扩大到数十人,得长短枪十来支,以此为基础,在一九三八年元旦成立了“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老百姓也有叫它为“郎玉麟部队”的。这是我们在浙西敌后迈出的第一步。

这支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它曾把日寇分散的小分队打得惊惶失措,龟缩湖州、长兴;它经常夜出摧毁“维持会”等汉奸组织,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为所欲为,从而扩大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初步打开了局面。这支年轻的队伍也吃过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的亏,游击大队的领导成员之一,年仅二十五岁的王文林就是在“红枪会”的突然袭击中,惨遭杀害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游击大队被当地国民党专员公署整编,改称为“浙江一区抗日自卫总队第十二中队”,后又改为九中队。郎玉麟任中队长(郎已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被吸收入党),彭林任分队

长。

同年十一月，新四军派人来联系。彭林即专程去新四军军部汇报请示。为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军部派孙秉夫、陈祖猛与彭林同回浙西。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们又与中共浙西特委取得了联系，接受浙西特委的直接领导。由于充实了骨干，加强了领导，部队出击也更加频繁了。曾在菱湖伏击日寇汽艇，予敌以杀伤；在太湖边的另一次战斗中，甚至击沉敌军船一艘，歼敌一个班，缴获一挺轻机枪。当时，国民党浙西行署的《民族日报》刊登的战地消息报导说：“郎玉麟部大战安澜桥，重创敌人，战果辉煌……”这些战斗对敌人震动很大，我部在浙西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部队的士气也更加旺盛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郎部随总队调往金华附近，改编为浙江保安第四团一大队二中队（简称浙保四团二中队）。彭林担任一大队附，俞慕耕（党员）任二中队长。从“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到“浙江一区抗卫总队九中队”到“浙保四团二中队”，历时近三年。这个部队虽然番号几经变更，领导成员也多次调动，但其领导权实际上均为我党所掌握。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为配合太平洋战争，调兵遣将发动浙赣战役。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数十万军队（包括浙江的几个保安团）部署在浙赣线上。彭林等所在的浙保四团在夏家畈等地和日寇接火后，接连败退，溃不成军。彭林（这时担任七中队队长）收容了三百余人在永康新楼集中后，把部队带回四团团部驻地壶镇。途中，彭林碰见了在四中队担任特务长的孙秉夫，彭对孙分析了急剧变化的形势，认为目前敌后已非常空虚，这是我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如果整个部队继续后撤，我们所掌握的队伍还有可能被打散，但不管情况如何恶劣和变化，我们一定要掌握一部分队伍在手里，带到敌人后方去找俞慕耕（俞当时在永康养病）。

浙保四团继续后撤，日军仍紧追不放，结果该部被日军包围在

松阳山区。孙秉夫所在的四中队被打散了，伤亡很重，只剩下三十多人，长短枪二十多支。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孙就按照彭林的意图说服中队长劳良功脱离浙保四团。当天夜里，由孙率领队伍突围下山，昼夜兼程，冲过重重封锁，到永康找到了俞慕耕。不久，他们听到国民党永康县政府收容到“浙保四团”一个武装班的消息。俞即派孙去县政府联系，才知道原是彭林的七中队的的一个班，在松阳战斗中，被敌人分割截断，是彭林命令班长徐国光带全班人员（一挺机枪，十多支步枪）以失散名义到永康找俞慕耕的。这样，孙秉夫就把这个班领回永康新楼集中。以后又陆续收容了从前线退下来的一些散兵，逐步扩大为一个中队的兵力，人枪各八十余人，由孙秉夫和徐国光两人负责。

俞慕耕就以这个中队的实力为基础，利用永康著名人士吕公望的儿子吕师扬的关系（早在浙江一区抗卫总队时，吕任副总队长，俞曾在吕的部下当过新兵连连长，吕对俞是比较信任和器重的），由他出面扩建部队。不久，吕师扬就以国民党三十五军“高参”的名义，以孙秉夫的中队为基干，积极组建部队。他下令将永康全县乡政府所建立的抗日自卫武装和武义县的一个中队，以及收容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全部集中在永康新楼，有人枪六百多，编为两个大队，下辖六个中队。部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民运宣传和军事活动。由孙秉夫带领的一个中队，在永康城南石柱镇附近，巧妙地打了一次伏击战，予日寇以杀伤。从此永康县城的鬼子，就不敢轻易出动了。

部队频繁活动，不断壮大，引起浙江省第四区专署专员李楚狂的眼红，他即把这支部队收编为浙江省第四专区保安总队。任命吕师扬为总队长，俞慕耕为总队附兼第二大队长，徐国光任一中队长，孙秉夫任三中队长。

随后，喻荣金、张志萱也先后来专署所在地宣平找俞慕耕接关系。喻荣金被任命为二大队附兼五中队长，张志萱为该中队的第一分队长。这就增加了我党在吕师扬部的领导骨干，党的力量在这

儿重新得到了集结。部队在宣平整训三个月后,调到永康、东阳、义乌三县的交界地区的三十里坑驻防。一九四二年底,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委任吕师扬为义乌县县长兼四专区保安总队长,于是,吕师扬命令部队进驻义乌东乡。这时,日军趁我部立脚未稳,从附近各据点调兵遣将,十天之内,向我部发起三次进攻。部队新兵多,又缺乏准备,一时出现了被动混乱局面,一部分人经不起考验趁乱自动离队。这样,部队不得不开回三十里坑休整。由于部队伤亡、失散、减员过多,吕师扬报请上面批准后,取消了浙江省第四区保安总队的番号,将原有的两个大队,缩编为“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由原一大队长胡远雄代理,下辖三个中队,共有人枪三百多,轻机枪八挺。中队干部是吕师扬按照俞慕耕的意见委任的:一中队长徐国光,二中队长张志萱,三中队长孙秉夫。这个大队就是后来金萧支队独立大队的前身。经过这次整编,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实际上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为我党所左右了。

一天,俞慕耕派人叫孙秉夫去商量要事。孙去后,俞谈了他和彭林通信联系的情况,说彭林现在处境孤单,身边没有党的同志,如果继续留在浙保四团,没有益处。俞慕耕征求孙的意见说,他准备亲自去吕师扬那里活动,设法把彭林也从浙保四团调过来(吕师扬任浙西一区抗卫总队副总队长时,彭是分队长,也是吕的老部下)。孙表示完全赞同。后经俞的积极活动,吕师扬发了三次电报给国民党浙江保安处长宣铁吾,终于将彭林调来,担任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

一九四三年九月,彭林从浙保四团来到永康向吕师扬报到。吕见到彭又热情又高兴,认为是来了一位“得力助手”。他向彭林详细说明了大队的情况和所负的任务后,对彭说:“在义乌的东北角有一支武装部队,有点‘政治色彩’(意为共产党领导的),你们要特别注意!你老彭进入敌占区后,可采用特工手段打入该部,再来一个突然袭击把他们消灭掉。”彭林听后心中有数,暗自高兴,向他表示:“我这个人是不问政治的,你所交代的任务和所指示的

情况对我很有益处。”接着,彭林带警卫员董国贤去找俞慕耕。俞主动向彭汇报了部队组建及开展活动的情况。同时指明义乌东北角那支带“政治色彩”的部队,叫“坚勇”部队。又说:自我部来到义乌后,他们和八大队(我党领导的)都极力避开我们,不和我们接近。彭林果断地说:“他们回避我们,我们应该主动接近他们,去和他们联系。我们已有两年多与上级党失去组织关系,现在附近如果真有我党领导下的部队,就必须积极设法通过他们恢复组织关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部队办妥移交手续后,彭林任大队长,俞慕耕任政治教导员,喻荣金任大队附,加强了我们党对这个大队的领导。经过对坚勇部队的几次接触和观察了解,证实这个部队确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其大队长是陈福明(原名崔洪生)。于是,就派俞慕耕正式以我们党的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去找陈福明和义东北工委书记江征帆两位,向他俩表明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说明我部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但长期中断了同党的关系,要求该部领导逐级向上反映,为我部接上党的关系。以后,彭林又派孙秉夫和警卫员董国贤带着他的亲笔信,多次和他们联系。通过江征帆的帮助,终于在这年十二月,我们与上级党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同志们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解除了两年多来失去组织联系的苦闷,为以后把这支部队胜利拉出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从这以后,我部与坚勇部队联系更多了,经常互通情报,互相支持,互为配合。有一次,坚勇部队的陈福明大队长向我们说,凡他的部队派出去搞征粮、收税、做情报工作的人员,经常遭到与敌伪有勾结的义乌县警察大队的袭击和追捕,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正常活动和给养供应。他要求我“独大”配合作战,坚决消灭这支只反共,不抗日,危害人民群众的部队。某一深夜,彭林大队长令孙秉夫秘密率领三中队与坚勇部队协同战斗,速战速决,围歼了这个警察大队,共缴获五十多支枪和一批弹药物资。孙秉夫率领部队完成任务后,神不知鬼不觉,于拂晓前赶回原驻地。通过这次协同作

战,我们与坚勇部队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期间,我部仍活动在义乌东乡的花溪、廿三里镇一带。由于我们“独大”是披着国民党部队的外衣,用的是国民党制定的番号,所以,老百姓很自然地把我们与别的国民党部队等同看待,一见到我们就躲避,这给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有鉴于此,大队领导研究决定,除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不许侵犯群众利益,以区别于国民党顽军、汪伪军、土匪部队、地主武装外,还要求部队迅速通过打击日寇和伪军来改变群众对我们的看法。首先,我们选择了位于义乌和东阳县城之间的吴大元村的日寇据点作为打击的目标。我们利用日军抓民伕修工事的机会,选派了张志萱、方毅等九人组成突击队,在大队掩护下,带着短枪、手榴弹,化装成民伕进入据点,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消灭了二十几个鬼子,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五支和弹药一部。我部只有两名战士负伤。这次战斗规模虽小,但在当时国民党顽军一见日本人就跑的情况下,对金华、义乌和东阳地区影响很大。我们九个人歼灭了二十几个敌人,这就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特别是通过这一次战斗,改变了周围老百姓对我部的印象和看法,许多青年纷纷来参加“独大”,壮大了我们的力量。

正当我们在义乌地区以廿三里镇一带为中心开展活动时,吕师扬曾多次命令独立大队坚决消灭“奸匪坚勇部队”。我部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坚勇部队来往更加密切,甚至还暗中配合坚勇部队,这就更加暴露了我部的“政治色彩”。同时,我们在这一地区积极发动群众,打击敌伪势力,也使部队逐渐“红”起来了。再加吕师扬不当义乌县县长后,要我部开回永康后方去。这一切情况,都使我部难以继续“利用合法身份,长期隐蔽”下去了。因此,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我们一面应付吕师扬,一面加紧和上级党组织联系,准备脱离国民党关系,把队伍拉出来与金萧支队会合。为此,彭林带警卫员董国贤两次秘密到大畈以东地区找金萧支队,向支队首长汇报请示。一九四四年二月上级批准了我部的报告。之后,

部队为同金萧支队会合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我们把留守在永康后方的人员及枪弹等军需物资收回部队，于三月二十三日，率领人枪各三百多，轻机枪十挺，与金萧支队会合于义乌县大畈村。三十日，在诸北的江藻召开了联欢大会，宣布我部为金萧支队独立大队，彭林任大队长，俞慕耕任政治教导员。我们这一突然行动，使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欢欣鼓舞，送来了很多慰劳品。这对国民党当局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和打击。

大队到根据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同志们的精神和体力都得到恢复，斗志旺盛。不久即参与墨城湖战斗，于五月二十七日粉碎了伪独立第四旅旅长蔡廉亲自带领的两个团的进攻，毙伤其副旅长以下官兵两百余人，其中当场击毙伪营长三人，伪连长七人。我部在这次战斗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金萧支队第一大队长朱学勉，第三中队附王志清，以及二十多名战士英勇牺牲。这次大捷对于扭转整个金萧地区的形势，鼓舞民心士气，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都有重大的意义。

七月，彭林调任金萧支队参谋长，俞慕耕接任“独大”大队长，周柏生任政治教导员。部队在义西稍事休整后，又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在诸暨接连取得了打许长水部、反日伪军抢粮、拔除三都伪军据点，以及在诸暨山前、赵家埠打击日寇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二月，金萧支队调往四明山区，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的一部分，原独立大队的俞慕耕、孙秉夫、喻荣金、张志萱、徐国光等同志也随部队到了四明山。原支队政委杨思一，支队参谋长彭林仍留在金萧地区，以各地方武装为基础，重建新的金萧支队，彭林任支队长，杨思一任政委。当时编到新金萧支队的有蒋焕章中队，八大队调来的一个主力中队和新组建的一个地方中队。其他如义东北的坚勇部队、金义浦的八大队以及各区的区队等，则在支队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单独活动。新的金萧支队成立后，又在不断打击敌伪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血战大鱼山岛

张大鹏 何亦达

血战大鱼山岛,是新四军浙东纵队直属海防大队在日寇陆海空军联合进攻下进行的壮烈战斗。

一九四四年二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为贯彻浙东区党委关于“坚持四明,巩固三北”、“分散活动,调动敌人”的决定,根据“三东”工委的建议,决定从海防大队抽调部队,向海岛进军,开辟海上游击根据地。

五月,纵队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向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面授了这一任务,指出:“我们的根据地,不但在陆地上要发展,而且也要向海岛发展。”张大鹏和大队政委吕炳奎分析研究了舟山群岛的敌情,和进军海岛的计划以及与地方党联系的方案。决定选择灰鳖洋的大鱼山岛,作为进军的跳板。

大鱼山岛,东南和岱山、舟山本岛临近,西南与慈镇海域相连。进占该岛后,可进一步向岱山延伸,穿秀山,进入黄大洋和岱衢洋之间,向大小长涂进军,北上大、小洋山,南下马目、金塘。如兵力许可,最终可进军舟山本岛。行动方案经批准后,大队部决定由海防大队主力第一中队,担负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加强领导,由大队副陈铁康亲自率领。部队航行前,派了一条侦察船,先去大鱼山岛侦察航线、航道、敌情以及岛上的基本情况。根据侦察报告:岛上仅有六、七名伪军,带有四支步枪和一支六吋手枪,是伪“舟山保安总队大洋山独立中队”俞康祺部的一个分队。队长赵云山(刚调往岱山伪军据点受训),分队副张阿龙(绰号“沙山龙”)。全岛长约六公里,宽仅一点五公里,四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都以

捕鱼、种田、砍柴为生。自浙东沦陷后，日寇屯兵岱、舟，把舟山群岛作为巩固其海防和支援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

八月十九日晚，我海防大队第一中队，于古窑浦港分乘五艘大帆船，其中二条乘坐指战员四、五十人，是突击登陆作战的哨船；三条是装载大米、油盐、医药用品的后勤船，都派武装保护。当晚因风向不顺，无法起航。二十日晚，风向转好，五条战船，乘风破浪，向大鱼山岛进军。

八月二十一日清晨，我部顺利抵达大鱼山岛南水头，时逢落潮，五条船只能泊于外滩，无法靠岸。七十余名指战员和后勤人员涉水登陆，一鼓作气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冲上海岛，控制山岗。

大队副陈铁康、中队长程克明，一面察看地形，布置警戒，一面派出小分队，分路搜索。指导员洪珠，副指导员孙岳，带领部分战士，分头到各村岙进行宣传，以稳定群众情绪，并侦察敌情。

岛上居民，由于历受盗匪伪顽迫害，见我部队上岛，一时摸不清情况，跑的跑，躲的躲，十分惊恐。但见我指战员队伍整齐，身穿土布衣服，脚穿百纽草鞋、头戴草帽，举动文明，态度温和，与盗匪不同，慢慢地平静下来。驻岛伪军俞康祺那个分队，则吓得胆颤心惊，龟缩在龙王宫，不敢轻举妄动，实际上他们是在窥测我军动向。

是晚，部队宿营在湖底树北的老厂基，陈大队副召开了连排干部会议，安排了部队的进一步工作。二十二日，部队转移到三面环水、一面临海地势险恶的小西洋岙驻扎。战士们在指导员洪珠带领下，到大西洋、湖压头各村岙，访贫问苦，调查情况，向群众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说明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指战员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群众打柴挑水。对保长杀鸡宰羊的招待，都婉言谢绝。战士吃饭缺菜，群众主动拿出鱼虾、海蜇、泥螺、咸菜时，我们都一一照价付钱。战士们看到居民以蕃芋度日、糠菜充饥，就主动把大米饭送给面黄饥瘦的老人、小孩吃。这些爱民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岛。群众

很快消除了恐惧,赞扬说:“这样好的队伍,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一定是四明山来的三五支队。”

在进行群众工作的同时,陈铁康、程克明也把岛上保长之类的“头面人物”召来座谈,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讲明我部进岛的宗旨是:“依靠群众,共同抗日,保护地方,爱护百姓”,最后还听取了部队进岛后,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下午,惊魂稍定的伪军分队副张阿龙,在保长王才荣的陪同下,假惺惺地以“拜会”陈大队副为名,来到中队部。陈铁康出于联络各方,争取利用的目的,向其阐述国内外形势,说明抗战必胜、日寇必败,规劝他弃暗投明。但据战斗后查悉,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就在当晚,趁我不备,他和保长一起,暗渡岱山,向日伪定东指挥部李思镜,大队长郑留忠等告密。郑即向驻岱日寇报告:“鱼山发现三五支队主力二、三百人,请求进剿。”驻岱日寇,即电告舟山日军司令部求援。于是敌即拼凑了岱、舟日军二百人,伪舟山保安总队王继能部的陈积晃大队和贺平独立中队三、四百人,共五、六百人,在日寇指挥官和伪军头目王继能的率领下,分乘大型兵舰105号、登陆艇二艘、小汽艇五只、机帆船五艘,在两架敌机的配合下,向大鱼山岛发动了陆海空军的联合进攻。

二十五日清晨,突然间,张阿龙鬼鬼祟祟地来到中队部,对陈铁康说:“今天日本的飞机和兵舰要来进攻。”说罢就溜走了。几乎是同时,隆隆的马达声在大鱼山岛的东方响起。了望哨徐一宏发现了敌舰,即向五班长报警,五班长用最快的步伐,飞奔中队部,向大队副报告:“发现敌舰艇十来艘,向大鱼山急驶而来。”陈铁康闻讯后,预感情况严重,立即下令:各班掌握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集合连排干部,商讨紧急部署。一致认为,部队转移无路可走,有船难行;大鱼山不高,树不密,也无处隐蔽。出路只有一条,打!坚决地打!洪指导员立即作了队前紧急动员,他短促而有力地說:“同志们!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怎么办?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敌人要消灭我们，我们就要挺起腰、咬紧牙，紧握枪，狠狠打，把来犯的敌人消灭掉。”接着大队副带领一个排，登上大岙岗阵地；洪指导员带一个排，向打旗岗阵地前进。陆林生带他的排十八名指战员，去占领事先指定的湖庄头。这三个阵地互为犄角，既能各自监视着敌人可能的登陆点，又能互相火力支援，有机配合。事务长沈长文，负责撤退后勤人员，帮助群众转移，并派孙民权班长带半个班、一门土炮，掩护后勤人员。

其时，一架敌机在大鱼山岛上空低飞盘旋，大型兵舰105号已停泊在鱼山东南海面。

部队刚上阵地，另一架敌机就低飞扫射，它既扰乱我构筑工事，又向敌舰指示炮击目标。登陆艇一艘泊于鱼山西北。小汽艇五艘，一艘在大西洋山后靠岸，一艘于小西洋岙登陆，一艘在老厂基外监视我哨船，并有机枪扫射，一艘在湖庄头山下登陆，一艘在大西洋西南角。五艘帆船都驶向鱼山的南头。

八时许，敌舰的炮火、汽艇的机枪，向我大西洋阵地轰击扫射。顿时，宁静的鱼山沸腾起来，村岙里、山岗上弹石横飞、硝烟迷漫。我英勇战士临战不惧，一面构筑工事、一面信心百倍地议论着战斗方案。他们庄严地宣誓：保卫海洋、保卫海岛，誓把日伪消灭在大鱼山。

日寇和伪军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从大鱼山岛南北两头爬了上来（由于我兵力限制，南北两头都没有设防），南从涨网岙的狗头颈，北自大西洋的鲛鱼坑，沿途烧杀抢劫，胁迫群众为其带路。我打旗岗的前哨发现小西洋滩头的日、伪军登陆时，就给它一阵猛烈的射击，把上岸的十多个敌人，打死打伤六、七人，敌人败下阵去，我们缴了几支枪。随后敌人一面加紧南北包抄，一面用更猛烈的炮火，向打旗岗轰击并驱使伪军再度发动冲锋。当这批伪军缩头弯腰爬上山坡时，在洪指导员带领下，我阵地上发动了政治攻势，向伪军高喊：“和平军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昧着良心为日本佬卖命。你们回去吧！你们不打我们，我们决不打你们。”

如若一定要打，那等着吧！我们送你们回老家。”伪军一听，吓得倦缩着身子，放慢了爬行的速度。日军指挥官见状，气得双脚直跳，命令鬼子象赶鸭子一样逼迫伪军冲锋。到日伪军爬向山岗，距我五、六十米时，指导员洪珠向全排战士高声命令：“同志们，咬住敌人，狠狠地打，打他个腰断背裂、脑袋开花……”于是那挺捷克式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飞射出仇恨的子弹；一个个手榴弹飞向敌群，直打得伪军叫爹喊娘，日本鬼子也嚎叫着败下阵去。

这时北路的敌人发现了大乔岗阵地。即用炮击，一刻钟后，一群日寇带着十几个伪军，开始了侦察性的进攻。

大乔岗是我一中队的主阵地，布置了二挺机枪、一门土炮、二十多条长短枪。左有打旗岗阵地的依托，右有湖庄头阵地为屏障。进能支援，退可固守。当时陈铁康看清敌人爬到山腰，一声令下，一阵排枪，一排手榴弹，就把敌人打下山岗。敌人进攻打旗岗、大乔岗受挫后，日军指挥官大为恼火，手持指挥刀，胁迫伪军头目带头冲锋，同时急令炮兵疯狂轰击。

敌人发狂了，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倾巢出动，全面进攻，三个阵地都各有六十名日军和七、八十个伪军，妄图南北夹击，分割围攻，一举陷我阵地。而我大乔岗、打旗岗、湖庄头的阵地依旧巍然屹立。

三次战斗的取胜，不仅激励着勇士们杀敌的勇气和决心。同时对后勤人员也是莫大的鼓舞。掩护后勤人员的孙民权班、炊事员、船老大，都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战，自动地跳上阵地，接过伤员的枪弹，参加了战斗的行列。经洪指导员的劝说，在事务长沈长文的带领下，才回到原来阵地。

午后，敌人一面调整兵力，一面舰上的炮火仍不断轰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指战员们衣破裤碎，满身尘土。有的身上有紫黑的血斑，有的伤口还在流血。虽然短兵相接的战斗暂时停止了，但他们知道恶战还在后头。因此顾不得伤痛、疲惫和饥渴，一面掩埋牺牲的同志，一面加紧抢修工事。指挥员一面安顿伤员、检查弹

药、调整兵力；一面收集石块，准备给予来犯的敌人更加有力的打击。

战斗间隙的阵地上，战士们诉说着杀伤敌人的情景和英勇机智的范例。有个战士欢乐地说起快板：“四明山，山连山，我们连里出了个施铁山，生活艰苦，工作积极，战斗勇敢，真不愧是个猛铁山。”此情此景，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

下午一时左右，日寇从全面进攻改为采用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以打旗岗为主攻目标，向打旗岗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炮弹象雨点般地在打旗岗爆炸。我机智的勇士把弹坑当掩体、碎石作枪弹。洪指导员虽和一些勇士相继负伤，但他还是和陆贤章排长带领战士顽强地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当大家弹药将要耗尽时，洪指导员忍着伤痛在阵地上来回爬动，把牺牲的、伤重的同志身上的子弹带解下，分发给大家。一面还领着大家高唱革命歌曲，以激励士气。他环顾阵地，一个排的战士仅剩六人，机枪手也伤重昏迷。他感到情况严重，难于坚持到天黑。于是对战士们说：“今天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要做一个光荣的革命者，决不做俘虏。决不缴枪！留下最后一颗子弹，作自殉的准备，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把多余的枪支砸烂，决不留给敌人一支好枪。”英勇的战士在党支部书记的号召下，奋不顾身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最后，阵地上只留下四个人了。陆贤章从昏迷的机枪手中接过机枪，对正在焚毁文件的洪指导员说：“指导员你带同志们撤！”可是，洪指导员坚决命令陆贤章等撤退，自己忍着伤痛，狙击敌人，掩护战友。当敌人冲上山岗时，他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自殉了。

打旗岗失守了。守卫在湖庄头的陆林生排顽强地在坚持战斗。陆林生腿负重伤，王根生把他背下来后，阵地上只有张宗发、张小弟和储连排三个人了。这时敌指挥官一手持刀、一手摇着膏药旗，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地率众冲上山来。张小弟（原是船老大）沉着地瞄准射击，不幸这是一颗“瞎火”。张宗发仅有手榴弹一颗、子弹五粒，于是他当即扔出手榴弹，落于敌群，可惜这颗手榴弹亦

未爆炸。只吓得鬼子四散奔逃。当鬼子惊魂稍定,继续冲上山来时,张宗发又举枪射击,把那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日军指挥官,当场击毙。但张宗发和另一战士,在日寇密集的火力下牺牲了。张小弟也光荣负伤,他乘敌混乱之际,机智地滚下了山岗。

湖庄头失守后,大岙岗就完全处于日寇的全面包围之中。我阵地上的英勇战士临危不惧、殊死坚守。当日寇倾其全力冲上岗墩时,朱大钧沉着应战,先后击毙敌寇三名。一班长兼机枪手施铁山英勇顽强、圆睁双眼、横扫机枪,一下打死了七、八个敌人。他身中数弹仍咬牙忍痛,打完最后一梭子弹。他把机枪芯甩掉,跳出战壕,高举枪身,手握枪托,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伤重的战士尽管不能行动,也撬动岩石,滚向敌人。在大岙岗直杀得鬼子尸横山岗。但是毕竟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英雄施铁山倒下了,他的战友也一个个倒下了。正当鬼子占领山岗企图活捉勇士之时,一位无名英雄身怀二个手榴弹,待敌群接近时,榴弹先后爆炸炸死鬼子多名。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许,鬼子凭着他优势的兵力和装备,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占领了这个最后的阵地。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荒秃的山岗,浇灌了抗战必胜之花。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一部分指战员机智地突出了重围。他们中有:杨永章等二人,突围后得到了当地居民何宗信、夏杏花的掩护。陆贤章、丁金福、王根生等藏进了山洞。林阿同腿部负伤后藏在山岙中的草舍棺材旁。一部分伤重的同志和弹尽枪砸的战士则都落入敌手。尽管日寇缴了十几支枪,但没有一支是完好的。鬼子对手无寸铁的伤俘大施淫威,胁迫他们交出武器。但同志们谁都不予理睬。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当场将我二名战士残杀于荒野。另外十九名伤俘被押上105号兵舰。这时李金根等三人目睹有三十多具日寇尸体僵卧甲板,他们暗自高兴。霎时,看到日本鬼子晃动雪亮的刺刀,在甲板上走动,步步迫近。李金根等三人洞察日本鬼子要下毒手,于是挣脱绳索,急奔船舷,乘敌不备,毅然跃入大

海。鬼子即刻举起机枪，向海面猛烈扫射。两位战士不幸被击中，沉入大海。李金根左手臂负伤，不过他水性较好，顽强地用右手，趁涨潮顺水，奋力向大鱼山岛游去。

接着105号舰上，传出了稀落的枪声。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对我伤俘进行了集体屠杀。

下午五时，敌人撤离大鱼山岛后，隐蔽在山脚、岩洞等地的沈长文、孙民权及其他后勤人员，立即奔上山岗打扫战场。岛上居民也积极主动地赶赴战场，协助寻找牺牲同志的尸体，收集勇士们砸烂的武器。他们含泪掩埋了烈士忠骨，收容汇集了十多名伤员，手扶肩背，送上三号哨船。当我准备扬帆起航时，死心塌地与民为敌的特务汉奸张阿龙率部追到山脚，妄图阻止我航行，截我伤员，遭到我孙民权班的坚决阻击。三号船当夜安全回到了海防大队基地——古窑浦。其后，跳海泅渡的李金根，当爬上滩涂时，得到了长礁岙口的渔民王阿品、王阿追父子俩的救护。跳崖脱险的张小弟等，也得到群众的热情掩护，给他们清洗血迹、包扎伤口、更换衣衫、喂水送饭、精心护理。第二天，鱼山群众驾驶鱼船，把十多名伤员送回海防大队。排长陆贤章滚下山岗后，他把机枪芯裹在身上，枪架藏在山腰后的山洞处，第二天也在群众的掩护下，转道滩浒岛，在二十七日返回大队部。

二十八日，大队部决定陆贤章带二中队的二个班，装运大米、药品等物资，重返大鱼山岛，对支援我军的群众给予亲切慰问，对张阿龙给予严正的警告，限他定时交出劫走的枪支、物品。当陆贤章等完成任务离开大鱼山岛时，人民群众依依不舍，含泪送别，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大鱼山人民流血牺牲的同志，盼你们再来啊！”

几天后，鱼山群众冒着风险，将我失散的一挺机枪架子及其它一些军用品，送到古窑浦。同船回来的还有朱三宝。

至此，先后归来的战士、班长、排长共三十多名。

我海大一中，在大鱼山抗击了八倍于我们的日寇陆海空军的

联合进攻,浴血奋战达七小时之久。战斗打得英勇顽强。我虽牺牲大队副、中队长、正副指导员等四十二人,但日寇汉奸也遭到了一倍于我的伤亡,没有达到全歼我军的目的。事后获悉,日本鬼子向其上司报告时,惊叹地说:“新四军三五支队这样厉害,在海岛上还没有碰到过。”并吓得岱山日寇全岛连续戒严三天。这一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表现了我中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神圣领海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浙东军民打败“小东洋”,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心,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新华通讯社发了战报,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作了广播,《新浙东报》也曾著文表彰。浙东《战斗报》社还编印了《血战大鱼山》的连环画册。

血战大鱼山岛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烈士们不朽的形象将永垂史册。

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 又联合又斗争的情况

何 克 希

我新四军浙东部队在四明山敌后与日伪四年斗争中，主要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日寇。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当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斗争复杂化。我们的原则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即国民党三十师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团，因其师长张銓基被国民党顽固派特务所谋害，故将其部队拉至敌后，主要是图生存，待机报仇。我们了解到以上情况后，决定争取和团结田、张部队共同抗日，并派人帮助其改造部队。这一方针政策得到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批准。田岫山由于对国民党残杀其师长报仇心切，认为我们力量太小，不能协助其实现报仇心愿，而想假手日寇以求报复。我们劝说无效，又因田与日寇已有所接触，结果田岫山投敌去了。田投敌后，日寇派其进驻三北周巷，阴谋对我。我们晓以大义，继续争取其返回抗日阵营，并约法不得出扰人民，如违约我当予以坚决打击。田岫山在周巷时期，日寇采取了一系列毒化、腐蚀的政策，田切身感受到日寇的毒辣手段，居安思危，乃毅然在周巷起义，将日寇一个小队和监视官佐斩杀，投奔上虞城（丰惠镇）、丁宅街、许岙一带。田部在周巷反正后，敌人即派部队追击，我们曾派部队掩护田部，击退敌人。以后又在人力物力上给予田胡子以不少援助，还派黄源等干部去田部帮助工作。国民党鉴于田岫山有此一杀敌的政治资本，即着手拉田、张以反我。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组织浙东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派挺三纵队贺钺芳部三个团进入四明山我根据地，妄图消灭

我军，封田岫山为挺四纵队司令，封张俊升为挺五纵队司令。并利用田的领袖欲，名义上以田为主，背后又暗许张俊升，实质上都受贺钺芳统一指挥。我们将以上情况电报军部及华中局，军部同意我们力争田、张中立，孤立打击贺钺芳的方针，并要我们在贺钺芳部一过新奉公路立脚未稳时，即予歼灭性打击。此一着，经我们派人到岩头实地察看地形，认为不易得手，兼之岩头系张俊升部魏显庭驻地，如我军集结部队，容易暴露企图。故我改为在四明山蜻蜓岗、峙岭构筑工事，驻守一二个要点，以逸待劳，集中兵力，求得歼击贺钺芳一部。我军一部仍驻守梁弄之横坎头，使田岫山部未敢越雷池一步。及至我到蜻蜓岗，而田、张部队已与贺钺芳靠拢，受贺统一指挥。因我未能取胜，作战参谋余旭牺牲后，只能撤出战斗，转而与顽敌作较长时期的作战，以求得于运动中打击顽敌。

由于田、张受顽敌指挥，深入我四明山根据地，人民受到了战争创伤，田、张部队骚扰了人民。我主力部队后来虽在茶坑一仗歼贺钺芳一部，但未能扭转战局，而顽军反又增加五个突击营，于是我军乃转移至会稽地区。这时，区党委开会讨论，一致决定打开会稽局面，调动顽敌至会稽地区，再行转回四明山根据地。乃因误传情报说顽军全部撤离四明山地区，仅留田、张部队，于是区党委改变了原有计划。时正一九四四年春节，我军冒雨行军返回四明，而顽军贺钺芳和五个突击营与田、张部队却完全未动，我军遂落入顽敌口袋，造成极为被动的地步。在此种情况下，我被迫选择在前方一战，企图消灭田岫山部队。战士用命激战昼夜，虽然予田岫山部队沉重打击，但究未能歼灭田部。凌晨两点，突击营援军已到，我被迫撤离，造成以后我军在浙东地区的隐患——田岫山由友变敌，张俊升亦对我疏远。以后我主力转移三北地区，使顽军迫我决战的企图落空，未敢深入，结束了第二次反顽战争。

在贺钺芳及突击营全部撤走后，田岫山邀我去丁宅街开会谈合。我明知这是一副苦药，是一个阴谋，是一次鸿门宴。我在区党委会上提出并经会上研究决定，我仍需应约前往。我要求必需做

到有充分的准备和部署，区党委同志们同意了我的意见，作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和部署，下定与田同归于尽的决心。去时有张任伟，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与我一道去的。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依靠随我同去的英雄同志们的舍身保护，终于安然归来。当时田岫山部道道门岗都是机关枪，那里谈得上是请客吃饭，开会谈判和平？！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回想起来，斗争的确是尖锐复杂得很。

后来，粟裕司令大军南下浙西，谭启龙同志率一部前往与之会师，我留在四明地区。这时田岫山第三次投敌，于是我们发起讨伐田胡子的战役，发动了对上虞城（丰惠镇）和许岙的攻坚战斗，才将田岫山部全歼。田岫山本人仅带几支短枪只身逃脱。在当时全国抗战和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张俊升即与此同时毅然起义，率部参加了新四军。

以上所谈的就是我新四军浙东部队在四明山地区，与田岫山、张俊升部队又联合又斗争的概况。

（节录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致余姚县文化馆的信》，陈孟庸整理）

围 攻 许 岙

张 文 碧

(一)

一九四五年五月,盘踞在四明山区的国民党挺四纵队司令田岙山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田岙山亲驻上虞城,大肆反共反人民。为巩固四明山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决定发起“讨田战役”,为民除害。我纵队领导经反复研究,决定以一部兵力攻打上虞城,而以主力先攻打田胡子的老巢许岙,并由纵队参谋长刘亨云和我率领三支队一、三大队、五支队一部和警大、上虞县大队共四个营兵力,星夜从上虞城近郊出发。

六月七日本午,部队到达了离许岙不远的一座山村。刘参谋长和我马上带着支队干部林有璋、周瑞球等随向导上山察看地形。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一脉绿葱葱的丛山峻岭,在逶迤层叠的峰峦上,矗立着大小廿八个碉堡;山上山下,鹿砦篱笆密似蛛网,将内外许岙两个村子围了起来。田胡子几年来的苦心经营,确已将他这座储藏金银财宝的后方巢穴,修筑得象铁桶一样坚固。向导说:“为造这许多碉堡,许岙周围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天天出伏做工,吃尽了苦头。田胡子曾经夸过海口,说什么钢打的锦锋碉、铁打的武德碉、铜打的永和碉,许岙是浙东的马其诺”。

这牛皮虽然吹得可笑,但要攻破许岙,确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浙东游击纵队过去未打过大规模的攻坚战,又没有摧毁坚固工事的炮火,仅有一个八二炮连,也缺乏弹药。不能不说,我们已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我拿下望远镜轻轻问刘参谋长：“老刘，你看怎么办哪？”刘参谋长沉默半晌后说：“你看呢？老张。”大家一时都说不出话来，默默相对，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的心坎上。

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喂！主任，调门八二炮来，向许岙先轰两炮试试，看看距离够不够得着，敌人防备怎么样？”

一门八二炮，很快就调到跟前装架起来了，“轰！轰！”锦锋碉前掀起二团浓烟，通过望远镜的观察，碉堡的皮也没碰掉一块。敌阵内，静悄悄的，好象根本不卖我们的帐。敌情如此复杂，战斗部署如此艰难，但我们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打，一定要打！许岙有田胡子，四明山根据地就不得巩固。

四明山的群众一听说三五支队要打田胡子了，马上拆了自家的门板、棕床，掬起套满绳索的竹杠，纷纷自动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披星戴月从里山岙赶出来随队前进。

四明山的群众，谁不仇恨田胡子这个吃人心的魔王呢！他每杀一个人，都要亲临刑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身边煮滚了一锅水，当死者刚刚栽倒在地，尸体的脉搏还在突突地跳动时，便有几个凶手涌了上去，用尖刀划破死者的胸膛，再用脚在肚子上一蹬，挖出那颗鲜血淋漓的心脏来，抛在滚锅里煮烫一会，然后，田胡子就拿起这颗半生不熟的人心，当作下酒菜吃下去。四明山有多少革命志士、进步群众，被这个灭绝人性的土匪头子杀害啊！想起这一切，我和刘参谋长久久不能平静。

战斗还是具备着胜利条件的。首先，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随时向任何方向发起攻击；其次，许岙守敌虽是田胡子的精锐，但能拿起来打的只有一个支队和一个教导大队，余下全是杂七杂八的后勤眷属；同时，敌人虽有林立的碉堡工事，却成了分兵把守互相隔绝的致命弱点，便于我们各个击破。他唯一可以逞能的是火力，但我们在夜间攻击，就使敌人的碉堡火力无用武之地。

晚上八时许，我们先派遣了三支队一大戈阳教导员，率领郑光

发的三中队，去夜摸许岙右侧阵地的前哨堡——太平碉。

星光点点的夜色里，这支轻装的尖兵，静悄悄地向丛山峻岭隐去。夏风徐徐，拂得村头的杨柳婀娜起舞，田间聒噪的蛙鸣，偶尔有几只山鸡拍打着翅膀叫着“咕咕咕”的声音钻进草蓬。夏天的夜晚是多么富于情趣啊！我和老刘在村口站了许久，遥望着夜幕笼罩的战线，揣测着未来的大战将鸣响起怎样的前奏曲！

(二)

翌日清晨，东方露白，一营通讯员满头大汗飞也似的奔进草屋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张主任，刘参谋长，太平碉全解放了。敌人在睡觉，连个岗哨都没有，我们只塞了两枚手榴弹，便抓了十一个俘虏。阵地已占领。请示首长，是否趁胜攻击？”

“好极了，小鬼！”我兴奋地高喊。

刘参谋长带着那快活的笑容拍着小家伙的肩膀说：“命令警大立刻出发，乘胜攻击！”

通讯员粗声粗气地应了声“是”，扭头就跑。

山谷中回响起短促的号音，警大指战员很快就向战地跑步挺进，我和刘参谋长也随队前进了。在朝雾中沿着许岙敌人的右翼棱线插上山去，进展神速，一连八九华里的险山隘道，都通行无阻。正午十一时许，仅用二个班的兵力，连克了两座黄泥小碉。战斗打得非常干脆，榴弹大王鲁国俊一连将数颗榴弹甩进碉堡，趁着敌人一片慌乱，战士们便杀进碉堡，解决了战斗。

下午三时，警大又向蒋山碉发起攻击。这是个中型碉堡，上下两层，里边守敌有一个排，它是保卫武德碉的前哨碉。对付这座蒋山碉，步枪榴弹就无用武之地了，我们立即调炮连助战。炮轰中，一颗硫磺弹燃着了蒋山碉旁十公尺处一座用稻草搭成的伙房，顿时，烈火漫天，在微微东南风的吹助下，火焰卷着山上的干茅草，一阵猛一阵地向蒋山碉扑去，刹那间，碉堡外围的鹿砦篱笆，烧成了一圈丈把高的火墙。好家伙，我们就趁机来了个火攻！战士们就地

砍伐了许多柴火，将火圈缩拢到蒋山碉下，碉墙上的砖石被烧成了红色，瞭望孔里的木板也着了火，碉内的敌人象无数头野牛关在火笼里，横冲直撞，发出了绝望的号叫。突然，碉堡门被撞开了，涌出来十几个浑身着火的敌兵，他们剥着衣服，捶着胸膛，嗷嗷地嘶喊着向武德碉跑去。战士们沉着地用冷枪向逃跑的敌人射击，山腰上立即滚下了四五具敌尸。蒋山碉就在这一阵烈火中毁灭了。不知不觉，战斗已经历了一个白天，一抹夕阳渐渐沉下了西山，火红的晚霞漫盖了半个天空，晚风吹动竹林，发出飒飒的声响，战士们三五成群地坐落在烟火未烬的阵地上，嚼着烧饼，饮着泉水，有的还轻轻哼起了歌曲……

(三)

在乱石垒垒、竹林环抱的最高峰上，武德碉象一顶“鹅冠”戴在上面，居高临下，鸟瞰着整个许岙阵地。旁边山脊上有一条直通嵊县、天台的暗径，武德碉控制着这条路，是田胡子留作最后的退路。碉内有两个武器精良的步兵排扼守着。拿不下这顶“鹅冠”，战斗就无法向许岙纵深延伸，部队就会完全暴露在它的火网之下。

八日当晚，月色朦胧，我们连续组织一个排向“武德碉”作试探性的攻击。激战一小时未能攻克，部队只好歇下手来研究战术。

上虞城内的田胡子，得到了武德碉被围的消息，就火速命令许岙守敌组织增援。九日拂晓，乳色的浓雾尚未消散，敌人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增援部队，在各个碉堡火力的掩护下，从许岙左翼，向武德碉蜂涌上来。刘参谋长和我速令三支队坚决打垮敌人的反冲锋，不准他们靠近武德碉一步；再令警大，将武德碉严密封锁起来，控制碉外所有的水井、泉坑、伙房、厕所，不让敌人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拉一泡屎，把守敌活活的饿死渴死闷死在碉堡里；又组织冷枪队不断地向碉内射击；组织喊话队进行政治攻势，促使敌人内部瓦解。

三支队全体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敌人增援部队反复争夺着前沿阵地,失去,夺回,又失去,又夺回……终于在我们猛烈地反冲锋下,将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抱头回窜,使武德碛完全处于孤立。

十日黄昏,战士抓到了一个出碛偷水的敌伙头军来见我,一见面,这家伙便磕头如捣蒜地向我求饶说:“不得了呀!长官,武德碛内没有粮没有水,前天在伙房里烧好的一锅稀粥,没等盛进饭桶,就叫你们炮弹给炸翻啦,还死了两个伙伙弟兄。现在,碛内死尸伤号一大堆,大便小便全解在里头,臭死了,渴死了,饿死了,兄弟们都不想再打这个讨债仗了。长官,让我给你们当个伙伙吧,我烧过三年小厨房。”

根据这个情况,组织科长徐放就进一步向俘虏做了政治工作,让他饱餐了顿白米饭,喝足了开水,然后劝他回武德碛去送一封劝降信。伙伙用脏黑的手掌抹抹嘴连连说:“一定效忠,一定效忠!连长和我是同乡。”

一小时后,碛内出来一个蓬头污脸的班长,自称代表连长来谈判投降条件。徐放说:“绝对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但不准破坏武器,否则,严惩不贷!”

敌班长装出一副尴尬相,不时“嗷呀,嗷的”点头哈腰,其实他已无心谈判了,那双眼睛贼溜溜的向旁边一口水井打转转,一会儿恭恭敬敬地说:“长官,准许我喝口水。”徐放允许他畅饮一顿,这班长就快活得蹦了起来,三脚两步奔到井边,咕咚咕咚牛饮起来,足足灌了那么一二分钟,才爬起身来,向我们鞠了个九十度的躬,回碛去了。

很快,武德碛内四十九个官兵,全部举着枪,排着队,躬着腰,出来投降了。内有七、八个人,头发眉毛都烧得光秃秃的,活象几只火烧毛猴,原来就是从蒋山碛逃走的那一批,他们仍然逃不出做俘虏的命运。

占领武德碛后,我部就控制了整个许岙的制高点,居高临下,

我们这一把犀利的钢刀就要直插许嵩的心脏了。为了加强直插敌纵深阵地的力量,我们把参加围攻上虞县城的五支三大调来许嵩增援。

(四)

六月十一日,我们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保护田部印刷厂的“黄泥碛”。敌人为了保护印刷厂作殊死顽抗,加上我们地形生疏,接连两天两夜的争夺战未能攻克。

十四日,刘参谋长和我的指挥位置下移,直接指挥三支队二中队强攻该碛。中队长陈鲁在激战中一只眼睛被敌人的榴弹炸瞎了,但仍坚持战斗,高呼冲锋。在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下,终于拔除了这枚硬钉。印刷厂全部被我占领,缴获了大批物资,还有几头肥猪。我们马上将肥猪发给各部队,就地宰杀改善伙食。

连续七个硝烟炮火的白天晚夜,战士们消瘦了,疲惫了,阵地上的尸臭味、火药味,加上六月的闷热天气,不少战士呕吐昏倒。我和老刘也一样,一连几餐都咽不下饭。但是,在苦战中,从没听说过谁叫苦,也没看见哪个愁眉苦脸。仗越打得艰苦,斗志越是高昂。不少战士连续几次充当突击队员,还有许多指战员身上连带几次花,也不肯下火线。战士们这种自觉的革命斗志和优秀的阶级素质使人深切难忘。

在我们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人上层分子也开始动摇分化。田部大队长蔡国玉认清了大局,认识到田胡子一贯祸国殃民,不值得为他卖命送死,眼看再战下去,只有自陷泥潭,逃不出被歼的厄运。加上他好友荆子刚(我军的干部,共产党员)的劝导,便于十一日亲率全大队,举行了战地起义,将纵深阵地中一座重要碉堡交给了我们。这一来,敌人纵深阵地被我隔离,使我军对许嵩大本营及田家山一线阵地,形成一把铁钳。

可笑的是,蔡国玉率队起义的消息,敌人还蒙在鼓里不知道。

第二天,我在望远镜里看到,许岙方向有一个背着马枪的传令兵到那个碉堡去传令,我憋不住笑出声来,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小鬼,你们看,这家伙给我们送消息来了。”果然,那个传令兵双脚刚跨进碉堡的门,便被我们逮住了。

(五)

六月十五日,三支队副支队长周瑞球和五支队七中中队长都曼令,率领一个加强连向田家山猛攻。一口气占领了山上四座碉堡,等于一把尖刀,割断了锦锋碉和永和碉之间的联系。但我们预计到,这是敌人的最后阵地,失守以后,许岙将四面无屏,敌人定会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我们要求攻击部队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带足干粮和水,以备和困兽激战。

同时,老刘和我又亲自指挥一个连,用火攻蒋山碉的经验火攻永和碉,以策应田家山的总攻。

这是许岙之敌最后的一块阵地了,田胡子三令五申,向各守碉堡部队传下了死守命令,因此,敌人的顽抗也变本加厉,处处均有恶战,战斗进展缓慢,一连拖了好几天。可是,情况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了,何克希司令员从梁弄拍来急电,催我们快打快攻。浙东局势日趋恶化,国民党顽军卅三师星夜赶来增援田胡子,以每天八十里的急行军逼近上虞,浙保的几个团也从天台急行军赶来,田胡子又从上虞派出了他最后一支部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和教导队,增援许岙。

田胡子的增援部队倾全力向我田家山守卫部队连续发动九次反攻,手榴弹象阵雨般地在我们的阵地上爆炸。都曼令指挥的两个班在敌人重围中孤军奋战,最后终因弹尽力竭,伤亡惨重,被迫弃碉突围。

敌人的疯狂挣扎,激怒了全体指战员。当晚,在周瑞球的指挥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我军再度反击田家山。山谷中,震动人心的冲锋号音,把战士们的愤怒和斗志推向了高潮。大家高喊着:“杀

回去,为牺牲同志报仇,不把田胡子消灭干净,不拿下田家山,决不回来见上级!”战士们象汹涌的海潮一样向田家山冲去。不到一小时,田家山阵地又踏在我军的脚下了。

(六)

六月十九日,我军占领了全线阵地,直接控制了外许岙。留下的只是许岙和田胡子的最后一座锦锋碉了。

这是一座最坚固的堡垒,它以田胡子自己的字号“锦锋”命名。田胡子曾洋洋自得地带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观赏过这座碉堡。现在,碉内困守着田胡子的祖孙三代——父亲、大小老婆、儿女和最亲信的一个支队长及教导大队长,依凭内许岙八十个卫士保护着。

锦锋碉是钢打的也罢,是铁铸的也罢,现在只不过是一只装着匪首的囚笼罢了。

我们知道田父在匪部中有极大的封建权势,就象太上皇一样,一道“圣旨”下来,无人敢违命。他年过七十,还荒淫无耻,每天要烧几两大烟,如今四面被困,烟土已绝,整天眼泪鼻涕滴滴涟涟。

利用这一点,我们决定从田父下手,以政治方式解决锦锋碉。何克希司令员也特地从梁弄赶来,亲自写信令田父派人与我军谈判。

这个老家伙狡猾得象狐狸,他知道救兵国民党卅三师和浙保已逼近上虞,许岙还有获救的希望,因此,一面与我们敷衍答应投降,一面又故意拖延时间,硬说要二十日以后再做最后决定。我们当即揭穿了他的阴谋诡计,叫他不要梦想,卅三师进不了许岙,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同时,我们也大度地答应他在二十日清晨放下武器,但其电台必须在当晚十一时交出。

我们一边打仗,一边集中了十几挺轻重机枪架在锦锋碉四周,加强军事压力。田父看看大势已去,只好在晚上十点多钟,派人将

一部崭新的收发报机送到我们的指挥所里。

二十日清晨，当圆滚滚的太阳爬上山时，锦锋碉洞门大开，灰须满腮的田父，携着老伴、大小儿媳、孙子孙女及全体官兵，共五六百人枪，在锦锋碉前的广场上涌成一堆，向我投降。

胜利了，凯旋了！

战士们押着七、八百个俘虏，唱着雄壮的凯歌，回师梁弄。沿途群众人山人海夹道欢呼，爆竹声响彻云霄。

连续十四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把这座田胡子号称浙东“马其诺”——许岙砸烂了，为浙东人民铲除了祸根，搬掉了浙东抗日战线上的绊脚石，大大鼓舞了浙东军民抗日的决心。

虽然田胡子本人没有被擒，但他再也不能在四明山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了。他不得不放弃上虞城，带着残兵败将向嵊西落荒而逃，结果在崇仁镇又被我军追上，几乎全歼。

许岙战斗获得胜利，消灭了田胡子部，歼灭了卅三师一部，促使张俊升部起义，解放了浙东第一个县城——上虞。这不仅使浙东的抗日根据地大大巩固，而且为浙东游击纵队以后奉命北撤，奠定了胜利基础，对浙东的抗日斗争来说，这一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东游击纵队的政治教育工作

江 岚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来进行的。

浙东部队是党领导的一支年轻的人民抗日武装。它虽然没有红军部队的基础,但有红军干部作领导,当时支队以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锻炼的,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和相当的领导水平。部队的政治素质是很好的,它是由黄浦江两岸和浙东地区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部队富有朝气,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这个部队基本上是在本乡本土中生长的,和人民群众联系密切,鱼水相亲。但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四面受敌,敌众我寡,战斗频繁,斗争艰苦。

从一九四一年初夏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部队北撤,四年间,在浙东区党委和纵队政治部领导下,部队进行了如下的政治教育工作:

(一) 抗日教育

这是部队的基本教育,它贯串在整个抗日时期。教育方法是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激发民族仇恨,鼓舞抗战士气。例如,联系日寇烧杀淫掠的暴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汉奸卖国贼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径,使战士们认识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歼灭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就不能解放。同时,联系我反“扫荡”、反“清乡”反抢粮战斗的胜利,振奋士气,提高胜利信心。

(二) 阶级教育

阶级教育和民族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寓阶级教育于民族教育之中。初入伍的战士,不知什么叫阶级,什么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只知道抗日,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国军”的本质区别。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联系国民党顽军多次向我军进攻,与敌伪勾结,搞“曲线救国”,以及欺压人民,迫害民主人士等等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事实,揭露它的反动阶级本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当时部队曾专门编印了一个小册子《我们的出路》,集中地讲解这个问题。

(三) 关于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宗旨和任务的教育

这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是:

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和领导的军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八路军、新四军。

共产党今天领导我们抗日,抗战胜利后,将领导我们搞社会主义。

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解放人民而打仗的革命战士,不是雇佣兵。

革命战士应该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四) 纪律教育

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纪律教育也是部队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使大家明确,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遵守的基础之上的。

我军官兵在政治上、人格上一律平等。要继承和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团结互助,阶级友爱的光荣传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不仅人人要会唱,而且要做到自觉遵守。

(五) 国际主义教育

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当时部队主要抓了两方面的教育:

苏联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

联红军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

德、日、意是法西斯国家,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为争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团结奋斗。

除以上内容外,对干部还有两项重要的教育:一是政策和策略教育,主要内容是中央和华中局对内部的有关指示;二是整风教育,主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这些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

主要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形势和斗争需要以及上级指示来部署,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

方式方法一般有上课,讲故事,做报告,班组讨论和俱乐部的活动。没有什么冗长的、空洞的说教,教学是生动活泼的。如在揭露敌、伪的残暴罪行时,就请受难群众来控诉;在表扬那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英雄时,就组织本人或他的战友作现身说法;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邀请当过红军的干部讲二万五千里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红军时期的革命故事;有时,也请原来落后,后来转变为先进的同志,讲述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体会。所以,当时的教育者不光是首长、政工干部,而主要的是集体、是群众。

部队的基本政治教材是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等等,都印成单行本,普遍发给干部和连队学习。我们也编写教材,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编发一些关于时事、政策、具体任务等临时的讲话材料。

从这里不难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军队都是受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这样称的)熏陶、哺育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代新人。一个年轻的战士从入伍起,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教育,就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逐步奠定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不断地清除自身从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变为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操、遵守纪律、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士。

浙东部队从纵队首长到每个战士,都过着清苦的生活,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为了革命事业,都以艰苦为荣;在枪林弹雨中,一旦革命需要,都毫不迟疑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五、六百次大小战斗中,特别是第一、二次自卫战争,以及与日军遭遇的横河血战,被敌伪顽联合围攻的后杜桥战斗,孤军挺进海岛的大鱼山战斗,背水之战的激浦战斗,涌现出多少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英雄!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先烈,永垂不朽,将为人们世代所崇敬和怀念。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陆 慕 云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是随着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斗争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为军事、政治斗争服务的,经过了初创、发展、巩固、北撤几个阶段。在经济机构方面,初期成立了三北、四明两个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别领导两地区的财政工作。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时,成立了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处,统一领导根据地财经工作。一九四五年春,成立浙东行政公署时,又设立了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继续统一领导财经工作。抗日根据地经济斗争形式有:二五减租,武装保卫秋收,武装保卫税收,征收抗日报费等。我们制订了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提出了税收工作的详细方案,建立了浙东银行,发行了抗币,从而保证了抗日报费和部队给养。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除了维持本地区的一切开支外,还有节余上缴。

我到浙东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一九四二年底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原要我和范醒之一同去浙东的,范醒之后因另有任务,就决定我一人去浙东。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我辗转三个月,才乘海船来到浙东,在慈溪县古窑浦上岸到达三北。来三北前,粟裕司令对我说:“浦东的武装发展到三北,要同其他游击根据地联成一片。浙东处于东南沿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战略要地,蒋介石的老家在那里。我们到了那里,政治影响很大。经济上是富饶地区,你们去搞钱,还要支持延安”。我到三北后,浙东部队负责人何克希同连柏生对我说:你来浙东我们区党委早就接到电报了,对你的工作已作过研究,你当前的任务就是留在三北经济委员会工作;我们浙东地区

主要财经来自三北。区党委已去四明山地区,往返要过封锁线,你就在此把工作抓起来。因此我一到三北就在经委会工作。

整个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创、发展、巩固健全与北撤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阶段(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从根据地开辟到我到三北以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做打基础的工作。浙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经济的条件很好。三北地区北靠大海,是浙东海上通道,贸易来往频繁;人口稠密,盛产粮、棉、盐,经济富庶;浙东的新昌、嵊县、诸暨盆地都是产稻地区;中部金、衢、东阳盆地,耕地集中,旱地面积较大,是稻谷和杂粮产区。在我到三北以前,三北地区已经有办事处和税卡,进行征粮、征税的工作。我到三北后,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基础工作:(一)建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下面有慈溪、浒山、余姚分会,分会下面是税务所;(二)组织了一支财经税收的队伍,大都是浙东地区各县的知识青年,包括小学教师,有一些是苏北和苏中根据地调来的,还有浙东地方党的一批干部,他们是财政税收工作的骨干;(三)采取不同的形式抓收入,收税、搞钱粮、收爱国捐款(上层开明人士爱国抗日,愿意捐一些钱)。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保证了部队的基本需要。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
从我到三北以后至浙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前,这一阶段的财经工作是不发展的。浙东区党委成立以后,开始设立三北经济委员会时主任是连柏生,我是副主任;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连柏生走后,我担任主任,张蓬、叶贻中为副主任。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各县行政工作,我还兼任三北总办事处副主任。我们经委会主要是负责制定方针政策,如确定征收粮食、合理负担,规定征收办法,编制预算决算等,具体由各县贯彻执行。税收工作是经委会直接领导的。在这一阶段,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巩固和加强税收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们着手调整税收机构,把各分会撤了,改为税务分局,分局下设税务派出所,派出所下再设若干税卡。税务分局管的地方很大,象慈溪分局,南面管到二六、三七市,北面管到观海卫、古窑浦。税务派出所专门收税,不搞其他工作。实行以后,效果很好。但税收干部的工作是十分艰险的,同敌伪斗争也是很尖锐的,大部分税收干部都带有武器,当时三北税收主要是盐税,为了打破敌伪封锁,增加税收,我们就在交通要道设卡收税。当时我们在税务战线上,和敌伪进行了艰巨而又剧烈的斗争。有的税收人员牺牲在敌人枪口刺刀之下,有的税收人员被捕入狱,受尽敌人的酷刑。写到这里,不禁令人心酸难过。

为了健全税收制度,我们通过调查研究,草拟了一份《战时进出口货物税征收暂行办法》,提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口号,根据地只开征统一的进出口货物税和盐税。货物税实行一物一税制,过境解一道税,尔后在根据地内就可通行无阻。这个货物税条例当时未对外公布,只在内部掌握;到一九四五年,在一年多实践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后,才正式公布《战时进出口货物税征收暂行规定》。当时在敌伪据点林立之下,敌以据点为依托,对我实行严密的封锁,严禁军需物资和民用必需品进入我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伪的封锁,我们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这个杠杆,冲破封锁;另一方面利用敌占区和根据地内的工商业资本家,给予税收的优惠和高利润政策,支持和鼓励他们贩运,和我们供给部挂钩,解决一部分军需物资,如布匹、医药、必需的日用工业品,有时还搞进一些枪枝弹药。在税收政策上我们采取物资分类税收的政策,税率大约有四大类:

(一) 轻税率:一般生活必需品;

(二) 高税率: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如化妆品、迷信品等;

(三) 免税品:军需物资,如药品、布匹等;

(四) 禁运品:毒品、战略物资。

关于盐税,我们对过境的食盐,以货物税的形式征收;对盐区,

因敌人控制很严,我方力量达不到,就采取包税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责成盐区乡保甲长包税。

在收税措施上,采取武装保护税收,由地方民兵和税收人员一起收税,既可武装保护,又可探听敌情,起到侦察员的作用。在根据地开始征收的只是货物税、盐税两种,这两种税收明确规定是归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东行政公署的财政,统一收支,各县不得截留。后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又规定了属于各县财政收入的税收,并陆续开征酒税、屠宰税、油坊税等,总计有十多种,都属地方税,由各县政府支配。

为了保证军政费用,建立了总金库制,一切税款和征粮代金的收入款,必须全部缴库;军政机关的开支费用,必须有预决算制度。为了能贯彻执行这个制度,由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东行政公署发行金库兑换券,用钱要有预算,各级负责人不得乱批条子,这样规定后纪律严明,风气很好。

关于金库兑换券,它不是货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它实际上只是提取现金的证明。后来开办的浙东银行设有总金库,在四明山,三北等地区设有分库。按金库制度规定,所有现金(税款、粮食代金等)都应解入金库,各地所需费用,由浙东行政公署发令下拨。在当时敌我交错,战斗频繁的环境下,解送大量现金,长途往返于敌我之间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印发给各单位、各部队一定数量的金库券,凭金库券向当地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提取现金;再由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将金库券汇集、抵作现金解交入金库。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给养,我们财经处对收入的款项,控制是十分严格的,按期有预算决算,对各级财政单位都有严格的要求。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积极支持我们建立和健全财经工作制度,党、政、军、群都要遵照执行。

一九四四年初,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三北经济委员会撤销),临委会下设财经处,我任处长,张蓬任副处长,各税务分

局划归县办财经科领导。我们工作主要抓各县财经科。

第二，征粮工作。

当时征收公粮不仅保证部队吃饭，而且因其中有一批征粮代金的收入，这也是解决财政开支的一项重要收入。征粮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根据各抗日根据地征粮工作的经验，征粮有两种办法，一是按产量累进征收，二是按田亩累进征收。当时情况，按前者不可能，只能采取后者。但按田亩累进征收也有缺点，不容易达到合理负担，且当时我们实行二五减租，团结开明士绅，情况就复杂了。一九四三年秋收时就按田亩分等级累进或递减征收，征粮条例是以三北游击司令部名义公布的，共十章四十五条。到一九四四年秋收时，征粮办法是用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名义公布的，共八章三十四条。这个“办法”的特点：（一）同老的田赋合并征收，把原来国民党政府征收的三十三年份田赋法移过来为我根据地财经工作所用。为什么要用这个办法呢？这是为了尽可能与群众的传统习惯相适应；另外，可以借田赋为名接收原县政府的田赋册，使我们依据田赋中的田亩数征收，并可向业主征收田赋。（二）征收标准及征额按田亩累进，一共分了四等，分等计额。（三）强调合理负担，其中田赋部分应由业主完全负担外，有关公粮负担还分：1. 自耕农独自全部负担；2. 租佃之田由业主及佃户平均各半负担；3. 租佃之地采用定额分担办法；4. 还规定了大小业主分担办法。（四）规定了减免政策和办法，其中有优待抗属等。这个征粮办法的特点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使征粮达到合理负担。根据这个精神，对上虞、慈溪、余姚、镇海等县的一百二十万亩土地，分等征收，还同二五减租结合起来，有利于团结抗战，照顾了开明士绅的利益。

征粮地区分为游击区、基本区、敌顽区。前两种地区收公粮，对敌顽区采取收缴公粮款、解缴法币的办法。

一九四四年正式公布了征粮法，将公粮和田赋合并征收，这是依据当时人民经济情况和坚持浙东敌后抗战实际需要来制定的。公粮田赋一年一度，一次征收，以粮谷为主，但也收代金；征收以田

亩为对象,对工商业者另行规定征税(抗经费)。还规定有爱国热忱之人士(敌占区),愿意贡献力量支援抗战,自动慨捐抗经费者,我们也接受其捐款,并严守秘密。

田赋和公粮是分别解交的。田赋悉数拨交作军事费用,公粮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军事公粮;(二)行政公粮;(三)乡镇公粮(包括乡镇行政及文化教育等各种事业经费)。

征粮的标准是:

甲田(平原水田),每亩征谷27斤,其中军事公粮16斤,行政公粮7斤,田赋4斤;

乙田(山田),每亩征谷17斤,其中军事公粮10斤,行政公粮4斤,田赋3斤;

甲地(包括上等地及地改田),每亩征谷13斤,其中军事公粮8斤,行政公粮3斤,田赋2斤;

乙地(次等地),每亩征谷7斤,其中军事公粮4斤,行政公粮2斤,田赋1斤。

以上的田赋全归业主负担。公粮部分分四种情况:

(一)自耕农,独自全部负担;(二)租佃之田,由业主及佃户各半负担;(三)租佃之地。甲地业主负担3斤半,佃户负担7斤半;乙地由佃户独自负担。(四)租佃之田地如有大小业主的,由大小业主和佃户各负担三分之一。

根据地的征粮工作由县委书记、县办事处主任或县长主管,县财经科具体负责,按期完成征粮任务。当时有句口号:“先予之,然后取之。”这就是要先领导群众实行二五减租,让群众得到好处,然后再来征粮。征粮工作除了财经干部承担外,在基层主要依靠民运干部的大力帮助,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大批的公粮征收起来后,分散给老百姓储存,保管得也很好。我们部队保卫秋收,群众都很愿意交公粮,地主也是愿意交的。我们的征粮工作同二五减租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为了保证部队所到之处有饭吃,当时采取发粮票的办法,凭粮

解决了下去工作同志吃饭的大问题。

第三，准备发展金融事业。

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一）设法制造抗币铜版，我们通过上海地下党与文化单位联系，采办到制造抗币的全套铜版，运到四明山；（二）技术准备，组织力量做好抗币的印制工作；（三）做好统一发行工作，包括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如组织了一支管理与监督发行抗币和筹备建立银行的队伍；（四）起草抗币条例和银行条例，以及起草关于发行抗币向华东局的请示报告等。之后由于技术条件限制，上海运来的铜版不能用，印刷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研制了石版，胜利完成了印票任务。

第三阶段：巩固健全阶段（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从浙东行政公署成立至北撤前夕，这一阶段的财经工作逐步巩固健全，公布了公粮田赋并征办法，税收办法，建立了银行（发行抗币，设立总金库），公布了浙东银行条例和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一九四五年八月还筹建工商管理总局，郭静唐任局长，吕炳奎任监委，管理海上通道，开辟贸易，和山东石岛准备开展两地区的物资交换。

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业，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奠定根据地经济基础，积极准备反攻，根据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决议发行抗币，以为本行政区之本位货币。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发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和浙东银行条例。规定了发行抗币总额为二百万元；设立浙东银行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等机构。

设立浙东银行董事会，由九人组成，并指定董事长一人，常务董事两人。吴山民为董事长，郭静唐和我为常务董事，负责日常事务。根据银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由浙东参议会推选监察人二人、行政公署委派一人共同组织监察人会，监察人是：谭启龙、杨思一、楼适夷。浙东银行由浙东行政公署副主任吴山民兼任总经票吃饭，乡保长凭粮票抵缴公粮，这就使我浙东从事军、政、党和民运工作的同志到各乡保甲处都能吃到饭。这适应了游击区的需要，

理,我任副总经理,王海峰任襄理兼总金库主任,四明和三北地区设立分行。四明分行由罗白桦兼任经理,王绍甫为襄理,三北分行由王耀中兼任经理,张光担任余姚支行经理。

发行抗币是经请示华中局同意的。华中局的复电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是:同意发行,并明确指示以下各点:

(一) 抗币发行后,应确定其是抗日政府的本位货币,在同法币联合或同伪币斗争过程中要力争主动,要培植它和帮助它,使它将来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成为独占的本位货币。抗币发行后应联合法币,在基本区坚决打击伪币。

(二) 抗币发行时如与法币等价行使,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抗币在流通筹码中将永远难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为此应按自己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比价不宜太低。比价的提高原则应以根据地几种主要的农副产品物价的加权指数为标准,但也不应常常变动。要采取支持生产发行,货物赎物,抗币即使不提价也可不完全受法币、伪币膨胀而带来的损失。

(三) 抗币与法币比价确定后,再确定发行票面的大小与发行数量。这要以主观条件印刷力量为标准,其次再满足流通的需要,一般应按照农产品上市季节性来分批发行,发行前要做充分的宣传动员工作。发行时要尽可能采取群众路线,贷给基本群众。发行后要大力巩固抗币的信用,如一切税收尽先收用抗币,必要时保证无限止兑换等等。

(四) 浙东所提的避免财政发行、采取生产发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贷款时要切实注意:要贷给有组织的基本群众,以刺激群众参加组织,同时也要真正贷到基本群众手中,照顾基本工农群众。还要有良好的贷款组织,要做到贷得出,收得回。

(五) 用银行和政府名义发行,印象可能更好一些,还可同金库结合起来,银行可以代理金库。

(六) 发行抗币后,必须同时开展贸易管理,并逐渐做好这一工作,使货币斗争与贸易斗争互相配合与支持,方易收到稳定物

价、防止通货膨胀等效果。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我们发行抗币总数定为二百万元,等于粮食二百万市斤的价值,作为浙东银行的基金。发行的票面有四种:壹元券、伍元券、拾元券、伍拾元券(实际只发行了前三种,是用上海道林纸印的);各地委印角票,有壹角、贰角、伍角。抗币的后盾是以稻谷为主,还有金银、有价证券、固定资产。

发行抗币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四明和三北根据地内货币流通很不足,伪储备票冲击市场,发行抗币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占领市场。抗币作为金融力量,联合法币,打击伪币,财经工作同军事结合起来,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一)发挥了打击伪币的作用,开辟了金融战线,向伪币发动进攻,建立了一支金融力量,造成了一个斗争的声势;(二)起了在根据地调剂金融市场的作用,受到群众的欢迎,占领了市场;(三)维持了部队和行政人员的经费之需要,起了一定的调剂作用;(四)起了稳定经济、发展生产的作用。当时抗币在四明、三北地区流通,它在群众中的威信是比较高的。广大群众相信共产党,说“藏抗币不吃亏”。由于广大群众的支持,抗币的发行对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开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根据地的财政工作中,我们对培训干部是比较重视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前后共办五期训练班:一九四三年在三北办了两期,一期是税收,一期是征粮;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南山的徐鲍陈又办了三期。训练班由薛诚等负责,每期大约两至三个月时间,主要是学业务,学如何收税、如何征粮、如何记帐等。

根据地财经工作胜利发展的原因,一是党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二是注重了调查研究。

当时在根据地里,根据敌伪顽我力量变化频繁的情况,我们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阻碍敌人的掠夺,减少敌人的掠夺,缩小敌人的掠夺;保护人民的生产,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增加财政的收入。前三个原则是对敌的,后三个是对自己的,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阻碍敌人的掠夺,就是保护人民辛劳所得的生产

成果；减少敌人的掠夺，就可以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缩小敌人的掠夺，就可以增加我们财政上的收入。我们正是坚持这样的方针，对敌顽区、游击区、基本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有了正确的方针，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主要是靠调查研究这个办法。在一九四四年夏，《根据地财经问题讨论的总结》中心是讲调查研究，包括调查的内容、方法，达到的目的，对问题解决的办法等。我们对征粮工作、交租关系、二五减租等都作了系统的调查，为制订政策、完善条例提供了依据。

第四阶段：全军北撤。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决定，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必须在七天之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由于时间紧迫，北撤时行政公署财经处和银行的同志，均分散随部队行军，随带金银基金，准备解决部队行军中的需要，并销毁抗币。对于流通在社会上的抗币，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在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的统一部署下，由各县政府所在地负责兑换，并委派海防大队政委吕炳奎负责办理。在庵东、道路头、龙山、陆家埠等地设立了兑换处，均按照原浙东行政公署公布的抗币条例规定，一元抗币兑换粮食一市斤。兑换是比较彻底的，避免了群众的损失。

我们在北撤途中突破了敌人的拦击封锁，于十一月中旬胜利到达苏北涟水，后编为山东野战军。浙东纵队供给部、浙东行署财经处及银行的物资、金银、货币等上缴，人员归一纵三旅供给部，我任供给部部长，魏善诚任副部长，至此浙东部队与行政公署的财经工作就胜利结束。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外事三则

顾 春 林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间,先后有美国飞行员以及美国新闻处与第十四航空队的代表来过浙东。我当时担任纵队司令部秘书,协助政治委员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处理些日常工作,有机会接触这些事件,现在分别记述于后。

一、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在浙东

我手头有一张美国飞行员的照片,在原照片的背面,我曾写了如下几行字,现在墨水褪色了,但仍依稀可辨,照录如下:

“美飞机师托勒特,阿肯萨斯州人,年二十二岁,隶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部下。一九四四年十月,横渡大西洋经印度来华,纵横飞驰于中国战场,予广州、香港、汉口、安庆、芜湖、南京等处敌寇以重大杀伤。不幸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江西驾机飞袭上海时,为敌寇高射炮击落,渠乘降落伞下降,为我淞沪支队救获,面部四肢灼伤甚重,经送至浙东梁弄司令部医治,旋即康复如常。相处五十日,于三月二十二日护送其归队。此照摄于梁弄新年雪景中,留此作为永久纪念。三月二十二日”。

另外根据我当年简略的日记,关于这个美国飞行员有以下几则记载: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美飞机师由浦东护送至梁弄。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

今日旧历年初一。昨晚又大雪，玉树琼枝，风景甚佳。晨起与何司令出外踏雪。民众来拜年者极多。晚上开晚会，欢迎盟国飞机师托勒特。多年来未曾有过如此快乐平安的新年了。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

上午谭政委在全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报告新形势与新任务。下午在大操场开军人大会，庆祝苏浙军区成立，欢迎盟国飞机师及金萧支队前来会合。会上何司令、谭政委进行更广泛动员，并有盟国飞机师演说。晚，社教队演出：《扩大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盟国飞机师托勒特南行，拟护送其返重庆。天雨，欢送者仍甚众。

淞沪支队是浙东游击纵队领导下的在上海浦东地区活动的抗日部队。他们在浦东救获美飞行员后，即于二月一日，派一队武装人员把飞行员送到梁弄。托勒特刚到梁弄时，只见他面部、四肢烧伤甚重，躺在担架上，行动很困难。当时纵队司政机关驻在梁弄，司令部住在梁弄东头一户姓黄的地主家。我们即把他安置在司令部的一间房里，实际上和谭、何首长住在同一所房子。我们以上宾之礼待他。天冷，给他烧火盆，医务人员每天来给他治疗，伙房给他做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好的饭菜，还派人到余姚、宁波采办面包、罐头、咖啡、炼乳等东西给他吃，还找了一本英语小说给他消遣。由于他年轻力壮，我们医疗及时，生活调理得宜，康复很快。日常口语翻译，由雷震担任，也只能勉强凑合几句。

查阅我的日记，纵队司政机关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自袁马移至梁弄，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离开梁弄移至上虞县城附近的朗桥朝西屋，在梁弄共住了六个月又二十天。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中最小的两个之一，处在强大的敌、伪和顽军包围之下，居然能在四明山区一个小市镇上，一连住得这么久，这件事本身，就可以充分说明根据地的巩固。一九四五年春节

前后,梁弄山静村闲,根据地群众情绪很高。美国飞行员到达后,我们对部队和群众进行了必要的时事教育和革命人道主义教育。飞行员在一定范围内的活动是相当自由的。

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处理问题,由谭、何首长发电报请示新四军军部。后得复电,交给国民党地方政府接收,转送美国驻华机构,手续必须完备,以防不测。我们当即遵照军部指示精神,完成交接任务,取得交接证件,并在交接现场拍了一张双方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在内的照片,转回司令部。

现将查阅当年浙东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有关报刊的所得的资料,抄录如下:

托勒特(Horold B Tollet)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队(Tights Group)第一一八战略侦察队(Tactical Reconnaissance Squaddron)中尉飞行员。一九四五年时为二十二岁。生于美国阿肯色斯(Arkansás),系独生子。父亲以修配汽车、无线电等零件为业。他在大学里读了一年书,主修机械工程。参加过空军训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自愿报名来华作战,在华作战共十三次。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托勒特与同伴驾驶二十六架野马式P51飞机,从江西赣州出发,约经二小时半飞行即达上海上空,先后向日寇机场射击敌机两次。日寇即纠集九十二架飞机与他们激战。托勒特于射击后,离敌机场不远,不幸中高射炮弹,油缸起火,面部与右手右脚都被灼伤,于是他乘降落伞坠于黄浦江边的浦东龙华嘴(离上海仅五里),被民众发现后,知道他是盟国机师,把他接进了房里,并招待他休息。可是因为离敌人据点很近,旋又被敌发觉,马上派了二十多个敌兵进行搜索。因隐蔽得好,未被搜去。第二天早上,我民运工作同志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派人把他接到了部队。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托勒特由我军护送起程,一月三十一日渡江,二月一日安全抵达梁弄。

托勒特的伤势好转后,他住的房子亦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每个关心他的首长、干部、士兵、老百姓,都很诚恳地带着礼物前来慰问他。”二月八日,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司令员知道他的身体

已经好转,于是约他作了如下交谈:

何司令:“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抗战认识怎样?”

托氏:“我国人都赞成积极援助抗日的中国,但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抗日军队不大了解,过去我只见过重庆国民党的军官,现在我才知道你们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胜利的。”

何司令:“国民党军队以盟国供给的军火武器,向我们进攻,足足打了半年,我们为了抗战,许多忠勇的战士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倒死于这种可耻的国民党造成的内战中。”

托氏:“这实在是蒋介石的大错”。

何司令:“我们希望美国援助我们的物资,军火,能公平的分配给全国所有愿意牺牲生命真正抗日的武装。”

托氏:“我很佩服你们屡次和敌人英勇作战,你们建立了这样优良的军队,你们控制了广大的敌后地区,你们的部队比起国民党的军队要强得多。我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使其发展壮大起来。”

何司令:“你以为还须多少时候,战事可以结束?”

托氏:“我个人意见一年或半年就可以结束欧洲战局,欧洲方面解决了,则太平洋方面亦就快了。”

何克希司令员与他交谈,给他以很深刻的印象,他称赞何司令员是个“聪明、能干、善计划军事,能负起指挥责任的人。”

二月十二日(旧历除夕)晚上,纵队司令部举行晚会,欢迎美国飞行员托勒特。

三月七日,纵队政治部召开“庆祝苏浙军区成立并欢迎美国空军战友托勒特”的驻地军人大会。下午一时许,各单位差不多全已集合在大会场上,会场的两边贴着四五幅描绘生动的漫画,各首长也陆续到来。托勒特穿着中国长棉袍同行署黄处长(黄源)一起来到会场。大会于二时开始。由江科长(江岚)主持。何司令、连主席、谭政委先后讲了话。托勒特中尉也用英语发表了演说,由黄处长作翻译。托勒特说:“在你们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所得到你

们的帮助和招待已使人十分满意，我实在十分衷心感谢。我非常敬佩你们在敌后和敌人作战的精神。你们建立了军队。军队中的枪炮、服装、及一切供应品又都是自己搞起来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希望你们以后壮大起来，发展起来。我相信三四月后美军也许要在香港或者福州或者这里登陆作战，可与你们联结起来打日本，先打到南京，打到汉口，然后与北边八路军会合，一直把日本摧毁为止。你们可以建立自由的中国，我们亦可以没有日本来毁坏，这个世界就幸福了。我感谢你们和期望全人类很快的脱离战争，很快的能过和平幸福的生活。”托勒特的演说，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个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已完全恢复健康，要求回队。我纵队首长发电报请示新四军军部后，乃于三月九日，致书当时在嵊东的浙保第一团黄土韩团长，略谓：“拯救盟友，为我人应尽职责，先生谅不以素日政见不同而弃，用敢专函商询，该机师是否可由敝部送经贵部负责转送后方？倘蒙慨允，并请约定交接时地及手续，以便护送前来，免生误会。”信去后，未获复，再去信，仍不复。不得已，我一面准备先将托勒特从司令部送往我嵊东地方兵团，一面通过地方人士关系继续与新昌县政府接洽是否可以接收。

三月十八日晚，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设席为托勒特饯行，宾主尽欢，各举杯恭祝杀敌胜利。行署吴山民副主任即席赋诗四首送行：

(一)民主同盟讨极权，
将军跨海壮声援。
翱翔铁鸟见神勇，
仗义临风瞰百川。

(二)残年风雪叙悲欢，
异地风光总未安。
戎马仓皇慢上客，
临歧倍感泪辛酸。

(三)闻君议论壮河山，
磊落诤言天地宽。
但愿他山能攻石，
军民同此涌冰渊。

(四)委曲梁弄两月间，
相與心照意难宣。
他年举世升平日，
重话期于麦美连(为将军故乡)。

托勒特非常高兴，把吴副主任的原稿要走了。

三月二十二日，托勒特在我军的护送下从梁弄出发南下，第二天安全抵达我军嵊东地方兵团的驻地。该地军民热烈地开了一个大会欢迎他，他兴奋地登台演说：“你们英勇的抵抗我们共同的敌人，所担负的伟大工作，都使我非常佩服。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以求更大的成功。我相信美国将在中国沿海登陆时期是非常迫近了。我希望你们和他们(美国)能够并肩毁灭我们的敌人，齷齪的苍蝇——日本。”

三月二十八日，得知新昌县长傅知行致托勒特中尉信，表示愿意对他负责。我们因该县政府未有正式文件给我们，为防止意外，请对方具备正式交接公文，再行移交。

三月二十九日，我们护送托勒特到达××时候，对方竺桂招部竟埋伏在山里向我方射击，我方为保护盟友安全，不得不予以还击。在这战斗中，托勒特愤慨地要求参战，经我们再三劝阻才罢。

四月四日晚，应主任(应晓初)问托勒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意见，他爽直地回答说：“我认为共产党是好的。国民党是坏的。因为我看见你们所作的都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国民党的坏处我们的政府已经知道了。”托勒特在谈话中，对于国民党的“曲线救国”阴谋表示非常愤懑。他说：“盟军登陆时，无论蒋介石亦好，和平军亦好，那个不抗日而阻挠抗日的，我们是不会给他们客气的”。托勒特还说：“我们过去因傲慢而轻视中国人一事请你们原谅，这

实在是错误的观念，以后我将设法告诉我们美国人，使他们有正确态度。至于你们的一切情形，我将告诉我的上司。”

四月五日这一天，临海美国陆军办事处秘书黄晋本与新昌县政府商妥了关于托勒特移交的问题。但是，在准备移交时，该县政府竟以不承认我军为新四军为口实而食言。托勒特知道国民党方面如此没有信义，不禁愤怒地破口大骂，可是却移交不成。不得已，只好再由黄秘书回临海办事处去直接处理这事。

四月十日，我方与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正式办好了交接手续，并出具了领据。全文如下：

领 据

今领到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救护之美国第拾肆航空队机师
托勒特中尉乙名

此 据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十日

具领机关负责人签名(柯克斯印)

同日，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驻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给何克希司令写了致谢信，全文如下：

新四军何司令，
敬爱的先生

我藉着这个机会谨向你和你们的部属们道谢：因为你们很好的营救了我们的勇敢的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并且殷勤招待他，和治好了他的创伤。请你相信，我是奉我国驻华陆空军将领们的命令担任这工作的。你和你们的人民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地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我确信，我无庸告诉你，当这位青年的亲友们在美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时，将要如何感谢你们啊！

我所代表的机关，主要的任务是营救在浙江省的飞行员。我们的办事处刚设立不久，因此，尚未能北上向你和你的部属们致候。我很希望

你能答应我在最近的将来拜访你，以便和你讨论营救的计划。在我们会见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无可能将营救消息立刻告诉我的办事处，这样，好让我们的飞行员，迅速地回到他们的基地去。假如你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带这封信给你的代表，可以较详细地和你商讨那些计划。当我们会面时，我们将更详细的讨论它。

兹送上储备钞一百万元，希望你收下作为一部分的补偿。我知道你们用在托勒特中尉身上的钱一定很可观。你们加于这个飞行员的恩惠，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偿清的，希望你把这笔款子当作礼物一样收下吧！

为了你们对我们的努力帮助，让我再一次地向你和你的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最热诚的致意。

你最忠诚的

美军上尉柯克斯(签名)

一九四五·四·十

四月十一日，托勒特写信给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来告别：

何司令以及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们：

我想我明天或后天就要离开你们的部队了。我非常感谢你及你的部下，感谢你们对我的优待，同时更感谢你们为了将护送回我的司令部而作的种种努力。我希望你们新四军和我们美国军队能够很快在一起并肩作战，来摧毁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请你将这封信在你的士兵中间轮流传阅。并且告诉他们，我是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的一切出色的优待。现在我要向你和谭、刘、张诸位先生和所有你们的指战员告别了！

托勒特

何克希司令员给托勒特复了信：

亲爱的托勒特先生：

你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当我们这封信寄给你时，你也许能看到，

也许不能。你在这里等候了很久，没有能够回到你的指挥部，我们真是抱歉得很。但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些，请你原谅！我们预备照你的要求去做，准备把你的信告诉我们的全体同志们。但是我们觉得你太客气了，因为我们招待你很不周到，虽然我们主观上想尽力做好。我们有一个希望，希望你假如可能的话，要求你的指挥部派你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们一定以十二万分的高兴来欢迎你，你的飞机，以及你的同志。我们希望你能够很安全而且迅速地返回你的指挥部，并且英勇地在天空中打击敌人，加速地完成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是抗日战线上亲密的友人，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我们这里的情形和消息，带给我们盟国的友人们去。我们现在分别了，但希望不久的将来能会面。

四月十八日，我们派队护送托勒特至奉新公路边，将他移交××。托勒特最后离别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浦东被救起，至四月十八日伤愈归队止，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生活了近三个月。托勒特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中美人民共同反侵略的见证，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人民友谊的佳话。

二、美大使馆新闻处代表来梁弄

美国飞行员送走不久，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我日记上有如下记载：

“了解‘警大’情况，连续三天。

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派周壁先生来此。”

前一句记的是我根据何司令的指示，与政治部组织科长徐放和司令部人事科长周毅（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去警卫大队工作。

后一句记的是怎么一件事呢？

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派周壁先生偕夫人彭传玺女士和刘文宪（刘金）到梁弄找到纵队司令部后，我奉谭、何首长之命，接待他

们。对他们在梁弄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对他们在此以前与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的关系，则一直不知道，为了弄清事件真相，最近，我通过刘金找到了周壁先生。周先生是江苏无锡梅村吕浜人，原名吕祖渭，现更名吕宜。周壁是他到浙东时使用的化名。

下面是周壁先生给我的回信中关于一九四五年春“浙东之行”主要情节的摘要。

“还在一九四三年，为了准备向日本侵略军反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在东南抗战前线的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设立了一个东南分处。由美国民主党人Chxistoph Rand(兰德)任主任。美国新闻处这个机构。据我所知，既是一个文化宣传机构，也是一个从事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的机关。

“当时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是比较进步的文化人。他跟兰德以及他身边的几个翻译，过从甚密，建立了友谊。

“一九四五年初，兰德跟谌震说起，想跟前线部队(游击队)取得联系，替他们散发日文宣传品。

“那时我在永安改进出版社(黎烈文任社长)编辑部工作。一月间，谌震借访问黎烈文的机会，跟我谈了美国新闻处的事情，问我能不能找到游击队，最好能找到新四军。我那时在业余时间问帮董秋芳先生编《民主报》副刊“新语”，跟当地进步青年接触较多。我知道，在国民党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刘文宪(刘金)，家住浙东嵊县，可能找到浙东的新四军。谌震嘱我跟他们研究，希望能完成这一任务。

“刘金说，他早先读书的清波中学校长很可能是地下党员，找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把握是有的，愿与我同去。我向谌震汇报后，他跟兰德联系，兰德约我去美国新闻处面谈。我告诉他们可以找到游击队，但不是国民党部队。他们没有坚持一定要找国民党部队，并向我谈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给我的任务是代表美国新闻处去游击队接上关系，转达新闻处的意见：(一)建立联系，互相交换情报，包括政治军事气象各方面；(二)美国新闻处可以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也愿意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三)请游击队派正式代表到永安或上饶洽商具体办法。(美国陆军有一个机构在上饶)。

“我到谌震家中汇报情况，他给看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关于

中共情况的机密材料,从中看到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的名字。他告诉我向新闻处要路费的大致数目。我又开了三个名字,要通行证。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刘金的,用刘文宪名字,一张是我爱人彭传玺的、用史平的名字。

“第二次谈话是在深夜,这次把一切都谈妥了。我把目的地四明山告诉了他们,明确说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并要新闻处提供三个人的路费和身份证明。兰德约我第二天去取路费和证明,他们希望我能在五月初回到永安或上饶。

“到达嵊县,和刘金同志去清波中学找校长裘某(按:即裘颂兰先生),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由交通员送我们越过封锁线,进入游击区。以后就由交通站逐站伴送,翻山越岭,约在四月上旬到达梁弄。”

周壁等三人来到梁弄,我出面接待他们。通报姓名后,周壁拿出一封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给我部队的正式信件,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印,蓝颜色的。接着周壁陈述来意,转达美国新闻处的意图。我听完之后,一面给他们安排住在梁弄一户老百姓家里,告诉他们耐心等待回音,一面如实报告谭、何首长,美新处的来信,也一并交上。

谭、何首长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打电报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请示。

有一天晚上,何司令找周壁单独谈了一次话。《新浙东报》记者和文教处长黄源等都去看过他们。

周壁等三人亲眼看到浙东根据地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安居乐业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和他们长期生活其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深为感动。他们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大约过了十天、半个月时间,军部复电到达,根据谭、何首长指示,我找周壁他们来谈话,转述电报内容,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无权与美国新闻处直接建立联系。美国如想同我们建立联系,必须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延安党中央商谈解决。”关于他们要

求留下来参加革命的问题，我说：“我们四明山区处在抗日前线，战斗激烈，行动频繁，生活艰苦，你们很难适应，还是回大后方去为好。只要有抗日的热情与愿望，即使在大后方，也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不一定非要留下来不可。”经我这么一说，大概周壁也觉察出我们不想留他们的意思，就同意和他爱人回去。刘金家住嵊县，他在梁弄的一些日子里，看到了不少同乡、老师如俞德丰、周丹虹、黄源等，并知道在干田畈有一所鲁迅学院，由黄源主办，就坚决不愿再回福建。我说：“那也好，你家在嵊县，还是回家去吧！”可刘金说啥也不行，一定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我把这一情况向何司令汇报后，决定将刘金留下，把他送到设在横坎头的抗日军政干校学习。

周壁在梁弄期间，曾几次去韬奋书店。在他决定回福建以后，曾在书店买了十多本书，其中有《整风文献》，艾青的长诗《吴满有》等。他要我们供给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带回国民党统治区，我送了他几十份《新浙东报》。临走的时候，我又请司令部供给处长魏善诚张罗了足够的“法币”，礼送周壁作为路费。

三、美十四航空队派人来找我们

一九四五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纵队司政机关还驻在梁弄。这时有两名青年，一名徐仲言，一名何为，他们从福建大后方来到司令部。我奉谭、何首长之命，又接待了他们。他们是肩负着美国驻华空军的使命来的。最近我写信给徐仲言，请他回忆一九四五年到浙东之事。下面是他两次给我来信的综合：

“一九四五年春，美国打算在浙东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美十四航空队（驻福建长汀）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由于搞不到浙东沿海日军情报，很想同浙东新四军建立联系，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有关日军的军事情报，愿意空投新式武器作交换。为了建立这种联系，美军愿意空投小型电台

设备,并且告诉了空投联络的标记——红色布板。(即用长红布条铺在地上,飞机能按指示的地点进行空投。)

“美十四航空队顾问吴大琨了解美军这一意图,就到福建龙岩,找到了友人徐里平(台湾义勇队、台湾青年报主编,已故),徐里平同地下党负责人潘超(现在北京)商量,决定此事可办,可以利用美十四航空队提供的路费向解放区输送人员。当时我与何为(按:解放战争期间,何为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爱好和擅长音乐。解放后,曾在中央戏曲研究院工作。)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到浙东解放区找徐里平的友人郭静唐。我们没有带什么介绍信,只带了茶叶公司工作人员的证明,说是到浙东采购茶叶。五月间,我与何为到达梁弄,先是找到了郭静唐。郭感到此事甚大,要找党内负责同志,于是把我们介绍到行署连柏生主任那里。连接见了我们。他说这是有关军事问题,要找何司令、谭政委,于是我们又到了纵队司令部。(按:郭静唐当时担任司令部秘书长,所以说,又到了司令部。)

“到了司令部,是你接见我们的。你说何司令、谭政委很忙,不在司令部,要我们和你具体谈。谈后,你说这事要请示领导。当晚我们随同司令部行军。(按:大概是六月三日我们离开梁弄那一天。)次日你和我们谈,说:此事已向领导汇报,象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决定,要请示延安。我们两人提出要求报考浙东鲁迅艺术学院,你就把我们介绍到鲁艺去了。”(按: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黄源。)

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惜别四明

谭启龙

抗战胜利，鬼子投降的消息，象一股电流，迅速地流向城市，村庄、田野，流向受过战火洗礼的四明山。苦战了八年，热望和平的浙东人民，怎不为这消息振奋？人们奔走相告，互相祝贺，欢欣得流下了眼泪，在欢腾中谈论着幸福的明天。但是，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天空又出现了战争的阴云：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从陆上、空中、海洋把他的主力运输到全国各个角落，“肃奸”“剿匪”的叫嚣声也随之而起。在那动荡的日子里，电报频传。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党中央发布了“八·二五”时局宣言。这一切意味着局势的变化。但我们绝对想不到，正当我们向敌后日伪据点分路进军，把主力集结在宁波城外，准备攻取这个浙东沿海的大城市时，却传来了“放弃浙东，全军北撤”的命令。

那是一个难忘的早晨。

记得那天吃过早饭，我正在看文件，秘书匆匆地推门进来。

“政委，急电！……”看他脸色阴沉沉的，似乎发生了什么突然的不幸。

我放下手头的文件，迅速地把报夹子打开。电报上面冠着“加急”两个字，发报栏内署着新四军军部首长的名字。我读着电报，每一个字都紧扎住我的心扉。当读到“浙东纵队务须于七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我的手情不自禁的抖动起来。的确，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使我不敢相信。但这毕竟是事实——电报，军部的命令！

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当

我把周围情况,当前的局势细细想过以后,我醒悟过来。但是,执行这个命令毕竟是痛苦的,我的思绪又象黄河决口似的奔腾起来。四年前初来浙东时的情景,坚持四明山斗争的艰难岁月,突破姚江,转战三北……,一桩桩难忘的往事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四年前的一切,想起了曾经和我一起冲锋陷阵现在已经倒下的战友……

何克希司令员看了那份电报,和我一样,从读完电报的第一分钟起便担负了感情重担,我们两个坐在一间小屋子里默默地看着那份电报。我们不是为了北撤的困难而忧虑。应该承认,七天内北撤是会有很大困难的,要准备那么多的船,要组成一支庞大的水上部队。我们更明白,在撤退的道路上,敌人已布满了障碍,但是这一切对我们革命者,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又算得了什么!深信我们的战士会战胜任何困难,深信我们的战士到了紧要关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带领这样的部队,指挥员还愁什么呢?而我们现在痛苦的是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经用我们的血汗灌溉过的土地,离开数年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

我们紧张地执行着军部的命令。七天的时间是短暂的,它不允许有丝毫松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撤走一部分伤病员,动员一批能走的,并能在上海、杭州找到关系的伤病员,弄到合法的身份后,从陆上撤走。

我们把准备北撤的约一万五千人分成三批,同时在临山、观海卫,古窑铺登船渡海。我被指定带领纵队机关,一部分地方党委、教导队、四明山自卫队和警卫大队共五千余人。从古窑铺渡海。我们约定三路各自行动,以江苏青浦为中途集结点,在那里会合后,过长江去苏北。

计划拟好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这么多的人要从海上撤走,加上武器、装备,非三百条船不可。可是哪里来这么多的船呢?我们浙东纵队虽有一支海上大队,但他们的船只也

少得可怜,最多也只能凑上几十条船,还差二百多条呢,怎么办?新造吧,不成,哪来那末多木料和工人?再说有了船也少船工。最严重的是时间也不允许,七天内是无论怎样造不出那末多船来的。办法只有一个,找现成的船,动员老百姓的船。于是,东至舟山群岛,西至曹娥江,秘密和公开的寻找,动员民船。有篷的,带杆的,大的,小的,只要能下海的船都行。我们感谢浙东父老,他们在我们的紧急关头,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七天,不到七天,我们所需的船只都集中了。浦东地区的武装部队在找船工作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共中央华中局为了支援我们,还从遥远的胶东、苏北派来了船只。九月三十日,这是我们进行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天,部队集中了,有关留下坚持斗争的各项工作也作了安排,连一切宣传工作也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准备就绪。现在留下的工作是,准备启碇远航。

这是我们留在浙江的最后一个夜晚。杭州湾里,沿着海岸静静地停泊着待命出发的木船。战士们聚集在沿海城镇,他们照常操练,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部队明天就要北撤。当他们明天听到军部的命令时,将会引起多大的震动……我走回室内,一次又一次地来回踱步。夜很深了,窗外万籁无声,城东的那座宝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挺秀,壮丽。我象突然发现什么,仿佛今天才懂得浙东有这么美好的土地,那么纯洁美丽的夜晚。

随着晨曦,我们迎来了十月的第一个早晨。按照命令,我们要在今天下午一点从杭州湾渡海撤离。据情报,敌人估计我们北撤路线是北渡杭州湾,跨过沪杭、京沪两线,通过杭嘉湖水网地带渡过长江,他们已派兵准备追击围堵。他们慌慌张张地调集了二十五军和一百军两个军的兵力,安置在沪杭线上对付我们。国民党三战区的陈沛部队已经从宁波、绍兴进到余姚附近。很明显,敌人企图把我们消灭在杭州湾附近,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但是,他们算错了。他们已经迟了,我们已经作了一切准备,有足够力量击溃沿途敢于阻挡我们的敌人,有信心渡江北上。临走前我们接到军部来

电：已指派陶勇带领部队在淀山湖附近接应。这对出发前的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一切都是按计划中规定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着。部队已分头集中到渡海的码头，北撤的指示已传达到营级干部。下午四点，我准时到达了古窑铺。古窑铺的海边已站满了人，这里有我们的战士、干部、地方工作人员、船工和欢送我们的群众，他们三三两两的围在那里说着、笑着，显然，他们还没有知道北撤的消息，不会了解为什么要上船渡海，也许他们在想的是即将到来的一次海上战斗。他们一见我去立即静了下来，用探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等待我解答他们这个谜。我从群众中穿过，摸着袋里即将宣布的军部的命令。

部队迅速地排成了整齐的行列。场地上静静的，可以听到海水拍打船板的声音。我环视四周，看着站在面前整齐的队伍，看着站在战士们身边的数以千计的群众，想到四年前我们渡海南来，那时只有几百人。而现在……。我终于在战士面前宣读了军部的命令。当我读到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中央决定将坚持敌后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浙东纵队务须于七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时，我发觉自己的声音沙哑了，听到从群众中传来的呜呜的哭声。我的面前交织着一片激动人心的景象，整齐的队伍，战士按照自己的位置站着，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军人，谁也没有因激动而挪动一步。当我发出了“登船”的命令后，人群喧哗起来了，群众扑向自己的战士，握着战士的手，互相诉说着。“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能忘了我们，不能忘了四明山！不能忘了三北！”群众激昂地喊着，叫着。“我们一定会回来！”战士们也激动地齐声回答。这声音象响雷，传向天空，传向遥远的东海，传向四明山的每一块土地。

船慢慢地离开海岸。我们挥着手，挥着帽子，站在海岸上的群众，嚷着，叫着，喊声里掺着哭泣声。远了，连声音也听不见了，我才回到舱里。但一会儿我又走上船尾，我拿起望远镜寻找古窑铺。

窑铺海岸的人们还是站着，挥手着。

“等着吧，浙东的人民，我们一定回来！”我从心底里默念着这句话。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人。四年以后，我们终于回来了。浙东纵队的指战员不但回到四明山，而且还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迈步前进。

澈浦战斗

何克希

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命令浙东新四军北撤。我们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命令，全体指战员怀着沉痛和惜别的心情，告别了美丽的家乡，告别了父母妻儿，踏上了北撤的征途。

为了防止国民党言而无信，突然拦击，我们在起程之前，即研究决定由谭启龙政委率领本部，沿海边过浦东北撤，我则率领五支队及独立二旅张俊升部于十月三日晚渡杭州湾经澈浦北撤，以掩护本部。

我们的行动是非常神速的，然而敌人掌握了优于我们的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所以当先头部队张俊升部经过澈浦时，即为敌发觉。于是，国民党四个师立刻沿沪杭线指向澈浦，企图一举将浙东新四军完全歼灭于钱塘江口，以实现其第二次皖南事变式的阴谋。

那一晚，杭州湾风平浪静。我们的全部船只于次日拂晓陆续安然抵岸。当部队正忙于下船整队之际，我带了两个警卫员习惯地先头走了。侦察科长着了急，立即命令侦察班和通讯班分别紧随我的前后。

澈浦离江岸约二里。当我们走近镇边时，突然，从镇里传来了几声枪响，划破了早晨的宁静。

“不对头！”我勒住了缰绳，立刻命令侦察员迅速前去侦察。不久，他们回来报告：“敌人已从西北角进镇，但东面尚未发现敌人”。

从情况分析,进镇的敌人可能是先头部队,而且,对我们的情况也未了解清楚。否则,不会一进城就盲目开枪。但是这一霎那间,我明白: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宝贵,如果延迟片刻,等敌人完全占领了溆浦,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望了望身边紧握着枪杆的战士,迅速地下命令:“侦察班将西面敌人,通讯班将北面敌人,统统赶出城外,并迅速占领城墙,关闭城门!”接着,我命令一个警卫员火速通知后面五大队调两个连兵力来。

那些机智勇敢而不习惯正面作战的侦察员们和通讯员们,在这危急情况下,一下子变成了突击队。他们以不可抵御的力量猛力向敌人冲击。

果然,进城的敌人只是些先头搜索部队,而且并不完全清楚我们的动向,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进得城来,却不料遇到了措手不及的攻击,便狼狈地逃出城外。

这时,五大队两个连也已赶到,我们完全占领了溆浦镇。可是,远远望去,外面周围山上已都布满了敌人。

我们跟敌人暂时处于对峙的局面。

当后面部队及机关勤杂人员全部进镇后,我一面让部队先用饭,一面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打与不打的问题,同时架设电台请示粟裕司令员与华中局。

粟裕接到电报后,立刻命令陶勇率领一个旅来增援,华中局的电示在可能情况下,尽力避免作战。

然而,当前的情况很清楚,溆浦三面临山,一面临水,三面山上都已为敌占领,我们后退已不可能。因此,我们实际上已处于被包围状态。问题更严重的是,全军是否能完成北撤任务,完全依靠我们对敌人的阻击是否成功。我内心感到万分的焦灼与不安。

要避免被敌人歼灭,首先就要歼灭敌人。在长年累月的战争年代里,使我愈来愈清楚地熟悉了敌人的弱点。在当前情况下,以攻为守,才是最好的出路,也只有这一条出路。

使我得到安慰和放心的是,当前在敌人一再逼迫得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全体指战员早已迸发出复仇的怒火。这怒火将化为进攻的无畏的力量。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再地向全体同志进行战斗动员,要他们明白:今天是生死关头,他们的司令员是多么坚决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于是,我集中了一个多营的兵力,向敌山头猛攻。

我在望远镜里看到战士们前仆后继地扑向敌人,然而,在敌人猛烈火力抵抗之下,许多人倒下了。每一个人的倒下,都使我的内心感到一阵剧痛。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神经中枢,冷静地注视着战斗的进展。

终于,敌人败退了,山头为我们占领了,山上战士们喜悦的情景立刻从望远镜里传给了我,我高兴地把望远镜递给了警卫员陈建华,说:“小鬼,你瞧瞧,同志们打得多好!”

可是,一转眼间,战局又起了变化,我们的人又退下来了。从望远镜里望去,敌人的增援部队恶狼似地一阵又一阵地拥上山来,我们被迫放弃了刚占领的阵地。显然,敌人的后备力量是相当强的。但是,我们处于背水决一死战的境地,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因而,我坚决地把守城的士兵也调下来,又集中了一个多营的兵力,向敌人进行反扑。这时,我们已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了,而增援的力量又遥遥不可期。

感谢英勇牺牲、坚强无比的指战员,在残酷的搏斗中,敌人终于给我们打退了些。战况得到了暂时的稳定。

现在我可以充分地考虑找寻合适的突破口,并找寻每一致胜的战机,以便能赢得时间,完成掩护北撤的任务和最后撤出全体被包围的人员。

当我发现北面有一个突破口的时候,正拿着我的望远镜了望着战场的警卫员陈建华突然狂喜地唤我:“司令员,快看,那里可能是敌人的炮兵阵地。”

我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那不但是敌炮兵阵地,而且还是敌人的指挥阵地,敌人的指挥旗和指挥人员,在望远镜里也看到了。

这一下，使我突然抓住了一个战机，心里觉得分外兴奋。我用感激的眼光望了一下这可爱的警卫员，命令他：“立刻通知炮兵连把所有的炮都集中起来，由我亲自指挥。”

所有的八二迫击炮都抬到我指定的地点，集中炮火向敌指挥阵地猛轰。炮兵们在我亲自指挥的鼓舞下，特别起劲，打得又快又准，敌指挥阵地完全被我们摧毁了。接着，整个山上敌人阵地立刻乱了。战局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于是，我下达了佯攻和突围的命令。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候了。

当拟好突围路线，找好向导，和安置好重伤员等等工作后，我们即开始撤退。那一晚，政治部大部分人员都临时成了抬伤员的担架员，我也自告奋勇地抬了一段路。

第二天拂晓，敌人在山上用炮火轰击激浦。在蒙蒙的晨光中，激浦成了一片火海。

当我们在路上听到那轰隆隆不绝的炮声时，战士们开心地笑了。“多谢敌人打欢送炮！”

数天之后，在一个晚上，我们和本部会合了。当我和谭启龙政委碰头时，我们一下子一句话也说不出。然而，在夜幕里，我们仍然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点头与微笑。这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表的感情，使我永远难忘。

忆 吴 山 民

杜 承 钧

一九四二年五月，金华、义乌、浦江等地沦陷以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吴山民与我党真诚合作，为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开辟金(华)义(乌)浦(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回忆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与伟大，同时，也使我更加怀念已经离逝的吴山民。

吴山民又名吴椿，一九〇二年一月出生于义乌西乡里美山。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抗战爆发后，他从外地返回家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先后担任过义乌县政工队队长和义乌县长。他支持和拥护我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积极靠拢我党，主动要求党派干部帮助他，实行过许多抗日、进步的政策和措施。为此，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和打击，先后被撤去县长职务、开除国民党党籍，还一度被捕入狱。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吴山民被保释出狱后一直“闲居”在家。

我开始认识吴山民是在义乌沦陷后不久。沦陷前夕，金华地区特派员陈雨笠和我们义乌、浦江党的负责人在义乌柳村开会决定，一沦陷就组织抗日武装，坚持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义乌沦陷。国民党义乌县政府迁到永康方岩。我们党一面着手收集武器组织游击小组，一面重视做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大家认为，吴山民是这个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过去与我党有过很好的合作基础，我们应积极争取他的同情和支持。于是，我就先到里美山去拜访吴山民，并叫本地一个吴山民认识的党员陪我同去。吴山民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

面,但是一开始就谈得非常融洽,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我向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坦率地向他谈了我们党已在浙赣沿线搜集武器、准备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希望他能予以合作和支持。他当即表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组织武装可以先干起来!”为了表示他与我们合作的诚意,就叫家里人拿出一支木壳枪送给我,并说:“我这儿还有几支枪,你们需要时随时可来拿去。”吴山民如此坦率、豪爽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们义乌党还刚开始搜集武器,没有搞到枪支。他献出的这支枪就是我们以后组建“第八大队”的第一支枪。过了一、二天,县委书记肖江(江征帆)还亲自去拜访吴山民,并从他那里取来了长短两支枪。从这以后我和吴山民的接触与交往就多起来了。

吴山民早在抗战初期在义乌当县长时就享有坚决抗战的名声。他曾以历史上戚继光组织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义乌兵”抗击倭寇为榜样,号召义乌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义乌营”。这个有五百多人的“义乌营”组织起来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没有出现他在“号召书”中所希冀的“俾令明朝平倭之义乌营重见于今日,而为人民抗战史上留下光辉之一页”的壮举,但反映出当时吴山民为争取抗战胜利的良苦用心。以后,吴山民在被撤去县长职务时,还发表了《告义乌全县同胞书》,号召义乌人民“发挥不甘屈辱的抗敌情绪”,“坚决肃清汉奸,要使无耻的汉奸和顺民不能在义乌出现”;并且还说:“义乌的土地是我们义乌民众世代所凭藉生长的,每个民众都应为争取生存而负起护卫的责任。”他的《告义乌全县同胞书》当时确实感动过许许多多爱国的正直的人们。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们已初步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游击队。由于周围日伪顽势力都相当大,而我们的力量还未能完全控制局面,部队采取了灰色隐蔽的办法。我们从当时正在浦江县招兵买马的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军钱南别动第一支队那里,通过进步人士季鸿业,搞到了该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为了解决部队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后,不能较快地为群众所了解和拥护的问题,我们就请吴山

民在八大队正式成立的大会上讲话。他欣然表示同意。吴山民已沉默了两年多，这次公开露面自然特别引人注目。他讲话后，“吴山民组织起抗日武装的消息”就传开了。由于他过去倾向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战，所以在人民群众的眼睛里，吴山民组织的准是抗日、进步的部队，它区别于其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也区别于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地主豪绅武装和土匪部队。所以，以后金东义西以至金义浦兰（溪）地区的人民群众都把我们的八大队叫做“吴山民部队”。特别在八大队成立不久打跑了回乡推行伪化治安的大汉奸傅延文的武装卫队，和在肖皇塘一仗打死八个鬼子兵以后，部队的名气更大了。我们的部队到那里，就受到那里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为此部队也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立不到六个月，人数就增加到三百余人。

由于吴山民的公开合作与支持，对金东义西地区的上层士绅影响很大，象杨德鉴、何茂钟、余逊斋、吴琅芝、黄长波等也都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对我们开展武装斗争表示了热情支持的态度。特别是金东的大资本家大地主杨德鉴，不但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出面担任八大队的大队长，而且还慷慨解囊，解决了八大队成立初期的给养困难。

义乌沦陷初，在一些上层士绅中曾一度刮起了妥协投降之风，有的还策划伪化活动。吴山民对此十分痛恨，并表示了势不两立的态度。当时曾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义乌青岩人傅屏侯在出任汪伪义乌乡镇联合会会长之前，给吴山民写来一封信，说他原不问政事，日寇却多次要他出来做傀儡，还把他绑架到城里，实在出于无奈，希望吴山民先生能够谅解他。吴山民阅信后愤然对人说：“这不能原谅。对汉奸是论行动不论心理的”。他给傅屏侯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惠书诵悉。先生苦衷，晚所深知。顾举国士大夫同趋一途，则国事如何？！晚初年失学，辄乘暇读书，曾读春秋，次及其他。每览梅村晚年沉痛之作，不禁掩卷流涕！人生处此，祸福宁论。但愿文山正气与天地而长存，阁部精神共梅岭而千古。临书

挥泪,欲言不尽。”虽然吴山民这封信没有最后能使傅屏侯回心转意不当汉奸,但反映了他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和史可法为楷模,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置个人祸福于不顾,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后,吴山民的家曾两次被日寇烧掉,也丝毫没有动摇他抗战到底的初衷。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已得知吴山民在义西组织起抗日武装的消息。对此他们却很不放心。在他们看来,吴山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他曾经是个“严重左倾的危险分子”。因此他们一边警告他,一边又拉拢和利诱他。例如八大队成立后不久,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就派和吴山民认识的董伯廷来游说。因董不敢过日寇的封锁线,就在路上写来一封劝说信,说什么“夜行者自信不为盗,但是不能避犬吠也。”吴山民阅后一晒置之。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军钱南别动第一支队支队长楼允文还亲自跑到吴山民家,聘请吴山民当他支队的“咨议”等等。在这情况下,我们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对吴山民的猜忌和注目,同时也有利于在“合法”名义下开展斗争,就支持他接受楼允文送上门的“咨议”的头衔。并且在这年十月,当国民党义乌县政府要在各地组织“联防处”时,又和吴山民商量,由他出面致函义乌县县长,意思是由吴山民负责来筹建“义西乡镇联防处”。得到了国民党义乌县政府的同意。这个联防处实际上就是我们根据地最初的和“合法”的政权组织。联防处的主任是吴山民。他利用这两个合法的名义和身份,协助我们党做了大量的有效的工作。

那时,凡我们遇到处理与邻近部队的关系、处理与国民党义乌县政府的关系时,大都请吴山民出面应酬和对付。因为他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外,还曾当过国民党的县长,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可以运用,再加上他本人的资望和影响,无疑比我们出面去做工作要便利得多。为此,我们党的一些重要决定和意见,往往是通过他的密切配合和支持来实现的。吴山民尽管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总是“遵照我们党的指导进行一切工作”,做了许多我们共产党员

无法做的工作,起到了我们无法起的作用,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我们八大队消灭了妄图投敌的实力较强的刘文扬部后,一些友邻部队与我部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对我部戒备森严。为了消除误会、团结抗日,我们和吴山民商定,邀集友邻部队开会,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这次会议是十二月初在义乌分水塘召开的,由吴山民主持。原定来参加的有义北的吴伟民、楼辉秀,金东的邢小显等。但是楼辉秀害怕这是“鸿门宴”,走到半路又回去了,改由他的参谋长来参加。吴山民在会上以确凿的证据宣布了刘文扬的罪状,说明了解决刘文扬部是我们履行自己的职权,是对刘部执行纪律的需要,与其他部队无关,他还强调了各部队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重要性。肖江也以八大队政训员的身份讲了话。这次会议对于消除隔阂、增强团结、改进我部与近邻各部队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除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邢小显部因国民党特务的挑拨对我部进行挑衅外,其他诸部与我部基本上相安无事。这么长时间的比较安定的局面,对于发展、壮大我们的武装部队、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们奉命北撤时,金义浦兰地区共有一千四百余人的武装力量撤退到了解放区。

第二件事。一九四二年八月,钱南别动第一支队特务大队调出浦江后被李默庵整编掉了。这时国民党义乌县政府就开始觊觎我们的部队,多次说要来收编,但都被我们以各种理由给挡回去了。翌年七月,新上任不久的国民党义乌县长吕师扬,借“统一政令、军令”为由,要亲自来收编我部,并且还要在金东义西设立机构进行征粮收税。为了不扩大矛盾、不过份刺激吕师扬,同时又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吴山民研究后认为,可以坐下来和吕师扬谈判,但要坚持两条:一是他们的人一个也不能进来;二是我们的钱一个也不能被拿出去。

这次谈判仍由吴山民出面主持。会谈前他和王平夷作了认真的布置和安排。在会谈中当吕师扬说了一套如何统一政令军令的话后,预先安排好的余逊斋老先生就接上去说:“日本佬来了,你们都跑到那儿去了?现在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维持社会治安,你们倒要来收税了。不抗日,光要钱,还不如扛着胡公大帝来募捐更体面些!”说得吕师扬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因为余逊斋是义乌县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吴山民的舅父,所以这句话由他来说确是很合适的。吕师扬心里有气也奈何他不得。这样谈判一开始,气氛对我方就很有利,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经过反复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我们八大队的番号改为“义乌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三大队”,具体整编由自己负责;税收名义上由县政府收,但由我们代为征收,收来的钱粮作为整编后的“第三大队”的给养。所以这次谈判吕师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吴山民在这次谈判中表现出应付裕如、从容不迫、始终贯彻原定的谈判意图,与吕师扬展开有理、有利、有节、有节的斗争,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吴山民早年在浙江政法学校和北京政法大学求学时攻读经济专业,先后当过国民党定海县和义乌县县长,在国民党里经历了十年宦海浮沉的生涯。在国民党腐败的政治下,他感到自己要想有所作为很难,往往是“既做不得好官,也做不得好人。”对国民党已“彻底的失望”。因此,他在参加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和建设中,表示了满腔的热情和希望。

吴山民从一九四二年十月担任义西联防处主任开始,一直是我们根据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开始时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因此联防处的筹建工作基本上是由吴山民负责进行的。联防处成立后,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为此他经常主持邀集士绅开会,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原则制订了《金东义西自卫谷筹集办法》,动员殷户来承担。这时期我和吴山民工作上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经常请他设法解决金属党的经费。他总是全力支持。由于联防

处人手少、机构也不健全，有时他不得不事事躬亲，操办一切。特别在筹集粮款时，遇到有的殷户不愿承担时，他就亲自登门去做说服工作；遇到青黄不接钱粮告罄时，又总是他出面去筹借。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他还抽出时间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并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制订和实行了一些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党要培养根据地的抗战干部和人材，他又克服各种困难，在四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举办了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吴山民除担任训练班的主任外，还亲自给学员们讲授社会发展史课。吴山民就是这样为建设巩固的人民抗日根据地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地工作着。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们和浙东区党委接上了关系，这对于我们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我们在这年的六月成立了“金义浦抗日自卫委员会办事处”。八月国民党义乌县政府撤销联防处后，我们还建立了“金义浦财政经济委员会办事处”。通过民主选举，吴山民当选为这两个办事处的主任，我为副主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办事处副主任还有何茂钟。这时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吴山民见面和相处的时间更多了。他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擘划甚多。在他担任两个办事处主任期间，曾颁发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法令。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学习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以金义浦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制订了《金义浦地区租佃减租暂行办法》、《金义浦地区减息增资暂行办法》和《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这对于调整根据地内的租佃关系、坚持合理负担、调动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和促进生产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拥护。以后随着部队不断打胜仗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内呈现出了年登俗乐、欣欣向荣的气象。吴山民过去在当国民党县长时梦寐以求的政绩，终于在他亲自参加领导的人民抗日根据地中变成了现实。他感到非常的欣慰。

吴山民在金义浦抗日根据地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在维护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上也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九

四三年春节前夕,我们得到日寇要扫荡的情报,奉命转移。就在这这时,部队内个别人鼓动地方宗派情绪,反对外来干部的领导,将部队主力私自拉走(即“寺口陈事件”)。吴山民闻讯后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这种分裂行为。他以自己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协助我们党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妥善解决了这次分裂事件。他的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坚定立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山民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在金义浦根据地内几乎是有口皆碑的。他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成了抗日、爱国和进步的一面旗帜。金义浦地区之所以长期比较稳定,是与吴山民同我党真诚合作,并亲自出任公开职务有很大关系。以后吴山民调离金义浦抗日根据地,而“金义浦抗日自卫委员会办事处”有时仍以吴山民主任的名义对外发布文告。

吴山民胸怀磊落、正直敢言,当时即使对于我们地委和县委领导的意见,也总是直言不讳,提在当面。他不捧场也不迎合。吴山民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在根据地和大家同吃同住,不要任何的特殊照顾。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加上学识渊博,说话幽默风趣,因此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都愿意接近他,喜欢听他作报告或讲课。吴山民为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不矜功自傲、固步自封,他把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根据地的广大军民。

吴山民作为我们党的统战对象,在我和他共事相处的日子里,深感他除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外,对我们党还有颗执著的追求之心。早在抗战初期,他曾在我党吴樟、吴拯黎等的影响帮助下,曾提出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金衢特委因考虑到他还是个国民党员及经历情况,没有立即吸收他,但认为“要是他继续进步和坚决”,可以考虑作为我党的“特别党员”。两年过去了,当吴山民再次与我党合作时,又多次提出要求加入党组织。但我们仍以他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等原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始终把他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而已。虽然大家都很尊重他,遇事与

他商量,但在政治上关心帮助他不够,缺乏这方面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交谈。为此,也一度使他感到苦闷。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杨思一同志在里葛村会议上,批评我们对吴山民的作用认识不充分,不够放手让他工作,犯有小脚女人的毛病。这个批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浙东区党委为了发挥吴山民更大的作用,调他到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我和他分手了。吴山民去的时候还把他的一个心爱的女儿也带到四明山去参加了革命队伍。不久吴山民在浙东临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选为浙东行政委员会委员、浙东行署副主任,后还兼浙东银行总经理。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北撤后在山东,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党组织。经原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原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介绍,并经华东局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山民从我们党的忠诚的朋友成为我们党的坚定的同志,说明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与成功;同时也说明吴山民一生不懈地追求真理,具有为真理献身的崇高精神。

(高三山整理)

国际主义战士坂本贤阶

江 征 帆

坂本贤阶，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哥哥是工人、日本共产党党员。他少年时代曾随父亲来过中国，在上海读过书，懂汉语。但未读完中学就回日本去了。在东京，他当了一名皮鞋工人，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后，他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可是不久他被强迫征召入伍，在炮兵部队服役，随着那些侵略者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到了义乌。他目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内心十分痛苦，不时流露出反战情绪，因而遭到上级的怀疑，把他从前线撤换下来，派到楂林采伐队当队长。

一九四三年九月，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为使四明山、会稽山、金义浦等几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决定派我和陈福明、楼觉、童坤、蒋忠、陈流等率领一个中队的兵力去开辟诸（暨）、义（乌）、东（阳）边区，成立坚勇大队。开始时由楼觉任大队长，不久改由陈福明担任，我任政委，并担任诸义东县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坚勇大队刚到诸义东边区两天，就神出鬼没地一下子端掉了楂林镇碉堡，消灭了“和平军”的一个中队。接着又袭击了大陈镇鬼子的军用仓库，缴获了几百条军毯、部分粮食、药品和武器。这一胜利大大地鼓舞我军民的斗志；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敌人内部的反战、厌战情绪。

一天，我们在北上坑驻地刚吃完晚饭，楂林镇的维持会长来了（此人绰号叫蒋油壶），为我们传递情报。他交出情报后，又吞吞吐吐地对陈福明说：“陈大队长，有个人很佩服坚勇大队，他想帮你们

做一点事。”

陈大队长一听十分高兴，忙问：“哪一个村的？”

蒋油壶小心翼翼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他看到我和陈大队长都流露着怀疑的目光，又连忙说：“这个日本人不同别的日本鬼子，他从不做坏事，是个厚道人。上半年从军队上下来，在楂林镇的采伐队当队长。”

“是不是叫坂本的那个人？”

蒋油壶见陈大队长已知道坂本这个人，胆子也就大了一些：“对、对，就是他。”接着，他弯下腰凑近陈大队长说：“坂本是白皮红心的，他反对侵略中国，很敬佩英勇大队抗日和爱护老百姓的行动。他想帮大队做点事情，尽些责任。一定要我请你去谈谈。”

关于坂本其人其事，我们也曾听到过一些传闻，譬如：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正要强奸一个中国姑娘，被坂本看见了，他一把将鬼子推倒在地、忿怒地骂道：“畜生，还不如去强奸你自己的姐妹……”还有，他看到日本兵每到一个村庄，总是烧杀抢掠，就按捺不住怒火，对一士兵发火：“你的良心没有了？中国老百姓也是人，你一刀戳死他，眼睛不眨一眨。你要知道，我们日本有句俗语，‘你要喝人家的血，人家也会吃你的肉！’”他还说过，中国老百姓盖一幢房子、买一头牛，多么不容易？！你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一刀宰了他们的牛，于心何忍啊！听说就是为了这些事，上级觉得他不可靠，把他从作战部队撤下来。一九四三年夏天，又把他派到义乌县采伐公司楂林采伐队当队长，但仍受日本警备队的管辖。

在楂林，还有一件关于坂本的奇闻，那是我们的情报员老楼耳闻目睹的。一天，坂本走过楂林镇卖五香豆腐干的小摊，见警备队长河野带着两个士兵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便停在摊前对河野说：“来，来，米西米西！”

河野打量一下锅里直冒热气又香喷喷的五香豆腐干，嘴馋地说：“好，大大的好！”

坂本叫摊主盛了四碗五香豆腐干，又叫他去打两斤白干。摊

主向坂本要钞票，坂本犹豫了一下说：“钱，你的，先垫着。”摊主无奈，只好自己垫钱去打酒。

坂本陪着河野嘻嘻哈哈地“米西”起来。他们吃饱喝足之后，抬腿就走。摊主连忙拦住坂本要钱。坂本却突然“虎”起脸来：“皇军吃你东西，是给你面子，还要钞票？要不是皇军保护你们，游击队来了，你的小摊也摆不成！”

摊主还是拦住要钱，不料坂本飞起一脚，将摊踢翻，豆腐干和碎碗片撒了一地。坂本边骂着“好不识抬举”，边和河野扬长而去。却见河野对着坂本翘起大姆指叽里哇啦地说着日本话。当时，老楼真想上前和他们论理一番，被胆小的摊主硬拉住了。

夜晚，摊主在家向老婆叹苦经，斥骂鬼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从窗口伸进一只手来，丢进一大把钞票。摊主和老婆吃了一惊，忙开门向外探看究竟，只见一个人若无其事地向院外走去，月光清晰地照出那个人的背影，他就是坂本！只见他已脱下白天的军装，换了便衣。他们想追出去，但又犹豫着觉得追出去不妥，回到房里，捡起钞票一数，竟有二十余元，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赔你。别声张。”

现在坂本却主动找上门来了。虽然在日军中有许多厌战思亲的士兵，也有因厌战而剖腹自杀的，但象他这样求人引见，向抗日游击队公开表示反战的人还是鲜见的。

我和陈大队长作了仔细的研究，认为可以和坂本接触，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无疑是一把刺向敌人的匕首。但必须谨慎从事。为此，彼此都争着去。最后，陈大队长以几条充足的理由说服了我：一是他多次去过楂林，对那里的情况比我熟悉；其次，坂本指名要他去；再是他万一发生意外，我可以谋划如何接应。我也考虑自己兼着诸义东县委书记的职务，组织上曾有过不宜露面的指示。所以就决定由陈大队长出面。于是陈大队长化装成农民，跟蒋油壶进了楂林镇，顺利地 and 坂本会了面。

后来，陈大队长虽然对我仔细描绘过坂本这个人，但我总期望

着能亲自和他接触一次。

总算能如愿以偿了。

一天，我刚从外面回来，陈大队长神秘地对我说：“政委，晚上·一块去参加一个婚礼！”

我兀自一愕：“谁结婚？”

“日本人”！

听到日本人结婚请我们去吃喜酒，我立刻意识到莫不是坂本吧！果然，陈大队长告诉我，坂本和楂林镇上的中国姑娘蒋荷菊结婚了。

我们化装成上山打柴的樵夫，在天黑的时候下山了。进了楂林镇，陈大队长很快把我领到一幢宅院式的房子前。他布下岗哨之后，就举手敲了两下门。开门出来迎接的是一个男人，背着屋内的灯光，看不清脸，只听他小声地说：“喔！陈大队长，请，请，请。”

我们看了一下周围，没有异样情况，就侧身进了屋。房内并无其他宾客，显然，坂本是特此邀请我们的。

进入内室，陈大队长替我们作了介绍。我和坂本互相热烈地握着手，我感到他那双粗糙而有力的手激动得颤抖着，我诚恳地说：“欢迎你同我们一道抗击法西斯侵略。”

坂本闪着晶莹的泪珠说：“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我是日本人，‘反战同盟会’的会员”。他是否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会员，当时我虽然无法证实，但从他的神态中，我看出他的真诚。接着坂本又对我们说：

“陈大队长、江主任，你们抗日是爱国。我讨厌那些在中国到处烧杀奸淫的侵略行为，日本人也反对他们。”

陈大队长听了坂本的肺腑之言，也诚恳地说：“坂本先生说出日本人民的心里话，我们知道，即使目前中日交兵，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还是心连心的。”

坂本听了连连点头说：“对！对！战火烧不掉中日人民紧紧相连的心。大队长、主任，你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也是对日本人

民的支持，我们会感谢你们的。”

我们还告诉他改变斗争策略，先争取敌人的信任，然后伺机而动。他也讲起那次踢翻五香豆腐干小摊的事，说就是故意做给河野看的。他已经认识到靠斥责那些禽兽，是不能使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他现在已经改变了斗争策略，在日本汉奸面前，他必须装出侵略者凶残的样子。经常斥骂村上的老百姓和搬运木材的民工，这使他心灵上经受莫大的痛苦，但为了更好地隐藏在敌人内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也只能如此。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对坂本说：“你做得对！你越隐蔽得深，从里面对敌人插刀子就越厉害。只是你的处境会更困难、更危险。”

坂本激动地说：“不怕！别说担点风险，就是为中国人民抗战而牺牲，我也是甘心情愿的！”

新娘端出了酒菜，坂本向我们作了介绍，坂本深深爱上了这个淳朴的农村姑娘。蒋荷菊也早已发现，在坂本那可憎的戎装下，跳动着一颗善良而火热的心。他们是按照中国的风俗举行婚礼的。

一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父母分别为两个国籍，真有点为难了。蒋荷菊按中国习惯认为孩子还是应该姓坂本，可是坂本认为孩子应该用中国姓好。他说：“我不是替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蒋贤礼吗？孩子生在义乌，就叫蒋义生吧！”从这事也可看到坂本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

那天我和陈大队长去楂林，除祝贺他们的婚礼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坂本，和他定下联络地点、人员和暗号。

不久，坂本通过交通员给我们送来一份重要情报：鬼子同“和平军”即将大“扫荡”。我们得到情报后，立即布置部队撤进深山，第二天，敌人果然从义乌县城出动了二百多人，但扑了空。敌人向山上打了一阵炮，烧了大畈村的几间民房就回去了。我们部队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坂本经常通过秘密联系的渠道，给部队送来一批又一批的药品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诸义东边区斗争环境复杂而又艰苦，由于

得到坂本的协助,使我们部队能在铁路沿线穿插自如,狠狠地打击敌人。

一天,采伐队的大本要到杜门去收购木材,坂本知道他只带两个伪兵去,就把这情况告诉了老楼,并且安排了一条绝妙的计策,让老楼赶快向陈大队长报告。陈大队长和我立即部署游击队作好埋伏,出其不意地擒住了大本和两个伪兵,缴了他们的枪。然后就按坂本的计策开始第二步行动:坚勇大队在当天中午就给坂本送去一份通牒,要他立即转交给河野队长,限他们三天内送三十担大米,二十袋面粉来,将大本等人赎回,否则格杀勿论。坂本将通牒送进炮楼,日本警备小队长河野看了以后,立即象牛似的咆哮起来,要派部队来夺人。坂本见河野要动蛮,忙又“献计”说:“游击队厉害得很,大本是城里警备司令的亲戚,还是给游击队送点粮食,把人要回来要紧”。河野没法,只好同意了。大本被放回来了,他们当然不知内情,还着实感激坂本的“救命之恩”哩。

我们的部队不断壮大,人多了,但缺少棉衣过冬。坂本又及时送来情报:县城里的日本警备司令部将给楂林的日、伪军运送一部份军需物资,其中有军火、药品和毛毯。我们得到情报后,巧妙地截获了这批军需物资,使部队安然度过寒冬。

坂本一次又一次地给坚勇大队送来有价值的情报,使河野屡屡失利受挫,引起河野对坂本的怀疑。

不久,坂本又送来情报:采伐公司曾命他在春季大兴采伐。他用各种办法拒绝执行,因而被公司以违令罪撤职,另委派了一个叫黑田的日本人来楂林督工。采伐即将开始,黑田要亲自到杜门视察,望大队长及早采取措施。

这一天清早,坚勇大队派了四名侦察员化装成种田的农民,分散在杜门村口的稻田里。果然,不一会见穿黑西装的日本人同坂本出现在村口。侦察员们先后爬上田坎向他们靠近。等到相距五、六米时,四个人拔出快慢机,一拥而上。黑田一看情况不妙,急速从裤兜里拔出短枪,没等他举枪射击,两只手已被我们侦察员扭

住，反剪在身后，手枪被缴下了。

黑田对坂本破口大骂：“八格亚鲁，你私通游击队，我要向军事法庭告你”。突然，冷不防他争脱双手，跋脚就逃。侦察员就用快慢机把黑田击毙在杜门村口，并随即用芦席将尸体包裹起来，运到大队部。

为了对日军进行宣传，陈大队长命令战士用口薄板棺材，装了黑田的尸体，棺盖不钉死，在盖上贴了封条，上面用毛笔写了告日军官兵书。趁着黑夜，将棺材送到浙赣路苏溪镇日军警备队中队部的碉堡下面。

过了三天，坂本跑来报告苏溪镇鬼子的情况。原来，日本兵看到黑田的下场，动了厌战情绪。坂本就乘机说，游击队满山遍野，惹不得，打不得，死在中国连骨灰都寄不回去。因此，这些日本兵都唉声叹气、怨言连天。

黑田事件更使河野怀疑，采伐公司也怀疑坂本从中作祟。一天夜里，河野带着几个日本兵冲进坂本家里，把坂本逮捕了。河野将坂本看押起来，准备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回国再执行死刑（据说日本侵略军凡在国外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者，必须押回本国执行）。

我们知道坂本被扣押后，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

老楼终于打听到河野要派人将坂本押送到日军驻金华警备司令部候审的消息，我们立即派了部队去路上伏击、拦截。

在押解途中，机灵的坂本趁火车在苏溪一段转弯慢行时，从火车上纵身跳下来。我们的战士立即冲上去接应，不顾日本宪兵的枪弹，掩护坂本撤进丛林。

坂本来到英勇大队，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我上前紧紧握住坂本的手，由衷地说：“欢迎你，坂本同志，其实你早已是游击队员啦！两年里，你为游击队做了不少事，为抗日作出了贡献。”

坂本连忙谦逊地说：“应该的！应该的！和你们比，我还差得远哩！”

从此，坂本成了一名正式的抗日游击队员。他很快就和战士们混熟了，与大家一起练兵、一起打仗，同甘共苦，坚决不要特殊照顾。

不久，楂林炮楼里的日本侵略军被赶走了。楂林成了坚勇大队活动的阵地。为了给诸暨的日本警备队以打击，我们决定拔掉诸暨红桥宣何街的一个汪伪军据点。

坂本知道后，坚决要求参加。我和陈大队长看着坂本，立即谋划出一个巧夺敌人据点的作战方案。坂本听了之后，眉飞色舞地连声称妙。

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大摇大摆地直奔红桥宣何街汪伪军据点。伪军见是日本兵来了，慌忙开门迎接。坂本第一个冲进据点，堵住敌人；那些汪伪军懵懵懂懂地还没明白过来，便当了俘虏。坂本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五年五月某日，金义浦八大队获得情报：第二天，日寇的一个小队带领伪军要出来“扫荡”，将经过金华东部连塘潘村。领导决定打伏击战。结果消灭了这股敌人，并活捉到四个鬼子兵和一个伪兵。其中有两个鬼子十分顽固。在送往金萧支队路经诸义东时，我们就请坂本去做他们的工作。坂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中国是好的，没有侵略我们，我们日本是错的，侵犯了中国。我在中国被俘虏，他们是自卫、正义的。我们是错的，有罪的。我们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这种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战争”。那两个顽固的日本俘虏听了坂本的话，觉得有道理，最后表示愿意投降认罪。

一九四五年九月，金萧支队奉命随浙东游击纵队全部北撤。到达长江以北的海安时，坂本向陈大队长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陈大队长真诚地表示欢迎。并且说你若入了党将来回国，还可以把关系转去。不久，坂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撤部队到达涟水整编后，我们就分手了。

部队进入山东解放区不久，纵队司令部驻扎在华丰新汶煤矿

区,我在政治部民运部工作。一天,我和坂本意外地相见了,高兴地拥抱起来。他告诉我,他参加“日本反战同盟会”的证明,已由在延安的野坂参三负责的“日本反战同盟总部”转到纵队来了。我问他 在楂林的妻子和孩子的情况,他黯然地说:“不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我了解到,部队北撤后,他的家属受到国民党的严重迫害。

那次相会后,我就再未见过坂本,但关于他的事迹,从战友们那里时有所闻。

抗战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从华丰方向过来日军的一个旅团,不肯向我军投降缴械。旅首长就叫坂本和另一个战友宫本一起去做劝降工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闯入敌营,对日军晓以利害,终于迫使该部日军分三次向我们缴械。缴获了山炮、轻重机枪、步马枪等大量军用物资。

一纵有了山炮后,在三旅成立了炮连,坂本就在炮连当教官。

解放战争中,坂本不仅克尽一个炮兵教官的职责,而且,每每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亲自操炮射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被誉为“神炮手”。

淮海战役后期,我军追击敌人到安徽萧县和永城之间时,把敌人团团围住。当坂本用山炮平射敌碉堡时,不幸被敌人的一颗流弹击中。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

坂本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他的亲骨肉——一个儿子、两个孙女亦留在中国。

解放后,在义乌楂林大队的村口,竖立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坂本贤阶烈士的纪念碑。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第四部分

日寇暴行一斑

“千人坑”

——日本侵略军屠杀乔司人民纪实

余杭县乔司乡乔司西街头保庆桥畔的“千人坑”，坑边的戊寅公墓埋葬着千余具白骨，它记载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和乔司群众的血泪史。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杭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沦陷，随后乔司镇也陷于敌手。占领乔司的日军有百余名，分别驻在五仙殿、东汽车路边、平家桥等处。在主要道口均设了岗哨，从此他们奸淫虏掠，强拉民伕，无所不为。五仙殿有一孕妇被鬼子轮奸后，用刺刀将她肚皮挑开而死，惨不忍睹。由于日寇不断骚扰屠杀，群众提心吊胆，一日数惊。

二月十八日（即戊寅年正月十九日），一场空前的灾祸降到乔司人民的头上。这天天亮时，笕桥的鬼子开到乔司，在北街开始放火，随后，临平镇、长安镇和杭州的鬼子也赶到了，总共约二百多人。八九点钟光景包围了乔司镇四周，封锁了各路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鬼子施放火枪烧房子，用步枪和机枪扫射慌乱外逃的群众，一边放火，一边开枪，见房就烧，见人就射，霎时整个乔司火光冲天。

鬼子是由东面包围过来的，西面保庆桥便成了群众逃生的主要途径，群众大批被杀害，在公路上、桥边、河边、小路上、池塘边，到处都是被杀害的尸体。黄源兴酒店一个职工，被鬼子用指挥刀拦腰砍了一刀，肚肠流出体外而死。冯信发和祖父、父亲三人在夜里逃到北面三里的永仁庙，但其母亲不放心残疾卧床的外婆没有

走,早上她把外婆搬到外面,在两副棺材之间藏好,刚离开家门不远就被鬼子打死。西街金宝珠全家被鬼子枪杀,她自己逃到了船里仍被杀害。城隍弄汪凤珍在上午鬼子放火后,从陆路难以逃出,她即与六个妇女和一个婴儿,同乘一只船,想偷偷划过保庆桥往北逃命,但这时鬼子已经把桥守住,见了她们就开枪射击,她听到枪响倒在船里,六个妇女被打死,她躲在同伴的尸体下一动不动,鬼子以为都死了,这样她躲了一下午和一夜,到第二天天亮时,她睁开眼见没有鬼子兵了,才上岸逃了出来。船内的婴儿也没死,可是她的父母亲都被鬼子杀害了,成了孤儿。外地一只载运甘蔗的船,摇到保庆桥附近,被站在桥上的鬼子看见了,硬逼他们将船摇至桥边,将船上的人全部枪杀了。这样鬼子在乔司四周屠杀了无辜群众数百人。

九时许,鬼子兵把未逃脱的和躲藏的搜出来,用刺刀逼押到保庆桥,关在汽车站里,其中有张宝福、陈文奎、沈雪坤、周金荣父子三人、金宝珠的父亲和马祖宝夫妇等三四百人。这时鬼子兵排好队,由队长训话后,集体屠杀就开始了。鬼子先从关在车站的人中叫出一个来,站在东面的公路上,枪杀后,再从里面叫出一人,叫他把刚打死的尸体拖到车站后面的池塘里,再叫他回到刑场,又将他枪杀。如此反复数十次,鬼子看到这样的速度太慢,又生恶计,改用一根绳子捆绑两人,同时可枪杀两个。一次陈顺叔是绑在前面,枪声一响,后面的人饮弹倒下,但他未被射中也同时倒地,待到深夜逃出;另一次是沈雪坤,他只打伤嘴巴,也逃出性命。到了下午三点钟,车站里剩下的一部分人纷纷议论:“看来鬼子是要把我们全部杀掉,横竖早晚都是死,冲出去可能还有一线生机。”陈文奎提议,大家鼓起勇气,一起拚命冲出去!群众就象潮水般向外涌,陈文奎冲在头里,鬼子集中火力扫射,大多数被打死,但也逃出了张宝福、马祖宝的儿子等数人,陈文奎身中二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倒在途中地沟里,深夜爬到一家草舍,后被亲友救出。

第二天(即二月十九日)早晨七点多钟,鬼子又从笕桥机场乘

汽车到保庆桥，架起机枪，见人就扫射，把回来看家的人又射杀了好几百。日寇连续烧杀了三天，使乔司镇成为一片灰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保庆桥旁的池塘变成了血肉塘。乔司方圆十里的农村也未逃出劫难，许多房屋被烧，群众被杀害。乔司镇这次鬼子大屠杀，据后来调查(包括附近农村)，被害同胞达一千三百多人，烧毁房屋七千余间(镇上二千多间)，使无数同胞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中共余杭县委党史办公室收集整理)

青东大屠杀纪实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七至廿日)，日本侵略军在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的策划指挥下，抽调了第十七旅团、驻江湾的大部日骑、松江日军守备队、青浦日军守备队、及和平军许连生部、青浦保安队等四千余人，对以观音堂、陆家角、刘夏为中心的青东地区(即青浦县东部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烧杀。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凌晨二点，四千余日伪军在旅团长长谷川的指挥下，突然出动，对青东地区作了战略包围。他们用“拉网梳篦”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重点地区，结果连我三支队的影子都未找到。侵略者迁怒于无辜的乡民，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

天黑后，日军到处抓人，许多平民百姓被关押起来。嵩山钱家石桥的杨东生，听到抓人的风声，想藏起来，不料被日军发现，一枪打死在家里。十五日，青浦守备队长今井带一百多日伪军在观音堂镇上挨户搜查，把抓到的人押到顾家客堂里毒打，甚至用烧红的铁条烙脸，通红的铁条按在皮肤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和难闻的臭

味,被害者在惨叫声中昏死过去。下午,在镇上吃喜酒的朱阿虎、徐迪明等十七人被押到“朝阳门”(现凤溪农机厂)前,用刺刀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戳死在坑内。其中仅邱百亮一人因未中要害而幸存。在章家角村,日军把章伯荣、章金荣、章小弟等人关进章金海家里,严刑拷打。被打得半死不活,拖到场地中央,绑在稻床上面,下用稻草浇上煤油,把他们活活烧死。这次章家角村被杀了二十六人。在陆家角,日军酒足饭饱后,把周逸君、周文彬、张毓文、姚枚生、方梦云、张绵江等十五人押至村外,杀人取乐。在和睦镇,道士姚金华正要出门,正好遇上日军,问他背的什么,姚答“家生”(即做道场的道具),日军以为“家生”即枪枝,就把姚抓了起来,将姚和姚母用开水泡死,并将姚家的三间草房二间瓦房烧毁。年仅十五岁的小苏北邬阿三,恰在镇上打短工,因语音不同,日寇硬说他不是好人,吊死在树上。还有姚礼德的母亲和徐进余二人被绑住手脚仍进河里活活溺死。十六日,日军搜索到杨字圩,马云南祖孙十一人在家干活,日军不问情由,即加屠戮,马氏一门顿时断绝。白发苍苍的老竹匠姜如松,从田里干活回来,恰与日军相遇,躲避不及,被杀死在南仓房路上。十七日,虹桥头村的钱浩生、钱宝仁、钱企鹏等四人,摇了船去吃喜酒,路过火烧桥村时被日军枪杀。下午四时许,翟小和尚、张阿炳等五人,在费更浪和杨木桥间的田野里干活,日军视作活靶子,他们全部饮弹身亡。十八日,周家浜村的吴海生、徐伯华等十一个青壮年在家干活,日军凭空臆测,断定他们是三支队的后备队员,严刑逼供。他们说不知道,牛棚栅、枪托便雨点般地飞来,徐伯华的肋骨被打断,当场惨死在天井里。其余的人被毒打后扔进河里,开枪打死。晚上,在沙家村的日军,把林顺余、朱小桂生、高才生等二十余人押至野外,用刺刀来发泄他们的兽性。村民马小弟被戳了十七刀,朱小桂生被戳了十三刀,这次屠杀仅林顺余一人幸免。十九日,迳庵村的青年朱其昌、朱阿六被日军抓住,他俩的母亲想送钱去赎儿子,谁能料到,丧尽天良的日军,竟把二位母亲的衣服剥得精光,取笑作乐,然后用刺刀戳

死。她们的儿子也被割去睾丸而丧命。村民王辛如,被日军用铁钉钉在长凳上,再灌水刑逼,日军得不到什么,就对准他的耳朵开枪,脑壳被穿了个大窟窿。在嵩子庙,村民王湘涛因轧的米多,日军咬定他是游击队,被吊起来,用烧红的火钳烙脸,再用火烧他的下身,王当即昏死过去。王的妻子正在怀孕,挺着大肚子,杀兴正浓的日军,对着她的肚子连戳数刀,还没有出世的婴儿便与母亲一起被残杀。接着,日军的刺刀对准了王的七岁的儿子,刺刀从啼哭的嘴中插入,往上一挑,头颅分成二瓣。这天晚上,庙后竹林中的三个大坑里,叠着八十余具尸体。二十日,日军到师姑桥村搜查,发现郑庚生家门前的两棵大树上竖有两杆鸽旗,日军认为是三支队架设的电台天线,因而冲进郑家,不问青红皂白,将三个养鸽青年杀死。二十一日,里巷村的王伯余、侯小狗、李小妹、盛洪生等五个青壮年,被残忍的日军用铁镢(翻地的农具)一个个地砸,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肋骨折断,无一人幸免。在青沪公路以南的横港村,日军烧了大量的开水,倒在二只七石大缸里,然后,对抓来的人进行吊打,遍体鳞伤后,甩在滚烫的大水缸里,四、五十人都被折磨致死,连六十九岁的老学究彭景贤也惨遭毒手。二十二日,青沪路以北的日军全部撤至路南。市川寿三郎窜到南和尚泾、方家窑、孔巷等地,抓了查品连、王树生、沈德士、陈伯余等九十八人,押到南崧塘村施刑拷问。日军将人手脚绑住,倒竖在开水缸里,泡个半死,再戳死抛入河里,水为之变红,真是惨绝人寰。二十三日,前明村的汤柏松被日军剖开肚子,将大肠拉出,挂在桥上,行人惨不忍睹,掩目捂嘴而过。金云村的陈小妹老太,在田里劳动,被日军无故打死,尸体为军犬撕得粉碎。二十四日,日军从打铁桥到湖夏,沿张步泾、新开泾、胡泾三条河进行大烧杀,二十多个村庄化为焦土,六十七人丧生。二十七日,市川寿三郎突然返回,将观音堂镇团团围住,只许进,不许出。同时,把附近村庄的几十人抓到镇上。上午,把南仓房的陆阿宝等二十余人杀死在镇南市梢的文公浜里。下午,把刷布路村的姚锦清、袁小二等二十三人,押到庙场西南的

坑边戳死，再在坑四周浇上煤油，进行火焚，焦臭弥漫全镇。接着，又把邱锦青等二十八人押到八角东杀死。村民邱昌时身中十三刀，因未中要害而幸存。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有一千余人，有名有姓就有七百四十余人，其中枪杀一百十九人，戳死三百六十六人，烧死七十二人，溺死二十人，打死十四人；被烧房屋共一千八百三十九间；其中，草房一千一百七十九间，瓦房六百六十间，有三十余个村庄化为废墟。日本侵略者对青东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牢记这笔血债，绝不能再让这种历史重现。

（中共青浦县委党史办公室）

难民生活的回忆

郑雪芬

在日本鬼子侵占杭州以前，我丈夫是个电机工人，靠着自己的劳动过活。鬼子侵占了杭州，不少人逃难到了外乡，我夫妇俩也逃到了金华，托亲靠友的找点事情做。可是，鬼子飞机天天去轰炸，夫妇俩只好每天早晨八点就带上一天的食粮躲到离城十多里路的乡下，晚上五点钟再回来，在夜里做点勉强维持生活的事情，但在兵慌马乱的时候，可做的事情很少，所以饭也吃不上。一九四〇年二月廿日，这是我永难忘记的一天。这一天，鬼子的三架飞机到金华轰炸，眼看着三百多个无辜的中国人民，在鬼子的滥炸下粉身碎骨。就在这天，国民党抓来的一百六十个壮丁，关在三成店的土地庙里，三架飞机，轮回滥炸，土地庙塌了，一百六十多个壮丁也就被压得同声惨叫死去。我还亲眼看到一个背被炸伤的中年男人，挣扎着跑了几步，然后惨叫着死去。

日机的轰炸天天迫害着人们。一天，飞机又来了，我刚跑到不

远的田里，一颗炸弹落了下来，“轰隆”一声，炸弹翻起泥土来把我掩盖了，好容易才被救了出来。从那次以后，半个月的时间，一闭眼就看到了日本飞机的凶相和被炸死者的惨状。晚上，飞机又来了，大家拚命的奔逃，在抢过浮桥时，因为人太多，桥被压断了，六十多个人，就这样掉在河里淹死了。

金华被日寇侵占后，在城中无所不为，于是我又逃到乡下，生活更加没法维持，一天，我准备进城探听，刚走到城边，鬼子的哨兵，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一顿打。后面又过来了两个卖鸡蛋的妇女，日本强盗也是不问长短的就把鸡蛋踢翻，把这两个女人打得头破血流。日子过不下去，就只好回到杭州。回来时，我所熟识的亲友大都家破人亡。邻居黄金凤，本是开机坊的，也在日本鬼子的迫害下，把家产卖掉去逃难，十个月的时间，钱都吃光了，回到家来，没有办法生活。（王巨光记）

（节选自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浙江日报》第三版）

顾祝同、黄绍竑关于日寇在浙江 散布鼠疫菌罪行呈报行政院电

一、黄绍竑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电

重庆行政院长蒋委员长：

密。上月二十八日敌机空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人民收集送检，由本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刘经邦、本省卫生处防疫专员柯立光、本省卫生处第二科长郑介安、本省卫生试验所技正吴昌萃五员在严密检验下，鉴定其形，并业经辨明系鼠疫杆菌，除继续由该员等施行其他生物学试验外，谨电呈报。永[康]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叩 歌生印。

二、願祝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电

渝行政院长蒋：

密。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处断为鼠疫杆菌，则以后继续散布传染堪虑，敬请转饬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学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职顾祝同鱼绒印。

（原件存南京市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寇曾在宁波金华 散放疫菌杀害人民

萧 凡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宁波由于日寇投掷鼠疫跳蚤而突然发生了鼠疫，很快地蔓延开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亦不积极设法抢救。到后来鼠疫严重地区就只好被封锁，不准和外边接触。有的地区就纵火焚烧，房屋东西以及人畜全部活活烧死，其惨状难以形容。而损失之巨大，更无法统计。那时金华也不例外，一天，敌机来轰炸，在大桥附近轰炸了一阵之后，即低空掠过。上空“嗖嗖嗖”的一阵响，大片黑点子飞速地降落下来。在大桥附近投下了许多装满泥土的麻袋，麻袋震裂后，泥土里跳出了无数跳蚤，向四处跳散了。于是，这个地方迅速地戒了严，不准人们往里走，麻袋也不敢去动它，因为人们知道宁波的鼠疫，也是这样一大堆麻袋传开来的。自那天起，敌机又接连来投了几次麻袋。不久之后，鼠疫便在金华发现了。患者的症状和鼠疫病状完全一样。不少人因而死亡。日寇这一残酷兽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节录自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当代日报》）

回忆义乌一带人民 惨遭日寇鼠疫菌杀害

楼 秋 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但是用飞机、炸弹、大炮、机关枪来肆虐烧杀中国的和平城市和人民,而且用更凶残的“细菌”来毒杀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在浙东城市散布过鼠疫病菌,衢州、义乌、东阳,都先后发现“腺鼠疫”和“肺鼠疫”,杀害了我们浙东无数无辜的人民。

我的家乡义乌北门,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间流行着严重的鼠疫,时间延续达半年之久,先后摧病致死者共一百余人。整个县城,成了恐怖世界,浙赣路客车也不在义乌车站停靠。染上腺鼠疫的人在一、二天里面便中毒身死,染上肺鼠疫的人在一、二小时内便吐血送命。有全家十二人均遭死亡的。许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埋葬后接着自己也病了,很快地死去。许多人家死了人,没有人料理丧葬,因为同时间全家的人都病了。邻居害怕传染,早已远避。到后来,疫区的居民,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只好活生生地在家中等待死亡。死亡是多么恐怖!防疫队的杜队长,为了救治一个患肺鼠疫的病人(义乌东门张伯诚的妻子),因不留心忘记带上口罩,而传染上肺鼠疫立即身死。我的老师楼良相先生的老婆病了,楼先生到医师楼纯寿家去请他医治,谁知到了医生家中,医生却早死在床上无人埋葬。我的三婶陈月珠,死后留下四个小孩,最小的女儿碧芳,到她妈死后,还哭着要吃娘的奶。我三祖母的未婚媳妇朱宝钱,知道自己得了疫病,无法挽救自己宝贵的青春,只好坐在窗前哀哭,等待着和自己的未婚夫再见一面。我七岁的妹妹筱芳,那样天真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已经上学半年了,学校里的老师常常称赞她的活泼聪明,鼠疫竟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夺走了她的小生

命。当她疫病初起,开始发热时,我抱着她,她求救的眼光盼着我,低低地问我:“哥哥!我会不会死?……”唉,多么痛心!至今想起,我的眼泪就会立刻夺眶而出。

日本法西斯蒂强盗杀害了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杀害了我亲爱的小妹妹,真是仇恨深似海。

(节录自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浙江日报》)

大 皎 的 浩 劫

田 心

谈起日本鬼子,每个大皎人都咬牙切齿,永远忘不了。到(一九四一年农历)五月初五那一天,即使在九年的后现在,愤怒的火焰仍燃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时我还只有十岁,但我亲眼见到的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奸、掠暴行,并不因我年小而有些含糊。

当时鄞县、余姚等六县相继沦于日寇,六个县政府都搬到大皎。村中最好的一座房子,被俞济民的小老婆占住,警察、小兵住满每户人家,大皎街畸形地空前热闹。

当日本鬼子开始进攻大皎的前夜,相离廿里路的樟村人,已遭日寇枪杀、奸污,大皎山上,已经可以听到日本人的马叫声,而那些官儿们却还做着好梦。第二天——五月初五黎明前,日本人分五路进攻,在日本人快近大皎时才发觉,于是慌成一团,一点也没有抵抗,只知逃命。俞济民起先坐了车子,前面拉,后面推,往里山逃,结果对面碰见日本人,只好丢了车子向山上爬,险些丢了脑袋。一连串灾难让大皎人来受。

日本鬼子到达大皎时,威吓来不及逃避留在家里的老百姓,枪杀了二个农民,被毒打的更不可以数计。一把火,把三百余家的

大皎村,多年来劳苦人民所累积下来的财物化为灰烬。村中的哀号声,惊人心魄,我那时躲在山上的树丛中,一共有数十人,曾祖母把颤栗的手更紧地抱住了我,我们每一个都看得很清楚,自己的家开始被烧了,倒塌了,每个人的眼中冒着火,咬着牙齿,掉下晶大的眼泪。但日本鬼子还不够满足,四处找寻妇女,发泄兽欲。

我们躲着的地方,被鬼子发现了,在刀枪下,被赶了出来。我的右腿被鬼子踢了一脚,曾祖母被推倒在地上,造成几月后曾祖母的惨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六个比较年青的妇女,及二个未成熟的女孩子,都被拖上了一座墓前的拜台前,那里已拖来了二十多个妇女,立刻凄惨野蛮不忍为睹的一幕开始了。

妇女的挣扎,惨叫、哀求。丢在地上的孩子的哭声,鬼子的大笑声,惊碎了我小小的心灵,我钻在曾祖母的怀中颤抖,害怕、愤怒,我不忍再看着听着。如我那时再长大三四岁,一定也不能免去同样的污辱,但不管那一个妇女姐妹们被耻辱,我们都是同样极端愤恨的。

火烧后的大皎,全村只有零碎的六间破屋幸存,这是全村人唯一栖身之地。饥寒交迫,吃野草、糠皮,火堆中翻掘出来的焦米,成为村人唯一粮食;百余人挤在一间破屋内,晚上没有被,只好挤着互相得到一些人体的暖气。我曾祖母就在这时候卧了一月多病死去,病中的惨叫声,就可想象她已吓得胆破,在亲戚的照顾下,她总算喝着粥。但糠皮对我是吃得够难受!后来我被姑婆领了去,抚养长成,没有了家的痛苦,却不会因此而消失的。

在这样饥饿交迫的时候,鬼子还要来村上骚扰,我堂姐只有十五岁,就被二个日本兵强奸了,造成她以后沉默、消极,黑暗的生活。堂伯父的腿被日寇打伤,拉伕子更是平常的事。所有的田地都荒芜了,饥饿愈来愈迫人,有几家全家饿死,很多人向村外去求乞。我家隔壁的一个女孩子,向别村去求乞的途中,遇到日本鬼子,把她的二只脚绑在二匹马上,让马把她的身体对半扯开。这是人做的事吗?每一个人永远是永远忘不了的,复仇的根是生长在每一个人

的心底。

(节选自一九五一年三月六日《当代日报》)

三十九天血的经历

倪哲生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日寇以一个师团的兵力窜扰浙东武义县属古竹，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人员以及当地无数的青年男女都被“俘虏”，当夜监禁在一所破旧的酒作坊内，用绳索紧紧地反绑在一起，不准动，也不准大小便，他们说我们是“支那兵”，不分皂白地用枪柄乱打，用刺刀在我们头上乱敲乱刺，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次日兽兵要行动了，从我们这批人当中拖出一部分去枪毙，未枪毙的押解金华方向去，路上我们到处都看到兽兵无恶不作的暴行。一到金华，又立刻押着我们向汤溪进扰。这二三天当中，我们眼见沿途被拉的挑夫很多，年老体弱的被刺死在路旁，三五步即可看到一个。有一天，在山上宿夜，雨下得很大，兽兵们自己用油布盖好睡觉，我们却被绑在大树上淋雨。到了汤溪，在郊外休息，我和同伴周定枢（杭师毕业学生），趁兽兵不注意时，越溪逃跑，霎时枪声四起，我腿部中弹倒地，兽兵赶来，复在我背上连刺三刀（现在有疤痕），血肉模糊，痛得不知人事，大约过了一小时左右，醒来又被拖到附近的一间茅屋里。第二日，被单独押向龙游方向去，过灵山、溪口时，只见到处火烧，遍地尸横。我上厕所去，亲见二个农民，一在粪缸里，一在厕所里负伤呼救，状极凄惨。由龙游至衢州路上，所见更为惨酷：有一个数百户的大村子，兽兵来到之前，青、壮年已逃避一空，家家户户仅留老公公、老婆婆看守；兽兵一到找不到粮食，又拉不着伕子，就挨户把这些老年人杀光。这夜，和我同住在一起的一个青年伕子，他痛恨兽兵的暴行，

破口大骂。起初兽兵不懂他的意思，还和他打趣寻乐，后来不知怎的怒了，先则拳打脚踢，继而大家用刺刀向他猛刺，连刺数十刀，血流满地而死。第二日，流窜到衢州城外的火车路两边，一部分兽兵出去放火掳掠，一部分兽兵迫使挑伏冲城；在郊区眼见有不少的善良人民被屠杀，更有一批披头散发赤裸裸的无辜的妇女在露天里被强奸，喊声、哭声，不绝于耳。衢州沦陷的一天，兽兵集体的把城里成千的居民，送到河塘里及飞机场里去活埋，这一连串空前的暴行，真是任何人梦想不到的。我们在这凄惨悲痛的日子中，被捆绑在铁路的枕木上，连日大雨淋得我们不能抬头，愤怒的火焰又燃烧在心头，真是难受已极。后来，兽兵宣布衢州“会师”的目的已达，把我们放了绑，囚在一小间民房里，我与同难者在一个深夜，冒死突窗而出，脱离了虎口。

（节录自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浙江日报》第三版）

日寇火烧南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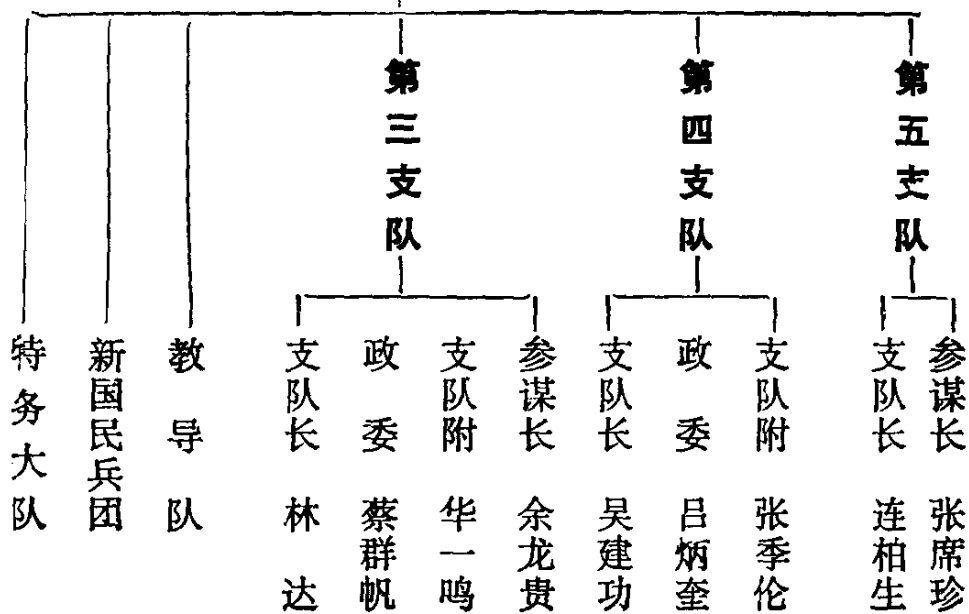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敌人调集驻奉化、鄞县、慈溪、余姚等地的日伪军，向四明山区进行第二次扫荡。日寇所过之处，房屋被烧光，猪羊等家禽家畜被抢光杀光，财物被劫掠，还杀害我来不及躲避的同胞，山区人民受害极其深重。如在大岚乡黄家庄受害的有五百六十七户。蜻蜓岗、俞家横、夏家岭，晓云乡的高岩村，后溪乡的南黄村，还有邻县鄞县的大皎、小皎村等八个村庄，都被不同程度的烧毁。十二月十日，鄞县来的鬼子兵二百余人，从晓云到大山，又窜到南黄村，鬼子一靠近村就把南黄四面包围，挨户搜查，抢劫财物，宰猪杀羊。全村群众早已逃避上山，鬼子在第二天早晨，竟丧心病狂地放火烧村，全村二百三十七户，被烧二百三十四户，

仅残剩三户。烧死二个群众(一个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名黄桂林,一个是尚未取名的小孩,是黄瑞仁的小儿子)。鬼子烧村后从茭湖方向去余姚城。

(中共余姚县委党史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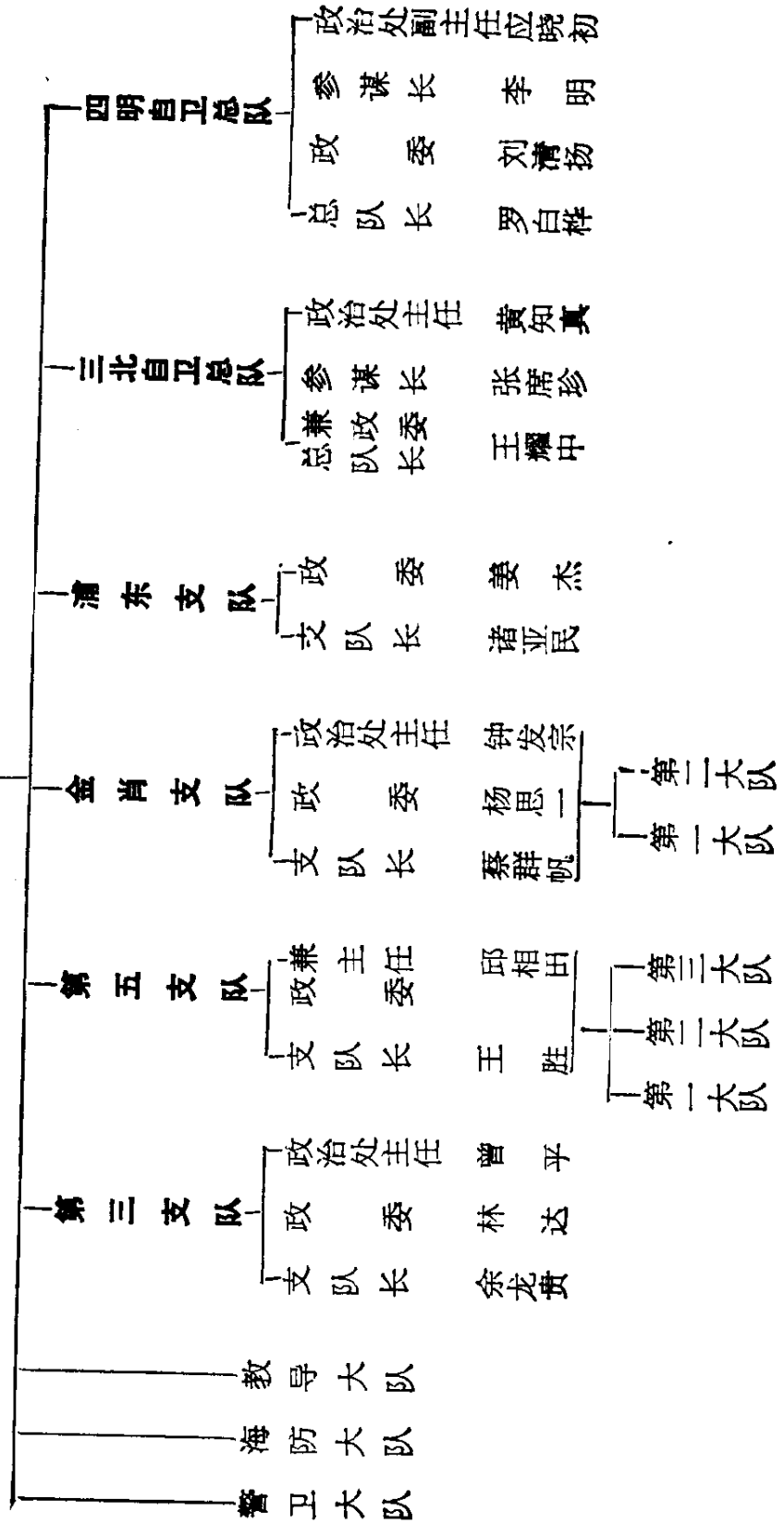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三北游击司令部)
战斗序列表之一 (1942年8月)

| | |
|-----------|-----|
| 司 令 员 | 何克希 |
| 副 司 令 员 | 连柏生 |
| 政 治 委 员 | 谭启龙 |
| 参 谋 长 | 刘亨云 |
| 政 治 部 主 任 | 张文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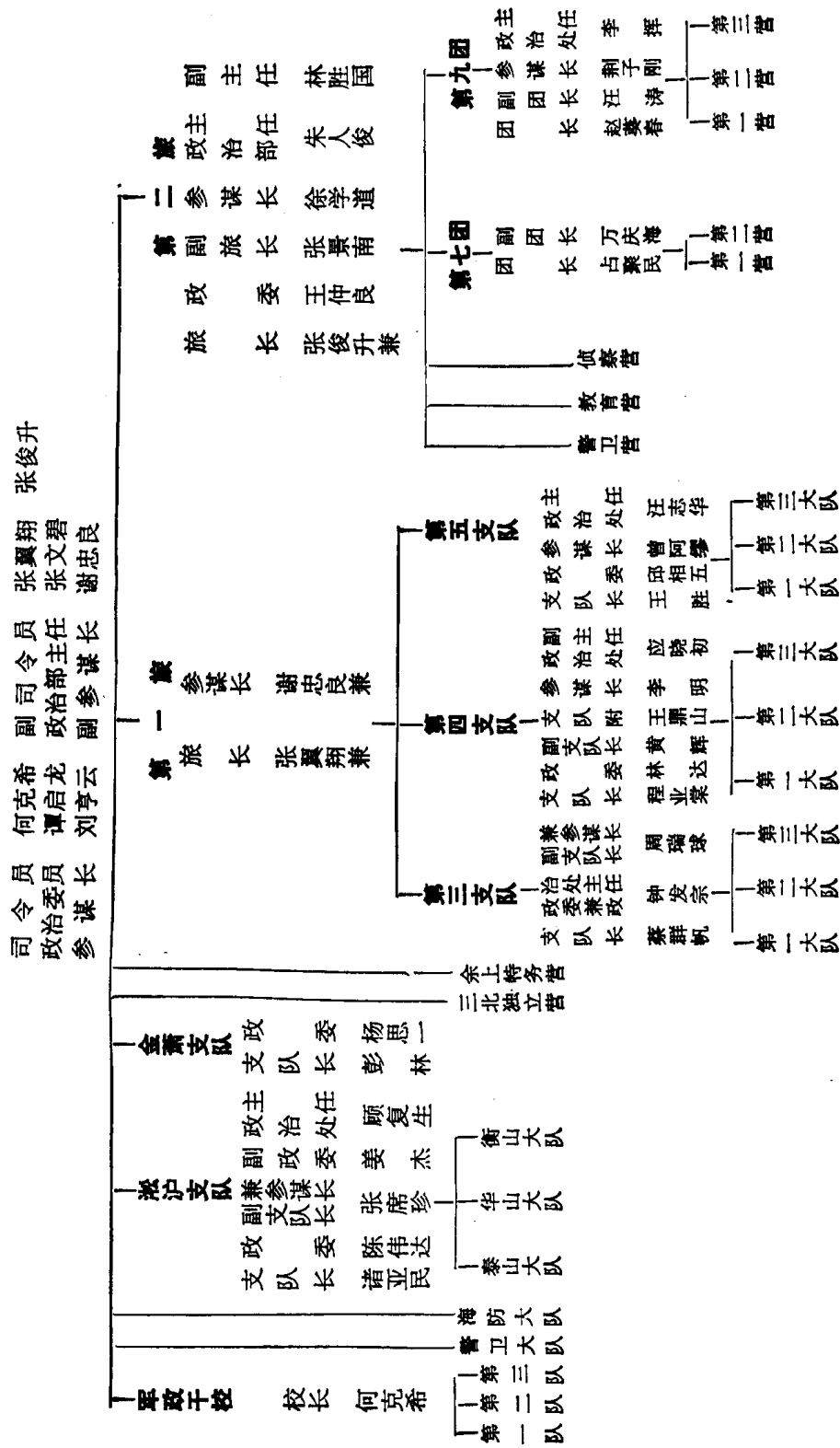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战斗序列表之二 (194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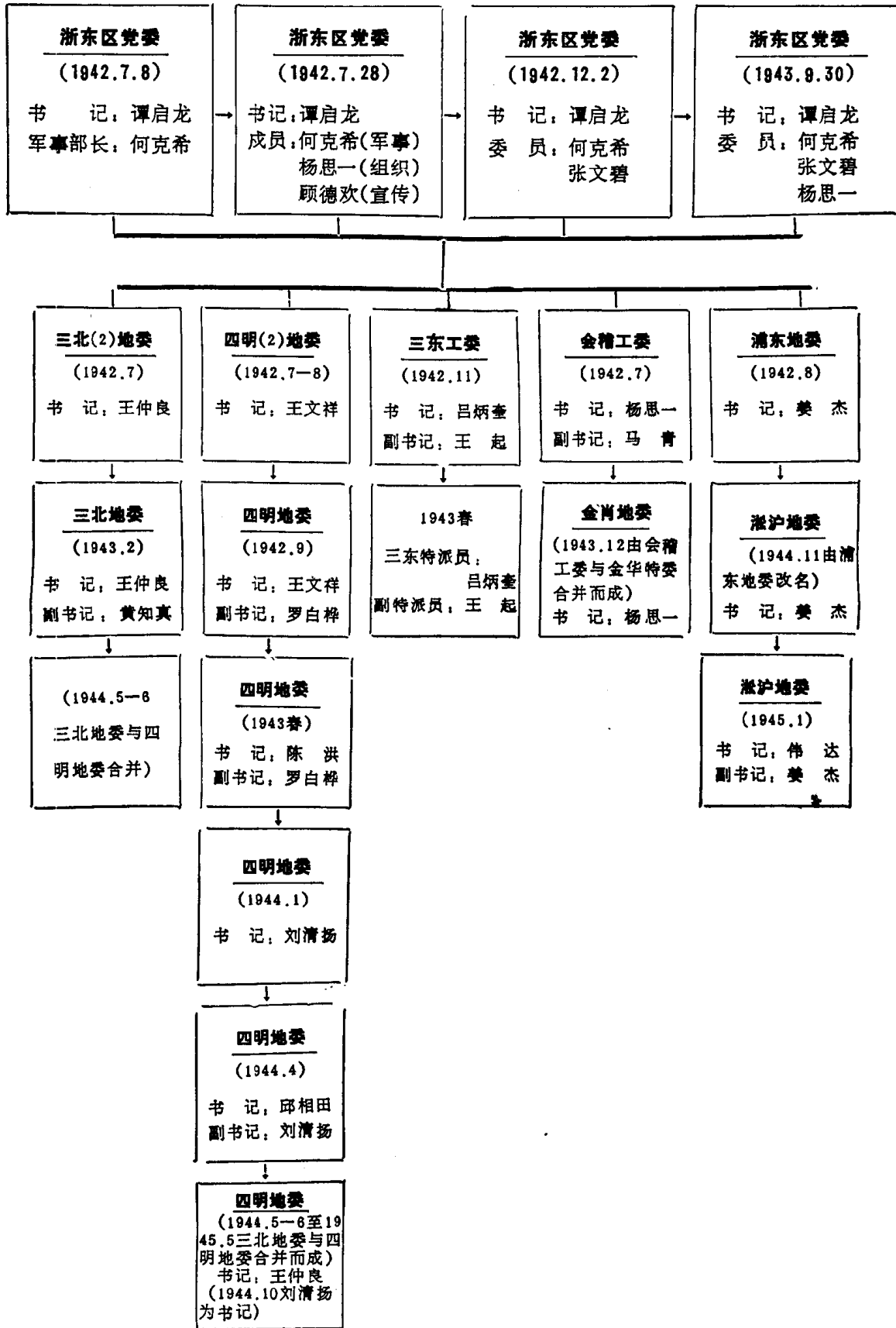
司令员 何希
政治委员 谭克
参谋长 刘启
政治部主任 张云
副主任 李文
主任 文碧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战斗序列表之三 (1945年9月)



中共浙东区委员会组织系统表



封面
目录
正文